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05 第五期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目錄

清代嘉義沿山地名「枋仔岸」的內涵探究.....	1
日治時期嘉義社口古柯農場初探.....	41
唐代回紇政策的成效與影響.....	73
〈塞蘆子〉詩所見蘆子關在唐代關中北面的軍事地理.....	111
無辣不歡—.....	133
歷史照片解讀—以「袁世凱與外國使節」照片及相關史料為例..	157
1937年美國《時代》雜誌對中國的報導.....	197
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台」、「中」對外政策的改變.....	263
英國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歷史發展與未來展望.....	285

清代嘉義沿山地名「枋仔岸」的內涵探究

池永歆*

摘要

清代論及當前嘉義沿山的文獻資料中，曾多次出現相關於「枋仔岸」的地名，包括：枋仔岸山、枋仔岸隘、枋仔岸生番界（碑）以及枋仔岸庄等用語；但卻未見有對其意涵加以說明的文本。本研究透過文獻爬梳，探明漢字的「枋仔岸」即源自《熱蘭遮城日記》所出現之 *Pangalanh*【枋仔岸社】的台語音譯；隨後並引述清代文獻中，涉及「枋仔岸」地名的文本；最後經由古文書文本，進而掌握枋仔岸社所指涉之地理空間範圍。此基礎地名探究，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清初當地的族群分布、乾隆中葉番界位置以及原漢間的租佃關係等歷史地理的課題。

關鍵詞：枋仔岸、嘉義沿山、古文書

* 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任教授。通訊作者：池永歆，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E-mail：james@mail.ncyu.edu.tw。

An inquiry into the place-name '*Pangalangh*' of Chia-yi mountain-bordering area in Qing Dynasty

Yeong-shin Chyr**

Abstract

From Dutch period to Qing Dynasty, the place-name of *Pangalangh* frequently appeared in many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a-yi mountain-bordering area. But there is no concrete discussion about this place-name. By the reason, this paper will pay much attention to debate the place-name '*Pangalangh*' so as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For the purpose, this paper will use many kinds of original archives to study this place-name.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ill further help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a-yi mountain-bordering area.

Keywords : '*Pangalangh* Chia-yi mountain-bordering area, place-nam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史料所出現的「枋仔岸」地名，已消失於當前嘉義沿山的土地空間，純粹成為歷史文獻存在的名詞；與其相關的史料詞彙，包括：《熱蘭遮城日記》所言及的 *Pangalangh* 社（枋仔岸社）¹，以及清代方志與地圖上出現的枋仔岸山²、枋仔岸生番界碑（界址）³與枋仔岸隘等⁴。若能將文獻上的歷史地名枋仔岸，回歸到實質的地理空間，或許可釐清枋仔岸社於荷蘭殖民後期或迄清初的分布位置⁵，並可確認清乾隆中葉番界的具體範圍、界碑所在的位置，以及漢字書寫的地名枋仔岸（庄）所涵蓋空間，由之可更透徹地了解清代嘉義沿山深邃的歷史地理內涵。

迄今對於枋仔岸地名內涵及其所意指之空間範圍的討論，依舊闕如；在於已刊行的文獻除《熱蘭遮城日記》曾對 *Pangalangh* 社有片段記錄外，清官方文獻對此的記載，僅隻字片語，難以做出更為深入的討論。此外，「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乾隆 49 年（1784）繪製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番界紫線圖），以及「台灣汛塘圖」、「台灣汛塘望寮圖」，僅能約略比對出枋仔岸（枋仔岸山）與其它現

¹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III-A/1648-03-10，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² 可參閱：《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33、36。

³ 可參閱：《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頁 63-64。

⁴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台灣汛塘望寮圖」。網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digitalatlasen/map_detail.jsp?id=A104000124。瀏覽日期：2017/11/19。

⁵ 本研究在此的預設是「枋仔岸社」於這段期間內未徙社。

存地名的相對空間，難以辨識出確切位置。儘管，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諸如《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1915）與《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1917），對於鄒族各社群的歷史傳說有所記載（諸如社群分布、遷徙等），但難以由此回推，以之當作了解 17 世紀中葉迄 18 世紀初，其分布與遷徙的確切證據。

相關「枋仔岸」地名用語的研究，限於史料的不足，實難詳細討論；但本研究仍盡可能地爬梳眾多文獻、古文書契資料，期能較全面地探討「枋仔岸」地名所深具的歷史地理意涵。在研究的論述上，首先將引述數份曾論及「枋仔岸」用語（枋仔岸社、枋仔岸山與枋仔岸）的史料文本，諸如《熱蘭遮城日記》、清初的縣志與府志，以及數份清雍正迄乾隆年間所繪製的地圖（汛塘圖、番界圖）等，以之初步討論早期文獻資料對枋仔岸、枋仔岸山所作的描述。隨後，直接引述論及枋仔岸的多張古文書契文本，探討枋仔岸的具體位置；就在於古文書契的文本，是最直接涉及當地歷史地理的素材，保留過去最詳實的土地與生活的記錄。研究者透過其文本的解讀，得以回溯過去歷史現場，或空間中的人文活動足跡。古文書契文本，可提供地名內涵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地方歷史的基礎研究，極為豐富的資料。由之本研究將得以釐清枋仔岸社在荷治與清初時期可能的社域、清中葉漢庄枋仔岸的空間範圍，以及探討清中葉鄰近枋仔岸庄的番界大致位置。本文這些先行性的研究成果，將可作為更細緻地討論嘉義沿山歷史地理的基礎。

貳、荷治時期迄清代有關「枋仔岸」的文獻文本

就本研究所收集之已刊行的史料分析，自荷蘭時代的《熱蘭遮城日記》迄清代中葉，有關「枋仔岸」的用語，包括：枋仔岸社、枋

仔岸山、枋仔岸生番界（或界碑）、枋仔岸隘，以及稱為枋仔岸的漢庄。以下行文，將對其逐一詳盡論述。

一、《熱蘭遮城日記》對 *Pangalangh* 社的記載

較早提及枋仔岸社的文獻，為江樹生譯註的《熱蘭遮城日記》所言之 *Pangalangh* 或 *Pangalang* 社；其羅馬拼音依本研究的眼光，就是漢語系台語的枋仔岸社發音。《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所載 1648 年 3 月 10 日第五次召集的地方會議記錄，首度出現 *Pangalangh* 社名⁶：

從 *Pangalangh*，這社位於 Tarrocquangh 社南邊，以前未曾與公司結盟，有一個名叫 Sauki 的靈敏的人前來要求結盟，因他的請求，乃給他一根權杖，告訴他應該辦理的事情，並勸戒他要有良好的表現，任命他為該社的長老……。

由此段記載可獲悉：*Pangalangh* 社直到 1648 年，才由 Sauki 代表該社與荷蘭殖民當局結盟，並被授予權杖；其社址位於 Tarrocquangh 社的南方。但因 Tarrocquangh 社一詞僅出現在這次的會議記錄上，無從得知其確切位置。隨後在 1651 年 3 月 7 日的會議記錄提到⁷：

在 *Pangalangh*：長老 Sauky 稱病，派他的女婿帶他的權杖來，

⁶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III-A/1648-03-10，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⁷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III-C/1651-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乃予繼續留任；因該社戶口眾多，因此另立一個名叫 Amul 的人為第二個長老，並交給他一根權杖……。

長老 Sauky 即 Sauki，應為音譯的異寫。這次的會議記錄指出：該社群因為戶口數眾多，因之殖民當局另立一個稱為 Amul 的長老，處理社務。

1655 年 3 月 9 日，學校教師 Jan Druyvendal 曾向殖民長官報告：他前去邀請位於福爾摩沙北邊山區裡的幾個村社的長老，參加地方會議的情形；他提到⁸：

在那中間，他也派兩個人去上述 Alitavang 社，以及 Pangalang 社，希望從他們得知那邊情況如何。這兩個人回來以後告訴他說，當他們走近 Pangalanh 社時，看到該社周圍都埋設著陷阱，而且他們被一群武裝的人用弓箭逼退。從這情形可以看出，這兩個村社都很張狂，蓄意不良。

在 Jan Druyvendal 報告之後的同月 19 日，殖民當局舉行地方會議，由 Pangalanh 社的兩位新任長老 T. Raup 和 Taumul 出席⁹：

從 Pangalanh:T. Raup 和 Taumul 來出席，兩人都繼續留任；質問他們，為何在他們住處周圍埋設陷阱；對此，他們說他們是無辜的，那不是他們做的，而是 Tamataloes 社民埋設的；

⁸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5-03-09，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⁹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5-03-19，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乃命令這兩人要忠於職守，並各贈一塊 cangan 布和一包煙草……。

兩人除續任長老外，並被質问到：為何在 Pangalangh 社周圍設立陷阱，甚或對待教師 Jan Druyvendal 等一行人的不友善舉動，他們否認這事，把這一切推給 Tamataloes 社民。《熱蘭遮城日記》並未對 Tamataloes 社有更多記載，無從討論該社位於何地。

當年 5 月 18 日，由派駐諸羅山社的政務員 Nicolaas Loenius 寄回殖民當局的信箋中，載有對 Pangalangh 社最直接的描述¹⁰：

我們收到諸羅山的政務員 Nicolaas Loenius 從那裡寄來的一封信，其內容簡述如下，即他遵照此地的命令，親自帶領士兵去過虎尾壠以後，從那裡要回去諸羅山的回程，他經過 Pangalangh 社、Taringalang 社和 Emroy 社這些小村社，跟他們互相交談，極力促使他們遷移，他們都已承諾，將於再來的 9 月一起下來，拋棄他們的村社，去跟 Takapoulangh 社人住在一起。此事，他們和上述 Takapoulangh 社人都已宣誓遵辦。又，他也已使 Talakbayen 社人樂意拆毀他們自己的村社，去跟 Dovoha〔打猫〕社人一起居住，為此目的，也已在上述村社找好一塊適當的土地，測量好該街道的形勢，並已照著那形勢開始建造。

政務員 Nicolaas Loenius 在信箋中，提及他從虎尾壠社

¹⁰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5-05-18，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Favorlangh) 南返諸羅山社的路上¹¹，需途過 Pangalanh 社、Taringalanh 社和 Emroy 社；他極力要這三個社群徙社，社民宣誓照辦並允諾 9 月會遷去與 Takapoulanh 社同住¹²。可見這四個社群的居住地間隔不遠，或彼此間具語言、文化同質性。

8 月 31 日，同樣由 Nicolaas Loenius 回報給殖民當局的信箋，再度提及這三社將會如期徙社一事¹³：

我們也收到諸羅山的政務員 Nicolaas Loenius 的一封信，報告說他那地區的村社與原住民的情況良好。由於良好的理由和他勤懇的勸勉，以前叛變的 Talacbayan 人（按照我們的好意）已經答應離開他們的村莊，下來跟 Dovaha〔打貓〕社人住在一起。互相鄰近的 Emroy 社、Pangalanh 社和 Taringalanh 社的原住民也終於決定，將於再來的 9 月一起下來，並一起去定居在小 Takapoulanh 社裡非常適當的地方，而且他們已經答應，搬家時將互相幫助。

根據這封信箋所言，Emroy 社、Pangalanh 社和 Taringalanh 社，

¹¹ 《熱蘭遮城日記》對諸羅山社的羅馬拼音有 Tirocen、Tirosen 或 Tirossen 等三種。

¹² 在《熱蘭遮城日記》第二冊、第三冊曾出現三次（大、小）Takapoulanh 社的記錄，其社址無法確認，根據 1646 年 2 月 28 日的會議記錄：「在諸羅山（Tiro sen），或稱 Laos，長老是：Dackalackala、Davalack、Gavil 和 Davoro，他們一直都表現良好……；在小 Takapoulanh（Cleyn Takapoulanh），去年的長老去世了，因此選另外一個名叫 Lissingh Cassourangh 的人接替他的職位……。」可見 Takapoulanh 社與諸羅山社距離不遠。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二冊、1646-02-28，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¹³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5-08-31，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再次應允徙居到小 Takapoulangh 社，並會在遷徙時相互幫忙。

根據隔年 1656 年 3 月 7 日所召開的北區地方會議記錄，未見 Emroy 社和 Taringalanhg 社或小 Takapoulangh 社的長老出席，但卻載有 Pangalanh 社的長老 Saup 與代理 Tamul 的人出席¹⁴：

從 Pangalanh：Saup 前來出席，但 Tamul 因腳受傷，把權杖送來。兩人都予以續任。Saup 和帶〔Tamul 的〕權杖來的人，每人贈送一疋綿布和一包煙草。

參與 1655 年 3 月 9 日地方會議的 Pangalanh 社長老為 Raup 和 Taumul，且繼續留任，可見他們就是 1656 年會議提及的 Saup 與 Tamul 兩人，或因拼音書寫的差異、傳鈔訛誤而致人名有所不同。

先前殖民當局曾要求這三社徙居小 Takapoulangh 社域的合適地點，儘管他們答應辦理，最終有無達成當局的要求呢？依上述文字記載，未能確切獲悉有無徙居事實。本研究有以下推論：在 1651 年 3 月 7 日的會議記錄中，曾提及 Pangalanh 社因戶口眾多而再增設一位長老¹⁵，可見其為較大的社群；或許這三社遷徙小 Takapoulangh 社域後，沿用較大社群 Pangalanh 的社名，由其長老參與地方會議，因之未見另三個社的社名於地方會議時出現。另一種解釋則是 Pangalanh 等社並未如期遷徙、併社，而沿用原社名參與會議。

《熱蘭遮城日記》曾多次載有另一個 Pangalanh 社，係 Outwangh

¹⁴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四冊、1656-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¹⁵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1-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社的別稱；1655年3月19日的會議記錄載有：「從 Outwangh，又稱 Pangalang：Lamare T. Lavere 跟去年一樣，親自來出席，因他在指揮上表現良好，再予繼續留任」¹⁶。Outwangh 社首次出現在 1648 年 3 月 10 日北區村社長老的地方會議記錄¹⁷：

在 Outwangh：長老是 Lassoerangh，這個人需要經由三個翻譯員跟他交談，即從新港的語言翻譯為 Dorcko 的語言，從 Doreko 的語言翻譯為小 Tackapoelang 的語言，再從小 Tackapoelang 的語言翻譯為他自己的語言，因為沒有聽到對他的怨言，只聽到該社一切情況良好，因此也跟去年那樣繼續留任.....。

《熱蘭遮城日記》談及 Outwangh 社時，大都會補充其又稱 Pangalangh 社，諸如 1656 年 3 月 7 日的會議記錄¹⁸：

從 Outwangh〔舊 Wangh〕，又稱為 Pangalangh：Lamara T. Lavara 因生病沒來，但派他的副手來出席。據我們所能查知的，他那病可能是輕微的病，因此贈送一疋綿布給這個副手，因他走了這一趟，並命令他，回去必須轉告長老 Lamara，以

¹⁶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55-03-19，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¹⁷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1648-03-10，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¹⁸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四冊、1656-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後他必須親自來出席。於是再次讓他續任。

多次的地方會議記錄，皆見 Outwangh 社與上列引述的 Pangalanh 社並列，同時派有長老出席¹⁹，據此可推知這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社群。

根據《熱蘭遮城日記》內文所提及之參與北區地方議會、來自當前嘉義平原與沿山地帶的社群，並根據上下文的敘述而推測：Outwangh 社與 Pangalanh 社可能位於淺山地帶或鄰近諸羅山社的區域，但其確切的社域範圍仍難推知。

二、清代官方文獻論及「枋仔岸」的相關用語分析

本研究直截地認為：《熱蘭遮城日記》所言及的 Pangalanh 社²⁰，為枋仔岸社，而推論《諸羅縣志》的「山川總圖」以及卷一封域志「山川」的枋仔岸山的地名，應據此社名而來。這說法依現存清初文獻，亦難以找到相關的佐證資料，就在於清初的志書，雖涉及「枋仔岸」地名的用語甚多，但未曾直接出現過「枋仔岸社」這詞²¹。而《熱蘭

¹⁹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四冊、1656-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²⁰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三冊、III-A/1648-03-10，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²¹ 在翁佳音與黃驗合著的《解碼台灣史 1550-1720》〈頭目長老的「地方會議」〉一節中，曾提及：「1648年3月舉行的北路地方會議，使用了新港語、干仔轄語（Camachat，大肚番王轄區語言之一）、虎尾語及山地語（鄒族語）為通用語。一位鄒族 Outwangh 社（又作 Pangalang，清代文獻作「枋仔岸社」）的長老勝士壠（Lassoerangh），需要經由三個翻譯員跟他交談：第一個翻譯員將會議通用語新港語，翻譯為哆囉國語（Dorcko）；再由第二個翻譯員將哆囉國語翻譯為小蘭社群語（小 Tackapoelang）；接著又請第三個翻譯員將小蘭社群語翻譯為長老的族語。從這一條記載，可見當年台灣話之多元、繁複，更可想像跨語區、跨族群交流時比手畫腳七嘴八舌的忙碌景況」（頁126）。本研究遍尋清代文獻，有

遮城日記》所記錄之鄰近諸羅山社的原住民社群，在清初文獻中已難以覓得其蹤跡。

自荷蘭殖民時代（1624-1662）的晚期起、歷經鄭氏王朝（1662-1683），以迄清康熙末葉（康熙 61 年、1722），約莫六、七十年的時段內，或起自殖民統治者的族群政策、漢人入墾、疾病傳播，以及原住民的徙社、併社等等緣由，可能引發原住民社群空間分布的極大變化、消長。由原先羅馬拼音的 Pangalanh 社名，變成漢字書寫的音譯「枋仔岸」，凸顯出書寫作為一種權力，已由先前的荷蘭殖民當局對原住民社群的統治，轉變為大清帝國對原住民的另種殖民凝視以及土地空間的掌控與宰制。

清初史料雖未曾載有 Pangalanh 社（枋仔岸社），但其台語音譯最終成為《諸羅縣志》所言及之枋仔岸山的命名由來。據當時在牛稠溪與八掌溪流域沿山地帶活動的主要原住民社群，是文獻資料提及的「阿里山社」（阿里山八社），依地緣關係來看，枋仔岸社理應歸屬廣義阿里山社的一個小社群。康熙 24 年（1685）蔣毓英的《台灣府志》，對於阿里山社有如下記載²²：

諸羅之山，自木岡山折而西向，峰巒不可紀極。其峙於東北者曰番米基山（在木岡山之西北，縣治之東北。阿里山社東界至此山止，自此山以東，皆係內山），曰大龜佛山（在阿里山八社東南），曰阿里山（在諸羅山東北。其山下有土番，共八小社），曰肚武營山（在諸羅山東北，阿里山社北界至此山

關「枋仔岸」的用語不少，但尚未發現「枋仔岸社」一詞；又稱 Pangalanh 的 Outwangh 社，是否為本文探討的「枋仔岸社」，本研究對此存疑。

²² 資料來源：蔣毓英《台灣府志》，頁 19。

止……)。

在此引文中，可清楚看到《台灣府志》雖未明言阿里山八社指涉那些社群，卻指出阿里山社是在阿里山下的八個社群，其活動空間的北界是肚武營山、東界是番米基山。康熙 35 年（1694）刊行之高拱乾補纂寫成的《台灣府志》，對阿里山社與阿里山八社的敘述，大抵傳鈔自蔣毓英的《台灣府志》²³。

康熙 56 年（1717）刊行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中，首度明確論及阿里山八社所包括的社群²⁴：

其峙於東南者曰阿里山（山極遼闊，內社八：大龜佛、咍囉婆、肚武營、奇冷岸、番米基、踏枋、鹿楮、干仔霧）。

不過陳夢林在卷二「規制志」的說法，卻與「封域志」對這八社的描述有所出入：「阿里山社、踏枋社、鹿楮社、咍囉婆社、盧麻產社、干仔霧社、奇冷岸社（一作嶠嶺岸）、大龜佛社（郡志作「大居佛」。以上各社俱在縣東南」²⁵。可看到「規制志」多了阿里山社與盧麻產社，但少了肚武營、番米基。而在卷六「賦役志」則提到²⁶：

阿里山社，額徵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二釐（內踏枋、鹿楮、咍囉婆、盧麻產、干仔務等五社……）。

這段敘述的「阿里山社」，應專指有納餉的五個社群。由此可清楚看出，同樣在《諸羅縣志》的文本中所論及的阿里山社一詞，作者

²³ 資料來源：高拱乾《台灣府志》，頁 15。

²⁴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33。

²⁵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42。

²⁶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六「賦役志」，頁 69。

陳夢林卻對究竟包括哪幾個社群，仍存在著差異的說法。

隨後刊行於雍正 2 年（1724）、由巡台御史黃叔璥所撰述的《台海使槎錄》，在「北路諸羅番七」的標題下，提及：「阿里山五社（踏枋、鹿堵、咍羅婆、盧麻產、甘仔務）、奇冷岸、大龜佛……」²⁷；在此的「阿里山五社」顯然傳鈔自《諸羅縣志》有納餉的五社。隨後黃叔璥又寫道²⁸：

阿里山乃總社名，內有大龜山之大龜佛社、霧山之干仔霧社、羅婆山之咍囉婆社、東髻山之沙米箕社、八童關之鹿堵社、溜藤山之阿拔泉社、朝天山之踏枋社、豬母嘮社（一作肚武營），共八社；納餉者五社。盧麻產社今無番，皆民居；康熙五十六年，瘴癘死亡甚眾，遂徙居於阿拔泉社，附阿里山合徵者。

「北路諸羅番七」標題之下，列有奇冷岸社、盧麻產社，但卻無阿拔泉社；不過以上徵引的內文，未見奇冷岸社，卻有阿拔泉社，並說明：「盧麻產社今無番，皆民居」；由《台海使槎錄》的這段內文，則可看出盧麻產社與阿拔泉社之間有著密切關係，因之未死於瘴癘者皆移居溜藤山的阿拔泉社；阿拔泉社則併入阿里山社而納餉²⁹。除了有納餉的五個社群以外，清官方對於其它社群內涵的了解，應十分有限，僅止羅列或傳鈔社名。此外，根據《諸羅縣志》與《台海使槎錄》有關這些社群的文本，可獲悉其所論及的阿里山八社內涵，自

²⁷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19。

²⁸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22。

²⁹ 這裡所言及的「阿拔泉社」理應與盧麻產社有地緣關係，甚或兩者間文化屬性相近。另由嘉義城隍廟正殿左側外牆上鑲嵌的「阿拔泉社番租充為香燈示告碑記」，載有道光 18 年（1838）通事宇旺將阿拔泉社所屬的番租獻為城隍廟的香燈資費，可推測先前可能為盧麻產社所有的活動空間，其徙社後轉為阿拔泉社所轄。

康熙末葉以來，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原因或可推測起自：數個小社組成較大社群，而以較大社名稱為代表社名，或是併社、遷徙它地所致（諸如盧麻產社）；當然也可推論源於自稱或它稱的社名差異，或經漢字所拼寫社名所導致的歧異性³⁰。

由此討論，本研究認為：枋仔岸社可能是依附於大社群的小社名；因官方納餉單位係以大社群為代表，故枋仔岸社未見於文獻的記載。

儘管本研究所徵引的清代文獻文本，未曾論及「枋仔岸社」；但相關於「枋仔岸」的地名用語，多次出現在康熙年間的志書、雍正迄乾隆年間的多幅地圖，以及乾隆 48 年（1783）呈給乾隆的奏摺上。

康熙 56 年（1717）刊行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中，首度出現以漢字書寫、涉及枋仔岸的用語「枋仔岸山」。其內文於下：

其峙於東北者曰大福興山（一名大目根），與覆鼎金山（方言謂釜為鼎，山圓淨如釜之覆，故名。）同為邑治之右肩。又東而枋仔岸山在玉山之北、鹿楮山在大武巒之東北、打利山在鹿楮之北、鹿仔埔山在打利川之西南，則右肩之外輔也³¹。

曰八掌溪，發源於玉山。過枋仔岸、阿里、牛朝（俱山名）之

³⁰ 有關清代「阿里山社」的多重內涵可參閱：洪麗完（2012）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台灣史研究，18（1）：41-102。該文提及：「八社的內涵自十七世紀以來，並非固定不變，可能涉及遷徙或併社、分社，甚至自稱、他稱的不同；如盧麻產遷入阿拔泉社而消失，奇冷岸社、阿拔泉社同屬伊母祝群，番米基為踏枋（達邦）大社的小社。其中大龜佛、咍囉婆、踏枋、鹿楮、干仔霧是較穩定的阿里山八社成員，盧麻產社、阿拔泉社從不一起出現，似乎存在某種牽連」（53 頁）

³¹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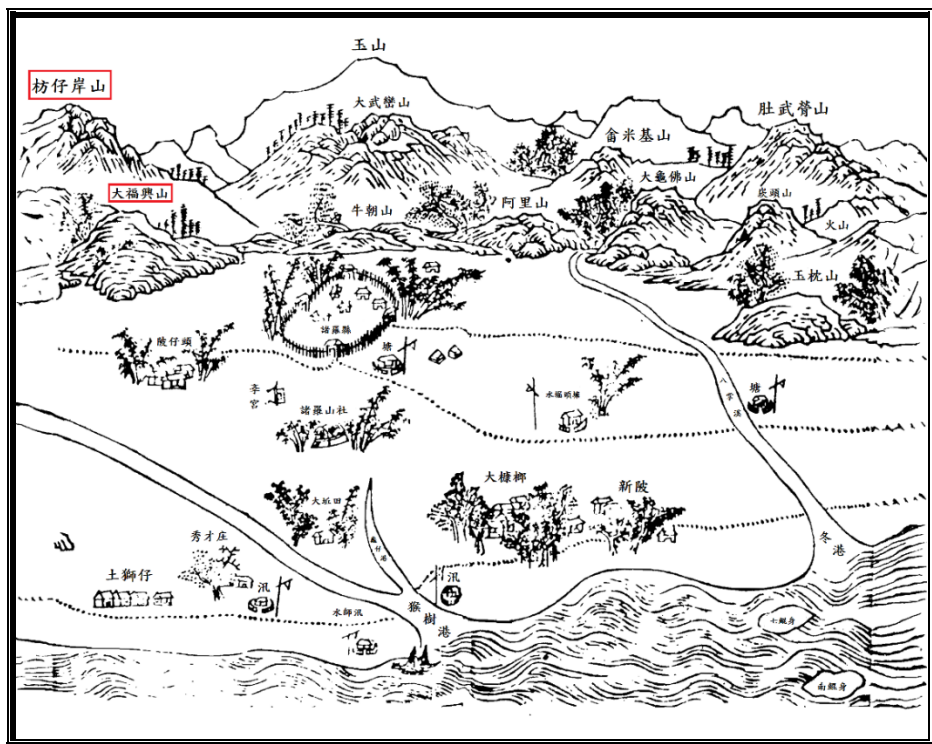
西南，為八掌溪渡（邑治南，抵郡渡此）³²。

這兩段陳述，比對《諸羅縣志》「山川總圖」所繪之枋仔岸山與其它地名的相對位置，約略可推測出大福興山之後的枋仔岸山，可能位於當今嘉義沿山的竹崎鄉或番路鄉境內。竹崎鄉的大部分空間，均屬清代大目根保的範圍；其保名由來，即源自大目根山（大福興山）。而在此的「枋仔岸」一詞，顯然是作為形容詞，其內涵於《諸羅縣志》中未見說明；但經由上一節討論，可清楚獲知枋仔岸應源自 Pangalangh 社【圖一】。

此後，刊行於乾隆 6 年（1741）、劉良璧重修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亦言及：「枋仔岸山，在玉山北」³³。顯然引述自《諸羅縣志》的說法。

³²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 36。

³³ 資料來源：《重修福建台灣府志》，頁 7。



【圖一】《諸羅縣志》「山川總圖」的枋仔岸山

資料來源：《諸羅縣志》「山川總圖」，頁 10。

=繪製於雍正 12 年至乾隆 24 年（1735-1759）之間的「台灣府汛塘圖」³⁴，圖幅上出現「枋仔岸山」的地名；其與大目根山的相對位置³⁵，略異於《諸羅縣志》的「山川總圖」，枋仔岸山係被置於大

³⁴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台灣府汛塘圖」（繪製年代推論應在雍正 12 年至乾隆 24 年間）。網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7/11/19。

³⁵ 在「台灣府汛塘圖」上並非寫為大目根山，而是「大六根社」，顯然是大目根山下的番社。

目根山南邊。隨後，繪製於乾隆 40 年至乾隆 51 年（1775-1786）之間的「台灣汛塘望寮圖」³⁶，則有「枋仔岸隘」與「枋仔岸」兩地名出現；該圖上並以紅線標誌出界內、界外空間。此圖雖無大目根山，卻在牛稠溪與其支流（濁水溪、清水溪）之間出現「大目根」，應是界外地的漢庄名稱。對比於其它界內地名，位於該圖界內地的枋仔岸，應專指漢人的聚落。當地何時有漢人入墾以及建立聚落，年代則不詳。

以現代學術的觀點來看，「台灣汛塘望寮圖」上的牛稠溪與八掌溪，係以枋仔岸之後的山為分水嶺。就兩幅地圖的實質內容而論，基本上是一種示意圖的繪製，重要目的是陳列出汛塘與望寮的相對位置，而非真實地理空間的呈現，難能詳實地比對出地名的方位與位置【圖二】。

乾隆年間所繪製、已出土的數幅番界圖，由於繪製重點是邊陲地區的番界（界碑、界址），呈現清官方所要厲行的族群政治，因之對於臨近番界的山脈、河流、番社和漢庄，及其彼此間相對位置的描繪，顯然較為精準，尤以乾隆 49 年（1784）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番界紫線圖）特具參考的價值。

乾隆中葉所繪製的「台灣番界圖」³⁷，繪有立於諸羅縣沿山的生番界碑、界址六處：「梅仔坑生番界碑、中坑生番界碑、葉仔林生番界、蘆麻產生番界、枋仔岸生番界、埔姜林生番界」³⁸。該圖首處載

³⁶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台灣汛塘望寮圖」（繪製年代的推論當在乾隆 40 年至 51 年間）。網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7/11/19。

³⁷ 資料來源：〈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載於施添福（1991）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46-50。

³⁸ 「中坑生番界碑」可能位於大林的中坑附近。「葉仔林生番界」應是原先議定的「葉仔坑口」（民雄鄉東興村葉仔寮）的界址位置，「葉仔林」查無相關地名，

有：「圖內民番界址，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界。台、鳳、諸三屬用紅線，源其舊也……。」可見諸羅縣議定的界址，當為先前所欲立界碑處；而界碑、界址上所冠的地名，諸如梅仔坑、中坑、葉仔林、蘆麻產，枋仔岸以及埔姜林等，應為界內的漢庄名稱。由北而南所列出的這些界址、界碑，廣泛分佈於現今沿山的數個鄉鎮。枋仔岸並非設立「界碑」，而是根據當地地形特性劃定番界；此圖僅簡要繪上枋仔岸生番界的所在地，難以辨識出界址所在地與其它地名的相對位置。

乾隆 48 年（1783）4 月 29 日³⁹，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等人上呈的奏摺，曾提及「枋仔岸」⁴⁰：

嗣埤堵庄漳匪羅安見漳庄被泉眾焚殺，日甚心懷不忿，倡首糾眾邀集山仔門⁴¹、枋仔岸等共十九庄。招翁三才、盧強等及自往附和者，計首夥共三十五名。……。

可見在乾隆末葉時，枋仔岸已發展成諸羅縣沿山一個頗具規模

又「葉仔寮」也稱「葉仔林」，依本研究判斷可能圖上的「葉仔林」的「葉」字為「葉」的訛誤（兩字就外觀確實相似度極高）。「蘆麻產生番界」的碑址，位於「金交椅山」的西方，可能位於內埔仔玉山岩（香光寺）附近。「枋仔岸生番界」，照圖看來，位於八掌溪的北岸，正確位置不詳。「埔姜林生番界」（原圖誤寫為姜埔林生番界），依照安倍明義在《台灣地名研究》的說法，位於中埔的頂埔一帶（頁 228）。

³⁹ 日期為陰曆，公元日期為 5 月 29 日。

⁴⁰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2150122-00862 00868.txt〉。該奏摺題為〈為辨明諸羅漳泉匪民攻庄焚搶殺命拏獲首夥要犯分別究辦彙奏事〉，原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55【影印本】，頁 862-868，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網址：<http://thdl.ntu.edu.tw/>。瀏覽日期：2017/11/29。

⁴¹ 「山仔門」即今日竹崎鄉義和村的山仔門。

的漢庄；由此奏摺來看，其居民多為漳州籍，附和同籍的羅安，因而卷入這次漳泉籍漢人間的衝突。

繪製於乾隆 49 年（1784）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番界紫線圖），是當前最能提供清晰之乾隆末葉諸羅縣沿山空間圖像的資料⁴²。由此圖可清楚辨識出「枋仔岸生番界碑」立於作為牛稠溪與八掌溪分水嶺的大崎山旁，並鄰近界外的漢庄石頭埔。另一張繪製於乾隆末葉的「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圖幅上的地名標示較為簡略，但亦清楚標出「枋仔岸生番界碑」的位置在大崎山南側⁴³。

此後，少見官方文獻有關枋仔岸或枋仔岸山的記載⁴⁴。

至此，根據本研究所徵引之《熱蘭遮城日記》、清康熙年間的志書，一直到雍正與乾隆年間多張地圖、奏摺等史料所示，相關於「枋仔岸」的用語，有枋仔岸社、枋仔岸山、枋仔岸、枋仔岸生番界碑（界址）等；「枋仔岸」從最初專指原住民 **Pangalanh** 社群的用詞，最晚自乾隆初葉起已成為漢庄的名稱。透過多份史料的文本拼砌，僅能獲致這般瑣碎答案。而作為漢庄的「枋仔岸」名稱，最終也未能流傳到當前，僅成為一個文獻上曾出現的歷史地名。

經由上述的討論，本研究感到興趣的是：漢庄「枋仔岸」所指稱的空間範圍位於何處？唯能掌握其確切位置，方能知悉乾隆年間生番界碑、界址的所在地點，而對嘉義沿山的歷史地理內涵，有更深入

⁴²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頁 63-64。

⁴³ 資料來源：《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解讀》，「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頁 112。

⁴⁴ 在清光緒 4 年（1878）所繪的「全台前後山輿圖」，仍繪有「枋岸山」，但與其他地名的相對位置顯然不夠準確。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全台前後山輿圖」。網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60。瀏覽日期：2017/11/19。

的討論。以下行文，本研究將佐以數張有關枋仔岸的古文書文本，對於枋仔岸社的社域、枋仔岸庄的範圍以及當地番界等數個歷史地理課題，詳加討論。



【圖二】「台灣汛塘望寮圖」的枋仔岸與枋仔岸隘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台灣汛塘望寮圖」。



參、有關「枋仔岸」地名的相關論題探究

一、枋仔岸社的社域空間及其與盧麻產社的關係

當前已發現、相關「枋仔岸」地名的古文書契，為乾隆 24 年 12 月（1760）居住在「枋仔岸旧社」（舊社）的陳深所立的賣契⁴⁵：

立賣盡根契人：枋仔岸舊社陳深。有自己開墾埔園壹所，土名倒頭崎腳，大小坵數不計……。三面言議，出得時價銀三拾大員正，其銀即日全中交收足訖，其埔園隨即踏付銀主前去起耕掌管、耕作……。乾隆貳拾肆年貳月 日立賣盡根契人：陳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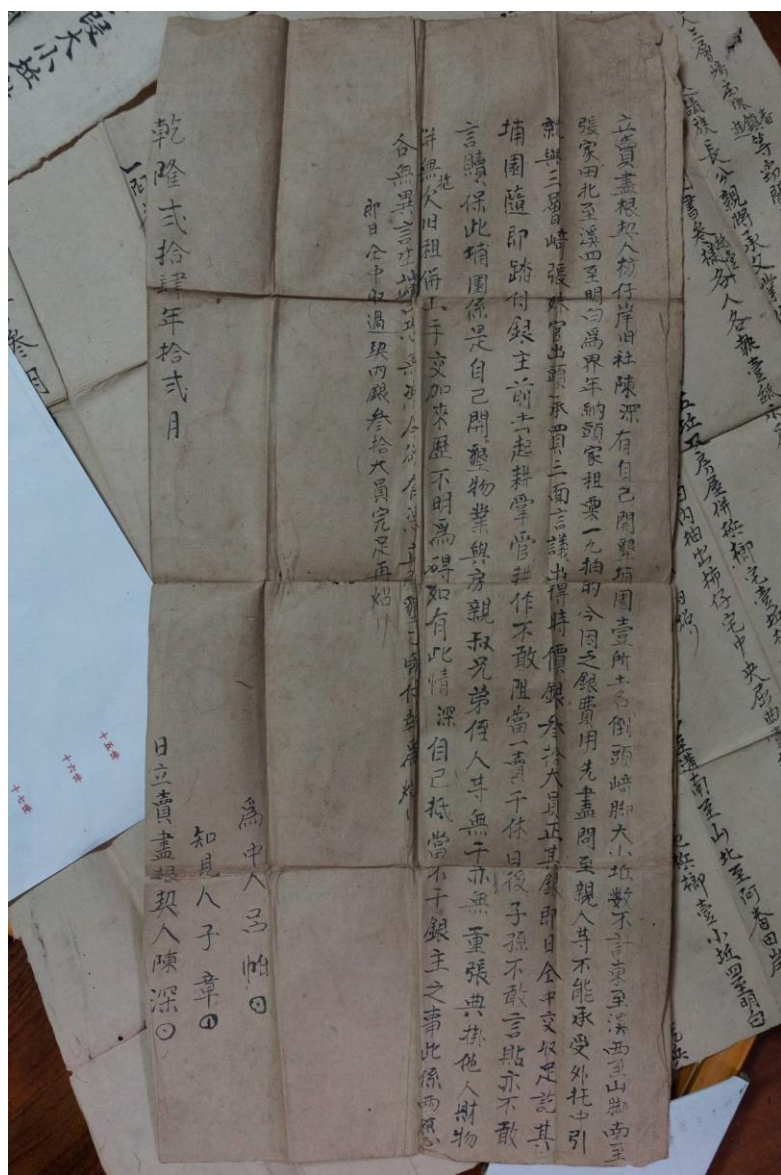
儘管杜賣的土地位於今日中埔鄉三層崎的倒頭崎腳，但對本研究來說，最具意義的是古文書所出現之立契人陳深居住地「枋仔岸旧社」（舊社）的地名【照片一】。

舊社位於今日的竹崎鄉昇平村，當地耆老對此地名有大致如下的說法：「舊社」地名源自該地原為原住民（鄒族）的居住地，爾後他們遷徙到新社坑居住（竹崎鄉義隆村），而原先居住地被稱為舊社，新的居住地則為新社。儘管透過現存的漢字地名，容許有這樣略有望文生義的說法，但未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如此的推論。顯然這些地名，是當時入此墾闢的漢人所做的它稱命名，應無疑義。此外，漢字所書寫的地名「枋仔岸舊社」，看似意味著當地原為本研究所指稱之枋仔岸社的舊社址，則其活動領域當擴及當前竹崎鄉內埔村、昇平

⁴⁵ 資料來源：「中埔三層崎張家古文書契」，乾隆 24 年 12 月（1760）陳深所立的賣契。

村等處，而內埔村的清水溪畔仍保有的「番仔園」地名，或許就是當時枋仔岸社的田園所在。就此，當可由此地名而論證：當地原為枋仔岸社的舊社域空間，而該社的原住民，曾在特定歷史時期中於此地居住、活動的事實。

據《諸羅縣志》與《台海使槎錄》所載，清初另有屬於鄒族的盧麻產社，於鄰近枋仔岸社的空間中定居。就此而論，枋仔岸社與盧麻產社兩者間似乎有一定關係。《熱蘭遮城日記》雖有 Pangalangh 社（枋仔岸社）的記載，但卻未見盧麻產社的相關記錄；而清代諸多文獻有載盧麻產社，卻僅有相關「枋仔岸」的用語，未曾直接提及枋仔岸社。這對本研究來說，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課題。以下將對此加以討論。



【照片一】乾隆 24 年 12 月陳深所立的賣契

資料來源：「中埔三層崎張家古文書」。拍攝日期：2017 年 10 月 5 日。

蘆麻產或蘆麻產社等用語，最早出現在《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與卷六「賦役志」），以及隨後的《台海使槎錄》⁴⁶、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乾隆一、二十年間的官方文獻，則寫為「蘆麻產」⁴⁷或「鹿麻產」⁴⁸，係為一漢庄。至乾隆 28 年（1763）余文儀主修的《續修台灣府志》，則稱「蘆麻產街」，可見當時該聚落已有一定的規模。《熱蘭遮城日記》所載之參與 1656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召開的北區地方議會的原住民社群，並未出現蘆麻產社的紀錄⁴⁹。對蘆麻產社最直接描述，出現在《台海使槎錄》，載有：「蘆麻產社今無番，皆民居；康熙五十六年，瘴癘死亡甚眾，遂徙居於阿拔泉社，附阿里山合徵者」⁵⁰。這段話是身為巡台御史的黃叔璥，於康熙 61 年（1722）6 月抵台後巡行、引述地方官或通事所提供資料，而對蘆麻產社所做的最直接記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

蘆麻產地名所指涉的範圍，為當前竹崎鹿滿村一帶，但根據清

⁴⁶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19、122、167。

⁴⁷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1865448-00170 00171.txt〉。乾隆 15 年（1750）7 月 2 日「戶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定台灣府屬廳縣生番地方界址」，張本政主編，《清實錄台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1993 年，第一版），頁 170-171。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瀏覽日期：2018/10/19。

⁴⁸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l-3052656-0027 300335.txt〉。乾隆 27 年（1763）12 月 18 日福建巡撫定長「審擬諸羅縣民婦蘇李氏與陳坤殺死親夫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v.47）》（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頁 273-335。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瀏覽日期：2018/10/19。

⁴⁹ 資料來源：「台灣日記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記》第四冊、1656-03-07，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瀏覽日期：2017/11/25。

⁵⁰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22。

初文獻資料，諸如《諸羅縣志》來推論，當時盧麻產社民的活動區域，應遍及現在牛稠河流域的中上游。日治時期由小島由道與河野喜六所調查、編撰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1917)，於「種族之沿革」標題下，根據部族的祖先傳說，對北鄒族的 imucu (伊母祝群)，有如下的記載⁵¹：

……imucu 的 mfozana、tapangu 兩氏下新高山後，起初居住於竹頭崎下方的 youmasana (漢稱鹿麻產庄)，而後卻因漢人的欺壓而遷往 pipiho (漢稱阿拔泉)，但是仍無法避免漢人的欺壓，最後才定居於現今之地。

將報告書的內文比對《台海使槎錄》對盧麻產社的敘述，或可推論當前已消失的 imuca (伊母祝群)，曾在清初定居於竹頭崎下方的 youmasana，爾後以漢字書寫為盧(鹿)麻產社，但其語意不詳。此外，由阿里山社的土官阿貓里與漢人吳宅立於康熙 58 年(1719)的「合約」，亦可得知盧麻產社民先前的活動空間，往西至少延伸到番仔潭(義仁村)(伊能嘉矩，1991：340)⁵²。可見康熙 56 年(1717)盧麻產社遭受瘴癘侵襲、遠離原先的社域空間，而遷徙並依附到溜

⁵¹ 資料來源：《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漢譯本)，頁 14。

⁵² 「合約」內文於下：「立合約人：阿里山土官阿貓里。因本社餉課繁重，無可出辦，將本社界內番仔潭草地一所並埔林，東至坑頭、西至大溪、南至雙圈潭、北至牛坑崙水流內，四至明白為界，將草地付與吳宅前去招佃，築陂開墾。每年公議納租叁拾石，貼本社餉銀。收成之日，車運到社交納，務要經風扇淨。其築陂開墾工費，欲贖之日，估價清還。凡招佃之人，須當誠實，不得容匪。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勒。今欲有憑，親立合約一紙，付執為照。知見人夥長吳鳳康熙伍拾捌年叁月 日阿里山土官阿貓里 代書人夥計黃勒」。本研究對此引文的部份錯字已加以改正，而以「陂」標記，以下同；強調標記，均為本研究所自行添加。

藤山的阿拔泉社後⁵³，阿里山社仍保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⁵⁴。盧麻產社原先的社域空間，逐漸吸引大批漢人前往墾闢；根據「合約」來看，漢人應根據番業主、漢佃的租佃關係，取得地權開墾。

依上述行文而推論，清初盧麻產社的活動領域，應擴及舊社與新社坑鄰近地區；就此來說，其活動領域就會與先前枋仔岸社域空間有所重疊。這就衍生出數項問題，包括：是否枋仔岸社徙居後，盧麻產社移入該處定居；或是名稱有異的兩社群，根本就是同一社群。有關兩社群更深入的討論，限於文獻闕如，本研究在此無法詳述。

二、枋仔岸庄的範圍

訂立於乾隆 24 年（1760）12 月的這張賣契的立契人陳深，自稱其居住地為「枋仔岸旧社」（舊社）⁵⁵；根據該漢字的語意，這地名

⁵³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22。「溜藤山之阿拔泉社」的社址，據陳哲三在〈古文書在台灣史研究的重要性—以「竹腳寮」、「阿拔泉」之地望的研究為例〉的考證，有如下說法：「阿拔泉社即在今竹山鎮之泉州寮」（《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頁 135-151，2000）。此係康熙末葉的社址。根據《熱蘭遮城日記》對阿拔泉社的記載（IV-C/1657-12-15）：「那些 groot-Tackapolan、豬母勝（Livora）、大武巒（Tavoenan）與阿拔泉（Appassoan）社的長老們，都照往年的慣例去那裡〔諸羅山〕。他們哀嘆他們的村社這兩年來變得很衰弱，因為很多人，包括小孩和幾個長老都因天花死去了，他們請求派別人接替那些死去的長老的位置。」於荷蘭殖民末期，其與諸羅山社有頻繁往來，本研究認為兩社社址應距離不會過遠（或許當時阿拔泉社就位於嘉義沿山一帶）。

⁵⁴ 此外，根據以下數份碑文與古文書契資料，亦可論證先前居住在沿山地帶的社群徙社後，阿里山社通事擁有對土地的處分權：（1）番路鄉半天岩立於乾隆 30 年（1765）2 月的「佛祖香燈」石碑，載有阿里山社通事將番租獻為佛祖香燈租一事；（2）竹崎鄉金獅寮廣福宮所收藏之立於道光 11 年（1831）2 月、由阿里山社通事吳安祿所立的「喜立捨山界字」；（3）嘉義城隍廟正殿左側外牆上鑲嵌的「阿拔泉社番租充為香燈示告碑記」，載有道光 18 年（1838）通事字旺將阿拔泉社所屬的番租獻為城隍廟的香燈資費。

⁵⁵ 資料來源：「中埔三層崎張家古文書契」，乾隆 24 年 12 月（1760）陳深所立的賣契。

意指著：位於枋仔岸這個大範圍漢庄（枋仔岸庄）空間內的小地名舊社。依此地名，大抵可釐定清官方文獻上枋仔岸庄的位置。另根據台灣總督府檔案的「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文書」，所抄錄的數張社論及枋仔岸的古文書契文本，可更清楚掌握到清中葉迄道光年間，枋仔岸庄所指涉的空間範圍【表一】。

該批古文書的第一張，為嘉義知縣陳起鰓於嘉慶 10 年（1805）6 月 2 日所開立的執照【圖三】⁵⁶：

特調福建台灣府嘉義縣正堂加十納紀錄十次陳，為給照管業事。照得抄封林逆案內匪犯蕭段宅園壹所，參宅相連，內檳榔樹壹千叁佰株，坐落枋仔岸菜堂頂：東至佛堂山埔、西至山埔、南至山埔、北至山路，確估番銀叁佰員……。

右照給買戶陳永茂。准此。

嘉慶拾年陸月初二日給

該執照的文本，有助於對地名「枋仔岸」內涵做進一步的了解。根據這張執照，可得知以下幾點事實：（1）由陳永茂所承買之位於枋仔岸菜堂頂的宅園，係抄封自曾參與林爽文民變的蕭段的土地；（2）由「枋仔岸菜堂頂」的地名可獲悉菜堂頂屬於枋仔岸的一部分；（3）這塊宅園因位地勢高，栽種檳榔等旱作；（4）官方以「番銀叁佰員」將此園宅售予買主陳永茂。根據最後一張立於道光 16 年（1836）的賣契，當地仍以枋仔岸菜堂頂作為地名；爾後，則未見相關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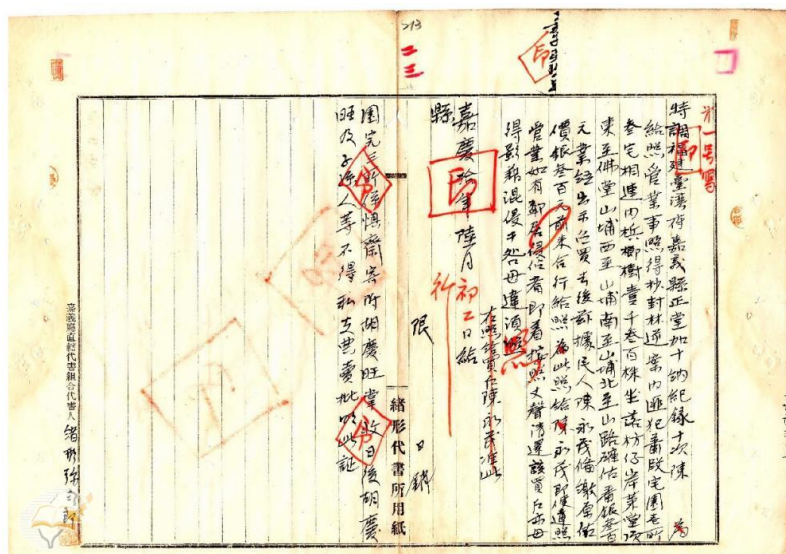
⁵⁶ 資料來源：「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909012，《嘉義廳（裁決ノ分）不服申立書》「高等林野調查—不服申立人氏名胡慶旺代理人矢野猪之八」。網址：<http://ds3.th.gov.tw/ds3/app000/>。瀏覽日期：2017/11/27。

依上述文本來推論：清乾隆中葉迄道光年間，漢庄「枋仔岸」的空間範圍，北邊大致以當前的清水溪為界，南迄菜堂頂，約略為昇平村所轄西半部的空間【圖四】。

【表一】枋仔岸菜堂頂古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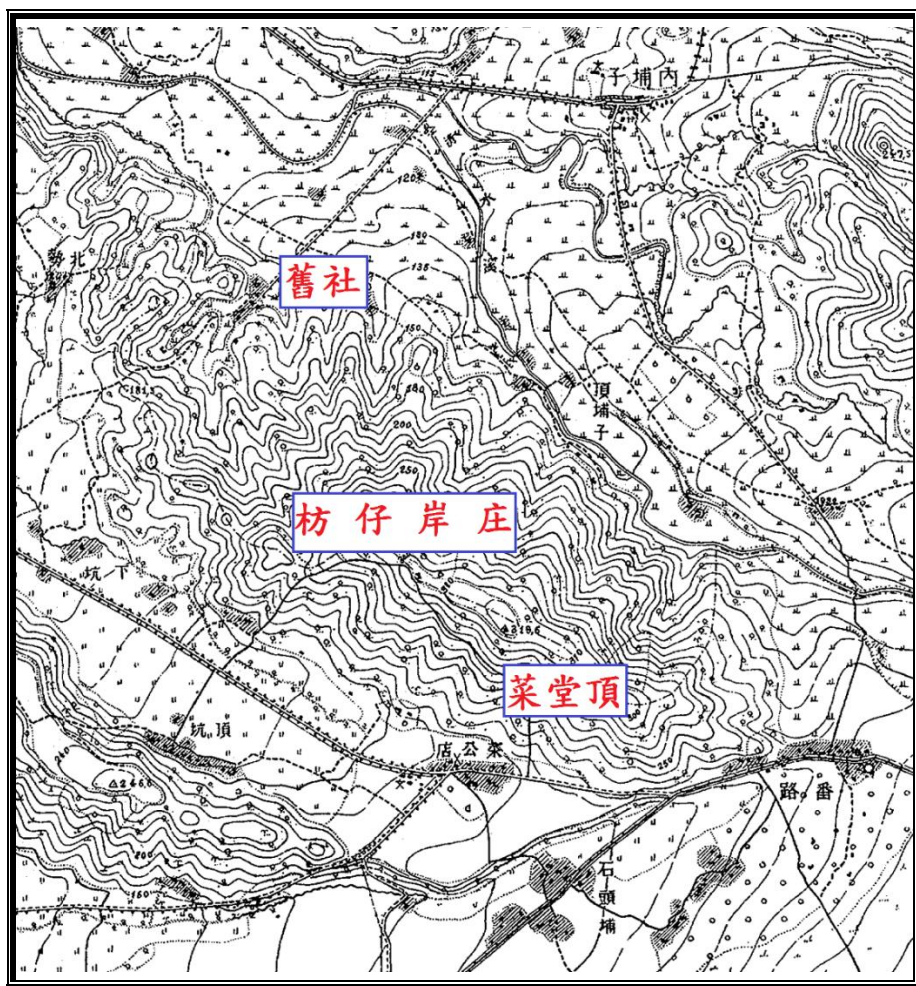
編號	立約年代	契字性質	立契人	關係人買主	座落地點	土地四至	賣價
1	嘉慶10年6月2日 (1805-06-28)	執照	嘉義知縣 陳起鰐	陳永茂	枋仔 岸菜 堂頂	東至佛堂山埔 西至山埔 南至山埔 北至山路	番銀300元
2	嘉慶10年7月 (1805)	賣契	陳永茂	胡略觀	枋仔 岸菜 堂頂	東至佛堂山埔 西至山埔 南至山埔 北至山路	佛銀380元
3	道光12年3月 (1832)	賣契	胡虎	蔡北海	枋仔 岸菜 堂頂	東至佛堂山埔 西至山埔蔴仔 南至山埔下溝仔 北至山路及崁下	銀400元
4	道光16年7月 (1836)	賣契	蔡順	王慎齋	枋仔 岸菜 堂頂	東至佛堂山埔 西至山埔蔴仔 南至山埔下溝仔 北至山路及崁下	銀600元

資料來源：「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909012，《嘉義廳（裁決ノ分）不服申立書》、「高等林野調查—不服申立人氏名胡慶旺代理人矢野猪之八」。



【圖三】嘉慶 10 年（1805）6 月 2 日嘉義縣正堂所開立的執照

資料來源：「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909012，《嘉義廳（裁決ノ分）不服申立書》「高等林野調查—不服申立人氏名胡慶旺代理人矢野猪之八」。



【圖四】枋仔岸庄的範圍

底圖來源：《台灣地形圖》，「中埔」圖幅。

三、鄰近枋仔岸庄的番界課題

本研究對枋仔岸庄所轄空間的推論，若正確無誤的話，將可進一步討論鄰近枋仔岸庄的番界課題。番界的確認，對當前嘉義沿山

的歷史地理研究，將有極大裨益；亦即，沿山空間地權屬性的辨識，將可作為更細緻地了解當地租佃關係、探討開墾組織等等議題的先行性基礎。

乾隆中葉所繪製的「台灣番界圖」、「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以及乾隆 49 年（1784）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番界紫線圖），皆將番界繪於大崎山前，而界碑則立於大崎山的山根南側、鄰近界外漢庄石頭埔附近。沿山空間當前已無大崎山的地名，其為當前嘉義沿山的哪座山，本研究難以確認。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等人，於乾隆 48 年（1783）4 月 29 日上呈的奏摺中，曾提及「……山仔門、枋仔岸等共十九庄」⁵⁷；官方文件既稱枋仔岸為庄，或可推論枋仔岸舊社一帶空間為界內地；此外，繪製於乾隆 40 年至乾隆 51 年（1775-1786）之間的「台灣汛塘望寮圖」，亦將枋仔岸（庄）地名，書寫於界內⁵⁸。可見其位於界內空間，理應無誤。「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有載⁵⁹：

密機庄小地名：大埔庄、石頭埔、番仔路、埔尾、啄口、白狗
藔、桃仔園、金交倚、金獅藔、阿拔泉、山豬塢等處，現丈羅
劍等墾田伍拾柒甲伍分叁厘伍毫捌絲肆忽、園柒拾柒甲零陸

⁵⁷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2150122-00862 00868.txt〉。該奏摺題為〈為辨明諸羅漳泉匪民攻庄焚搶殺命拏獲首夥要犯分別究辦彙奏事〉，原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55【影印本】，頁 862-868，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網址：<http://thdl.ntu.edu.tw/>。瀏覽日期：2017/11/29。

⁵⁸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台灣汛塘望寮圖」（繪製年代的推論當在乾隆 40 年至 51 年間）。網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7/11/19。

⁵⁹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頁 63-64。

厘伍毫捌絲壹忽、未墾荒埔肆拾伍甲零陸厘捌毫捌絲，該處離生番尚遠，應請准墾，歸阿里山社番報陞，于大埔庄後立定新界。

位於鹿麻產生番界碑、枋仔岸生番界碑以及埔姜林生番界碑以東的界外地，經官方查訪有羅劍等漢佃入墾⁶⁰；圖說上建議以番業主、漢佃的方式准許開墾，而由業主阿里山社承管報陞。換言之，這種番業主、漢佃的租佃關係，應為先前羅劍等漢佃於界外空間進行土地開墾，所採納的方式【圖五】。

圖面與圖說所列出之數個位於大崎山東側、界外私墾地的小地名。其與當前地名有如下對照：(1)石頭埔：番路鄉番路村頂石頭埔、下石頭埔一帶；(2)番仔路：番路鄉番路村番仔路；(3)埔尾：番路鄉觸口村埔尾；(4)啄口：番路鄉觸口村觸口；(5)白狗寮：泛指竹崎鄉內埔仔以東，包括內埔村、塘興村、白杞村等地；(6)桃仔園：竹崎鄉桃源村；(7)金交倚⁶¹：竹崎鄉內埔村香光寺一帶。圖說明確提及上述數個小地名為界外地，但未言及界內的枋仔岸庄；因之本研究認為：圖面所標示的舊界「枋仔岸生番界碑」，顯然源自界內漢庄枋仔岸的名稱而做的命名。清乾隆年間番界的設立原則，係以車路旱溝、溪溝水圳與外山山根，這些地形景物為分界；或挖溝、築土牛為分界⁶²。據此原則，比對界外的這些小地名，本研究認為：當時

⁶⁰ 羅劍所開墾的地點不詳。

⁶¹ 圖說的「金交倚」地名的「倚」字，應為筆誤；正確地名為「金交椅」。

⁶²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乾隆二十五年（1760）「閩浙總督楊廷璋條奏清釐台屬邊界酌定章程」，頁 126。內文於下：「台郡彰化縣沿山番界，年來侵墾漸近內地，生番逸出為害。今據該鎮道勘明，於車路旱溝之外，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接處，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為界。至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焰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沒之隘口立石為表，餘亦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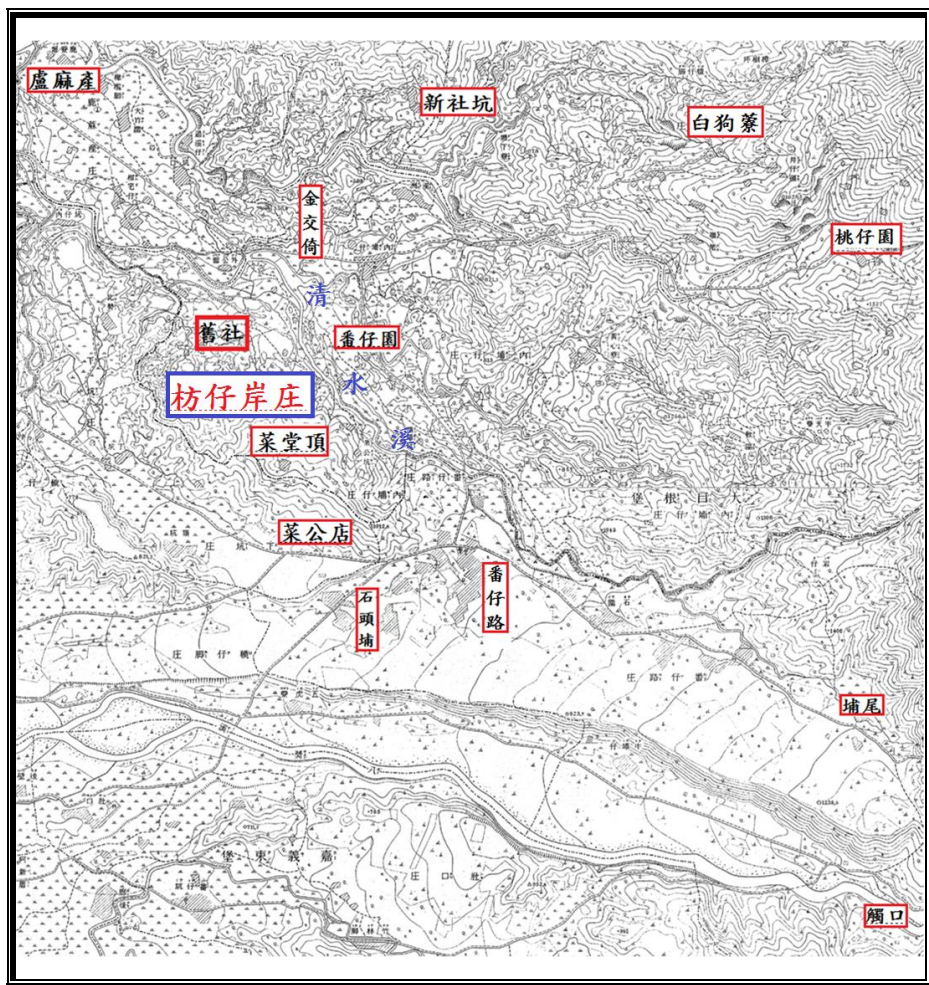
官方可能以溪溝（清水溪）為界，分隔枋仔岸庄一帶的界內外空間，並擇地設立界碑。不過對於當地番界更為詳實的論述，尚待更多古文書契資料的發掘【圖六】。



【圖五】乾隆 49 年「台灣番界紫線圖」的枋仔岸生番界碑位置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頁 63-64。

經劃清。今酌量地處險要，即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



【圖六】枋仔岸庄鄰近的小地名

底圖來源：《台灣地形圖》，「中埔」與「竹崎」圖幅。

肆、結語

本研究藉由引述《熱蘭遮城日記》、眾多清官方文獻，以及相關古文書契資料，以之再現清代史料所出現、當前已消失於嘉義沿山

土地空間之「枋仔岸」地名的歷史地理內涵。

透過本文對於相關「枋仔岸」用語的研究，已具體反映出看似單純的地名、實則蘊含著深邃的意涵，諸如：追溯出該地名源自原住民社群的稱呼、由地名探究族群分布與社域空間，以及透過地名釐清嘉義沿山的番界課題。這些先行性的基礎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未來更加細緻之嘉義沿山歷史地理研究。

徵引文獻

一、史料與地圖

《熱蘭遮城日記》（江樹生譯註），「台灣日記知識庫」，網址：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news_con.php?no=239。瀏覽日期：
2017/11。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台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網址：
<http://thdl.ntu.edu.tw/>。瀏覽日期：2017/11。

「台灣府汛塘圖」，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網址：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7/11。

「台灣汛塘望寮圖」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網站。網址：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7/11。

「高等林野調查—不服申立人氏名胡慶旺代理人矢野猪之八」
（0000-01-01），〈嘉義廳（裁決ノ分）不服申立書〉，《台灣總督
府檔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909012。網址：
<http://ds3.th.gov.tw/ds3/app000/>。瀏覽日期：2017/11。

「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載於林玉茹等編著，2015，《紫線番界：
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載於葉高華編著，2017，《十八
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解讀》，台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載於施添福，1991，紅線與藍線：清乾
隆中葉台灣番界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46-50。

《台海使槎錄》（黃叔瓚撰），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

《台灣府志》（高拱乾補纂），台灣文獻叢刊第65種。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劉良璧重修），台灣文獻叢刊第74種

《續修台灣府志》(余文儀主修)，台灣文獻叢刊第121種。

《清高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186種。

《諸羅縣志》(陳夢林編纂)，台灣研究叢刊第55種。

《台灣府志》(蔣毓英纂修)，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二、後人編纂、翻譯與撰述資料

小島由道與河野喜六，2001，《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
(191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伊能嘉矩，1991，《台灣文化志·下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洪麗完，2012，〈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台灣史研究》，18(1)：41-102。

陳哲三，2000，〈古文書在台灣史研究的重要性—以「竹腳寮」、「阿拔泉」之地望的研究為例〉，《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135-151。

翁佳音與黃驗，2017，《解碼台灣史1550-1720》，台北：遠流出版社。



日治時期嘉義社口古柯農場初探*

陳凱雯**

摘要

近代古柯樹因可提煉作為醫療用的麻醉藥品，成為在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積極培育的熱帶作物之一，也讓臺灣成為當時世界的主要輸出地。本文以嘉義社口古柯農場為中心，探討臺灣總督府對古柯樹的引進與栽培，星製藥會社在臺發展的古柯事業，以及社口古柯農場的經營狀況，窺探古柯在日治時期臺灣發展的概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軍需藥品的不足與麻藥騰貴等因，總督府積極鼓勵民間企業來臺投資種植，以求國內的古柯能達到自給自足。與政府關係良好的星製藥會社，憑借其技術與社長星一的投資眼光，在大正7年底（1918）於嘉義中埔社口設立古柯農場，開啟了在臺的古柯事業。雖然在1930年前後經歷破產危機，以及國際對於古柯產量的控管的種種限制下，星製藥的社口古柯農場持續提供古柯葉至日本，不僅為星製藥帶來獲利，也為社口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與移民。

關鍵字：星製藥株式會社、古柯、藥草園、星一、中埔

* 本文曾宣讀於「第十屆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感謝與談人涂涵君教授與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並感謝日本星藥科大學圖書館館員古川沙希子小姐的熱心幫助。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

A Study of Chiayi Coca Farm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ai-wen Chen*

Abstract

Coca originated in South Ame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extracted alkaloids from coca to be anesthetic by chemical technology. The Taiwan Sotokufu introduced coca's species into Taiwan from Java, and authorized Japanese-funded enterprises to plant it in Taiwa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on the coca farm in Chiayi, Taiwan. The far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Hoshi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supplied a lot of cocaine to Japan in the lat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ecause of anesthetic was expensiv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eriod, the Taiwan Sotokufu encouraged Japanese-funde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coca trees in Taiwan. Hoshi Hajime, the president of Hoshi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had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aiwan Sotokufu, and established coca farm in Chiayi Shekouo in 1918. Around 1930, his company was experienced some crises. At the same time, cocaine was restricted production by League of Nations. However, the coca leaves of Chiayi coca farm were still exported to Japan until 1945. Therefore, there were many new immigrants came to Chiayi Shekou in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 Hoshi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Medicinal Plant Farm, Coca, Hoshi Hajime, Zhongpu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古柯樹(coca, 又稱為古加、可卡、高根, 日文コカ)原產於南美洲今秘魯、玻利維亞東部, 分佈於海拔 4、5 千公尺之山區。因其葉具有刺激性, 當地原住民會直接採葉、或將葉子包以石灰等物咀嚼, 即使長期勞動也不會疲倦, 被視為貴重物。16 世紀歐洲人發現了古柯, 知道古柯的效用, 但因當時古柯葉無法長途運送, 亦不能應用於醫療, 並沒有廣為種植成為全球性商品。直到 1860 年代, 德國研究學者成功將古柯葉提取出萃取物古柯鹼(Cocaine), 具有麻醉功效的, 可使用於醫療藥用, 因而開啟了古柯的栽種熱潮。¹

初期南美古柯的出口途徑分為兩種方式, 一為在當地萃取粗製古柯(又稱生古柯鹼), 便於運送到歐洲市場, 或再行加工為鹽酸古柯鹼(Cocaine HCl); 另一種是直接以古柯葉進口至美國, 除了距離較近外, 也因古柯葉的課稅較為便宜。²在運輸古柯的過程中, 必須包裝好古柯葉, 以免在運送途中損失, 影響古柯鹼含量的提煉。19 世紀末, 各國相繼研究如何改善古柯葉的品種, 增加提煉時的古柯鹼含量, 以及減低古柯葉運送途中其含量的損失。西方殖民國家開始在亞洲殖民地如爪哇、錫蘭等熱帶地區試種栽培, 古柯遂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

20 世紀初, 日本也加入了古柯市場的競爭, 除了對美洲、爪哇進行投資古柯園外, 政府與民間製藥公司更相繼選擇了唯一一個熱

¹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二關スル調査書(第二卷)》(臺北:該課,1935),第九編古柯,無頁碼;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著、薛綸譯,《上癮五百年》(臺北:立緒,2017),頁 62-66;

² David T. Courtwright(大衛·柯特萊特)著、薛綸譯,《上癮五百年》,頁 65。

帶地區殖民地臺灣，作為試驗與栽種的地點。在 1920 年代末期，日本一躍成為世界主要的古柯鹼出口大國，臺灣在此期間曾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以 1933 年世界古柯葉的輸出量為例，玻利維亞 336 公噸、秘魯 264 公噸、蘭領印度 161 公噸，而臺灣亦高達 103 公噸。³但因當時古柯濫用成為毒品，與鴉片、大麻等同成為管制物品，⁴並受到國際聯盟控管產量，使得當時日本官方的檔案對此記載無多，甚至刻意隱藏。⁵加上戰後政府減少種植，使得目前一般人對於古柯在臺的種植與發展歷程，鮮少注意。1957 年臺灣省文獻會曾應政府須要，調查日治時期臺灣的古柯資料，由陳漢光等整理檔案並發表〈臺灣古柯調查〉。⁶文中提及日治時期兩大重要古柯種植農場，一是今嘉義中埔社口的星製藥會社（以下簡稱星製藥）古柯農場，另一處是屬於臺灣生藥株式會社的臺南白河林子內古柯農場。後者在新營設有提煉古柯鹼工廠，文章也提供較多資料，但對星製藥在嘉義社口的古柯農場則較少敘述。

事實上，星製藥是戰前日本國內具有霸主地位的製藥公司，其與臺灣關係更是緊密，不僅獨占臺灣總督府的鴉片製造，並對臺灣投資金雞納樹等藥用植物等事業。近年來，學界對於殖民時期的臺灣熱帶作物或藥用植物的栽培，如金雞納樹種植的研究，已有許多

³ 以 1933 年世界古柯葉的輸出量為例，玻利維亞 336 公噸、秘魯 264 公噸、蘭領印度 161 公噸、臺灣 103 公噸。〈一九三四年度に於ける蘭領印度コカ栽培狀況〉，《拓務時報》，第 70 號（1937.1），頁 54-55。

⁴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林業二關スル調査書（第二卷）》，無頁碼。

⁵ 例如在官方出版的《臺南州產業狀況》，曾在 1925 年至 1927 年間記載臺灣生藥株式會社工場製造的古柯鹼產量，但在 1928 年後就不再列出，此時正是國際聯盟開始限制古柯鹼產量之時。

⁶ 陳漢光，〈臺灣古柯調查〉，《臺灣文獻》9:1（1958.3），頁 39-50。

豐富成果，偶有提及古柯引進臺灣種植。如李文良在其博士論文中談到星製藥的對台投資金雞納造林事業，提及在大正 9 年（1920）於嘉義中埔設置農場種植古柯提煉古柯鹼；⁷顧雅文在討論 1930 年代金雞納樹成為國策作物時，引述當時中央研究所荒木忠郎的意見，認為當時臺灣的藥用植物栽培，只有古柯樹才稱得上是產業。⁸另外，有關星製藥會社的研究，如劉碧蓉在博士論文〈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有提及對於臺灣古柯事業的投資，但著墨亦不多。⁹

為一探星製藥對臺投資的古柯事業，本文以嘉義社口古柯農場為中心，以上述先前研究為基礎，整理爬梳日治時期的官方調查、《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戰後接收檔案等資料，嘗試對星製藥在臺灣投資的古柯事業，做一初步的探討。

貳、古柯的引進與培育

19 世紀中葉後，古柯樹被西方殖民者引進亞洲，移植印度、爪哇等地。荷蘭自 1878 年引進古柯樹於爪哇東部栽培，其古柯鹼的含量甚至高於原產的秘魯，同與安地斯山的古柯產品成為 20 世紀初的兩大生產地。¹⁰臺灣最初引進的古柯種，亦是來自爪哇的農場。

⁷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236-237。

⁸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18 卷 3 期（2011.9），頁 77。

⁹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¹⁰ David T. Courtwright（大衛·柯特萊特）著、薛絢譯，《上癮五百年》，頁 65；《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二關スル調査書（第二卷）》，無頁碼。

1910 年代是全球古柯市場勃發的年代，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臺灣總督府也於 1910 年代開始，積極對古柯進行移種試驗。明治 42 年（1909），任職於農事試驗場的技師藤根吉春（1865-？）¹¹被派遣至印度與爪哇，調查當地茶葉販售等農業及經濟狀況。¹²翌年 3 月，藤根自爪哇植物園帶回六株苗木回臺。先於殖產局林業試驗場開始培育，養成樹木，後因考量臺北試驗場的氣溫不適合古柯生長，在大正 2 年（1913）底移至嘉義支場培育。¹³

林業試驗場嘉義支場的前身，為明治 41 年（1908）為推動當時在臺的橡膠樹的研究試驗，設立於嘉義埤仔頭庄的嘉義護謨（橡膠）苗圃，接著陸續在山仔頂（1909）及中埔庄沕水（1911）開闢試驗場地。明治 44 年（1911）成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林業試驗場，將埤仔頭、山仔頂與中埔沕水三地合為林業試驗場嘉義支場，從事熱帶植物的栽培試驗。¹⁴

¹¹ 藤根吉春，岩手縣人，札幌農業學校畢，曾在北海道廳農商課任職。明治 28 年底渡臺，擔任民政局技手，明治 30 年任臺灣總督府技師，曾任臺南縣技師、農事試驗場長等職。明治 42 年 4 月被派至印度、爪哇考察，翌年 3 月回國。大正 4 年依願免官。〈藤根吉春恩給証書下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476 冊 7 件。

¹² 〈府技師藤根吉春印度及爪哇へ派來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546 冊第 4 號。

¹³ 《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ニ關スル調査書（第二卷）》，無頁碼。一說為五株苗木，參見〈古柯〉，《臺灣藥友會會報》1922，頁 12。

¹⁴ 鄧書麟、傅昭憲〈承襲百年之歷史～探究中埔研究中心的興革與蛻變〉，《林業研究專訊》，第 23 卷第 1 期（2016），頁 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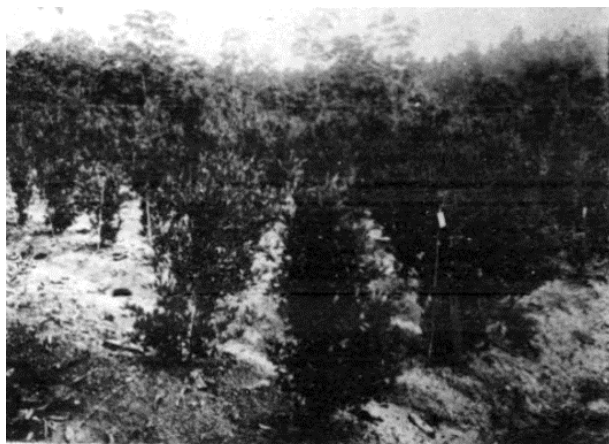


圖 1 林業試驗場嘉義支場內的古柯園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營林局編，《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六》(臺北：編者，1919)，頁 44。

說明：左圖為種植 1 年的古柯樹，平均約 3 尺高；右圖為種植 3 年的古柯樹，平均約 5 尺高。

在嘉義支場培育的古柯樹，位在沅水試驗林區。經過三年間的育成，將其古柯葉乾燥後，送至臺北林業試驗場及東京衛生試驗所，

針對繁殖方法、生長、收葉量、摘葉方法與時期、施肥等各方面，做了多方觀察試驗；並將嘉義培育的種苗，送至臺灣島內其他地區試種。¹⁵據大正 7 年（1918）的統計，在嘉義沄水共栽培 250 株古柯樹。

¹⁶歷經多年試驗，成效頗佳，可提煉古柯鹼含量不遜於國外進口原料，可說是日本移植培育古柯的嚆始。¹⁷

在此同時，正值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藥品需求急增，麻藥更因此騰貴，古柯的市價一度攀升至八倍之多，一時難以尋找替代品。¹⁸總督府殖產局有意發展古柯事業，希冀不仰賴外國進口，開始進行發展計畫。¹⁹除了持續栽培試驗外，²⁰並由政府提供官有林野地，積極鼓勵民間企業投入。

最早紀錄投入臺灣的古柯栽培事業，是來自橫濱的日商安部幸之助（1869-？）。安部原經營糖業貿易，大正 6 年（1917）底於鄰近中埔的嘉義廳店仔口（今臺南白河）設置安部農場，翌年初種植古柯樹約 4 甲，至大正 9 年（1920）古柯樹已種植約二百甲。但因遭逢第一次大戰後的經濟衰退，農園幾近荒廢，而後轉給臺灣生藥會社

¹⁵ 小野三郎，〈古柯樹栽培試驗報告〉，收入於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四》（臺北：編者，1917），頁 43-54；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灣に於ける林業特殊研究〉，《臺灣の山林》，1932，頁 105。

¹⁶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五》（臺北：編者，1918），附錄頁。

¹⁷ 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名も芳しき香料島》（臺北：編者，1927），頁 5-7、10；〈古加栽培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6.1.20，版 2。

¹⁸ 神田壽重，〈古柯樹葉ヨリコカインノ製造試験〉，收入於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四》（臺北：編者，1917），頁 151。

¹⁹ 本多靜六，〈臺灣と林業〉，《實業之臺灣》62（1915），頁 12-13。

²⁰ 在昭和 17 年度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的業務報告中，中埔分所仍將古柯造林試驗為其業務。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昭和十七年度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業務功程》（臺北：該所，1943），頁 48。

接手。²¹臺灣生藥會社是由鹽水港製糖會社與三共商會²²共同合資組成，是臺灣生產古柯的兩大會社之一，另一個即是在社口設立古柯農場的著名藥廠——星製藥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星製藥）。

參、星製藥在臺古柯事業

星製藥的創辦人星一（1873-1951）出身日本福島，東京商業學校畢業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畢業後曾在紐約經營英、日文雜誌，至明治 39 年（1906）回國，開始從事藥品零售。明治 44 年（1911）創立星製藥，運用其與日本政界的交往，逐步拓展其製藥事業，在東京新興工業地帶品川地區建立新式工廠與研發部門，並與各地藥局以連鎖特約店的經營方式，成功建立起星製藥網絡，被稱為「東洋製藥王」。²³

會社成立後，恰巧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防止藥品缺乏引起危機，日本政府除了積極研發新藥物外，亦指導民間發展製藥

²¹ 〈安部幸之助開墾地成功賣渡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152 冊第 1 件；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頁 12；〈古柯栽培良好 臺南安部支店農場內〉，《臺灣日日新報》，1920.5.15，版 2。有關臺灣生藥會社與古柯生產，筆者將另文討論。

²² 三共會社為 1899 年創立於日本橫濱的三共商店前身，初期取得美國藥品專利販售，並研發新藥品，1907 年改為三共藥品合資會社，1913 年改為三井株式會社。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44。

²³ 大山惠佐，《努力と信念の世界人 星一評傳》（東京：共和書房，1949），頁 11-15；東京都品川區編纂，《品川區史》（東京：編者，1974），頁 256-259；〈「明治百五十年」美しき日本人：星一 製薬会社に無料の学校創設〉，《文藝春秋》95 卷 4 號（2017.4），頁 288-290。有關星一與星製藥的崛起歷程，可參考劉碧蓉的〈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一文；星製藥的經營模式，可參考歐怡涵〈日治時期臺灣的藥業網絡：以藥業從業人員與藥品使用者為主的討論〉（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工業。星製藥正好搭上這波商機，研發出預防瘧疾的奎寧抽取技術，更在大正 4 年（1915），藉由與後藤新平的深厚關係，獲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委託精緻粗製嗎啡，獨占其事業。²⁴大正 6 年（1917）星製藥更成功研發鹽酸古柯鹼，通過日本內務省試驗合格，成為日本首家製造鹽酸古柯鹼的企業。²⁵

然而這些藥品的原料，如金雞納、古柯等，幾乎皆來自於海外。星製藥也對海外的原料市場投入大量資金，以維持原料的穩定供應。大正 5 年（1916）星製藥開始從秘魯輸入粗製古柯至日本；²⁶大正 6 年（1917）開始向爪哇的栽培業者締結金雞納樹皮輸入契約等。²⁷但因原料自海外輸入，時常受至於當地業者的哄抬或壟斷，促使星製藥在臺灣積極尋找藥用植物的栽培地。

據報導，在大正 7 年（1918），星製藥社長星一親自來臺，探查臺灣熱帶栽培環境以及適合種植古柯場所。原本星一屬意南投日月潭附近，最後選擇在總督府培植古柯成功之鄰近地——嘉義中埔社口，作為其栽培古柯之地。即於同年底，在此開闢 180 甲的藥草園，試作古柯與曼陀羅的栽培。²⁸在投資臺灣的同時，星製藥也在南美秘魯買下約五百公頃的古柯園，²⁹擴張古柯事業版圖。

為提高古柯葉的品質，大正 9 年（1920）星一更派員自秘魯帶回南美種，交由林業試驗所試種。³⁰而在大正 13 年（1924）社口古

²⁴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101。

²⁵ 〈鹽酸コカインの製造に成功す〉，《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17.6.1，版 1。

²⁶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131。

²⁷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頁 238。

²⁸ 〈星製藥新事業 南投にて古加栽培〉，《臺灣日日新報》，1918.5.24，版 2；〈藥草の栽培 星製藥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8.10.9，版 4。

²⁹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56。

³⁰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二關スル調査書（第

柯農場曾受病蟲害，臺灣總督府也派員前往勘查。³¹可見總督府與星製藥之間在古柯培植上的密切關係。星製藥社長星一相當重視臺灣的原料供給與市場，經常來臺與特約店舉行會議之餘，更親自視察嘉義古柯園等藥草耕地。³²古柯農場在大正 8 年（1919）初試種古柯 45 甲，逐年擴展古柯種植面積，至昭和 10 年（1935）已達百甲。³³昭和 20 年（1945）佔地達 147 甲，除了古柯樹之外，亦種植相思樹等。³⁴

二卷)》，無頁碼。

³¹ 〈コカイン藥草の蟲害〉，《臺灣日日新報》，1924.8.20，夕刊版 1。

³² 〈星社長以下臺灣の藥草園を視察〉，《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21.9.1，版 3；
〈安樂常務の臺灣視察〉，《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22.8.1，版 7。

³³ 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頁 11。

³⁴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復林務局造送接收日人財產清冊〉，「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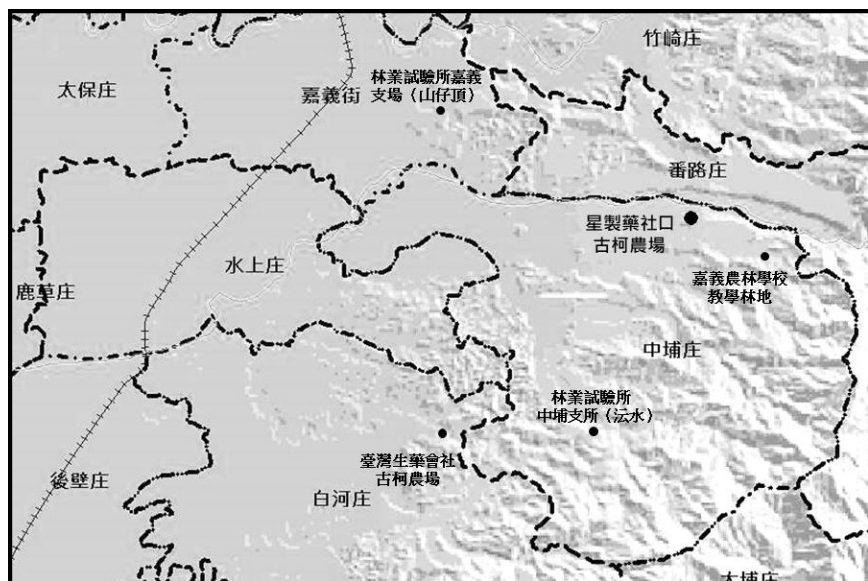


圖 2 星製藥社口古柯農場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圖 3 1919 年社口農場開闢的古柯苗圃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19.4.1，版 1。



圖 4 1930 年代社口農場擴張的古柯苗圃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3.1.20，版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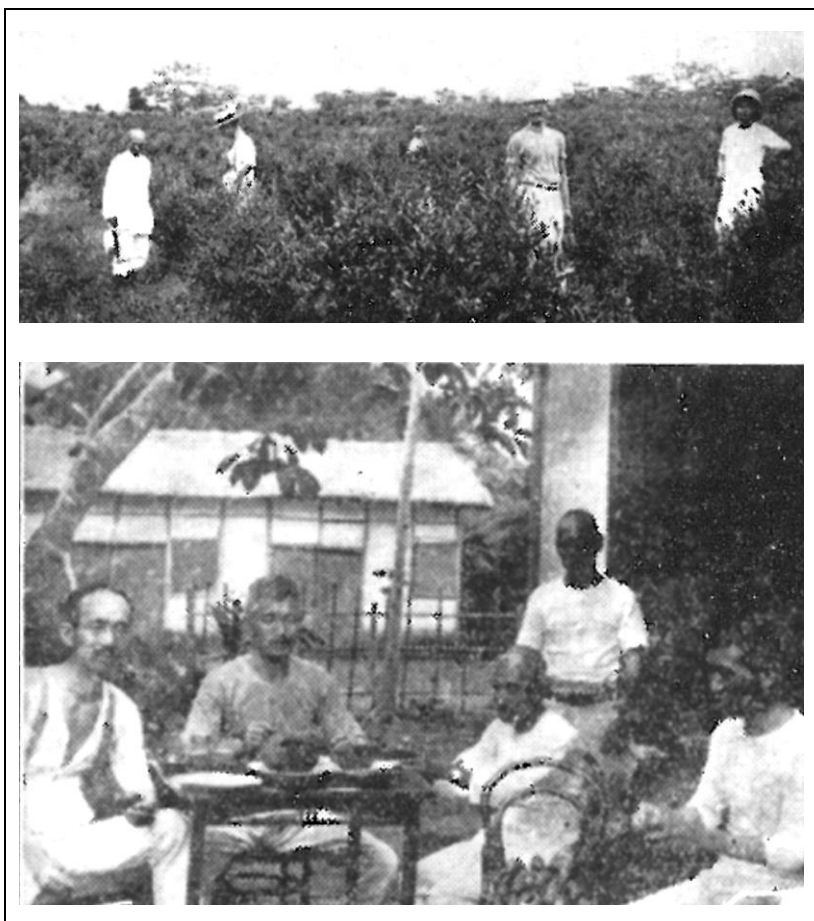


圖 5 1921 年視察社口古柯農場的星一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21.9.1，版 11。

說明：上圖為星一（右 2）在古柯園視察；下圖為一行人在農場事務所前休息，左 2 為星一，右 3 為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

1920 年代正是星製藥的事業突飛擴張之時，大正 12 年（1923）在日本國內有 3 萬家以上特約商店，更在東京創辦星製藥大學，培

育製藥人才。³⁵但大正 14 至 15 年(1925-1926)發生了「鴉片事件」，使得原本前途似錦的星製藥一時中挫。星製藥因被控私自販售鴉片圖利上海商人，而被檢察官以違反「臺灣鴉片令」起訴，雖然最終獲判無罪，但商譽遭受嚴重打擊。³⁶

鴉片事件之後，星製藥被下令停止麻藥生產，但在 1930 年後，日本內務省又發給許可證，星製藥又重新恢復麻藥生產。³⁷然而在此期間，隨著國際情勢對於毒品管制的聲浪日高，國際聯盟為控管嗎啡、古柯鹼的生產，甚至要求古柯鹼輸出大國日本，在 5 年內減少 3 分之 2 的生產量，日本外務省決議以減至 1 千公斤為目標，4 年內逐年遞減。³⁸

因此，臺灣總督府於昭和 4 年(1929)12 月公佈「麻藥取締規則」，其中規定作為麻藥原料的古柯樹種植，需經過臺灣總督府的許可。³⁹昭和 7 年(1932)，日本內務省規定日本古柯鹼的需要量為 1 年 1 千 5 百公斤，而原料除了臺灣、爪哇以及星製藥於南美秘魯農場外，一概不准輸入。昭和 10 年(1935)日本只有 6 家公司可製造

³⁵ 安士昌一郎，〈世界に奉仕する人材の育成一星一〉，收入於長谷川直哉編，《企業家に学 ESG 経営》(東京：文真堂，2019)，頁 17-19。

³⁶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頁 239；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202-203。

³⁷ 山田金治，〈本島に於けるコカ樹栽培事業の現況〉，《臺灣山林會報》(1932)，頁 8。

³⁸ 〈コカイン製造制限發表 佐藤代表から阿片委員會に〉，《臺灣日日新報》，1927.1.23，版 2；〈コカインの製造高を五年内に三分二に減ず 國際聯盟阿片賣買諮問委員會で 伊藤日本代表の答辯〉，《臺灣日日新報》，1930.2.2，夕刊版 2。〈「コカイン」製造量制限二關スル件(拓務次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7380 冊第 26 件。

³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臺灣ノ阿片制度》(臺北：該課，1939)，頁 47-48。

古柯鹼，⁴⁰其中只有星製藥、臺灣生藥以及武田長兵衛商店有兼營古柯樹的栽培。⁴¹在內務省限定日本鹽酸古柯鹼需要量後，臺灣許可種植範圍為 300 甲中，星製藥佔 105 甲，臺灣生藥為 184 甲，武田為 1 甲。⁴²臺灣生藥的栽植面積雖然高，但就生產率與提煉技術而言是星製藥較佳。⁴³古柯鹼的製造量雖然受限，無法增產，但亦成為政府授權的壟斷事業。

然而星製藥在 1930 年前後又接連發生勞動爭議、以及外人與社內幹部聯合惡意讓渡藥品商標等，導致星一與星製藥一度被宣告破產。當時星一曾被威脅以臺灣古柯耕地作為擔保以免除社內其他幹部破產的條件，被星一拒絕。⁴⁴最後，破產官司在昭和 8 年（1933）以強制議和方式解決，星一得以恢復星製藥的經營。此時星一來臺視察，發現大正年間積極投資的金雞納樹種植頗有可為，加上日本政府也在此時將其發展作為國策，決心以規納生產作為星製藥捲土重來之業。⁴⁵

為了順利推動在臺金雞納、古柯等藥用植物栽培事業，星一在昭和 10 年（1935）成立臺灣星製藥會社，資本額 125 萬，總部設於

⁴⁰ 此六家公司為星製藥株式會社、臺灣生藥株式會社、株式會社武田長兵衛商店、三共株式會社、江東製藥株式會社、株式會社鹽野義商店。山田金治，〈本島に於けるコカ樹栽培事業の現況〉，頁 8。

⁴¹ 武田長兵衛商店亦在嘉義市下路頭八掌溪畔設有古柯園約一甲，在沖繩縣亦有種植。山田金治，〈本島に於けるコカ樹栽培事業の現況〉，頁 7。

⁴²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二關スル調查書（第二卷）〉，無頁碼。

⁴³ 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頁 12-13。

⁴⁴ 〈芝＝高利貸＝會社乗取＝モルヒネ、コカイン製造〉，《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2.10.21，版 8。

⁴⁵ 星藥科大學編輯委員會編，〈星藥科大學八十年史〉（東京：學校法人星藥科大學，1991），頁 14-16、30；有關金雞納樹在 1930 年代後作為日本國策作物，可參考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頁 76-85。

臺北大和町。社長由星一擔任，並任命曾在臺具有地方行政經驗的馬場弘⁴⁶為專務取締役，負責主要會社事務。⁴⁷星一在成立臺灣星製藥會社時，宣稱獨立於日本之星製藥，然其會社 5 萬股中有 4 萬股為星製藥株式會社擁有，實仍為其附屬公司。⁴⁸



圖 6 1937 年星製藥以臺灣古柯農場印製的賀年明信片

資料來源：筆者收藏。

說明：右上為星一與臺灣銀行職員、臺灣星製藥會社幹部等在嘉義古柯農場的照
片，右下為古柯農場一景；左上為金雞納樹林栽培地一景（地點不詳）。此
明信片為昭和 12 年（1937）星一以社長名義寄給日本國內特約店的賀年明

⁴⁶ 馬場弘，日本福岡人，福岡農業學校畢業，曾在南投廳殖產係、台北廳庶務課任職；1930 年入星製藥會社；1935 年擔任臺灣星製藥專務取締役。〈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呈林務局送交會社各項應查填事項報告書〉，「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30。

⁴⁷ 〈資本金百廿五萬圓の臺灣星製藥會社 三日設立登記を完了〉，《臺灣日日新報》，1935.9.4，版 3。

⁴⁸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接收書類〉，「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2_0027。

信片。

昭和 13 年（1938）星製藥另立星規納產業株式會社，專營在臺的金雞納樹種植事業；⁴⁹臺灣星製藥會社則以古柯事業與其他藥草栽培為主。除擁有社口古柯農場之外，臺灣星製藥會社名下還有高雄大寮拷潭、南投集集隘寮、名間濁水等地，從事相思樹、梧桐等造林事業。⁵⁰會社也曾在高雄拷潭，嘗試種植古柯，但後因戰爭資金困難而放棄。⁵¹

肆、社口古柯農場的經營

星製藥在大正 7 年（1918）底設立的古柯農場，位在中埔支廳嘉義東堡社口庄（1920 年後改為臺南州嘉義郡中埔庄社口）新庄仔一帶，北臨八掌溪與番路相對。此區漢人約於 19 世紀中葉進入，因移民來自鄰近的竹林腳，故稱此處為新庄仔。⁵²在日本統治之初，社口村僅有人口百餘名。⁵³總督府進行林野調查後，社口多處被劃歸為官有林地，政府將這些官有林地開放給民間申請「無償借貸」或以「預約開墾賣渡」的方式，從事造林或開墾事業。⁵⁴因此在星製藥設置社口農場前，即有許多居住嘉義市街的日商，向總督府以無償借貸官有林地，如明治 37 年有嘉義街的橋本佐七，在此申請 58 甲土

⁴⁹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頁 202-203。

⁵⁰ 〈星規那產業株式會社及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財產估價表〉，「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7_0038。

⁵¹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接收書類〉，「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7。

⁵² 汪榮林總編輯，〈咱的故鄉：中埔〉（嘉義縣：嘉義縣中埔鄉立圖書館，2005），頁 305。

⁵³ 據明治三十年底調查，社口村的人口為男 65 人、女 40 人，共 105 人。〈中埔辦務署管內戶口表（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地 9754 冊第 2 件。

⁵⁴ 檜崎太郎，〈嘉義廳案內〉（臺北：著者，1917），頁 21。

地投資製紙原料生產；⁵⁵明治 43 年（1910）由日商真木勝人向官方以無償貸付申請 125 甲面積之官有林地，從事樟樹與相思樹的造林。⁵⁶與此處毗連的內埔，尚有日資三輪商店在此經營三輪農場，從事香料植物的種植。⁵⁷據當時嘉義廳長岡田信興所述，此處為八掌溪南岸，地勢傾斜、砂質土壤，附近一帶人煙稀少，將來亦很難開墾成田園，徒為雜草茂盛的不毛之地，若能以無常借貸讓民間企業投資，實為官民之便益。⁵⁸

星製藥選擇嘉義中埔社口作為在臺種植古柯之所，應與臺灣總督府選擇實驗場地為嘉義中埔之理由相似。（參考圖 2）古柯樹有百餘種，但大多對於氣候敏感，生長的環境條件限制頗多，要氣候溫和且富濕氣的地區，又需較強的日照；土壤需溼潤、排水佳，富含腐植質。⁵⁹據調查，臺灣適合種植古柯樹之地，以中部以南、海拔 1,500 公尺以下、特別是東西兩側山腳地區最為適合。⁶⁰社口位於中埔東部內埔台地，降雨較多，氣溫較低，⁶¹為適合古柯生長適合之環境。另

⁵⁵ 〈嘉義廳嘉義東堡社口庄官有原野同廳同街橋本佐七外一名八年期借地ノ件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800 冊第 8 件。

⁵⁶ 〈真木勝太官有林野無償貸付及起業方法變更許可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705 冊第 10 件。

⁵⁷ 〈請地栽培香料〉，《臺灣日日新報》，1917.1.16，版 5。大正 12 年（1923）總督府將與星製藥的社口古柯農場地相毗連的大片官有林野地約 44 甲地（中埔庄社口 37 番之 12），包含三輪農場之地，無償借給嘉義農林學校，作為教學實習之用地（即今嘉義大學社口實驗林場）。〈官有地無料貸付許可ノ件（臺南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7162 冊第 5 件。

⁵⁸ 嘉義廳嘉義東堡社口庄官有原野同廳同街橋本佐七外一名八年期借地ノ件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800 冊第 8 件。

⁵⁹ 〈臺灣の特用樹種（九）／コカ樹（古柯） コカ樹の來歴及び性質〉，《臺灣日日新報》，1922.2.22，版 3。

⁶⁰ 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頁 4。

⁶¹ 陳美鈴撰述，《臺灣地名辭書 卷八 嘉義縣》，頁 564-566。

外，也須遠離颱風易影響之區域，⁶²這或許是當初星一在南投與嘉義之間，選擇後者之因。

另外，交通便利，也可能是社口成為農場選擇的條件之一。古柯樹葉摘取後，會隨著日曬、濕氣減損其古柯因的含量。故星製藥在秘魯栽培的古柯，多在當地以古柯生葉製作粗製古柯後，再運送至日本；而在臺灣生產的古柯，則是將古柯生葉經乾燥處理，直接運送回東京後，再製成古柯鹼。⁶³中埔地區在 1910 年代已有嘉義興業株式會社鋪設嘉義至中埔、頂六至觸口等輕便鐵道；至 1920 年代由臺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經營。⁶⁴從古柯農場鄰近的汴頭站，可乘手押台車至 4 里（約 15 公里）外的嘉義南門驛。⁶⁵1930 年代後更有自動車道來往中埔與社口間，⁶⁶方便將古柯葉運送至日本製作古柯鹼。

⁶²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二關スル調査書（第二卷）》，無頁碼。

⁶³ 拓殖通信社編，《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頁 3。

⁶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嘉義廳土性調查報告》（臺北：該場，1918），頁 43-44；羅茂順總編輯，《中埔鄉志》（嘉義縣：中埔鄉公所，1997），頁 260。

⁶⁵ 〈官有地無料貸付許可ノ件（臺南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7162 冊第 5 件。

⁶⁶ 〈嘉義 交通便利〉，《臺灣日日新報》，1930.6.4，版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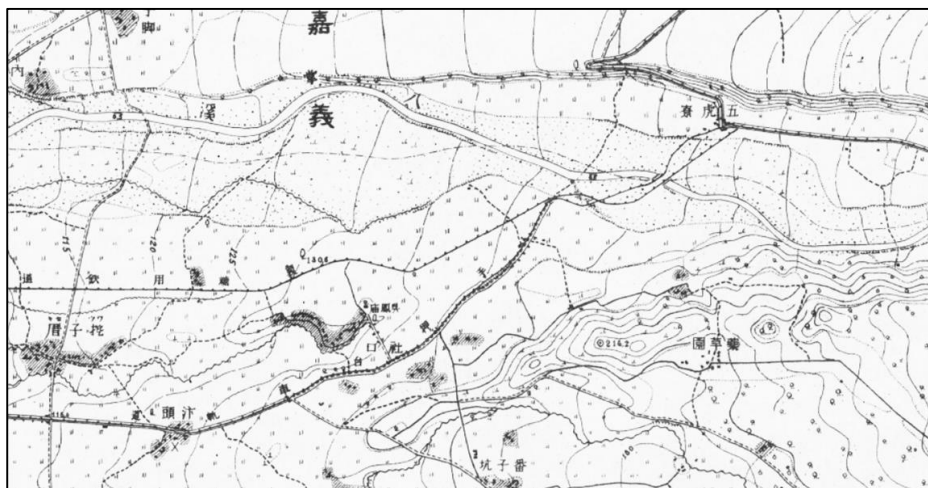


圖 7 1921 年標示「藥草園」的地形圖

資料來源：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台北：遠流，1998〔據 1921-1928 版本復刻〕），頁 109。

說明：圖右「藥草園」即為社口古柯農場，上方臨八掌溪與番路相隔，農場左方有「手押台車軌道」經汴頭站，可通往嘉義市街，1930 年代後可行汽車。在圖中吳鳳廟上方亦有「製糖用鐵道」，可通往水上庄南靖糖廠。



圖 8 運送至東京品川五反田工廠神社前的社口農場古柯葉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2.3.2，版 3。

據昭和 7 年（1932）的調查，社口古柯農場在平地種植 6 千株、坡地種植 9 千株古柯樹。每年收成 2 次，平均 1 甲可收古柯生葉 7 至 8 百公斤，年收成量可達 8 萬公斤。⁶⁷可見在 1930 年代星製藥面臨破產危機之際，社口古柯農場仍然穩定營運生產。在戰後接收檔案記載，園內的古柯樹共達 25 萬株，價值約 350 萬圓。⁶⁸推測在戰爭末期古柯產量擴張迅速。

另外，初期臺灣島內只有臺灣生藥會社在新營設有提煉古柯鹼之工廠，社口古柯農場是以摘採古柯生葉為主，將古柯乾燥生葉運送回東京，再製成古柯鹼。但根據戰後接收檔案所示，古柯農場內已

⁶⁷ 山田金治，〈本島に於けるコカ樹栽培事業の現況〉，頁 7。

⁶⁸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呈復林務局造送接收日人財產清冊〉，「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6。

設有從事製造粗製古柯的工廠，接收時在臺北總公司、嘉義農場兩地各存放 48、10 公斤的粗製古柯，1946 年更提出預設產量目標為 250 公斤。⁶⁹

星製藥設立古柯農場後，新庄仔從原本只有幾戶人家，開始有外地人來農場工作，逐漸變成聚落。據當地耆老所述，當時在農場中約有七、八十間工寮，維持百戶家庭生活。⁷⁰據檔案記載，農場於設立之初的大正 8 年（1919），即建有事務所、宿舍、浴場，並陸續增建員工宿舍、倉庫、收納屋等共 16 棟建築物，另外屬於嘉義工場有 5 棟建物。⁷¹前述七、八十間工寮的住戶，應為日雇工人而非正式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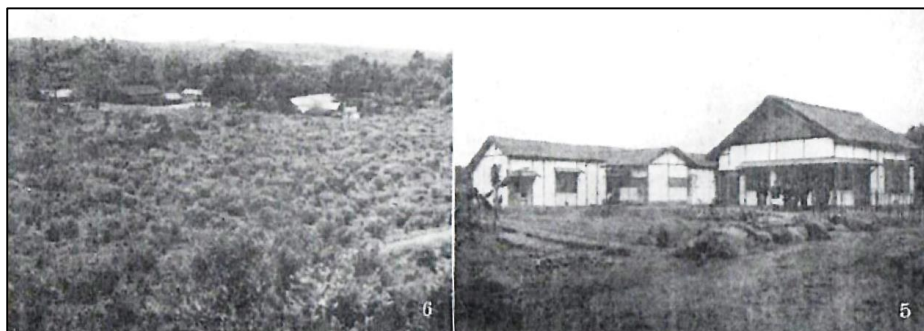


圖 9 社口古柯農場（左）與事務所、社宅

資料來源：鈴木英夫，《星製藥株式會社創立三十周年記念寫真帖》（東京：星製藥株式會社，1940），無頁碼。

⁶⁹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接收書類〉，「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7。

⁷⁰ 陳美鈴撰述，《臺灣地名辭書 卷八 嘉義縣》，頁 583；汪榮林總編輯，《咱的故鄉：中埔》，頁 305-306。

⁷¹ 〈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呈復林務局造送接收日人財產清冊〉，「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6。

表 1 1945 年臺灣星製藥會社嘉義農場職員表

職稱	姓名	年齡	月薪 (日圓)	備註
農場主任	牧野寬	41	560	1902年生，日本兵庫縣人，兵庫縣立農業學校畢業，1919年入星製藥會社社口農場。
農場員	中島威	29	200	
農場員	足立忠義	19	130	
農場員	鄭延壽	51	107	新竹關西人，關西國民學校畢業，1919年入星製藥社口農場
農場員	黃新丁	37	89	嘉義中埔社口人，曾於社口書房學習漢文，1937年入臺灣星製藥社口農場
工場主任	翁耀雲	27	209	台南鹽水人，1919年生，嘉義中學校畢業，1942年千葉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門部畢業，1945年4月入臺灣星製藥社口農場
工場員	相進	38	222	

資料來源：〈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接收書類〉、〈臺灣星製藥株式會社呈林務局送交會社各項應查填事項報告書〉，「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1_002_0027 、LW2_01_002_0030。

上表為戰後接收時星製藥嘉義農場的正式職員，除了日人之外，也有多位臺人任職。其中製造粗製古柯的工場主任，是聘請具有藥學專業背景的臺人翁耀雲⁷²擔任，薪資比日人低；農場職員鄭延壽，為新竹關西人，在農場設立之初即進入工作，長達 35 年。另一名黃新丁，則為當地社口人，從當時的新聞報導，也透露出有不少當地男女青年在星製藥的農場就業。⁷³臺南州廳曾記載鄰近的臺灣生藥會社在白河竹子門設立古柯農場時，於大正 14 年（1925）招攬新竹州竹南、苗栗郡等地的客家人從事農業；昭和 4 年（1929）又招攬東石、竹南、大湖、苗栗、斗六郡等地的客家人、閩南人共 14 戶、54 人，從事苦力職。⁷⁴可以推測，由星製藥經營的社口古柯農場，同樣也吸引部份外地移民至此尋找工作機會，而在此地生根。星製藥社員在昭和 11 年（1936）前往臺灣視察的報導中，即提到參觀社口農場時，有非常多的苦力與從事古柯葉的採集工作的日僱勞動者。⁷⁵社口村從明治 38 年（1905）的 782 人，至昭和 10 年（1935）增至 1,367 人，⁷⁶其中應該有不少為古柯農場工作的移民，惟需要更多資料與日後田

⁷² 翁耀雲在戰後星製藥被政府接收後隨即離職，後曾擔任樂生療養院藥局長。〈林務局電覆翁耀雲准予發給服務薪額證明書〉，「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號：LW2_06_001_0029；見城悌治，〈千葉医学専門学校・千葉医科大学時代の留学生をめぐる諸史料について〉，《國際教育》7（2014.3），頁 99。

⁷³ 〈啞及少女 出門不歸 女聞被人誘逃〉，《臺灣日日新報》，1935.9.21，版 8。

⁷⁴ 臺南州，《臺南州產業概況》（臺南：臺南州，1926），頁 168；臺南州，《臺南州產業概況》（臺南：臺南州，1930），頁 155。另《白河鎮志》亦述位於白河的古柯農場，吸引許多新竹地區包括新埔、竹東、北埔等地的客家人，前來擔任傭工，繼而落地生根。張溪南編，《白河鎮志》（臺南縣：白河鎮公所，1998），頁 181-182。

⁷⁵ 〈臺灣を視て〉，《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6.12.5，版 7。

⁷⁶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該部，1907），頁 102；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灣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概報》（臺北：該部，19

野調查佐證。



圖 10 在社口農場摘採古柯葉的臺灣勞工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3.1.20，版 15。



圖 11 在社口農場從事古柯葉粉末作業的勞工

資料來源：《星製藥株式會社社報》，1933.9.26，版 12。

隨著戰後臺灣星製藥以日產遭政府接收後，嘉義社口古柯農場，歷經多單位的移轉，至民國 40 年（1951）將古柯樹區域劃撥給當時內政部麻醉藥品經理處時管理，僅剩 3,500 株。⁷⁷原農場內並沒有繼續從事古柯種植與製造，廣大的藥草園區，則在公地放領時部份撥給民眾，現今多種植檳榔、香蕉等物，幾無古柯之蹤影。⁷⁸

⁷⁷ 「臺南山林所前接管星製藥會社嘉義社口農場及竹仔門古柯農場原植部份移交麻醉藥品經理處接管案」(1951 年 07 月 23 日)，〈嘉義社口古柯農場移交〉，《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 0042975016201003。

⁷⁸ 在 1997 年出版的《中埔鄉志》提到此處仍有少數的藥樹，但筆者在 2019 年前往訪查詢問，居民稱已無藥樹。羅茂順總編輯，《中埔鄉志》，頁 40。



圖 12 從八掌溪五虎寮橋上往南看社口古柯農場舊址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9 年 4 月。

伍、結語

近代古柯樹因可提煉作為醫療用的麻醉藥品，成為在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積極培育的熱帶作物之一，更讓臺灣成為當時主要輸出地。但同時也因古柯鹼的興奮刺激作用而成為管制品，使其在臺發展的歷史，不論是當時檔案的記載、或是現行研究，都付之闕如。筆者試圖在資料缺乏的限制下，以嘉義社口古柯農場為中心，探討臺灣總督府對古柯樹的引進與栽培，星製藥會社在臺發展的古柯事業，以及社口古柯農場的經營狀況，藉此管窺古柯在日治時期臺灣發展的概況。

從本文可知，總督府引進古柯樹培育是在 1910 年代開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因軍需藥品的不足與麻藥騰貴等原因，積極鼓勵民間企業來臺投資，以求日本國內的古柯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

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星製藥會社，憑借其技術與投資眼光，在大正 7 年底（1918）於嘉義社口設立古柯農場，開啟了在臺的古柯事業。在經歷 1930 年前後的經營危機，以及國際對於古柯產量的控管的種種限制下，社口古柯農場一直是星製藥在臺提供古柯葉生產之所，不僅為星製藥帶來獲利，也為社口帶來了工作機會與新移民。

參考文獻

《星製藥株式會社報》，星藥科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705冊第10件、第1546冊第4件、第2476冊7件、第3152冊第1件、第7162冊第5件、第7380冊第26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林業檔案」，檔號：LW2_01_002_0026、LW2_01_002_0027、LW2_01_002_0030、LW2_06_001_0029、LW2_01_007_003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297501620100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日日新報》

David T. Courtwright（大衛·柯特萊特）著、薛絢譯，《上癮五百年》。臺北：立緒，2017。

大山惠佐，《努力と信念の世界人 星一評傳》，東京：共和書房，1949。

不著撰人，〈一九三四年度に於ける蘭領印度コカ栽培狀況〉，《拓務時報》70（1937），頁54-55。

不著撰人，〈臺灣産の藥用植物規那古柯等最も有望〉，《臺灣藥友會會報》3（1922），頁11-13。

山田金治，〈本島に於けるコカ樹栽培事業の現況〉，《臺灣山林會報》74（1932），頁4-9。

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灣に於ける林業特殊研究〉，《臺灣の山林》78（1932），頁107-137。

本多靜六，〈臺灣と林業〉，《實業之臺灣》62（1915），頁12-13。

- 安士昌一郎，〈世界に奉仕する人材の育成一星一〉，收入於長谷川直哉編，《企業家に学 ESG 経営》，東京：文真堂，2019。
-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汪榮林總編輯，《咱的故鄉：中埔》。嘉義縣：嘉義縣中埔鄉立圖書館，2005。
- 見城悌治，〈千葉医学専門学校・千葉医科大学時代の留学生をめぐ
る諸史料について〉，《國際教育》7（2014），頁11-62。
- 拓殖通信社，《コカとコカイン 名も芳しき香料島》。臺北：拓殖通信社，1927。
- 張溪南編，《白河鎮志》。臺南縣：白河鎮公所，1998。
- 陳漢光，〈臺灣古柯調查〉，《臺灣文獻》9:1（1958），頁39-50。
- 檜崎太郎，《嘉義廳案内》，臺北：著者，1917。
-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
- 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臺灣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概報》，臺北：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5。
- 臺南州，《臺南州產業概況》，臺南：臺南州，1923-1933。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臺灣ノ阿片制度》，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939。
-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林業ニ關スル
調査書（第二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1935。
-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四》，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五》，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報告 第六》，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嘉義廳土性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18。

劉碧蓉，〈日本殖民體制下星製藥會社的政商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鄧書麟、傅昭憲，〈承襲百年之歷史～探究中埔研究中心的興革與蛻變〉，《林業研究專訊》23：1（2016），頁22-23。

羅茂順總編輯，《中埔鄉志》，嘉義縣：中埔鄉公所，1997。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18：3（2011.9），頁47-91。

唐代回紇政策的成效與影響

耿振華*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唐代對回紇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域外少數民族政治統屬關係造成的影響。太宗、玄宗建立回紇親唐政權，將其納入大唐帝國的政治體系之後，回紇在軍事上多次建功；包括助高宗平突厥、征高麗，助肅宗、代宗平安史之亂及收復吐蕃攻佔的長安、洛陽，助德宗有效共同圍堵吐蕃的軍事擴張等實質貢獻；回紇出兵不過五千騎，卻成為對大唐帝國最大貢獻的少數民族。本文以唐與回紇間的政權關係演變和軍事實力消長，研究唐代帝王對回紇不同的政策，以及謀臣李泌和武將郭子儀對回紇親善成效與影響。本文以漢文基本史料為核心，分析大唐帝國給予回紇大量經濟物資，被迫向回紇購買馬匹與對回紇和親，放縱回紇兵劫掠等措施，乃至於到後期以賞賜阻止回紇出兵劫掠等措施，對大唐帝國社會經濟和域外聲望的影響。

關鍵詞：唐代對外關係、回紇、唐代軍事、郭子儀、李泌

*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所教授 Mail:samden@tmue.edu.tw

The Influence of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to Huihe

Chen-Hua Ke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osition of Huihe in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Tang Dynasty's emperor of Taizong and Xuanzong established the occupied Huihe government and let the Huihe government to be a part of Tang Dynasty's Empire. Huihe often devotes his army about five thousand soldiers to support Tang Dynasty fighting in the battle to another nations. Huihe supplied his military strength to help Tang Dynasty controlling the empire. Huihe also helped Tang Dynasty's emperor of Suzong and Dezong to put down the domestic armed rebellion. But Tang Dynasty gave them a large amount of economic materials, and being forced to buy horses from the return of Huihe. Review the contribution of Huihe, analyzed the gain and the loss of Tang Dynasty's, that is the Huihe influencing of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 Ta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Huihe, Tang Political Policy and Military, Guo Zi-yi, Li Yu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M ail:samden@tmue.edu.tw

壹、回紇興衰與唐代帝王對回紇的政策

本文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史料分析唐代君臣在「安史之亂」前後對回紇的政策演變，並評論各項政策的成效及影響¹。興盛時期的大唐帝國以政治統屬、經濟封賞、武力協助方式建立親唐回紇政權，支持回紇從崛起階段成為漠北區域共主；內亂時期的大唐帝國則許以經濟利益，並由結盟與和親達到徵兵回紇的目的；而末期的大唐帝國則以購馬及賞賜避免回紇出兵後劫掠大唐子民。整體來說，大唐帝國對於回紇的基本政策是寬厚友好的，回紇比起其他民族政權對大唐帝國更為忠誠；而階段性的分析下，則受到大唐帝國、回紇、吐蕃等各民族勢力互為消長的影響。就回紇來說，早期與唐關係良好有助於建立漠北區域共主的地位；就大唐帝國來說，以回紇聯合則能制衡突厥、吐蕃等其他民族的擴張。但當各民族發生內亂或王位之爭時，則將以穩定本族內部發展為主，較少從事對外的合作結盟。本文主要依據漢文史料進行論述，引文原文會出現回紇、迴紇、回鶻、迴鶻等同音異譯不同文字，於正文則為行文與閱讀方便，均以「回紇」代表其他異文稱謂。

一、回紇的崛起與唐初所建置的親附政權

回紇的崛起，與唐前期為對抗突厥，後期為對抗吐蕃有關。「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²」。唐前期扶植回紇聯兵對抗突厥，「自太宗平突厥，破（薛）延

¹ 按：本文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史料為本，以唐代君臣回紇政策為主軸，限於篇幅，對史書編纂過程與學者感興趣的支節理論與研究不做細述。

² （宋）歐陽修：《新唐書》〈突厥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023

陀，而迴紇興焉³」；唐後期因內亂而以和親結盟方式借兵回紇。後期受前期「太宗、高宗遠征高麗和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發生以後，駐守在唐、蕃邊境的邊兵相繼東調，給予吐蕃東進機會，造成終唐一世，需以和親聯合吐蕃北方的回紇和吐蕃南方的南詔，以夷制夷⁴」。於是，「肅宗誘迴紇以復京畿，代宗誘迴紇以平河朔⁵」，造成「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所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⁶」。德宗時期，不僅不能如同太宗時期一樣以「天可汗」身份管轄域外民族政權的政治、軍事、經濟，也不能如同玄宗時期守住宗主國名義上的地位，德宗早期因回紇勢盛而親附吐蕃，但「唐玄宗時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嘗試使用敵國禮進行盟會不成，到唐德宗時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才以甥舅之情為由而將盟書中的用字都改為平等的敵國禮⁷」。然而因吐蕃的逐漸強大，德宗轉為以和親回紇牽制吐蕃。但姑息恃功的回紇和無法控制經常擾邊的吐蕃，是唐朝內部經「安史之亂」到藩鎮割據之下，帝王所面臨對外政策的困境。

（一）、回紇自阿爾泰語族帝國分立而出

回紇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與匈奴、突厥、高車等同屬於阿

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⁴耿振華：〈唐蕃和戰對唐代兵制變遷及和親政治的影響〉；《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7 期（2012 年 3 月）頁 24

⁵（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⁶（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51

⁷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58

爾泰語系。回紇興起之初，在不同時間下，依次隸屬於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相同語系不同部族的所建立的民族帝國。

隋煬帝大業初年，回紇脫離突厥帝國；太宗年間，回紇菩薩可汗與薛延陀合兵破突厥，正式遣使入唐；貞觀二十年（646）回紇吐迷度可汗佔有薛延陀土地軍隊，並於靈武地歸降太宗，同時接受唐的官號與建置；貞觀二十二年（648），唐誘殺謀害吐迷度可汗的親姪烏紇，以軍事武力出兵協助吐迷度之子婆閏繼位可汗；從此，「迴紇不肯西屬突厥」⁸。換言之，回紇初起為弱小部族，在政治、軍事上曾依附阿爾泰語族諸多遊牧帝國。逐漸壯大後，便不再隸屬於突厥、薛延陀等帝國。回紇自阿爾泰語系部落封建帝國⁹分立而出之後，開始吞併周邊如薛延陀等部族的土地、軍備與人口，並歸降太宗。

⁸（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5~5197

⁹ 見耿振華：《中國西北邊疆史：以部落政權發展模式與文化保存為中心》（台北：國立編譯館，民85）頁269~284

按：耿振華所定義的部落封建，是指部落聯盟的宗主國國君或區域共主，仍任命原部落酋長統領所屬的各部落。以歷史實例來說，若部落聯盟為相同族群所構成，則形成民族帝國。若以共同生活方式出現，則形成遊牧行國帝國或農業定居帝國。若地域遼闊、民族不一、農業城郭與草原遊牧聯合而成的部落聯盟，則有如阿爾泰語系匈奴人所建立的匈奴帝國。匈奴帝國包含印歐語系的城郭定居民族樓蘭與印歐語系的遊牧行國民族烏孫等不同語族、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政權。以匈奴帝國的部落封建為例，樓蘭由樓蘭王統治，烏孫由烏孫昆莫統治，但政治經濟軍事都受匈奴帝國節制。以回紇部落政權發展為例，遊牧行國的回紇，曾隸屬於同為阿爾泰語系的遊牧行國帝國，但回紇部族本身仍由回紇酋長或可汗統領。統屬於帝國之下又各自分立的民族政權，有時會以帝國名號自稱，因此會出現相同一個部落，在隸屬匈奴帝國時自稱匈奴，在隸屬鮮卑帝國時自稱鮮卑，在隸屬突厥帝國時自稱突厥；造成匈奴別種、鮮卑別種、突厥別種等民族單純而稱謂複雜的情況，往往出於不同語系、不同人種、不同生活方式等部落封建下的不落聯盟大帝國。

(二)、回紇遣使入貢並願受唐節制

回紇在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始來朝，獻方物¹⁰」，貞觀三年（629）是回紇向唐遣使朝貢的開始。「明年（貞觀四年【630】回紇）復入朝，乃以回紇……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渠領共言：『……世為唐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¹¹」。太宗在貞觀四年（630）依大唐帝國官制將固定官名授予回紇大小酋長，並在回紇領地內建置層級軍事統領的官僚機構；由於回紇統領者仍保有的傳統稱謂與部落封建組織，因此「世為唐臣」代表回紇成為唐帝國羈縻之下的藩屬國，僅如同以往隸屬於阿爾泰語族帝國部落封建下部落民族政權。

壯大且脫離阿爾泰語族帝國的回紇，以唐為外援，成為漠北地區的區域共主。回紇可汗接受唐朝帝王給予的封號，接受唐朝在其領地定點建立唐朝官制下的域外機構，出於回紇「為了在與突厥、薛延陀等漠北諸強的比拼中贏得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時間¹²」，希望「找到可以背靠的強大勢力，使自己在與周邊民族的競爭中能脫穎而出¹³」。亦即回紇興起過程以遠交近攻方式，加入農業漢族所建立的大唐帝國，得到大唐帝國政治庇護與經濟、軍事的支援，取得在阿爾泰語系部落中，次於突厥的穩固地位。回紇成功從以往臣服的阿爾泰語族帝國分立而出，依靠唐朝的支持成為漠北區域共主；大唐帝國

¹⁰（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12

¹¹（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12~6113

¹²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06）頁54

¹³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06）頁52

也利用回紇內政出現篡奪慘殺爭奪汗位之時，以軍事武力介入，扶植親唐可汗，使回紇成為親唐汗國；經由對回紇的控制，成功控制漠北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政權¹⁴。

二、安史之亂前唐對回紇的政策

（一）、太宗時期以部落封建統屬回紇政策的實效

唐太宗能夠介入回紇王位的廢立，除了內政治安定、經濟繁榮與武力強大之外，也與在唐貞觀四年（630）接受四夷酋長主動尊為部落聯盟共主「天可汗」的名號有關；唐太宗得「天可汗」名號後，開始以宗主國帝王下行部落聯盟共主的職掌，在政治上直接統治藩屬國，在軍事上形成武力同盟的合作協防關係，同時造就大唐帝國文化圈內的交流¹⁵。前文所述，回紇菩薩可汗向唐遣使朝貢，唐以軍事武力助其子烏紇成為親附大唐的回紇政權，均出於唐太宗行使「天可汗」部落聯盟共主職掌，直接介入回紇內政，出兵解決叛服不定的回紇的王位之爭，使回紇不僅受唐建制，並影響日後屢次出兵助唐平亂或征戰的契機。

因此，高宗永徽二年（651）七月，回紇出兵五萬騎兵助唐征討突厥¹⁶。高宗永徽六年（655），回紇婆閏可汗遣兵隨唐將蕭嗣業討高麗；高宗顯慶元年（656）突厥犯邊，回紇婆閏可汗隨唐朝將領蘇定

¹⁴杜娟，曹盟：〈唐與回紇和親的原因及意義〉；《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3期（2005年5月）頁40

¹⁵耿振華：〈唐太宗天可汗稱謂與大唐帝國宗主國地位：兼論東征高麗與西討吐蕃的戰略演變〉；《2017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11月）頁41~43

¹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274~6275

方逐突厥；但婆閏可汗死後，繼位的比粟毒王可汗則率領回紇本部與回羅、僕固犯邊，被唐將鄭仁泰討平；此後歷經中宗、睿宗直至玄宗開元時期的歷任回紇部落酋長，都接受唐朝督督等官制名號節制¹⁷。唐初回紇聽命於唐，也出於回紇仍處於逐步茁壯的階段。

（二）、玄宗時期懷柔回紇政策的影響

「性英斷多藝」、「儀範偉麗」¹⁸的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內政能以典刑、禮樂、慈儉、儀軌來杜姦、戒奢、明教，進而重軍法、校吏能，而重振如同太宗貞觀年間的淳美風氣；天寶年間則因用人不當而使小人道長¹⁹，造成「安史之亂」。

玄宗開元年間，壯大的回紇因部落分合與王系更迭，殺唐涼州都督，經唐將以武力收併各部並依唐制建置都督統領軍事，才造成回紇酋長葉護頡利吐發在玄宗天寶初年遣使並受封奉義王；玄宗時回紇的奉義王已擊破其他部落，成為阿爾泰語族次於突厥的區域共主，並自稱骨啜祿毗伽闕可汗，但仍遣使入唐，接受玄宗授予懷仁可汗的封號²⁰。說明玄宗能接受回紇已經強大的事實，因而承認回紇奉義王做為區域共主下的可汗稱謂。

「安史之亂」的出現於玄宗以胡將統胡兵，並以胡將胡兵防範東北方的奚和契丹。而奚、契丹以及回紇的崛起乃至於強盛，更是出

¹⁷（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7~5198

¹⁸（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165

¹⁹（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36

²⁰（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8

於大唐帝國長期對抗突厥並以胡制胡政策的結果。

天寶四載（745）正月，接受玄宗冊封的「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²¹」。面對已能戰勝及吞併突厥的回紇，玄宗採取政治懷柔與經濟封賞，使回紇持續遣使至唐，維持表面上的宗主與藩屬國關係。

「馬嵬之變」玄宗入蜀前，遣高力士宣諭分道帥眾收復長安的太子提及「西戎北狄，吾（玄宗）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肅宗）其勉之！」²²說明玄宗認為對西北民族政權的政治扶植和經濟施恩，足以讓回紇及其他民族政權效忠唐朝。

三、安史之亂後唐對回紇的政策

（一）、肅宗對回紇的政策

1、允諾賞賜而得回紇、于闐效力

「仁愛英悟」、「聰敏強記」²³的肅宗於至德元載（756）七月即位於靈武²⁴，當時大唐急於得到少數民族軍事助力用以平亂，肅宗嘗試善用玄宗以往對少數民族經營的成效。然而基於個別的民族性、

²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863

²²（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240

²³（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239

²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982

各自與唐結盟或與唐爭勝的政策，不同的少數民族政權對宗主國認同與否顯現出兩極化的態度。部分民族政權利用唐朝「安史之亂」、「馬嵬之變」的內亂而侵擾邊境，如突厥與吐蕃；但也有因肅宗持續經營之下，願以軍事武力出兵助唐的于闐和回紇。

突厥在肅宗即位之初即反叛，至德元載（756）九月出現「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胡數萬眾，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²⁵」而被平定。吐蕃則是先服後叛，起初「吐蕃請和，回紇內附²⁶」，之後又表現出忠於唐而願出兵助唐的情況，「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²⁷」，但最後仍然反叛；吐蕃在至德元載（756）十二月「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²⁸」。

至德元載（756）九月，肅宗除了向回紇借兵之外，也西域諸國承諾經濟賞賜，肅宗除「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案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²⁹。厚賞政策，在至德元載（756）十二月

²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998

²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981

²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992

²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11

²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998

據（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8記載：

「至德元載（756）七月，肅宗於靈武即位。遣故邠王男承案封為燉煌王，將軍石定番，使於迴紇，以修好徵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於承案，

使「于闐王勝……自將兵五千入援³⁰」。唐以和親而使回紇騎兵相助則見於下文。

2、和親回紇鞏固政治統屬及軍事徵兵

至德元載（756）七月肅宗即位，九月肅宗「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僕固）懷恩與燉煌王承案使于迴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案，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³¹」，十月敦煌王李承案娶迴紇懷仁可汗女毗伽公主為王妃³²，至德「二載（757）二月，迴紇又使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³³」由於迴紇可汗要求雙向聯姻，因此唐肅宗與迴紇可汗為子輩聯姻，即迴紇可汗少子登里可汗（毗伽闕可汗長子葉護被殺，故由少子登里可汗即位）即位後追述所稱「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婚，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³⁴」也就是唐肅宗將唐胡人將領僕固懷恩之女嫁予後來即位的迴紇可汗少子登里可汗。唐肅宗與迴紇聯姻後，立刻得到

遣首領來朝，請和親，封迴紇公主為毗伽公主。」《舊唐書》與《資治通鑑》不同處在於邠王與幽王，燉煌王與敦煌王的相異文字，以及迴紇公主成為王妃是9月與10月的時間差異；以上細微的差異，並不影響本文認為和親後迴紇方才出兵助唐的論述。

³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10

按：于闐居今塔里木盆地綠洲之上，屬唐安西四鎮之一，為印歐語系的城郭商業民族。

³¹（後晉）劉昫：《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478

³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05

³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8

³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31

回紇兵力相助，並且造成軍事勝利。至德元載（756）「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³⁵」。至德二載（757）九月由懷仁可汗子葉護及回紇將軍帝德等帥兵四千助唐平亂³⁶；四千餘回紇騎兵，在後來助唐反敗為勝，收復西京長安與東京洛陽，過程與實效見於後文。

此外，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丁亥（十七），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³⁷」寧國公主是第三次出嫁方才和親回紇可汗，並且隔年可汗死便離開回紇而重回唐朝³⁸。雖然寧國公主在回紇的時間短暫，卻是唐第一次以皇帝親生女兒和親，顯示大唐帝國對於回紇的重視。因此肅宗迅速得到回紇出兵相助的回應。乾元元年（758）「八月，迴紇使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驍將三千人助國討逆。肅宗嘉其遠至，賜宴，命隨朔方行營使僕固懷恩押之。³⁹」

³⁵（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451

³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2

³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59

（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53 記載：

「（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丁亥（十七），制上第二女寧國公主出降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

³⁸（宋）歐陽修：《新唐書》〈公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3660 記載「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肅宗）乾元元年（758），降回紇應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759），還朝。」

³⁹（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回紇之所以願出兵助唐平亂，除了受到玄宗對回紇的經營的影響，也與肅宗審時度勢下，以親王和親回紇公主、以帝女和親回紇可汗、以唐將僕固懷恩之女和親回紇，以及豐厚嫁妝和金帛賞賜等措施，方能成功締造唐與回紇的軍事聯盟。

（二）、代宗對回紇的政策

「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懼不形於色。仁孝恭溫，動必由禮⁴⁰」的代宗於寶應元年（762）四月「己巳（二十），即皇帝位於柩前⁴¹」。代宗的個性謹慎守禮、氣量大而決斷力強，即位前以廣平王身份任天下兵馬元帥，協助分兵靈武的父親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即位後於寶應元年（762）九月立刻「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脩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由於寧國公主所和親的毗伽可汗已死，寧國公主早已離開回紇而回到長安；當年與代宗以廣平王身份結拜為兄弟的回紇太子葉護也被殺死，而由葉護的弟弟登里可汗即位⁴²。失去和親與結為兄弟直接關係的同盟對象，使代宗在徵兵回紇平定史

頁 520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60 記載「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⁴⁰（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7

⁴¹（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8

⁴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3、7076

頁 7033 記載「（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頁 7076 記載「回紇毗伽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

朝義的過程，發現回紇將舉國出兵會合史朝義劫掠唐朝的危機；「迴紇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家天子頻有大喪（762年玄宗四月初五崩、肅宗四月十八崩），國亂無主，請發兵來收府庫。可汗乃領眾而南……迴紇業已發（兵）至三城北……（劉）清潭發使來奏云：『迴紇登里可汗傾國自來，有眾十萬，羊馬不知其數。』京師大駭，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勞之，及於太原北忻州南，（藥）子昂密數其丁壯，得四千人，老小相兼萬餘人，戰馬四萬匹，牛羊不紀⁴³」。回紇出兵的實際人口是一萬多人，能戰的精兵是四千人，出兵的目的在於與史朝義會合而劫掠唐朝，跟代宗希望回紇出兵幫助唐朝平定史朝義的希望完全相反。

後來由嫁女為登里可敦的唐將僕固懷恩協調，才使回紇可汗向唐代宗上表，表示願意助唐討伐史朝義⁴⁴；而「（僕固）懷恩與迴紇右殺為先鋒，及諸節度使同攻賊，破之，史朝義率殘寇而走⁴⁵」。在交涉出兵協助唐軍的過程中，回紇登里可汗在想要「由潼關東向破賊（史朝義）」，並拒絕唐朝建議「由土門入，直取邢、洺、衛、懷」以及「取懷州太行路，南據河陰之險，直扼賊（史朝義）之喉」的路線；最後才接受殿中監藥子昂所提出的第三條出兵路線，「取陝州太陽津路，食太原倉粟而東，與澤潞、河南、懷鄭節度同入」⁴⁶。代宗即位之初，回紇不僅輕視唐朝，在出兵路線上以方

⁴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2

⁴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31

⁴⁵（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⁴⁶（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便劫掠唐朝人口財貨做為考量重點，不服從唐朝對兵力的調度。

回紇之所以同意出兵平定史朝義，而不再與史朝義合流劫掠百姓的原因出於可敦是僕固懷恩之女；由於受僕固懷恩的影響，當僕固懷恩叛唐時，回紇自然也同時叛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秋，懷恩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將兵，又誘迴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之眾二十餘萬，以犯⁴⁷」。但「（僕固）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永泰元年【765】九月）丁酉（初八），死於鳴沙。⁴⁸」僕固懷恩死後，郭子儀憑藉個人在回紇大小酋長中的威望，相隔一個月的同年十月，便與回紇可汗之弟大將藥葛羅結盟聯兵擊退吐蕃⁴⁹。

永泰元年（765）七月「甲午（初四），（代宗）以上女昇平公主嫁郭子儀之子曖⁵⁰」，代宗與武將郭子儀聯姻。三個月後的十月，郭子儀與數騎前往回紇見主帥藥葛羅結盟，使原來與吐蕃聯兵的回紇轉而幫助唐軍對抗吐蕃。當時的形勢，郭子儀分析，「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⁵¹」、「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

⁴⁷（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6 記載「僕固懷恩誘迴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眾俱入寇。」《舊唐書》記載眾二十餘萬，《資治通鑑》記載數十萬眾。

⁴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7

⁴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0~7182

⁵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6

⁵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

見從，則四海之福也！⁵²」郭子儀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⁵³」運用個人與長時間與回紇大小酋長的情誼，冒死勸說回紇出兵助唐，同時得到結盟機會，從而使回紇出兵助唐。

代宗能成功徵兵回紇，建立在僕固懷恩與郭子儀個人對回紇的影響上。而代宗對僕固懷恩是寬容的，「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眾，為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饋軍，適幸天亡，而上為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為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⁵⁴」。僕固懷恩死後，其女「回紇可敦卒，（大曆三年【768】七月）庚辰（初四），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⁵⁵」，代宗派往回紇祭拜僕固懷恩之女；回紇登里可汗求其妹為可敦，大曆四年（769）「五月，辛卯（二十四），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⁵⁶。代宗寬容厚待僕固懷恩與其二女，是希望藉僕固家族的影響力而與回紇通好。

代宗對郭子儀也是包容的，「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以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

180

⁵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

180

⁵³（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

180

⁵⁴（後晉）劉昫：《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489

⁵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01

⁵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08

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⁵⁷」代宗倚重郭子儀，不僅對其家族寬容，又因郭子儀與回紇親善，代宗也寬容的面對回紇市馬的問題。

「回紇自（肅宗）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值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二十八），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⁵⁸」。代宗因回紇出兵助唐平亂，已忍受回紇的要所無度。而「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大曆八年【773】）十一月，戊子（十七），命市六千匹。⁵⁹」代宗之世，帝王與大臣都不得不以和親、財物賞賜與市馬等諸多方式籠絡回紇。在代宗籠絡回紇的政策之下，回紇卻仍不斷侵擾邊境，「（大曆十年【775】）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⁶⁰」；「（大曆十三年【777】正月）戊辰（二十一），回紇寇太原……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⁶¹」；「（大曆十三年【777】）三月，甲戌（二十八），回紇使還，

⁵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94-7195

⁵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1

⁵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4

⁶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36

⁶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

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⁶²；「（太曆十三年【777】七月）戊午（十四），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⁶³」。

整體來說，代宗依靠僕固家族的影響力，而向回紇借兵並與回紇通好。靠親女嫁郭子儀之子的聯姻關係，透過郭子儀和回紇大小酋長與將領間的情誼與盟誓，使回紇親唐並出兵助唐平定外患。因此，代宗在僕固懷恩生前死後均善待本人先後和親回紇可汗的二女，包容郭子儀及其家族，乃至於通融回紇要求的和親、市馬等財物索取，用來換取回紇的出兵助唐平亂，並在平亂後採取防守邊境及隱忍劫掠的政策。因此，出於回紇的主動的寇邊、劫掠百姓或違法亂紀，代宗只能被動的接受並持續地善待回紇；這便是德宗即位初期，採取親吐蕃抑回紇的原因。

（三）、德宗對回紇的政策

「聰明文思」、「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⁶⁴的德宗於「太曆十四年（779）五月……癸亥（二十三），即位於太極殿⁶⁵」，

250~7251

⁶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51

⁶³（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52

⁶⁴（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401

⁶⁵（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19

德宗與其父代宗相差十五歲⁶⁶，代宗五十二歲駕崩⁶⁷，德宗即位時年三十七歲，是位勵精圖志且較為嚴厲的國君。德宗前期對回紇的政策，受到親眼所見代宗時期回紇侵擾邊境並在大唐境內違法亂紀的情況，以及早年用雍王身分在陝州會見登里可汗時受到屈辱經驗的影響，即位後便採取親吐蕃抑回紇的政策。

陝州之辱的時間發生在 762 年，身為雍王的太子年已二十。由於祖父肅宗「命元帥廣平王（德宗父代宗）見葉護，約為兄弟，接之頗有恩義。葉護大喜，謂王（德宗父代宗）為兄。⁶⁸」可知代宗的年齡比回紇葉護大；而葉護是長子，登里可汗被是少子，因此登里可汗的年齡定較代宗為小。代宗與德宗僅相差十五歲；所以回紇登里可汗與二十歲的雍王年齡應該差距應在兄弟之間。若以唐和吐蕃「甥舅之國」的關係來看，唐始終為「舅」而吐蕃永遠為甥。「赤德祖贊在《請約和好書》五次自稱為『甥』，並一次稱中宗為『舅』，兩次稱玄宗為『舅』……實際上中宗是赤德祖贊的外舅，玄宗

⁶⁶（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7 記載「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敬章皇太后吳氏，以（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727 年 1 月 9 日）生於東都（洛陽）上陽宮。」

（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19 記載「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玄宗）天寶元年四月癸巳（十九，742 年 5 月 27 日，代宗年十五），生於長安大內之東宮。」

因此，代宗年十五時，德宗降生。

⁶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256

⁶⁸（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8

是赤德祖贊的妻舅⁶⁹」；與大唐金城公主和親的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可能並不了解「外舅」與「妻舅」之間輩份的差異，而認為唐與吐蕃甥舅關係中，唐為「舅」，吐蕃是「甥」，因此不論對中宗或玄宗，都自稱「甥」而稱唐為「舅」；德宗時，吐蕃贊普乞立贊對唐使韋倫說「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⁷⁰」也可以做為吐蕃自認是「甥」而稱唐為「舅」的旁證。廣平王（代宗）與葉護太子結為兄弟時，是唐為兄而回紇為弟；如果唐與回紇結為兄弟之國，在唐為兄且回紇為弟的情況下，不僅雍王（德宗）與登里可汗年齡相當於同輩的兄弟，雍王更應為登里可汗之兄。德宗時，以宰相身份篡位的回紇武義成功可汗便上言：「昔為兄弟，今為子婿⁷¹」，德宗並未跟武義成功可汗結為兄弟，而是後文所說，武義成功可汗為和親而自願從「昔為兄弟」的「兄弟之國」，變成「今為子婿」的「父子之國」。

陝州之辱發生衝突的原因在於雍王不願在庭前舞蹈，代宗「以雍王為兵馬元帥……東會迴紇登里可汗營於陝州黃河北……元帥雍王領（藥）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⁷²」因不願舞蹈，在爭論中才牽連到輩份的問題。當時唐將僕固懷恩是登里可汗的岳父，史料並未顯示代宗曾與登里可汗本人結為兄弟，因此迴紇要求

⁶⁹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23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46~47

⁷⁰（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45

⁷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8

⁷²（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3

雍王於帳前舞蹈是事實，輩份之說則是假託。至於帳前舞蹈則可能是羣眾圍舞而不是獨舞，如果雍王不願入境隨俗而加入羣舞同樂，導致回紇宰相車鼻傷人，「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各撈捶一百，少華、琚因撈捶，一宿而死。以（雍）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而（僕固）懷恩與右殺為先鋒，及諸節度同攻賊，破之，史朝義帥殘寇而走⁷³」。致使「官軍以王受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⁷⁴」；由於太子雍王的忍辱，才讓登里可汗出兵助唐代宗平亂，進而使唐軍獲取勝利。

779年德宗五月二十三日即位後，因太子時期的陝州之辱，採取親善吐蕃抵制回紇的政策。779年「（七月）庚辰（十三），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德效華人⁷⁵」，嚴加管制回紇。779年八月，一改代宗時期扣留吐蕃使者及流放俘虜的政策，德宗賜衣吐蕃俘虜並將俘虜送回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初八），以隋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⁷⁶」。德宗親善吐蕃的政策，造成建中「三年（782）四月，（吐蕃）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⁷⁷」的回應。德宗

⁷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3

⁷⁴（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18

⁷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65

⁷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67~7268

⁷⁷（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

時期，不僅與吐蕃互相交換俘虜，在建中四年（783）正月，德宗還正式詔令禮部告廟，讓祖廟的歷代先王知道，德宗要與以擴張為主的吐蕃贊普赤松德贊，進行兩國之間由使者代表的三次的「清水會盟」⁷⁸。但「清水會盟」後德宗遭遇吐蕃宰相尚贊結平涼劫盟的詐騙，導致會盟的唐朝官員被殺四五百人，被俘者千餘人⁷⁹。於是德宗接受李泌的建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開始由壓抑回紇轉變成聯合回紇來牽制吐蕃⁸⁰。李泌並且建議德宗要求回紇「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⁸¹」回紇可汗為與唐和親而意李泌要求的五項條件，德宗才在貞元四年（788）十月「庚子（二十六）詔咸安公主降迴紇可汗⁸²」，雖然「貞元五年（789）十二月，迴紇汨咄祿長壽天親可汗薨⁸³」；不過，德宗在「（貞元五年【789】十二月，庚午（初五）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初十），遣鴻臚卿郭鋒策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⁸⁴」也就是因

頁 5246

⁷⁸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32

⁷⁹ （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52

⁸⁰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502

⁸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504~7505

⁸²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8

⁸³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8

⁸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520

咸安公主和親回紇，德宗不僅將回紇從兄弟之國改為父子之國，同時建立了回紇的親唐政權。

德宗當太子時與回紇基於習俗不同而發生陝州之辱的衝突，為了讓代宗順利徵兵回紇而隱忍不發作，德宗即位後便採取親善吐蕃壓抑回紇的政策。但經過慎重告廟的清水會盟卻無法訂定疆界，後續的平涼會盟又造成唐朝參與的官員和會盟者被吐蕃埋伏士兵所劫殺或俘虜。因此，德宗對外政策產生轉變，接受了謀臣李泌的建議，採取親善回紇並以回紇牽制吐蕃。德宗以咸安公主和親回紇，並在和親的可汗死後立原可汗之子成為回紇的親唐政權；「回紇斷絕與吐蕃的關係，並允諾助唐攻打吐蕃……使吐蕃逐漸走向了衰落，為唐……爭取的一個和平的外交環境⁸⁵」。德宗對外政策的轉變，對唐朝的影響是正面的貢獻。

（四）、憲宗以後對回紇的政策

憲宗以後仍維持以和親及賞賜滿足回紇，用來避免回紇侵擾邊境的政策。憲宗因「回鶻之請婚，有司度費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侗往諭不可⁸⁶」。而回紇重視和親以及和親所獲得多於財物賞賜的實利；因此「（憲宗元和）八年（813）四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是歲，迴鶻數千騎至鶚鵠泉，邊軍戒嚴⁸⁷」；回紇

⁸⁵ 袁志鵬：〈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06

⁸⁶ （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29

⁸⁷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10

表現出若唐不和親，則將出兵擾亂邊境。唐朝大臣因此支持和親，認為和親回紇花費雖大，卻少於戰爭的開銷；「可汗以三千騎至鴨鵝泉，禮部上書李絳奏言：『回鶻強盛，北邊空虛……北狄貪沒，唯利是視……自脩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悉之……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或謂降主費多，臣謂不然……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帝不聽。⁸⁸」憲宗最早因為花費過多，而不同意和親回紇；但在「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⁸⁹」

於是在穆宗長慶元年（821）五月「癸亥（二十八），以太和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初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六月）戊寅（十四），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⁹⁰」和親所造成外交關係的改變，使回紇親唐而對抗吐蕃。對唐朝來說，至少能避免回紇與吐蕃聯兵犯唐的災難。

除了和親回紇，為穩固回紇親唐及共同對抗吐蕃，穆宗還給予回紇豐厚的賞賜，在長慶「二年（822），賜回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⁹¹」。穆宗時，朝議擔心回紇出現以往幫助肅

⁸⁸（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26~6127

⁸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79

⁹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791~7792

⁹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2

宗收復兩京之後對百姓和社會的燒殺劫掠，為阻止回紇出兵，穆宗「詔發繒帛七萬匹賜之，方還」⁹²。而文宗「大和元年（827），命中使以絹二十萬匹付鴻臚寺宣賜迴鶻充馬價。⁹³」唐朝至此已失去對回紇的主控力量，出兵與否完全由回紇自主決定。以往因需要回紇出兵而給予回紇大量財物的賞賜，而穆宗以後則為了防止回紇出兵劫掠大唐子民，需要賞賜回紇更多的財物，來避免回紇燒殺劫掠為百姓所帶來更大的禍害。

貳、回紇助唐征戰的理由

一、因政治統屬而受唐徵調兵力

回紇助唐征戰的理由，與太宗時期歸附大唐帝國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設置羈縻府州有關。羈縻府州是由唐任命部落酋長出任都督或刺史，以部落酋長守衛本部兵馬；在軍事上必須接受大唐天子或都護府的節制和調遣，特別在大唐帝國需要兵時要承擔協助征討的職責⁹⁴。由於太宗時期回紇受唐節制，高宗時期回紇便承擔出兵助唐征討突厥。突厥阿史那賀魯趁太宗過世叛唐，「（高宗永徽）二年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高宗）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⁹⁵。回紇以五萬騎兵協助唐高宗

⁹²（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2

⁹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3

⁹⁴周寶硯：〈論唐王朝治邊方略及其啟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 23 卷（總第 133 期）（2007 年第 3 期）頁 74

⁹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273~6275

三萬以步兵為主的將士征討突厥，回紇發兵的人數超過唐軍，回紇騎兵的作戰能力也超過以步兵為主力的唐軍。一方面出於回紇希望打擊突厥，另外也是在太宗「天可汗」共主餘威之下，願意承擔軍事調遣義務的表現。

二、因和親之利或戰爭之利而出兵

回紇戰爭的目的在於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寇邊或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都是為了得到物資、人口、馬牛羊等牲口的劫掠戰爭。回紇重視和親，因與唐和親後公主陪嫁能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兩個家族的和親造成兩個國家的結盟，以及兩個家族與兩個國家之間的同盟與庇護。回紇出兵常在和親之後，出於認為和親是彼此釋出最大誠意的表現，可以化解任何長期以來的恩怨。

和親為家族成員帶來庇護的情形，可以回紇登里可汗和親僕固懷恩之女為例。登里可汗之弟藥葛羅答應出兵幫助郭子儀征討吐蕃時，便要求郭子儀，「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⁹⁶」在僕固懷恩過世之後，因其女為回紇可敦，其子以及整個僕固家族也因此受到保護。

前文提及，至德二載（757）九月，肅宗在親王李承寀娶回紇公主後，立刻得到回紇出兵四千餘人協助。為鼓舞回紇盡力作戰，「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⁹⁷」；並以實利與回紇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⁹⁸」。在唐軍收復西

⁹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80~7181

⁹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2

⁹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4

京長安之後，回紇太子葉護因出兵四千餘人助唐，希望依照約定取得財物和人口。唐太子廣平王俦（代宗）也「拜於葉護馬前」以利害說回紇，將劫掠的行為延後，先繼續助唐收復失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⁹⁹；至德二載（757）十月，「壬戌（十八），廣平王俦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俦患之。父老請率錦羅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¹⁰⁰」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代宗李俦）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代宗李俦）又賚之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十一月癸酉，（迴紇太子）葉護自東京至。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肅宗）御宣政殿宴勞之。（迴紇太子）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繡繒彩金銀器皿。¹⁰¹」

回紇因出兵助肅宗征戰收回兩京有功，不僅劫掠在大唐境內戰亂下百姓僅有的物資，還在大唐境內派將領看守這些搶來的財貨；「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¹⁰²」。因此，回紇之所以為和親而出兵，除了重視聯姻與親族間的關係之外，也因獲得與唐和親所獲大量物資及得以劫掠物資而戰。

⁹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4

¹⁰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41

¹⁰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8

¹⁰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35

代宗永泰元年（765），「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¹⁰³」，便出僕固懷恩利誘少數民族發動劫掠戰爭。郭子儀在僕固懷恩死後，則同樣利誘回紇出兵劫掠吐蕃搶來的物資，同時助唐討吐蕃；郭子儀告訴回紇，「吐蕃……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¹⁰⁴」郭子儀形容吐蕃的物資「其馬羊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¹⁰⁵」以經濟利益做為戰爭目的，回紇可以因利而與吐蕃聯兵犯唐，也可以因利背叛吐蕃而出兵助唐。善察回紇族性，是郭子儀成功與回紇結盟的重要原因。

三、因盟誓出兵

郭子儀為使回紇出兵助唐討吐蕃，與回紇可汗之弟藥葛羅大將結盟為誓，「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盍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代宗永泰元年【765】十月）癸丑（十五），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

¹⁰³（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76

¹⁰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81

¹⁰⁵（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462~3463

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十月無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¹⁰⁶」兩人結盟為誓，出於回紇尚巫重神習俗，以及唐賜回紇三千匹綵緞；個人與個人間的結盟，促使回紇遣使入朝，並與唐聯兵攻潰吐蕃。

參、唐與回紇結盟對征戰實效及影響

一、回紇助唐征戰的軍事成效

太宗、高宗時期，回紇在軍事上受唐調度，「（突厥）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庭，（回紇）婆閏以騎五萬助（唐將）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庭；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¹⁰⁷」高宗一朝，回紇已展現助唐征戰的軍事成效。

當回紇部落逐漸興盛，唐朝又出現內亂之時，唐朝在平定內亂外患的戰中，大致皆以唐軍做為主力部隊；而回紇提供三至五千騎兵助戰，由於回紇的擅長埋伏與突襲，與唐軍配合之下，是促成唐軍致勝的重要助力。因此至德二載（757）二月，肅宗謀士李泌建議選擇胡兵適應的季節冷熱氣候，做為開戰時機，「遣安西及西域之眾，」
「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

¹⁰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81~7182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6記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今公盟約。』」

¹⁰⁷（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13

至之銳，攻（安）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¹⁰⁸。郭子儀也認為得到回紇士兵相助，有助於戰爭得勝；「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¹⁰⁹」。史料記載，顯現肅宗朝的文臣李泌與武將郭子儀，高度重視外族兵與回紇軍士的作戰能力。

前文提及，高宗永徽二年（651）回紇出兵五萬騎攻突厥，軍士超過唐軍步騎兵共三萬的總數。而肅宗即位後，至德二載（757）九月，回紇助唐的士兵人數為「精兵四千餘人¹¹⁰」，唐軍「從元帥廣平王帥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¹¹¹」。至德二載（757）九月回紇出兵四千餘人，唐軍加上外族士兵的總數則為十五萬人。相較之下，回紇不僅出兵人數降低，發兵的契機，也往往出於肅宗允諾和親及給予回紇金帛人口。但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僅出兵四千餘騎的回紇，在收復西京長安的香積寺之役，在收復東京洛陽的新店之役，善射的回紇騎兵，都能以奇襲與唐軍配合包抄夾擊，是唐軍在兩年內收復長安、洛陽的重要因素。

肅宗至德二載（757）九月香積寺之役中，「元帥廣平王（代宗李俶）帥郭子儀等至香積寺東二十里，西臨澧水。賊（安、史亂軍）埋精騎於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指迴紇馳

¹⁰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18

¹⁰⁹（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2

¹¹⁰（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23

¹¹¹（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451

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¹¹²」回紇在香積寺之役中具體的貢獻，在於發揮反敗為勝的功效，「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剪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癸卯（28），大軍入西京。¹¹³」

新店之役中，面對安慶緒悉發十五萬步兵騎兵，回紇能夠利用地勢從敵軍後方發動奇襲，而造成唐軍由敗轉勝的成果；肅宗至德二載（757）九月「己未（十五），廣平王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之曰：『回紇至矣！』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屍蔽野。¹¹⁴」

以上，便是在四千餘回紇騎兵協助下，肅宗迅速收復兩京的過程。

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寧國公主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和親，同年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¹¹⁵。」回紇的三千騎兵，在與唐軍合戰半年餘僅剩十五人，在大唐九節度使潰於相州前先逃回長安；「（肅宗乾元元年【758】3月）甲申（18），回紇骨啜特勒、

¹¹²（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9

¹¹³（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3~7034

¹¹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40

¹¹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60

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24），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休養一周後，回紇便回其故地¹¹⁶。相州之役兵敗的原因，依《考異》引《邠志》認為僕固懷恩記恨牙前兵馬使吳思禮言語提到史思明為蓋將果然造反是在影射自己，在勝仗後，「（僕固懷恩）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潰於城下」¹¹⁷。因此，回紇出兵卻仍戰敗的原因，在於郭子儀帶兵先離開戰場，而不在於回紇騎兵不盡力或出兵卻沒有成效，戰敗是出於唐軍內部調度以及將領彼此猜疑的問題。

戰爭所需的軍士人口，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¹¹⁸；也就是說，需要五千騎兵，三萬步兵左右的軍士人口，才能夠開戰。因此回紇出兵三、四千人助唐平亂，雖然人數不多，但皆為騎兵，回紇提供的騎兵，正足以解決唐軍馬匹以及騎兵人數的不足。在多次勝戰中，已顯示回紇提供的騎兵，具有戰勝的軍事實效。然而平定「安史之亂」的作戰主力仍以唐軍步兵為主，回紇騎兵僅能做為精銳前鋒部隊，給予唐軍及包抄突襲的契機；因此，戰敗責任往往出於唐軍本身戰略調度的問題，戰勝的原因則經常歸於回紇騎兵的衝鋒陷陣。

二、唐借兵回紇政策的負面影響

漢文史料對於回紇民族性的記載，包括：「其俗驍強」、「人性凶

¹¹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72

¹¹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70

¹¹⁸（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27

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¹¹⁹。回紇本身的石碑刻文也提到「上天及大地（神）保佑了我的奴婢（和）人民」，「我搶來了他們的馬群、財物、姑娘、婦女」，「那時天地保佑了我的奴婢（及）人民」；回紇寇抄習俗與尚武精神，反映在縱兵掠奪人口，將異族戰俘視為奴隸以從事生產勞動的慣例¹²⁰。

在唐朝政治扶植與經濟賞賜下，回紇王室日漸強大；而大唐帝國遭遇「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在經濟衰退、政治影響力下降以及軍事受制於藩鎮的情況下國勢實力下降的情況下，則往往需要順應及滿足回紇民族性的要求，方能促使回紇出兵並竭力為唐奮戰。

肅宗時，回紇助唐收復兩京，「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賁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賜錦繡繒綵金銀器皿。及辭歸蕃……仍封忠義王，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¹²¹」。回紇剽掠東京的情況，如「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¹²²」。回紇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百姓及任意殺害唐朝公人；如「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

¹¹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5

¹²⁰廖楊：〈回紇族的宗法統治述論〉；《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3 年 7 月）頁 34

¹²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9~5200

¹²²（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35

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¹²³」。代宗時，回紇因出兵助唐平定吐蕃，族人犯法，因唐朝對回紇政策的寬容，無人敢問也無人敢阻；如「（代宗廣德元年【763】一月）閏月，己酉（初五）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¹²⁴」；「（代宗大曆七年【772】）春，正月，甲辰（二十二），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¹²⁵」；「（代宗大曆七年【772】）秋，七月，癸巳（十四），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說乘他馬而去弗敢爭。¹²⁶」；「（代宗大曆九年【774】九月）壬寅（初六），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¹²⁷」；「（代宗大曆十年【775】）九月，戊申（十七），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酋而去。上亦不問。¹²⁸」。回紇公然燒殺劫掠百姓已造成唐朝社會不安，不守唐法及陵侮官員和殺害公人甚至騎馬劫獄，更是挑釁到唐朝的司法制度與國家治安。

「回紇恃功，自（肅宗）乾元以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¹²⁹」，敬宗時，冊立回

¹²³（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41

¹²⁴（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40~7141

¹²⁵（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18

¹²⁶（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19

¹²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8

¹²⁸（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32

¹²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

紇新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¹³⁰」造成「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逐漸感到經濟上的沉重負擔。

三、唐代回紇政策演變與影響

對唐朝來說，回紇在少數民族政權中，「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為民之害亦深¹³¹」。回紇因利出兵，「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¹³²」。唐朝早期得到回紇遣使納貢，接受政治上的統屬關係以及認同出兵協助平定內亂外患的義務。晚期唐朝以和親、賞賜、購馬等不同措施，給予實際經濟利益，請出兵助戰。末期則以財物賄賂的方式，阻止回紇犯邊或出兵後劫掠唐朝子民。

回紇對唐代的民生經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唐朝末期已因回紇要索無度而出現「生靈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朝廷之法令並弛，無以易其憑陵。忍恥和親，姑息不暇。¹³³」

黠戛斯破回紇後回紇種落分散，而唐朝仍持續有吐蕃與南詔的外患。大唐帝國與回紇的關係，在極盛期的唐朝能以經濟賞賜、軍事建置主動建立親唐政權，並維繫部落封建政治下宗主國與藩屬國的統屬關係；在唐朝因內政外患需要借兵回紇時，則須忍辱滿足回紇的一切需求，甚至默許回紇縱兵劫掠民間百姓；在唐朝經濟出現枯

頁 5207

¹³⁰（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30

¹³¹（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¹³²（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21

¹³³（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竭的情況，仍要努力湊足財貨被動阻止回紇寇邊或縱兵劫掠。

因此，大唐帝國或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一個國家，不論強弱，不論貧富，都需要有因應不同對象、不同情況下的對外政策。「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從唐朝對回紇政策的演變中，可以看出唐朝君臣審時度勢下，兢兢業業的經營與回紇之間的關係。而回紇離散之後，唐朝君臣仍謹慎處理與吐蕃和南詔的對外關係。因此，成功的對外政策是保障國內穩定的力量，遭遇內亂時則更要用心經營對外關係，以免外患趁虛而入。

參考書目

一、基本史料

- (後晉)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
(宋)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

二、後人論著

- 杜娟，曹盟：〈唐與回紇和親的原因及意義〉；《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3期(2005年5月)
周寶硯：〈論唐王朝治邊方略及其啟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23卷(總第133期)(2007年第3期)
耿振華：《中國西北邊疆史：以部落政權發展模式與文化保存為中心》(台北：國立編譯館【永和：啟英文化發行】，民85【1996】)
耿振華：〈唐太宗天可汗稱謂與大唐帝國宗主國地位：兼論東征高麗與西討吐蕃的戰略演變〉；《2017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11月)
耿振華：〈唐蕃和戰對唐代兵制變遷及和親政治的影響〉；《蒙藏季刊》第21卷第7期(2012年3月)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23卷第4期(2014年12月)
袁志鵬：〈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唐山師範學院學報》

第36卷第1期（2014年1月）

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卷第2期（2006）

廖楊：〈回紇族的宗法統治述論〉；《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4期（2003年7月）

〈塞蘆子〉詩所見蘆子關在唐代關中北面的軍事

地理

蔡坤倫*

摘要

唐代長安北往河套與受降城有三條路線，三線中以中線最為捷近，由長安北行經坊州、鄜州、延州，西北行經夏州至豐州西受降城及天德軍，途經蘆子關，蘆子關控制關中北面的路線捷徑，重要性不言可喻。本文透過杜甫〈塞蘆子〉詩論述蘆子關，希冀能藉由詩與史相互釐清、互證，作為單一關防研究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嘗試性的拓展。

關鍵詞：唐代、杜甫、蘆子關、關中、關隘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The Military Geography of Lu-Zi-Guan on the North of Guanzhong in the Tang Dynasty by ‘Sai- Lu-Zi’ poem

Kun-lun Tsai**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ere three routes from Chang'an north to Hetao and Shou-Xiang-Cheng. The middle of the three routes was the shortest. The middle route was from Chang'an north to passed Changzhou, Fuzhou, Yanzhou, and Yanzhou northwest passed Xiazhou to West-Shou-Xiang-Cheng and Tian-De-Jun in Fengzhou. Lu-Zi-Guan located in middle route, and controls the route shortcuts north of Guanzhong, and its importance is self-evid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Lu-Zi-Guan through Du-Fu ‘Sai-Lu-Zi’ poem, and hoping to use poems and history to clarify and prove each other, as a tentative expansion of single guan research under limited data.

Keywords : Tang Dynasty, Du-fu, Lu-zi-guan, Guanzhong, Guans

** Doctoral degree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resent.

壹、前言

歷史上都城所在的四方，往往因國防安全需要，而有依自然地貌與設置人文設施作為屏障。唐代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域，以山川形勢而言，北面軍事防禦首先是黃土與鄂爾多斯兩大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南接長城，以白于山與黃土高原為界，西、北、東三面並有黃河環繞。其次是關中北面黃河段自上游而下游依序設有西套、後套、前套，三套西有賀蘭山，北有陰山，東有呂梁山。以人文設施而論，首先是唐睿宗景雲三年（712）張仁愿於河套北側、黃河北岸上游自下游修築西、中、東三受降城，作為防禦北方突厥前線的軍事駐防體。其次是沿驛道設置於道路上的關隘。換言之，唐代關中北面不但有自然的山地與高原地形，黃河圍繞，更有人為的農業河套地帶，以及受降城與關隘的興建，自然形勢與人文設施構成唐代關中北面的防禦工事。

杜甫素有詩聖、詩史之稱，詩中流露憂國憂民的社會寫實面相，往往可與史實互證互補。本文以杜詩〈塞蘆子〉中記載的蘆子關切入，結合文獻記載釐清詩中意涵，除前言與結語外，第二章論述蘆子關的名稱與地理位置，第三章析論〈塞蘆子〉詩提及的五城，延伸討論蘆子關與黃河內、外五城的軍事格局，第四章則以趙雲過蘆子關案例，兼論經此關的交通網絡。唐詩卷帙浩繁，對於研究唐代史學、文學等面向具有斟補意義，方法上則是運用陳寅恪以詩證史。

貳、蘆子關的名稱與地理位置

一、名稱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關，¹蘆子關首見於唐代，又杜甫著有〈塞蘆子〉詩，²可見關又稱蘆子。蘆子之名據南宋人蔡夢弼語蘆關：「去延州百八十里，有土門山，兩崖峙立如門，形若葫蘆，故謂之蘆子。」³蘆子關地處土門山，土門山由於兩崖對峙如門的兩扇，形狀上宛若葫蘆，故名。此關名稱史家載名為蘆子關，詩人記為蘆子，蔡氏則以蘆關簡稱，蘆關名稱應溯源五代時後唐，《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四年四月：「延州奏，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金明鎮」，⁴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四月，蘆子關所在的延州上奏，蕃夷部族搶劫運送的糧餉以及攻城的器具，逼使蘆關的將兵退守金明鎮，能讓軍隊棄關撤退想見此次外族入侵的嚴重。總之，唐代蘆子關亦稱蘆子，五代後唐以後簡稱蘆關。

（一）、地理位置：從新、舊塞門鎮談起

¹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卷37，〈地理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971。

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卷4，〈塞蘆子〉，頁327-329。

³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3，1版），卷57，〈陝西·延安府·安塞縣·蘆關〉，頁2724引。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的作用〉，《唐史論叢》，2008，頁141。

⁴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5，1版），卷44，〈唐書·明宗紀〉，頁604。

前引《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蘆子關位於延州延昌縣北，可知關隸屬延州，不過《元和郡縣圖志》【以下簡稱《元和志》】卻有相異記載，且涉及與塞門鎮相對位置，至於塞門鎮位置亦有兩說。《元和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記載：「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⁵位於夏州的蘆子關在塞門鎮南 18 唐里，此塞門鎮在蘆子關北方說。《元和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另載：「塞門鎮，在縣西北二十里。鎮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⁶塞門鎮原本在夏州寧朔縣界，玄宗開元二年（714）遷到蘆子關南金鎮所，嚴耕望以為「金」疑為「今」之誤，⁷即蘆子關南側的今鎮所是遷移後的塞門鎮所在，新塞門鎮位於延州延昌縣西北 20 唐里，此塞門鎮在蘆子關南方說。換言之，塞門鎮有新、舊之別，舊塞門鎮位於蘆子關北的夏州寧朔縣，新塞門鎮於玄宗開元二年時遷到蘆子關南的延州延昌縣西北，至於蘆子關則隸屬夏州。

李吉甫認為塞門鎮在唐代出現新、舊之別，至於與之相對位置的蘆子關則未曾變遷，皆屬夏州，然而，《新唐書·地理志》則記此關屬延州，究竟唐代蘆子關隸屬何州？《資治通鑑·後唐紀》明宗長興四年（933）胡三省注：「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⁸塞門寨即唐代新塞門鎮，北宋人趙珣以為蘆關在延州延昌縣，新塞門鎮北 15 宋里。近人考證蘆關

⁵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6，1版），卷3，〈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78。

⁶ 《元和郡縣圖志》，卷3，〈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78。

⁷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頁237。

⁸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版），卷278，〈後唐紀〉，頁9083。

位置，如艾冲：「夏州的南界以蘆子關所在的白於山為限」，⁹說明依白於山而建的蘆子關位於夏州南界。王北辰：「位於陝西安塞縣北約 70 公里土門山谷，北與靖邊縣接界」，¹⁰穆渭生接踵其說，「故址在今安塞縣西北 70 公里與靖邊縣交界處，當延河源頭。」¹¹今安塞縣於唐代時屬延州，靖邊縣屬夏州，土門山谷可視為白於山系列山峰，可說蘆子關在夏州與延州的邊界。

溯源兩部地理志記載的政區時間，《元和志》以貞觀十三年（639）《大簿》中的十道為綱領，述唐憲宗元和時統治和 47 鎮割據地其下治理的州縣。¹²《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政區以開元、天寶為主體，政區沿革下限當以唐末天祐年間為斷。¹³是否可以說兩部地理書反映唐代前、後期政區變化，兩州邊界的變遷，導致蘆子關有位於夏州與延州之別？但從宋人記載以及近代學者考證，蘆子關位置似乎仍以在延州為多數時期，為延、夏兩州邊關，位於清水（今延河）源頭，王開以為關分峙於河水兩岸，¹⁴可見關在性質上屬於水、陸關。

⁹ 艾冲，〈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 年第 1 輯，頁 30。

¹⁰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歷史地理》，1990 年第 9 輯，頁 273。

¹¹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7，1 版），頁 309。

¹² 《元和郡縣圖志》「前言」，頁 1。

¹³ 華林甫，〈二十世紀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評〉，《中國地方志》，2006 年第 2 期，頁 41-49。陳凱，〈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史林》，2010 年第 1 期，頁 58-60。

¹⁴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 版），頁 208。

參、蘆子關與黃河內、外五城的軍事格局

談到唐代蘆子關的軍事地位必須從杜甫〈塞蘆子〉詩來分析。詩云：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崑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¹⁵

五城據仇兆鰲注是指定遠、豐安、三受降城。¹⁶定遠城據《新唐書·郭元振傳》記載：「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¹⁷定遠與豐安二城於玄宗先天元年（712）郭元振修築。又《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警州條記載：「警州，本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先天二年，朔方大總管郭元振置。其後為上縣，隸靈州。景福元年，靈威節度使韓遵表為州。」¹⁸可見定遠城在修建後的翌年（713）改置為警州，曾降為上縣，隸屬於靈州，直到昭宗景福元年（892）恢復警州之名。

豐安城即豐安縣城，據《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靈州迴樂縣記載：「武德四年析置豐安縣。貞觀四年於迴樂境置迴州，以豐安隸迴

¹⁵ 《杜詩詳註》，卷4，〈塞蘆子〉，頁327-329。

¹⁶ 《杜詩詳註》，卷4，〈塞蘆子〉，頁327仇注。

¹⁷ 《新唐書》，卷122，〈郭元振傳〉，頁4365。

¹⁸ 《新唐書》，卷37，〈地理志·關內道·警州〉，頁973。

州。十三年州廢，省豐安」，¹⁹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靈州迴樂縣分置豐安縣，太宗貞觀四年（630）豐安縣隸屬迴州，十三年（639）縣隨迴州廢除亦省去。又《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豐州永豐縣記載：「麟德元年別置豐安縣，天寶末省」，²⁰可見在高宗麟德元年（664）豐安縣再次被設置，不過，這次是出現在豐州，不在靈州，由永豐縣分置而成。西元 664 年後，此城曾廢，是以才有後來郭元振在玄宗先天元年（712）的再次修築，並且在玄宗天寶末年再次被廢。

三受降城據《新唐書·地理志》關內道豐州東受降城條記載：「景雲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²¹唐睿宗景雲三年（712）張仁愿於河套北側、黃河北岸上游至下游修築西、中、東三受降城，作為防禦北方突厥前線的軍事駐防體。²²三受降城同時與黃河三套互為關中北面軍防與農業要帶。〈塞蘆子〉詩中所謂的五城，倘依照修築時間，雖然三受降城出現時間仍有分歧，²³但依文獻記載，定遠、豐安二城於玄宗先天元年（712）為郭元振所築，三受降城於睿宗景雲三年（712）張仁愿所築，西元 712 年是睿宗與玄宗皇權轉換的交

¹⁹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靈州靈武郡〉，頁 972。

²⁰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豐州九原郡〉，頁 976。

²¹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豐州·永豐縣〉，頁 976。

²² 三受降城的設置與對外交通的開通與突厥有關。石維娜，〈唐長安通往「三受降城」的驛路及其歷史作用〉，《華夏文化》，2011 年第 4 期，頁 27。

²³ 三受降城的修築時間有唐中宗神龍三年（707）、景龍二年（708）或景龍中、睿宗景雲二年（711）、景雲三年（712）四說。王亞勇考證文獻，認為以景龍二年較貼近史實，詳參氏著，〈三受降城修築時間考〉，《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漢文版），1988 年第 3 期，頁 50-52。李鴻賓對三受降城地理位置與唐朝北部國防安全的連結。詳參氏著，〈唐朝三受降城與北部防務問題〉，收錄中國長城學會編，《長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2，1 版），頁 143-153。王北辰，〈內蒙古後套平原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兼考唐西受降城〉，收錄氏著，《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7，1 版），頁 358-370。

接年，亦是五城再築與首現的時間點。若依地理位置而言，定遠城在靈州或不遠處的警州，與賀蘭山相依，豐安城先設置在靈州，後改設於豐州，三受降城亦隸屬於豐州，與陰山相伴。換言之，五城位置皆位於黃河以北，或可稱為河外五城，與黃河「口」字型流向相依相隨，人文設施與自然形勢交錯，形成唐代長安北面河外防禦突厥的軍事體，「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訴說河外五城佇立在都城北面的黃河以北。

唐代兵制前期繼承隋朝府兵制，中央與地方軍隊合一，高宗、武后是轉折期，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府兵制破壞，中央改由募兵而來的彍騎負責，地方則由節度使，以藩鎮軍之姿分治地方，中央與地方軍隊分開，節度使尤其以邊疆兵力更有直逼中央軍的規模。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²⁴「率蕃、漢之兵十餘萬」，自幽州往南，以誅楊國忠為名，揭開安史之亂的序幕。²⁵詩云「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荊杞是荊棘與枸杞的合稱，帶鉤刺被視為惡木，借指殘破蕭條的景象，精銳的邊防藩鎮兵因被調往東平亂事，導致城內空蕩呈現蕭條之象。

詩云「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的背景是安史之亂期間，發生在肅宗至德二載（757）的太原之戰。天寶十五載（756）安祿山在東京洛陽僭稱燕帝，常山太守顏杲卿與弟顏真卿起兵，河北諸郡響應，但為史思明所敗，河北復陷，郭子儀與李光弼合軍再敗史思明，俘虜安思義，²⁶本欲直攻范陽，切斷安祿山本營與洛陽連線，但緊接發生

²⁴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卷9，〈玄宗本紀〉，頁215-225。

²⁵ 《舊唐書》，卷9，〈玄宗本紀〉，頁230。

²⁶ 《新唐書》，卷136，〈李光弼傳〉，頁4584。

潼關失守，西京長安淪陷，郭李兩人決定退守常山至太原。潼關之戰導致都城失守，皇權亦隨之改變，肅宗即位於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人太原」，²⁷「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²⁸太原是李唐王朝起基地，史思明等有意奪取太原，進而西進甫即位於靈武的肅宗根據地。所謂「思明割懷衛」的「懷衛」是河北道的懷州與衛州，位於洛陽東北側，河北道的南部，「割懷衛」是史思明捨棄經由河北道路線，選擇由河東道的太原往西。高秀巖本為哥舒翰麾下將領，²⁹後降安祿山，安史亂起，安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³⁰「西未已」指的是高秀巖自雲中與史思明合兵後，馬不停蹄地往西急攻太原。

詩云「迴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杜甫動天下局勢而先憂國憂民，展現其「軍事意識」。³¹認為太原之戰若唐朝再次失守，敵軍將西越黃河，屆時迂迴大荒地區的河外五城，形成包圍之勢，關中北面軍事安全岌岌可危，即便有位於關中東面的崤山、函谷關亦形同虛設，此時位於延州北邊的蘆子關是關中北面可依靠的關隘，一方面敵軍若攻破太原，守蘆子關可阻敵繼續南進或西進；另一方面太原若是安全，但敵軍已入長安，守蘆子關可阻敵北上，避免危及即位於靈武的肅宗。

詩云「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

²⁷ 《新唐書》，卷 136，〈李光弼傳〉，頁 4585。

²⁸ 《新唐書》，卷 136，〈李光弼傳〉，頁 4585。

²⁹ 《舊唐書》，卷 104，〈哥舒翰傳〉，頁 3213。

³⁰ 《舊唐書》，卷 120，〈郭子儀傳〉，頁 3449。

³¹ 鮮于煌，〈論杜甫的「軍事意識」〉，《渝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3 期，頁 75。

此事背景是潼關失守，長安淪陷後，肅宗至德元載（756）「安祿山寇扶風，太守薛景仙敗之」，³²岐州即扶風郡，安祿山攻陷長安後，西寇扶風，幸虧「陳倉令薛景仙率眾收扶風郡守之。由是關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軼」，³³可見薛景仙阻止敵軍西進的關鍵性，而「山賊」指安祿山等餘黨。「昆戎」徒是指吐蕃，代宗大曆二年（767）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來朝，景仙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為界。』」³⁴薛景仙自吐蕃出使而還，吐蕃首領跟隨入朝，傳達以鳳林關為界，此即「為退三百里」。然而，不能期待總有薛景仙之輩能「制山賊」、「退吐蕃」，是以杜甫筆鋒一轉而云「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以速去鎮守蘆子關能扼史思明與高秀巖兩寇，預先做太原之戰最壞打算，並以呼喊之情「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帝閭據劉良注「天門」，³⁵借指朝廷，即誰有能力喚醒朝廷，速派人鎮守蘆子關，因敵軍速度如鬼怪般的迅速，以免錯失時機。

杜詩〈塞蘆子〉以安史之亂為大背景，李光弼與史思明、高秀巖等爭奪太原為小背景，點出河外五城與蘆子關在關中北面的軍事地位。³⁶雖然《唐六典》記載唐代天下二十六座關並未見蘆子關，³⁷但從〈彭衙行〉詩提及：「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

³² 《新唐書》，卷6，〈肅宗本紀〉，頁156。

³³ 《舊唐書》，卷10，〈肅宗本紀〉，頁241。

³⁴ 《舊唐書》，卷196，〈吐蕃傳〉，頁5243。

³⁵ 《文選·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群神。」劉良注：「帝閭，天門也。」（待找）

³⁶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氏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14。案：史氏同意此關作為長安北面關。

³⁷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照白水山。……小留同（固/周）家窪，欲出蘆子關。」³⁸彭衙在同州白水縣，長安陷入敵軍之際，杜甫北行白水縣、³⁹鄜州洛交縣、延州膚施縣，出蘆子關至靈武追隨肅宗，沿路艱險之景溢於言表。⁴⁰此關在唐中期以後扮演著都城北面軍防重要性，亦是經過延、夏兩州驛道的邊關，層級屬於驛道中關，史籍分類的唐代天下關層級只能表示玄宗開元期間的情況。

蘆子關不僅作為京城北邊門戶，同時緊鄰長城南側，並與河外五城形成外圍防禦圈。穆宗長慶四年（824）三月甲戌日，時敬宗已登帝位，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為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⁴¹塞外五城設置長城以北，黃河以南，可稱作河內五城，五城分布據艾冲考證，宥州、陶子與夏州三城形成鼎立之勢，扼制無定河上游東進的河谷通道；烏延、臨塞、陰河三城也相互配合，肩負著無定河南側支流——蘆河河谷的防務。⁴²換言之，河內五城、長城、木瓜嶺上堡壘與蘆子關形成內圍防禦圈，這內、外圍防禦圈同時與黃河共同承擔京城北面安危。（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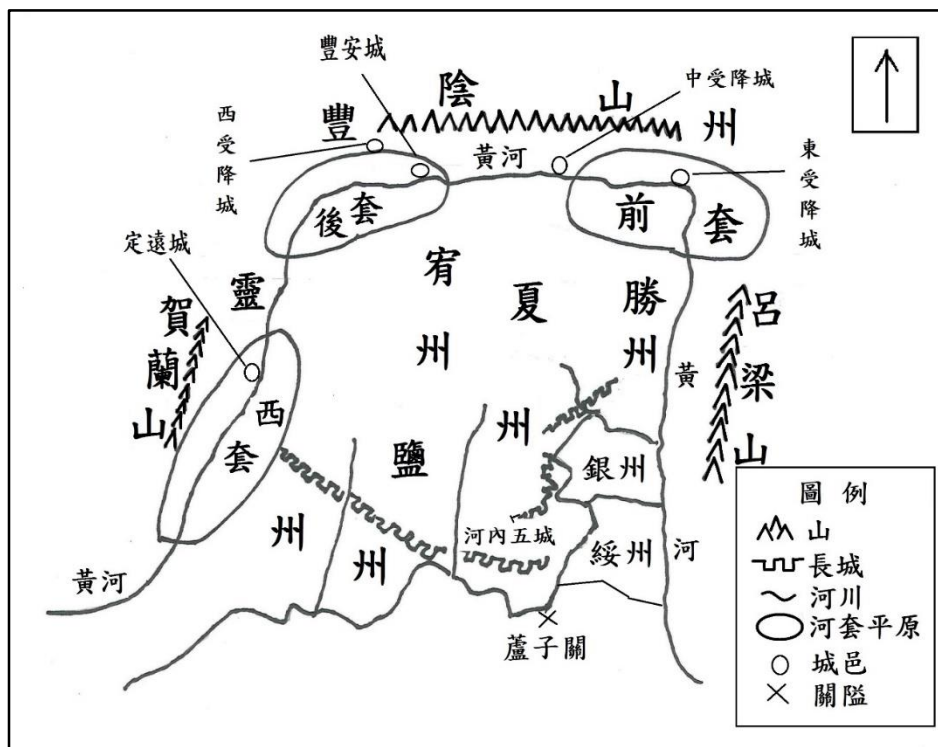
³⁸ 《杜詩詳註》，卷 5，〈彭衙行〉，頁 413-417。

³⁹ 李德輝，〈唐京北地區交通與唐後期邊塞行旅詩〉，《唐代文學研究》，2004，頁 64。

⁴⁰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頁 273。案：作者語彭衙在同州白水縣。

⁴¹ 《舊唐書》，卷 17，〈敬宗本紀〉，頁 509。《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夏州·朔方〉，頁 973-974。

⁴² 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的作用〉，頁 141-142。



圖一：蘆子關與黃河內、外五城示意圖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 改繪。

肆、趙雲出塞過蘆子關案例——兼論蘆關道

《太平廣記》引〈獨異志〉記載一則趙雲遊廊時事件，從中可窺知行經蘆關的交通，據文獻顯示：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

「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頰鼻額，掇換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減其黨，臨刑亦無隱暱，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⁴³

唐憲宗元年初，天水人趙雲遊鄜時，「時」以字形言疑為「時」，鄜時即趙雲遊鄜州時，途經坊州治所中部縣，醉話中要求縣吏加刑於一位罪不甚重，吏欲縱放的犯人，使其被杖刑。數月後，趙雲行經蘆子關，途中遇到日前因己語而害其被杖刑之人，乃被被拉入一室，受其凌虐至身形、聲音皆變，後被置於烏延驛中服雜役。數年後，逢其弟為御史，按查靈州獄政，雲密告其事，透過李銘乃得昭雪而獲救。

此案例乃是趙雲旅行經坊州中部縣時，因醉語害一人被杖刑，爾後行至延州蘆子關時被加害人囚禁與凌虐，並將其拉至烏延驛從事雜役。趙雲行走路線涉及唐代坊州、鄜州、延州，加上曾在河內五城之一的烏延城週圍烏延驛所在的夏州，此道即唐代長安北至黃河

⁴³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六）（北京：中華書局，1961.9，新1版），卷286，〈中部民〉，頁2279。

北岸三受降城與河套的三條路線之中線段。長安北往靈州、豐州、勝州的三條驛道，嚴耕望依序命名為西線長安西北通靈州驛道、中線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東線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⁴⁴中線是由長安北行經坊州、鄜州、延州，西北行經夏州至豐州西受降城及天德軍，道路經蘆子關。長安北經坊州、鄜州、延州段的路線與東線重疊，延州則是東線與中線的分歧地。三線中以中線最為捷近，史云「從天德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⁴⁵四日多即能從關內道北境傳遞訊息至京師，可說中線是三線中的主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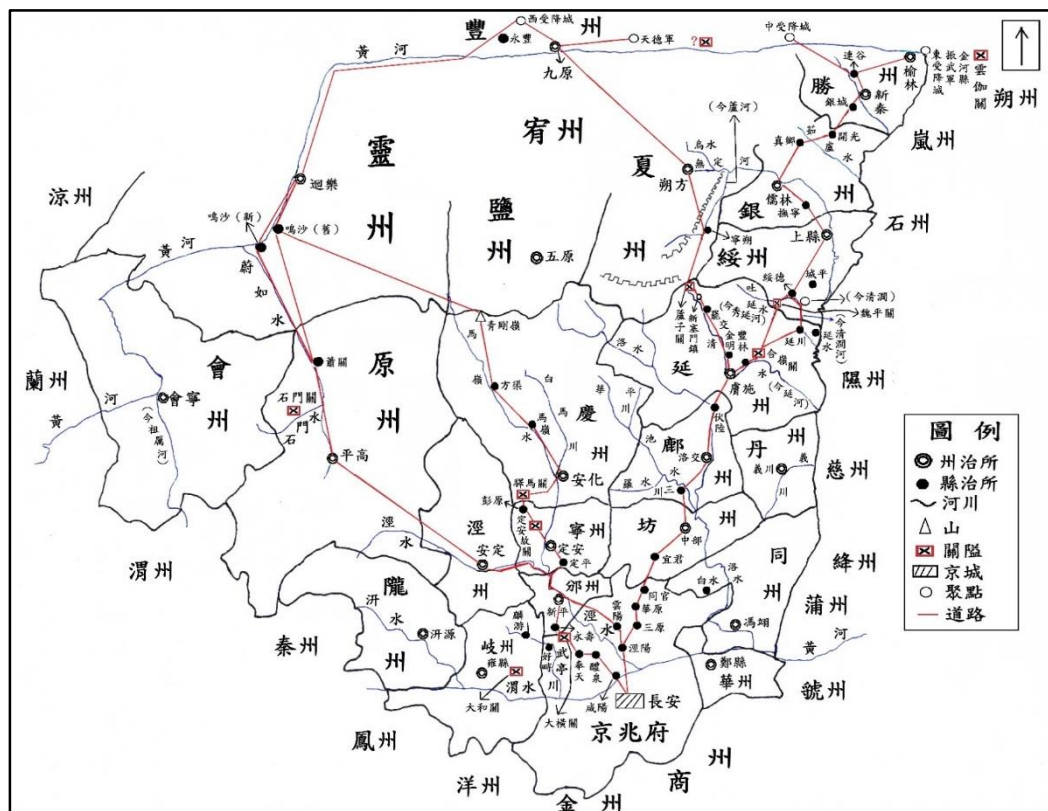
中線的具體路線是由長安北微東行經京兆府涇陽縣、三原縣、華原縣、同官縣，入坊州宜君縣、中部縣，入鄜州三川縣、東北循洛水至洛交縣、伏陸縣，入延州膚施縣，沿清水入夏州南部，總計由長安至延州 650 里。延州膚施縣後分東北與西北行兩派道路，東北行即東線，西北行溯清水經金明縣、罷交縣、新塞門鎮、蘆子關、木瓜嶺，入夏州河內五城與至寧朔縣、朔方縣，北微西行入豐州九原縣，凡延州至豐州計 1150 里。九原縣後分西北與東北兩路，西北 80 里至黃河北岸西受降城，東北 160 里至天德軍。⁴⁶由此可知蘆子關扼守關中北面長安北至豐州、西受降城、天德軍路線之要關，且為驛道所經，至少在唐中後期屬驛道中關。交通路線受到自然環境山、河的制約，唐代勝州、夏州、鹽州、宥州、靈州是今日鄂爾多斯高原所在地，鄂爾多斯高原屬於內蒙古高原南部，西、北、東三面黃河環繞，南接

⁴⁴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259。

⁴⁵ 《元和郡縣圖志》，卷 4，〈關內道·新宥州〉，頁 107。

⁴⁶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231-238。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207-209。《資治通鑑》，卷 278，〈後唐紀〉，頁 9084 明宗長興四年（933）四月條胡三省注：「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長城，以白于山與黃土高原為界，形成關中北面重要的自然地形屏障，都城北往受降城與河套均需繞行高原四周較低處或沿黃河岸而行，意味著自然環境的山、河制約長安北面的交通網絡，同時與在此設置的關隘，共同形成軍事防禦體。（圖二）



圖二：京城北往河套平原諸關與路線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40-41改繪。案：今日所稱鄂爾多斯高原，南以長城為界，東、北、西三面環繞黃河，即唐代靈州、宥州、鹽州、夏州、勝州與黃河之間。地圖因顧及整體交通路線與關隘呈現，對此比例上有所壓縮。

伍、結語

唐代都城所在的關中地域，因應國防安全需求，而在其四面均有自然形勢與人文設施的屏障。以關中北面而言，自然形勢有山、川，山者鄂爾多斯與黃土兩大高原；川者在鄂爾多斯高原的西、北、東三面形成口字型黃河環繞，河外西有賀蘭山，北有陰山，東有呂梁山。人文設施有河套、三受降城、關隘，河套在關中北面黃河段自上游而下游依序設有西套、後套、前套；三受降城是唐睿宗景雲三年（712）張仁愿於河套北側、黃河北岸上游自下游修築的西、中、東受降城；關隘是沿驛道設置於延州的蘆子關。可見唐代關中北面的防禦網是在自然與人文交錯所構成。

蘆子關雖然在《唐六典》中未見列入天下二十六關之一，這是因為史籍反映的是玄宗開元年間的情況。此關藉由杜甫〈塞蘆子〉詩可知在唐中期以後地位日趨重要，尤其在安史之亂中展現出作為關中北面關的地位。蘆子關亦稱蘆子、蘆關，是一座位於清水源頭，延州與夏州的邊界關。〈塞蘆子〉詩記載的黃河外五城（定遠、豐安、三受降城），以及《舊唐書》記錄的黃河內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黃河內、外五城、長城與蘆子關可謂構成系列防禦圈，並與自然地貌形成關中北面的軍事地理，透過詩、史互證互補的方式，有助於提升個別關防的認識。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6，1版。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

北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5，1版。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版。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9，新1版。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3，1版。

專書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版。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7，1版。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北辰，〈內蒙古後套平原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兼考唐西受降城〉，收錄氏著，《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7，1版，頁358-370。
-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歷史地理》，1990年第9輯，頁264-274。
- 王亞勇，〈三受降城修築時間考〉，《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漢文版），1988年第3期，頁50-52。
-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氏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1-57。
- 石維娜，〈唐長安通往「三受降城」的驛路及其歷史作用〉，《華夏文化》，2011年第4期，頁27-29。
- 艾冲，〈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輯，頁26-31。
- 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的作用〉，《唐史論叢》，2008，頁131-146。
- 李德輝，〈唐京北地區交通與唐後期邊塞行旅詩〉，《唐代文學研究》，2004年，頁60-65。
- 李鴻賓，〈唐朝三受降城與北部防務問題〉，收錄中國長城學會編，《長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2，1版，頁143-153。
- 陳凱，〈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史林》，2010年第1期，頁58-60。

華林甫，〈二十世紀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評〉，《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2期，頁41-49。

鮮于煌，〈論杜甫的「軍事意識」〉，《渝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72-77。



無辣不歡一

明、清時期辣椒的傳播與食辣飲食的嬗變

楊志遠*

摘要

辣椒作為新物種被引入中國已有400年左右的歷史，並引發中國傳統辛辣飲食的革命，此一過程隨辣椒的引入與擴散，徹底改變中國人飲食的習慣。然而辣椒何時傳入中國？透過何種途徑？至今仍有許多疑義。本文希望藉由目前明、清時期的筆記與方志紀錄，展開說明辣椒在中國飲食的嬗變過程，同時分析辣椒的食用對中國傳統飲食所造成的影響，以說明近代以來食辣飲食蔚然成風的習慣特色。文章除前言與結論外，首先將集中討論辣椒的傳播與對中國的影響；其次將說明與分析辣椒在明、清引種過程中，如何改變飲食習慣，進而形成具有食辣風氣的飲食文化。

關鍵詞：花椒、胡椒、辣椒、食辣飲食、嬗變

* 吳鳳科技大學醫學健康學院教授

There's no pleasure without chilies peppers :

The spread of chilies peppers in Ming-Qing Times

and Its transmutation in China's spicy diet

Yang Chih-Yuan**

Abstract

Chilies peppers have been brought china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and thus the beginning of the habit which continues even nowadays. The capsicum is one of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owerful demonstrations,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apsicum rest on a lower layer all the times. In this paper has done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ime and the path of capsicum introduction, as well as its condition of spread and evolution from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and focuses on the motivation of its spread in China,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spicy diet.

Keywords : sichuan pepper, black pepper, chilies pepper, spicy diet, transmutation

** 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Wufe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壹、前言

在辣椒傳入中國之前，傳統飲食中不乏以辛辣作為調料的食材，如被稱為「三香」的花椒、薑、茱萸。「花椒」之用於調味，依現存考古的發現，早在商代已使用。¹成書於先秦時期的《詩經》已有多處提及花椒的功能，如《周頌·載芣》載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說明了花椒所具有的獨特香氣，能保人平安長壽；《唐風·椒聊》載有「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則是盛讚花椒纍纍的結實，象徵豐收的喜悅。又明代《本草綱目·果部·秦椒》記載：「秦椒，花椒也。始產於秦，今處處可種，最易蕃衍。」²說明花椒在明代以前的種植與使用已很廣，食用亦十分流行。花椒有蜀椒、巴椒、川椒、秦椒、漢椒、南椒之分，唯花椒除具辛辣味外，其麻味使其在辛辣料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成書於宋代之浦江吳氏《中饋錄》記載宋代風魚法和造肉醬時，需使用川椒調味；元忽思慧《飲膳正要》記載宮內神枕方中、羊肚羹、椒麵羹要用蜀椒調味；明顧仲《養小錄》在湖廣魚酢法中載要先使用大量花椒處理食材，而後烹食。可見花椒作為中國傳統辛辣調料，有其特殊的歷史進程。根據藍勇的研究，從北魏到明代花椒的使用比例逐漸增大，然而到了清代，花椒在食譜中的使用比例開始下降，他認為這一現象與辣椒的傳播與使用有關，最終侵奪了傳統辛辣調料花椒的地位，迫使花椒特有的鮮麻味，侷限於四川一帶，也使得川菜於近代形成了麻辣兼具的格局。³「薑」的使用則較為普

¹ 河南省博物院葛滕山商墓考古隊，〈固始縣葛滕山六號商代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卷1第28期，1991。

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1428。

³ 藍勇，〈中國古代辛辣用料的嬗變、流布與農業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

遍，用於調味的文獻記載頗多，明、清時期各地方志的物產類中，多有薑的記載，如《論語·鄉黨》：「不撤薑食，不多食」所記載孔子的食薑原則；《呂氏春秋·本味》：「和之美者，陽樸之薑」則記錄蜀地陽樸所產的蜀薑，對於烹調的重要性。「茱萸」亦是中國古代常見的辛辣調料，有各種品種與名稱，其中以食茱萸較為普遍，《本草綱目·果部·食茱萸》：

此即欐子也。蜀人呼為艾子，楚人呼為辣子。因其奇辣，蜇口慘腹，使人有殺穀黨然之狀，……味形似茱萸，唯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⁴

自古蜀人擅以茱萸入膳，其樹果中有小白點子，人稱艾子。蜀人將其搗碎，取其汁液入菜，味甚辛香，為唐、宋時期蜀地的重要調料。除三香外，傳統飲食中還有「五香」的使用，即採大茴香、小茴香、丁香、桂皮、花椒所組成之調料，又飲食中常見之椒鹽味，均與花椒的頻繁使用有關。

中國古代辛辣調料，除前述的「三香」外，還有茺醬、胡椒與芥的使用。「茺醬」為胡椒科胡椒屬的扶留藤植物、又稱萎葉，其味辛辣而有甘甜感，常做為調食。晉嵇含《南方草木狀》：

茺醬，華芡也。生於番國者，大而紫，謂之華芡；生於番禺者，

研究》，第4期，2000，頁13-15。藍勇根據劉大器主編之《中國古典食譜》（陝西旅遊出版社，1992）中有關古代食譜所記載的花椒入譜，分析統計所得出的結論。然而必須說明，此書所收錄的多為較具代表性的全國性食譜，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唐〕楊暉《膳夫經手錄》、〔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元〕賈銘《飲食須知》、《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佚名《調鼎集》、〔清〕朱彝尊《食憲鴻秘》、〔清〕袁枚《隨園食單》、〔清〕顧仲，《養小錄》等，是否足以說明歷朝實際情況，恐需更多資料佐證。

⁴〔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1441。

小而青，謂之茺焉。可以調食，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⁵

茺醬作為調味的辛辣食材，自秦、漢時期始，已漸成為尋常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佐菜調食。「胡椒」原產於南亞大陸及中南半島等地，亦為胡椒屬，約於漢、晉時期傳入中國。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孫真人治霍亂，以胡椒三、四十粒，以飲吞之。」⁶可知在晉代胡椒主要用來入藥，具有藥用功效。唐《酉陽雜俎·木篇》：

胡椒出摩揭陀國，呼為味履支。……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⁷

唐時胡椒仍屬奢侈品，宰相元載(713-777)被破家後，曾於家中得胡椒九百石，足見胡椒的珍貴與稀有。宋、元之後，由於海外貿易的發展，胡椒的進口與消費大增，但尚未普及至一般百姓人家。至明代，通過朝貢貿易及與東南亞的貿易，大量的香料被輸入中國，明朝政府常以香料賞賜官員，官員又將之拋擲入市場，於是無形中加速了香料的交易，並建立起跨國的共同市場。⁸據研究統計 1500-1559

⁵〔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不過茺醬易與夾在檳榔中的扶留藤葉混淆，檳榔中的扶留藤葉，也稱茺葉。宋劉克莊〈次林卿檳榔〉有云：「芳洲瀾望總是榛，此物偏霑雨露春。海賈垂涎規互市，夷人嚼玉賽媒神。扶留葉嫩供湯使，大腹形同混偽真。樹下莓苔堪健倒，華堂何必錦為茵。」中國古代華南及台灣等地，常以檳榔宴請賓客，其作用為下氣消穀，幫助去胃腸脹氣與助消化。此書有學者認為是宋人偽作，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稱此書為西晉嵇含所作，但目前無更早的相關證據可證明。參見張玉燕，〈茺醬、扶留藤、華茺與胡椒〉，《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3期，2018，頁111。

⁶〔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2，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

⁷〔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⁸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陝西師範

年間，從東南亞輸入的胡椒達 3000 噸，隆慶開港後，僅從印尼萬丹與馬來西亞北大年進口的胡椒就有 2800 噸。⁹李時珍編《本草綱目》時，胡椒已成百姓家中的生活日常所需，又明代飲食著作中如《養生八箋》、《竹嶼山房雜部》、《易牙遺意》等書，皆有利用胡椒烹調的記載，¹⁰至此胡椒才被廣泛的使用。「芥」作為傳統辛辣調料，主要是以芥菜子末加工製作，明末清初李漁《閑情偶寄·飲饌部》曾言「菜有具薑、桂之性者乎，曰有芥辣是也。」提及芥辣汁的味性，此芥辣於清代成為各地非常普遍的辛辣調料。在辣椒尚未傳入中國前，中國辛辣類的食材不外傳統的三香(花椒、薑、茱萸)及蒟醬、胡椒與芥，明、清時期隨大航海貿易漸次擴展，美洲原生作物被引入中國及世界各地，其中辣椒的輸入徹底改變人們的食辣味覺，進而形成中國近代飲食食辣文化的新傳統。

貳、辣椒的傳播及其對中國近世的影響

1492 年(明孝宗弘治 5 年)當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揚帆橫渡大西洋，來到西方人所謂的「新大陸」後，歐洲人開始在美洲進行殖民，其後西班牙人成功征服中南美洲，並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帝國。殖民期間美洲的農作物開始向歐洲及亞洲擴散，其中亞洲之菲律賓扮演重要傳播中繼站，並隨之傳播於東亞中國及南洋各地，有學者稱此過程為「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此一過程所引發的動物、植物、病菌、文化與人群的全

大學出版社，2008，頁 26。

⁹ Antony Reid eds,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88, p.86。

¹⁰ 李日強，〈胡椒貿易與明代日常生活〉，《雲南社會科學》，第 1 期，2010，頁 127-131。

球性流動，促成了我們所理解的近代世界。¹¹此一階段約當我國的明、清時期，傳入中國的美洲農作物計有玉米、番薯、馬鈴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腰果、可可、番木瓜、菸草等 30 餘種。¹²美洲作物傳入中過國後，對傳統農業結構產生深遠影響，據王思明的研究分析，指出基本上有七點影響：一是增加了中國糧食作物的產量，滿足人口激增的糧食需求；二是飼料作物的種植，提高了畜牧業的產量；三是豐富的蔬果種類，改善原有的產銷供應；四是增加食用油原料的來源與產能；五是促成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六是菸草的種植與吸食，造成社會吸菸習慣的養成；七是加速利用各地土地空間，提高農業集約經營。¹³這些影響的確深遠，並改變明、清以來農業的發展進程，而美洲辣椒的傳入，也體現了此一過程。然而辣椒的傳播始於何時？傳播的路徑為何？與原有作物如何區隔？卻不斷困擾著研究學者。

辣椒屬於茄科辣椒屬（*Capsicum*），同屬於茄科的植物還有馬鈴薯、番茄、茄子及菸草。辣椒係原產於美洲的作物，其種類繁多，栽培歷史久遠。依考古資料顯示，早在西元前 6500-5000 年前，墨西哥古代遺址已出土野生辣椒的種子，厄瓜多南部地區發現，在西元前

¹¹ 「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係由 Crosby 所提出的觀點，在其同名書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中，作者從生態學及地理學的觀點切入，分析人類面對自然環境，不論是先天與後天改造的環境，均深深影響人類的歷史文明。相關的研究可參閱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台北：時報出版社，2015）及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1493 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台北：衛城出版社，2017）二書。

¹² 王思明，〈美洲原產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產結構的影響〉，《中國農史》，第 2 期，2004，頁 16-27。

¹³ 同註 12，頁 22-25。

4250 年便有食用辣椒的遺跡。¹⁴哥倫布在第一次航渡美洲時便記載：

還有一種紅辣椒，比胡椒好，產量很大，在伊斯帕尼奧拉島（海地）每年所產可裝滿50大船，他們不管吃什麼，都要放他，否則便吃不下去，據說他還有益健康。¹⁵

1493 年辣椒傳入西班牙後，漸次向歐洲擴散，但由於辣椒的強烈辛辣滋味，使其尚未廣泛使用在食物之中。在此之前，歐洲人食辣主要以胡椒為主，或作為入藥植物，然而胡椒及其它香料的主要產地，集中在南亞及東南亞，透過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將之集中於印度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後運往歐洲，其間亦造就如亞歷山大、威尼斯等港口的城市繁榮。約在 14 世紀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崛起，壟斷了此一貿易路線，促使歐洲商旅向外尋求新航路的可能性。¹⁶那麼傳入中國的辣椒係透過何種路線引入？一是透過陸路。中國早期的作物引種主要依靠陸路，透過古絲綢之路，唐代以前自西域以外

引種之物，名稱多冠以胡字首，以有別於中土原生物種與飲食，

¹⁴ 有關辣椒起源與品種的研究，可參考洪進雄、陳士略，〈番椒屬之起源及其分佈〉，《中國園藝》，34 卷 3 期，1988，頁 160-176；王昭月、林大鈞、曾夢蛟，〈番椒馴化種之演化與栽培〉，《植物種苗》，15 卷 1 期，2013，頁 1-13。另有三書可參閱寇特·麥可·弗萊瑟（Kurt Michael Friese）等，《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前進中北、美洲辣點，直擊多元的辣椒社會史與變動中的糧食體系》，台北：商周出版，2017，山本紀夫，《辣椒的世界史：橫跨歐亞非的尋味旅程，一場熱辣過癮的餐桌革命》，台北：馬可孛羅，2018，丁潔，《蔬菜圖說 辣椒的故事》，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

¹⁵ 孫家堃譯，《哥倫布航海日記》，上海：上海外語教育，1987，頁 148。

¹⁶ 請參閱杰克·特納（Jack Turner），周子平譯，《香料傳奇一部由誘惑衍生的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7，蓋瑞·保羅·那卜漢（Gary Paul Nabham），呂奕欣譯，《香料漂流記：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台北：麥田出版，2017。

如胡瓜、胡蘆、胡豆、胡桃、胡椒、胡荽、胡芥、胡芹、¹⁷胡餅等。元、明時期中亞的帖木耳（Shujan-ud-din Timur, 1336-1405）崛起，阻斷了與明朝的往來，其後帖木耳汗國內鬥不息，與明朝的關係生變，雙方的貿易因此受阻，鄂圖曼帝國於 1453 年滅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遷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改名伊斯坦布爾（Istanbul），隨後攻佔埃及，進逼義大利威尼斯，徹底改變 15 世紀地緣政治的結構，同時也壟斷中古時代以來的貿易路線。¹⁸二是透過海路。大航海時代有兩條來中國的貿易航線，一條是由西班牙人經營；另一條由葡萄牙人掌握。西元 1570 年西班牙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後，開啟橫渡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此一航線從西班牙→墨西哥→呂宋→中國，成為當時最繁忙的商業航線之一。明朝從早期的海禁到穆宗隆慶元年（1567）適度開放海禁，並以福建漳州月港為主要的通商口岸，大批的絲綢、磁器、茶葉、農產、手工作品被運往美洲直至西班牙，而墨西哥銀元則大量被運往中國換取商品，隨之而來的是，美洲作物也循此一路線傳入東亞與中國，辣椒引種亦同。但我們不能忽略葡萄牙人東來殖民的過程，當歐洲人的香料貿易受阻後，新航路成為突破此一僵局的希望，16 世紀初北非與西非開始有辣椒踪跡，沿著阿拉伯與塞法提猶太人的商路向中東傳播，直至印度。16 世紀中葉印度的果阿（Goa）已有名為「鄱那卜可辣椒」（Pernambucco pepper）的出現，在孟買（Mumbai）則稱辣椒為「果阿胡椒」（Gowai mirchi），南印度地區很快接受辣椒的特性並食

¹⁷ 劉錫濤，〈略論唐代舌尖上的胡味〉，《唐都學刊》，31 卷 2 期，2015，頁 39-42。另可參閱王賽食，《唐代飲食》，山東：齊魯書社，2003。

¹⁸ 蓋瑞·保羅·那卜漢（Gary Paul Nabham），呂奕欣譯，《香料漂流記：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頁 359-363。

用，但直到 18 世紀北印度仍未流行，約 18 世紀 60 年代印度才在食物中廣泛使用食用辣椒。¹⁹葡人自佔領印度果阿後可能將美洲辣椒引入，其後在 1511 年占領麻六甲，1553 年租借澳門，展開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面對西班牙的競爭與荷蘭的劫掠，葡萄牙人與荷、西兩國協議，轉而成為主要供應商之一。因此，辣椒也可能藉由在印度的葡萄牙商人，輾轉引入中國澳門或廣東一帶，但整體而言，西班牙在此區的實質影響性，顯然較佔優勢。

中國最早有關辣椒的文獻記載，是明高濂（1573-1620）《遵生八箋》（1591）中〈瓶花之法·番椒〉所載：「番椒，叢生白花，果儼似禿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²⁰高濂是杭州人，其所記有關辣椒的屬性，主要是從觀賞植物做分類，明末徐光啟（1562-1633）歿後刊行之《農政全書·種植》（1639）載：

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禿筆頭，色紅鮮可觀，味甚辣。

椒樹最易繁衍，四月生花，五月結實，生青熟紅。²¹

徐氏所載並無明確指出辣椒的食用性價值，仍介於可觀與可食之間，並常與秦椒混稱，至明末清初陳淏子（1612-？）《花鏡》（1688）則載有：

番椒，一名海風藤，俗名辣茄。本高一二尺，叢生白花，秋深結子，儼如禿筆頭，倒垂，初綠後朱紅，懸掛可觀。其味最辣，

¹⁹ 莉琪·柯林漢（Lizzie Collingham），程芸譯，《印度文化誌 咖哩群像》，台北：財信出版，2008，頁 98-102。

²⁰ [明] 高濂，《遵生八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 631。

²¹ [明] 徐光啟，《農政全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764。

人多採用。研極細，冬月取以代胡椒，收子待來春雨種。²²

陳氏所稱除仍具作為觀賞植物外，其辛辣功能已被認為可取替胡椒入菜調味，而「番椒」冠以番字，則顯示其外來物種的特性。明、清時期被引入之美洲物種，如番薯、番麥、番柿、番瓜、西番菊，番荔枝、番茄等，可以明確其原產美洲的域外身分。同為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其文獻亦有記載有關辣椒引入的紀錄，日《和漢三才圖會》載：「番椒出於南蠻，慶長年中，此與菸草同時將來也。」²³在同書有關「菸草」的記載云：「天政年中，南蠻商船始貢此種，番椒之種，亦始於同時。」²⁴日本的慶長時期（1592-1614）約明神宗萬曆 20-42 年間，天正（1573-1592）較早，約明神宗萬曆 1-20 年間，故日本的辣椒傳入時間約在西元 1574-1592 年間，但江戶後期的農學家佐藤信淵在《草木六部・耕種法》（1829）中言：番椒最初產於南亞墨西哥加利福尼亞州東海濱的伯亞建國（巴西），天文 11 年（1542）由波蘭杜瓦爾人（葡萄牙）同南瓜種子一起帶回日本，然而實際上是天文 21 年（1552）葡萄牙傳教士 Balthazar Gago 作為禮物贈與九州島豐厚國和肥厚國大名大有義鎮之物。朝鮮李圭景（1788-？）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稱番椒：

日本則天正、慶長時，自蠻船傳來，皇明則萬曆末，自呂宋傳播，我東則光海戊午始出。……番椒與南瓜來於我東，則在於

²² [清] 陳淏子，《花鏡》，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79，頁 203-204。

²³ [日]《和漢三才圖會・味果類》轉引自王茂華、王增瑜、洪承兌，〈略論歷史上東亞三國辣椒的傳播、種植與功能發掘〉，《中國史研究》，第 101 輯第 4 期，2016，頁 298。

²⁴ 同註 23，頁 298。

宣廟壬辰之後，與菸草同出，自倭國及中原流傳三種，始播一國。²⁵

朝鮮李朝光海君戊午年為萬曆 47 年（1619），比較三地辣椒引入時間先後為日本→中國→韓國，但也非定論，1592 年日本豐臣秀吉引兵入朝鮮，辣椒是否因此由中國傳入日本，因為日本有稱胡椒為高麗胡椒的稱法，又稱唐椒、唐辛子、唐芥子，而朝鮮則稱辣椒為南蠻椒、蠻椒、倭椒、倭草等名稱，三國對辣椒名稱的說法，正顯現出辣椒傳入時間與路線的複雜性，而傳播的途徑與品種也不同，是為三方雙向交融過程。

根據現存的方志研究指出，辣椒引入中國的栽培在明代的方志中未曾出現，而最早記載辣椒的方志為康熙 10 年（1671）浙江的《山陰縣志》，這符合前述高濂江、浙一帶對辣椒的記載，比南方福建、臺灣、廣東、廣西都要早上 70 年以上。²⁶臺灣有關辣椒的紀錄，最早於乾隆 7 年（1742）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已載有：

番姜，木本，種自荷蘭，花白瓣，綠實尖長，熟時朱紅奪目，中有子，辛辣，番人帶殼啖之，內地名番椒。²⁷

又乾隆 12 年（1747）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亦有相同記載，不過加上「更有一種圓而微尖，似奈，種出咬留吧，內地所無也」的描

²⁵ [朝鮮]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同註 23。

²⁶ 蔣慕東，王思明，〈辣椒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中國農史》，第 2 期，2005，頁 17-27。清代四地刊行縣志有關辣椒的紀錄時間：乾隆 6 年廣西《武緣縣志》（1741）；乾隆 7 年臺灣《臺灣府志》（1742）；乾隆 11 年廣東《豐順縣志》（1746）；乾隆 28 年福建《長樂縣志》（1763）。

²⁷ [清] 劉良璧等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述。²⁸其後乾隆 29 年（1764）《鳳山縣志》、道光 14 年（1834）《彰化縣志》、咸豐 2 年（1852）《噶瑪蘭廳志》、同治 10 年（1871）《淡水廳志》均有辣椒的紀錄，並提及食用的方式「番姜…可作辣醬，御濕之菜也」。²⁹依現有文獻分析，臺灣的辣椒主要來自荷蘭人，由咬留吧（Kelapa 或 Jakarta 明朝對荷屬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的稱呼）引入，而台灣原住民族習慣帶皮啖之，閩人稱其名曰「番姜」（番仔姜），與內地的「番椒」實為同一種作物，但可能為不同的品種。福建閩南一帶的辣椒記載為乾隆 28 年（1763）《泉州府志·藥屬》載有：「番椒，一名番姜，花白，實老而紅，味辣能治魚毒。」³⁰有此可略知福建閩南，在清初主要仍將辣椒當作一種藥物來使用，而非直接作為食辣的調料，因為閩南的飲食口味，傳統上普遍較為清淡，不甚嗜辣。臺灣原住民族直接食用辣椒的目的，是否是作為入菜的調味；還是也是作為藥物的一種輔助，而清初移民臺灣的閩、粵先民，是否因此沾染原住民的食辣之風，恐仍需更多的資料論證。

參、明、清時期中國食辣之風的形成與轉變

辣椒在明代被引入後，其名稱因傳入路徑、時間與地域的不同，而產生多樣性的稱法，如番姜、秦椒、辣角、辣虎、辣茄、辣子、海椒、斑椒、胡地椒等，其傳播路線出現南北兩個相對集中的區域，並向外部擴散。³¹明、清時期，「番椒」的栽種，首先集中在東南與華

²⁸ [清] 范咸等修，《重修台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²⁹ 轉引自丁曉蕾、胡又尹，〈從方志記載的辣椒地方名稱看辣椒在中國的引種傳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0 卷 3 輯，2015，頁 109。

³⁰ 轉引自曹雨，《中國食辣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9，頁 8。

³¹ 丁曉蕾、胡又尹，〈從方志記載的辣椒地方名稱看辣椒在中國的引種傳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0 卷 3 輯，2015，頁 104-117。此文透過現存方志中

北數省，然後漸次擴散。以浙江為例，康熙10年（1671）《山陰縣志》載：「辣茄，紅色，狀如菱，可以代椒。」³²可知早期辣椒在浙江種植的用途，主要是替代南方所產的胡椒，但其後的浙江方志記載較少，恐與浙人傳統飲食不好食辣的習性有關。廣東的辣椒栽培最早在康熙19年（1680）屈大均（1630-1696）的《廣東新語》有載：

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³³

在諸多的外貿貨物中已出現「番椒」的記載，其性質是作為藥品或辛香料使用，則未有明確交待，不過由於與澳門、呂宋及紅毛（明人稱荷蘭人為紅毛番，至清初仍習用）的貿易，故廣東辣椒的引種種植，是否藉由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人傳入，又康熙26年（1687）《陽春縣志》載：「枝莖柔弱，高一二尺、結角深紅色，中有子，如麻大，其角最為辛辣。」³⁴不過其物種歸類在「藥之屬」，當仍以植物性藥品視之。臺灣引入時間如上節所述，應比乾隆時期更早，原住民族已知此物，並加以食用，但自閩、粵等地移入者，是否開始作為

的農業物產分析，發現辣椒在中國的引種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乾隆以前時期（1796年前）為緩慢期；2、嘉道咸時期（1796-1861）為快速擴散期；3、同光宣時期（1861-1912）為穩定發展期；4、民國時期（1912-1949）為全境覆蓋時期。

³² 蔣慕東，王思明，〈辣椒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中國農史》，第2期，2005，頁20。

³³ 轉引自丁潔，《蔬菜圖說 辣椒的故事》，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頁11-12。

³⁴ 同註29，頁108。

飲食的調料，則無法獲得證明。福建在乾隆 22 年（1757）《安溪縣志》載：

番椒，一名番姜，一名秦椒，花細白，實老紅，味辣，能解水族毒，食魚蟹過多者，或泄瀉或脹滿，用子煎湯服。³⁵

其所述辣椒功能與《泉州府志》同，仍限於藥用，不過到了嘉慶年間《連江縣志》載：「番茄，俗呼辣椒，…味辛可代胡椒。」又道光年間《沙縣志》亦載：「蔬屬，辣椒，俗名麻椒，又一種曰朝天筆。」³⁶辣椒此時已轉變為可取替胡椒等辛辣調料的蔬菜類植物，成為閩地食辣飲食的新選擇。河北京、津一帶，康熙 36 年（1697）《深州志》載：「蔬類，秦椒，色赤味辛；花椒，樹生，色赤味辛。」³⁷可能將秦椒與辣椒名稱混稱，但能與花椒做出區分，也說明人們對兩者的功能特性已有理解，其後雍正、乾隆年間均有類似記載，華北的辣椒傳播，可能是藉由「京杭大運河」的漕運路線北上，隨之擴散開來。陝西的辣椒栽種也很早，康熙 33 年（1694）《山陽縣初志》載：「番椒，結角似牛角，生青熟赤，子白，味極辣。」³⁸乾隆 20 年（1755）《鎮安縣志》載：「番椒…每食必用，與蔥蒜同需。」³⁹在短短五、六十年間陝西的辣椒已成為百姓飲食中不可或缺的調料。

其次為漸次向華中、華西與西南各省擴散。湖南於康熙 23 年（1684）《寶慶府志》和《邵陽縣志》載有「海椒」，足以說明辣椒傳

³⁵ 同註 29，頁 108。

³⁶ 同註 26，頁 20。

³⁷ 同註 26，頁 22。

³⁸ 同註 29，頁 109。

³⁹ 同註 29，頁 109。

播與濱海地區的緊密關係，然後沿著航運與長江的水道，進入湖南一帶，或由西南貴州、兩廣傳入。乾隆 30 年（1765）《辰州府志》載：

茄椒，一名海椒，一名地胡椒。口實枝間，狀如新月，莢色淡青老則深紅，一莢十餘子，圓而扁，性極辣，故辰人乎為辣子，用以代胡椒，取之者多青紅接併其殼，切以和食品，或以醬醋香油菹之。⁴⁰

清初湖南全境食辣風氣不盛，但自嘉慶、道光年間後的傳播，影響逐漸擴大。道光 8 年（1828）《永州府志》引《湘僑聞見偶記》載：

府境多椒，有花椒、胡椒、山椒……西南之民秉氣中寒，嗜椒成性，然在昔僅有秦蜀諸椒耳，近乃盛行番椒，永州謂之海椒，……土人每取青者連皮生啖之，謂辣勝諸椒，亦稱辣子。…永州作齏菜必與之同腌，尋常作飲饌，無不用者，故其人多目疾血疾。……則番椒之入中國蓋未久也，由西南而東北習染所稱，與淡巴菰等是亦可謂妖物也與。⁴¹

在不到六十年的時間，離鄉作客外省的僑民，已察覺湖南境內食辣風氣的轉變，從嗜椒成性，轉為嗜辣成性，可以說餐餐必食辣，作者將之比喻為吸食「淡巴菰」（tabacco 菸草）的成癮性過程，並以妖物視之。然而其所謂從西南而至東北的傳播途徑，則有必要說明貴州的辣椒栽種過程，前述湖南辰州與貴州東部相連，因此得地利之便易於引種。康熙 61 年（1722）蔣深《思州府志》載：「藥品，海

⁴⁰ 藍勇，《中國川菜史》，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頁 140。

⁴¹ 同註 29，頁 110。

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鹽。」⁴²貴州辣椒一開始主要是用以「代鹽」，由於身處內地省分，當地少數民族取得食鹽不易，又鹽中含氯化鉀等礦物成分，為人體健康之必需品，故缺鹽的地區，往往會以其它的物類來取替或補充，故歷史上有所謂的代鹽現象。⁴³以辣椒代鹽是貴州食辣的特色，其後乾隆年間的《黔南識略》，道光年間的《遵義府志》等，皆有辣椒的種植記載。廣西是最早將番椒稱之為辣椒的地方，乾隆 6 年（1741）《武緣縣志》將番椒稱為「辣椒」，後於全省境內稱法逐漸統一，可能辣椒係由湖南傳入，湘人稱番椒為辣子；廣西人傳統上稱茱萸為茶辣子，故合稱為辣椒。⁴⁴乾隆時期《南寧府志》、《柳州縣志》均載有辣椒，謂其味辛辣，具有可消水氣，解瘴毒的功能。

湖南、貴州、廣西的辣椒栽培與食用，均早於四川，但四川的食辣之風，卻後來居上。乾隆 14 年（1749）《大邑縣志》載：「家椒、野椒、秦椒，又名海椒。」⁴⁵嘉慶年間《成都縣志》、《華陽縣志》、《洪雅縣志》均載有將辣椒稱為海椒的說法，其食辣的地理分布，主要在成都平原、川南、川西等區域，後擴散至川、陝、鄂的大巴山交界處，到了道光、咸豐年間以後，四川的食辣風氣開始普遍起來，各地的食辣記載很多，但起初食辣的份量較小，後漸形成增辣增量的現象。清代中葉，王士進的《隨息居飲食譜》（1861）中已有將辣茄與花椒、

⁴² [清] 蔣深，《思州府志》，〈物產志〉，卷 4。轉引自藍勇，〈中國古代辛辣用料的嬗變、流布與農業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4 期，2000，頁 17。

⁴³ 李鵬飛，〈歷史時期代鹽現象研究〉，《鹽業史研究》，第 1 期，2015，頁 72-79。

⁴⁴ 同註 26，頁 21-22。

⁴⁵ 同註 26，頁 21。

川椒並列，⁴⁶佚名的《調鼎集》(1868)也有記載關於含有辣椒的菜色。⁴⁷出生於成都的女中醫曾懿(1852-1927)，在其所著《女學篇》的附錄《中饋錄》中載有專門製作辣豆瓣的方法，使用紅辣椒為原料；製造豆豉時加入辣椒末；製造腐乳時加入紅椒末；在泡菜中加入青紅椒等辣椒調味，⁴⁸可見此時辣椒已作為一般的辛香料使用。清末光緒年間徐心餘(1866-1934)《蜀遊聞見錄》載：「惟川人食椒，須擇極辣者，且每飯每菜，非椒不可。」⁴⁹四川地區在短短百餘年間，已將辣椒轉變為尋常的家常菜了。

川人喜食辣椒的區域特色，深受移民的影響。明末四川地方由於受戰爭、瘟疫、天災等的影響，導致人口銳減。康熙年間，清政府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移民計畫，鼓勵湖廣等省百姓入川墾荒，號稱「湖廣填四川」，此一移民運動並非只限於湖北、湖南居民，江西、廣西、陝西、雲貴、兩廣、福建均有百姓入川，據曹樹基估計，清中葉以後四川全境約有 62% 的外省移民人口。⁵⁰這些外省移民中的湖北、湖南、貴州、廣西人士，食用辣椒的記載均早於四川，故食辣的風氣極有可能隨移民進入四川，並成為川人的飲食特性。⁵¹然而我們不應忽略傳統飲食辛辣味中的麻味，對四川地區的影響。從唐、宋時期開始，四

⁴⁶ [清] 王士進《隨息居飲食譜》，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頁 42。

⁴⁷ [清] 佚名，《調鼎集》，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91。有研究指出該書為乾隆年間揚州鹽商童岳薦所編，其內容許多來自朱彝尊《食憲鴻秘》、李漁《閒情偶寄》、袁枚《隨園食單》等食譜，主要為以揚州菜為主的江南飲食大全。

⁴⁸ 曾懿，《中饋錄》，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4，頁 12-16。

⁴⁹ 徐心餘，《蜀遊聞見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 98。

⁵⁰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 5 卷·清民國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78-100。

⁵¹ 吳松弟，〈宋代以來四川的人群變遷與辛辣調味料的改變〉，《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0 卷 1 期，2010，頁 91-94。

川巴蜀地方即為蜀椒、巴椒與秦椒的主要產區，許多食物或菜品中都要加入花椒，元、明時期花椒的用量更大，至清代《調鼎集》中有載：

椒，川產大紅袍最佳。花椒或整用，或研用，焙脆研末，須篩過。或裝袋同煮，方無粗屑。椒鹽，皆炒研極細末，鹽多椒少，合拌處蘸用。⁵²

可見花椒的使用十分廣，可以是顆粒狀，亦可研磨成細末加入食材中，或與鹽、胡椒合而為所謂的椒鹽味。現今川菜的味道以麻、辣、鮮、香為主，這是歷史發展積澱所致，絕非一開始便是如此。⁵³北宋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載：

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蜜糖，蓋便於北俗也。如今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⁵⁴

生活於北宋時期的沈括為江浙人士，所謂南人北人之分，應是相對於唐末五代以來北方的漢人士族和南方被宋征服的十國漢人士族而言，南人嗜鹹與所處濱海地域產鹽有關；而北人嗜甘，且魚、蟹加蜜糖，恐與唐代以來北方胡、漢融合後，所發展出來的飲食習慣有關。清末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載有：

則北人嗜蔥蒜，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粵人嗜淡食，蘇人嗜糖，即以浙江言之，寧波嗜腥味，皆海鮮，紹興嗜有惡臭之物，

⁵² 同註 47，頁 40。

⁵³ 藍勇，《中國川菜史》，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頁 87-100。

⁵⁴ 〔宋〕沈括，《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1。

必俟其酶濫發酵而後時也。⁵⁵

徐氏的觀察可能係就清代各地的飲食，加以整理所得的大致結論，基本上已十分符合現今中國各地的飲食習性。然而明、清以來，巴蜀地區處於南北移民的融合時期，故口味上呈現出複合兼融的特性，也反映出中國近代飲食文化的多元風貌。

肆、結語

辣椒此一作物伴隨著許多來自美洲大陸的生物向世界擴散，此一物種的全球性擴散，在中國歷經四百餘年的引種過程後，傳遍華夏大地，並徹底改變近代中國社會農業的結構與生產模式。傳統中國很早便知如何使用辛香料調味，「三香」中花椒、薑、茱萸的使用，具有深厚的歷史積累，也產生許多相對應的飲食文化，其後中土自域外引進之香料胡椒或者各類蔬果，不僅成為飲食調味的聖品，胡椒甚至一度被歷朝視為奢華的體現，凡此飲食文化的種種表現，均顯現出一種對於外來文化的包容性與調適性。「辣椒」在中國的出現最初並非食用，而是觀賞的植栽，後作為藥品輔助，將其所具有的辣度特性，發揮到淋漓盡致，是在食辣飲食中歷經百餘年的實驗，一場活生生的人體實驗。然而實驗證明，辣椒征服了中國的飲食習慣，改變了中國的飲食傳統。辣椒之傳入中國主要依靠海路，藉由新航路由東由西航向中國，無論西班牙、葡萄牙或荷蘭人，在此一漫長的東來旅途中，成為辣椒引種的主要中介。改變一地飲食風俗並不容易，

⁵⁵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28，頁10。

因此辣椒能逐漸成為中國飲食的新寵，有其主客觀的原因，無法單純以想吃辣作為回應，中國各省對於辣椒名稱的叫法多樣，正反映出辣椒傳入的複雜性原因，當然這與辣椒品種的繁複性有關，故何時、何地、何種辣椒的引入，並不容易有一個明確的解釋，但無論如何，辣椒的傳入與過程，最終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的飲食觀。

參考資料

史料

-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
- 〔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
- 〔宋〕沈括，《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 〔明〕高濂，《遵生八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清〕王士進《隨息居飲食譜》，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
- 〔清〕佚名，《調鼎集》，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清〕范咸等修，《重修台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28。
- 〔清〕陳淞子，《花鏡》，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79。
- 〔清〕劉良璧等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徐心餘，《蜀遊聞見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曾懿，《中饋錄》，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4。

專書

山本紀夫，《辣椒的世界史：橫跨歐亞非的尋味旅程，一場熱辣過癮的餐桌革命》，台北：馬可孛羅，2018。

杰克·特納(*Jack Turner*)，周子平譯，《香料傳奇一部由誘惑衍生的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7。

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台北：衛城出版社，2017。

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孫家堃譯，《哥倫布航海日記》，上海：上海外語教育，1987。

寇特·麥可·弗萊瑟(*Kurt Michael Friese*)等，《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前進中北、美洲辣點，直擊多元的辣椒社會史與變動中的糧食體系》，台北：商周出版，2017。

莉琪·柯林漢(*Lizzie Collingham*)，程芸譯，《印度文化誌 咖哩群像》，台北：財信出版，2008。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台北：時報出版社，2015。

蓋瑞·保羅·那卜漢(*Gary Paul Nabham*)，呂奕欣譯，《香料漂流記：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台北：麥田出版，2017。

丁潔，《蔬菜圖說 辣椒的故事》，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

王賽食，《唐代飲食》，山東：齊魯書社，2003。

曹雨，《中國食辣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9。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5卷·清民國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藍勇，《中國川菜史》，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

期刊論文

丁曉蕾、胡义尹，〈從方志記載的辣椒地方名稱看辣椒在中國的引種傳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0卷3輯，2015。

王思明，〈美洲原產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產結構的影響〉，《中國農史》，第2期，2004。

王昭月、林大鈞、曾夢蛟，〈番椒馴化種之演化與栽培〉，《植物種苗》，15卷1期，2013。

王茂華、王增瑜、洪承兌，〈略論歷史上東亞三國辣椒的傳播、種植與功能發掘〉，《中國史研究》，第101輯第4期，2016。

吳松弟，〈宋代以來四川的人群變遷與辛辣調味料的改變〉，《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0卷1期，2010。

李日強，〈胡椒貿易與明代日常生活〉，《雲南社會科學》，第1期，2010。

李鵬飛，〈歷史時期代鹽現象研究〉，《鹽業史研究》，第1期，2015。

河南省博物院葛滕山商墓考古隊，〈固始縣葛滕山六號商代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 卷28期，1991。

洪進雄、陳士略，〈番椒屬之起源及其分佈〉，《中國園藝》，34卷3期，1988。

張玉燕，〈蒟醬、扶留藤、葶苈與胡椒〉，《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3期，2018。

劉錫濤，〈略論唐代舌尖上的胡味〉，《唐都學刊》，31卷2期，2015。

蔣慕東、王思明，〈辣椒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中國農史》，第2期，2005。

藍勇，〈中國古代辛辣用料的嬗變、流布與農業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2000。

歷史照片解讀—以「袁世凱與外國使節」照片及 相關史料為例

呂慎華*

摘要

清宣統三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元年2月12日），清朝皇室宣布退位，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此後，歷經一年多波折，袁世凱於民國2年10月獲得國會推舉，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於同年10月10日舉行就職典禮。會後，袁世凱與前來祝賀的北京外交團成員、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要員們共同合影留念。

上述照片原件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錄於1994年，由二檔館、香港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之《中國近代珍貴圖片庫：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一書中，此後則廣被引用。照片留影者30人，包含袁世凱在內的中華民國政府要員、以及北京外交團成員各半，然二檔館僅能辨識出13名政府要員，另兩名官員、以及外交團成員15人銜名則全數缺略。

此照片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與承認中華民國政權之北京外交團間的唯一合影照，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然不過百年，照片中成員已難於辨認，不免影響其史料價值。筆者乃依據各國外交檔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案、政府公報、當時報刊雜誌等文獻史料，以及網路資源等數位化史料，對該照片進行考釋與辨認，希望能補足此一缺憾，使該照片之歷史價值能進一步呈現。

關鍵詞：袁世凱、外交團、大總統、民初、北京

How to reinterpret an historical photograph? Take the "Yuan Shih-kai and the diplomats in Peking" and other relative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example

Shen-Hua Lu **

Abstract

Yuan Shih-k'ai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October 6th, 1913, and hi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4 days later. In memorial of that, Yuan Shih-k'ai, the Minist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mbers of the Peking Diplomatic Corps took photo together after that ceremony.

The photo is in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t Nanking now. People can find easily that there were 30 men taken in IT, but also find it hard to identify all of them. Only 13 Chinese Officials are identified, the others is still unknown.

As a researcher of Yuan Shih-k'ai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 tried to identify each of them by using relative government files, official gazettes, new papers and magazines on that time, and even cyber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ke this photo more useful than ever for all historians and researchers.

Keywords : Yuan Shih-kai , Diplomat Corps , President ,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Pek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在記錄動、靜態聲音與影像之媒體技術尚未發明以前，歷史學家進行研究時，史料來源不出文字、圖像、實物、口傳四種，而所倚重者往往為文字史料。照相技術發明後，未經變造的照片儘管能保留當下的真實情形，但除特殊情況之下，照片拍攝者或保存者通常不會針對其內容加以記錄說明，¹年久日深之後，往往難以判讀，進而增加運用於歷史研究時之困難，如非解讀錯誤、即棄之不用。



照片一：顧維鈞像，收入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12。

¹ 例如，民初政壇曾一度流行贈送個人親筆簽名照，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品中，收藏一張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贈送給時任內務總長朱啟鈐的個人照，顧維鈞在照片中空白處提寫「桂萃總長賜存，顧維鈞贈。昔民國五年駐節美京」，則可知該照片最晚拍攝時間、以及保存者，參見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12。

各類型照片之中，最難考證者莫過於團體照，由於照片中人數眾多，除非拍攝時留下說明文字，²或參與者形象廣為人知，否則後人往往僅能得知其拍攝時間或地點，照片中人物即便有完整說明，亦難以一一辨認。³而看似重要、卻無法驗明正身的歷史照片在後人輾轉引用之際，常常出現解讀錯誤，甚至一張照片、各自表述情形。

² 例如，霧峰林家保存一張題為「1934.11.20 觀菊紀念」照片，此外別無記錄。相片中有十人，能辨識者雖僅有林獻堂、林烈堂、陳炘三人，但林獻堂於日記中曾記錄拍攝時間、地點以及主要參與者，因此尚能對照判讀。參見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頁183。

³ 例如，南京二檔館保存一張「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攝影」照片，由題寫於照片上的說明，可知拍攝時間為辛亥年11月初10日，拍攝地點為江蘇省諮議局門口，照片中共有十七省代表合計47人，說明雖列出其中46人人名，但因照片模糊、以及其中部分人物並未活躍於民國政壇，以致難以比對。參見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頁72-73。



照片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收入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頁 212。

例如，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香港商務印書館，於 1994 年合作出版之《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一書中，收錄一張題為「袁世凱與各國使節」的照片，編者說明該照片係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各國使節謹見袁世凱後合影，⁴而收錄同一張照片，由位在北京的中央編譯出版社於 2014 年出版之《亂世袁世凱》，卻說明該照片為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後，袁世凱與駐京各國公使合影，⁵臨時大總

⁴ 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頁 98-99

⁵ (英) 帕特南·威爾 (Putnam Weale) 著、秦傳安譯，《亂世袁世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頁 44

統就職日為 1912 年 3 月 10 日，正式大總統就職日則為 1913 年 10 月 10 日，兩者相去甚遠。

袁世凱於 2013 年 10 月 6 日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兩日後北京外交團除美國之外，先後致電外交部表達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之意，並在 10 月 10 日舉辦的就職大典中集體出席，由領銜公使代表致賀，中華民國政府從此由臨時轉為正式，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該照片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與外交團成員之合影，具有極高歷史價值，但因缺乏文字記錄，內容無法正確解讀，深為可惜。筆者乃以政府檔案、報紙、回憶錄、當時其他照片等一手史料，輔以其他相關資料，嘗試解讀該照片之拍攝時間、地點、人物，希望能讓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能真正為人所認識。

貳、是否確為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之後所拍攝之照片

二檔館所收藏之「袁世凱與外國使節」照片（以下簡稱照片 A），共有三十人入鏡，亞洲人種 16 位，非亞洲人種十四位，館方撰寫之說明為：「1913 年 10 月 10 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各國駐華使節覲見袁世凱。前排中者為袁世凱，三排右一為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右二為司法總長梁啟超，後排一為內務總長朱啟鈐，右四起為大理院院長章宗祥、外交部參事顧維鈞、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外交總長陸徵祥、海軍總長劉冠雄、參議院議長王家襄、教育總長汪大燮。章宗祥前左為侍從武官長蔭昌，汪大燮前右為眾議院議長湯化龍」。

⁶亦即，二檔館能辨識者僅有中華民國政府官員 13 名，另 17 名則無法查考。



照片 A：袁世凱與外國使節，收入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頁 98-99。

二檔館雖專責收藏 1912 至 1949 年間中華民國時期史料，但照片 A 並非海內孤本。早在 1913 年 11 月 15 日，法國國內發行之《L'Illustration》週刊第 3690 號，便已刊登袁世凱就職照片（以下簡稱照片 B），且於照片之下另繪站位編號圖，清楚標示出各人職銜、姓名與所站位置。⁷以內容而言，兩張照片僅有一處不同，二檔館照片共有 30 人入鏡，雜誌照片則僅有 29 人，比對之下，可以發現兩

⁶ 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98-99。

⁷ Le president Yuan-Chi-kai, entoure des membres du corps diplomatique a Peking, L'Illustration, No. 3690, 15 Novembre 1913. pp.13.

者為相同照片，照片 A 為原始照片，照片 B 則因雜誌時為了版面美觀與編輯方便，截去照片 A 兩側而成，卻不慎將原照片中站立於最右側之朱啟鈐截除。兩相比較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官員部分，照片 A 未列出之外交部秘書唐在復、總統府禮官處處長蔡廷幹兩人標示於照片 B 中，照片 B 未標示之汪大燮、顧維鈞、章宗祥、梁啟超，以及被截除之朱啟鈐則清楚標示於照片 A 中，則兩張照片中合計 15 名中華民國官員已無遺漏。

然而，二檔館所列出之 13 位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職銜並非全然正確。例如，說明中陸徵祥為外交總長，但陸徵祥已於 1913 年 9 月 4 日辭去外交總長一職，⁸，次日進行職務交卸，先由次長曹汝霖代理部務，⁹新任總長孫寶琦則於 9 月 11 日接任。¹⁰因此，陸徵祥於該片拍攝時，並未擔任任何官職，二檔館謂其為外交總長，顯然有誤。

至於外籍人士部分，照片 B 所列出者為西班牙公使兼外交團領銜公使 S.E. Don Luis Pastor、瑞典公使 S. E. M. Wallenberg、法國公使 S. E. M. A. Conty、比利時公使 S. E. M. de Cartier de Marchienne、丹麥公使 S. E. Count Aklefeldt-Laurvig、美國代辦 S. E. M. Williams、俄國公使 S.E.H. Kroupensky、日本公使 S. E. M. Yamaza、葡萄牙公使 S. E. M. Bathala de Freitas、和蘭公使 S. E. Count von Limburg-

⁸ 「臨時大總統令」(民國 2 年 9 月 4 日)，《政府公報》第 480 號，第 17 冊，頁 79。當時適逢海牙保和會即將召開第三次大會，袁世凱與熊希齡商議之後，認為陸徵祥曾參與前次大會，成績昭著，決定派遣陸徵祥擔任中國代表與會，參見「陸君任和會代表」，民國 2 年 9 月 13 日，《京華新報》第 2 版。

⁹ 「外交次長曹汝霖呈大總統報明代理部務日期文並批」(民國 2 年 9 月 9 日)，《政府公報》第 486 號，第 17 冊，頁 212。

¹⁰ 「臨時大總統令」(民國 2 年 9 月 11 日)，《政府公報》第 487 號，第 17 冊，頁 219。

Stirum、德國公使 S. E. Baron von Seckendorff、義大利代辦 M. le Checalier Daniel Varé、英國代辦 M. J. B. Alston、墨西哥公使 M. Herrera de Huerta、奧國代辦 M. le Comte des Fours。除美國、英國、義大利代表以代辦(chargé d'affairs)稱呼之外，其餘均稱呼為公使(ministre)，與政府公報中記載參加袁世凱就職典禮之外交團人員名單相對照，¹¹可發現人名方面完全吻合，但職銜方面則略有出入，政府公報將西班牙、瑞典、比利時、俄國、丹麥、法國、葡萄牙、日本、等八國代表稱為公使，將和蘭、德國代表稱為署理公使，將墨西哥、奧國、義大利代表稱為代辦，美國代表為頭等參贊代辦，英國代表則稱為參贊代辦，然而照片 B 中之人員確實為當時北京外交團成員則無疑問。

¹¹ 「大總統受職日外交團謁見銜名單」，民國 2 年 10 月 12 日，《政府公報》第 18 冊，第 517 號，頁 284 至 291。



Le président Yuan-Chi-Kai, entouré des membres du corps diplomatique à Pékin.--Phot. Fu Sheng.



照片 B：Le president Yuan-Chi-kai, entoure des membres du corps diplomatique a Pekin，收入 L'Illustration, No. 3690, 15 Novembre 1913. pp.13.

參、照片拍攝時間

二檔館對照片 A 之說明，為袁世凱就職典禮後所拍攝，而舉辦就職典禮日期為 10 月 10 日，按語意來說，拍攝日期即為 10 月 10 日；L'Illustration 雜誌說明照片 B 為就職典禮次日舉辦宴會時所拍攝，及 10 月 11 日。二檔館為專責收藏民國時疑檔案文獻之研究機

構，但照片 B 為就職典禮一個月後所刊登，且清楚標示所有外交團成員，按時地相近原則，L'Illustration 雜誌所記載理應較為真實。同一張照片，拍攝時間出現兩種不同說法，則須進一步考察史料，以確定拍攝時間。為行文方便，以下以照片 A 做為代表。

該照片是否確為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後所拍攝，拍攝時間究竟是 10 日或 11 日，則。

首先，考察照片中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資歷，可進一步照片拍攝時間。照片中的梁啟超與袁世凱雖然結識甚早，袁世凱甚至曾加入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北京強學會，但雙方並無深交、甚至因戊戌政變而結怨。梁啟超既非袁世凱北洋舊部，在清末民初也沒有顯赫官資，之所以能與政府部會首長合照，必出於其具備同等官員身份。梁啟超在民國時期曾兩度出仕，第一次為 1913 年 9 月 11 日獲袁世凱任命為司法總長，至 1914 年 2 月 20 日免職為止，第二次為 1917 年 7 月 17 日出任財政總長，當時袁世凱謝世已久。因此，照片 A 拍攝時間，可進一步限縮為 1913 年 9 月 11 日至 1914 年 2 月 20 日之間。

照片 A 中人與梁啟超狀況相似的，還有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湯化龍。湯化龍於 1912 年 5 月 1 日當選臨時參議院副院長，¹²1913 年 4 月 30 日當選參議院議長；¹³王家襄於 1912 年 4 月 3 日當選中央參議員，¹⁴於 1913 年 9 月 4 日當選參議院議長。王家襄、湯化龍並非袁世凱之故舊僚屬，在清朝末民初時，除擔任兩院議長之外也並無顯赫經歷，之所以能與袁世凱合影，其原因當在兩院議

¹² 「專電」，民國元年 5 月 3 日，《申報》第一版。

¹³ 「北京電」，民國 2 年 5 月 1 日，《申報》第一版。

¹⁴ 「杭州臨時議會電」，民國元年 4 月 5 日，《申報》第二版。

長身份。袁世凱於 1914 年 1 月 10 日宣布解散國會，¹⁵不久改聘王家襄、湯化龍為參政，已非政府要員，不太可能有機會與政府部會首長、外籍人士合影，因此，此照片拍攝時間可進一步限縮為 1913 年 9 月 11 日至 1914 年 1 月 10 日之間。

其次，民初北京外交團集體覲見大總統的時機，包含總統就職、祝賀新年、定期宴會等。袁世凱曾兩度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一為 1912 年 3 月 10 日就職臨時大總統，一為 1913 年 10 月 10 日就職正式大總統。臨時大總統就職當日，因各有約國尚未就承認中華民國一事達成共識，因此並未安排外交團覲見，外交團領銜公使朱邇典雖親自到場觀禮，¹⁶卻是以個人名義向袁世凱祝賀，¹⁷且照片 A 中並無朱邇典，因此照片 A 並非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時與外交團合影。袁世凱於 1913 年 10 月 10 日就職正式大總統後，直到 1916 年亡故為止，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再舉辦總統就職典禮，因此若照片 A 為外交團慶祝袁世凱就職所拍攝，則拍攝時間必然在正式大總統就職典禮當天、或之後。

以祝賀新年而言，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1913 年因外交團對於承認中華民國問題並無共識，因此沒有舉辦元旦集體覲見賀年活動，由各國公使集體以個人名義前往大總統府謁見袁世凱，俄國公使因病未到，袁世凱以茶點招待各國公使，禮畢後日使伊集院彥吉、美使嘉樂恆留在府內，與袁世凱合影；¹⁸1914 年元旦時北京外

¹⁵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年正月至二月，頁 98。

¹⁶ 「大總統受職之通告」，民國元年 3 月 13 日，《大公報》第 3449 號，第 2 版。

¹⁷ 「英使始終力任維持」，民國元年 3 月 13 日，《大公報》第 3449 號，第 2 版。

¹⁸ 「各國公使往總統府致賀」，民國 2 年 1 月 5 日，《順天時報》第 3280 號，第七版。

交團曾集體觀見祝賀，清皇室代表溥倫亦出席，¹⁹根據政府公報記載，當時外交團領銜公使為英使朱邇典，²⁰然照片 A 中並無朱邇典；1915 年 1 月 2 日，各國公使及夫人赴豐澤園向袁世凱賀年，瑞典公使夫婦未出席，²¹當時到場的英國代表為公使朱邇典，²²但照片 A 中亦無朱邇典身影；²³1916 年元旦改元為洪憲元年，各國公使於 1 月 3 日前往祝賀新年，英國仍由公使朱邇典代表，²⁴朱邇典亦未現身於照片 A 中。若照片 A 為北京外交團向大總統賀年時合影，領銜公使不可能被遺漏，因此，可以推定，照片 A 並非袁世凱在臨時、或正式大總統任內，外交團於元旦觀見大總統祝賀新年時所拍攝。

以外交團可能出席的定期宴會而言，邀宴者分為外交部、總統府。外交部舉辦之定期宴會，大總統並不出席，遑論其他部會官員。例如，外交部確實於 1913 年 10 月 10 日晚間九點半，由總長孫寶琦具名邀請各國公使、銀行團、報界、商界、中國國務原、高等長官、議長、議員等重要人物及其夫人，在石大人胡同迎賓館舉行茶會，則

¹⁹ 「特約透路電」，民國 3 年 1 月 12 日，《時報》第三版。

²⁰ 〈民國三年一月一日上午十點鐘駐京外交團觀賀大總統銜名單〉，民國 3 年 1 月 6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598 號，第 22 冊，頁 3。

²¹ 「初二日各公使謁見之禮節」，民國 4 年 1 月 5 日，《順天時報》第 3984 號，第二版。

²² 〈外賓觀賀銜名單〉，民國 4 年 1 月 6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956 號，第 47 冊，頁 3。

²³ 顧維鈞回憶錄中提到，一次新年招待會，外交團全體應邀參加，當時京郊鎮守使沈金鑒出席，顧維鈞與次長曹汝霖向沈金鑒提到其西服樣式錯誤。然而，沈金鑒之職務為京兆尹，且民初職官中並無「京郊鎮守使」一職，顧維鈞回憶錄以英文寫作，「京郊」當為「京兆」一詞誤譯。沈金鑒於 1914 年 3 月 23 日出任順天府尹，同年 10 月順天府改為京兆地方，沈金鑒自 10 月 8 日起改任京兆尹，直到次年 9 月 26 日轉任湖南巡按使為止。亦即，顧維鈞所述之新年招待會，當即為 1915 年 1 月 2 日外交團觀見後之茶會。參見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頁 132-133。民國職官年表，頁 359。

²⁴ 〈觀賀單〉，洪憲元年 1 月 6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號，第 77 冊，頁 3。

照片 A 也無法排除是在當天晚宴後拍攝。但依與會的記者黃遠生所述，與會者限定穿著晚禮服，陸徵祥夫婦未出席，席間跳舞十數次，直至午夜十二時乃紛紛散去。²⁵以當時照相技術，照片 A 為白天所拍攝自不待言，而晚宴由孫寶琦邀請，不僅陸徵祥夫婦未出席，袁世凱也未出席，²⁶但照片 A 中卻有袁、陸而無孫，可直接證明照片 A 必非在 10 月 10 日外交部晚宴時所拍攝。

至於總統府舉辦、邀請外交團出席的定期宴會，可考者如 1914 年 1 月 12 日下午，袁世凱邀集外交團、國務員、記者、等各界名流，於懷仁堂舉辦宴會，²⁷但照片 A 中之外交團成員與 1914 年時有顯著不同，因此照片 A 並非外交團參加外交部定期宴會時所拍攝。

綜合上述資料，在梁啟超的司法總長任期內，北京外交團曾經有兩次覲見袁世凱的機會，分別為 1913 年 10 月 10 日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典禮、以及 1914 年 1 月 2 日拜賀新年。袁世凱就職典禮中，應邀出席的德國代表為德國署理公使司良德，²⁸原任公使哈豪森於 5 月 31 日請假乘火車返國就醫，²⁹由司良德於駐摩洛哥公使任上轉調駐北京代理公使，³⁰任期至哈豪森於 10 月 16 日返抵北京為止，

²⁵ 「禧日日記其二」，1913 年 10 月 19 日，《時報》第二版。

²⁶ 「迎賓館夜會誌盛」，順天時報 1913 年 10 月 12 日，第九版。

²⁷ 「懷仁堂之盛饗」，1914 年 1 月 13 日，《順天時報》，第 3641 號，第九版。

²⁸ 〈大總統受職日外交團謁見銜名單〉，民國 2 年 10 月 12 日，收入《政府公報》018 冊，頁 284-291。

²⁹ 哈豪森於 5 月 30 日向袁世凱辭行，次日啟程返國，參見參見「北京電」，1913 年 5 月 31 日，《申報》第 2 版；「德欽使哈豪森君已回國」，1913 年 6 月 1 日，《順天時報》第 3424 號，第 9 版。

³⁰ 「德使回國之祖餞者」，1913 年 10 月 16 日，《順天時報》第 3558 號，第 9 版。

³¹次日即離京返德。³²司艮德作為外交團成員代表德國政府出席，與司法總長梁啟超見面並合照的機會，僅限於 1913 年 9 月 11 日至 1913 年 10 月 16 日之間，在這個時段中，外交團只有過一次覲見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政府高階官員合照的機會。此外，義國公使於 7 月初請假返國，公使館事務由頭等參贊華雷代理，³³於 10 月 11 日返抵北京，³⁴於 13 日開始辦公，³⁵則可再進一步，將照片 A 拍攝時間，限縮至 1913 年 9 月 11 日、至 1913 年 10 月 12 日之間。

至此，已經可以確認，照片 A 確為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與北京外交團以及政府高階官員共同合影紀念，但場景並非祝賀新年、也非定期宴會，更不可能是在其他總統就職典禮場合，則照片 A 於 1913 年 10 月 10 日袁世凱就職典禮當天、外交團集體覲見祝賀之後所拍攝，似已無可懷疑。但考察相關史料後，發現仍有進一步研究空間。

肆、一手史料中所描述的就職典禮照片

照片 A 中出現之人物，有留下相關文字記錄者，有外交次長曹汝霖，外交部參事顧維鈞、美國頭等參贊衛理等三人。

³¹ 哈豪森於 6 月進行手術治療，因恢復情形良好，原本訂於 10 月 5 日由柏林啟程返回北京，因總統選舉進度迅速，因而提前於 10 月 2 日啟程，大約可以在 16 日回到北京，但已趕不上參加就職典禮。參見「德使哈豪森回國治病近耗」，1913 年 6 月 22 日，《順天時報》第 3551 號，第 9 版；「哈豪森就道來京」，1913 年 10 月 6 日，《順天時報》第 3549 號，第 3 版；「北京電」，1913 年 10 月 17 日，《申報》第 2 版。

³² 「公使回國」，1913 年 10 月 18 日，《京華新報》第 228 號，第 3 版。

³³ 「義國公使請假歸國」，順天時報 1913 年 7 月 9 日，第 3461 號，第九版。

³⁴ 「義公使回京」，順天時報 1913 年 10 月 14 日，第 3556 號，第九版。

³⁵ 「新任義使定期晉謁」，1913 年 10 月 17 日，《大公報》第 4019 號，第 5 版。

報紙報導為「該公使已於十三號到京」，其意應指於 13 日開始辦公。

曹汝霖回憶錄中所記最為詳盡，全文為：

直至民國二年之春，各國始先後承認中華民國，各公使呈遞國書，儀注仍參照清制，備極隆重。時外交官新定大禮服，照法國式繡金線嘉禾，以金繡多少分等級，很華麗。總長加一指揮帶，均配劍，帽似海軍帽式，上綴羽毛，以白黑分等級。是日與會者，外交總次長及官員均著外交大禮服，文武官員都著禮服，各使除美使外，均著大禮服。總統立於居仁堂中間，各官員序列左右，威儀正肅。大總統則御軍常禮服，配大勳章，沒有御戎裝大禮服（聞因總統頸項特別短，戎裝大禮服領高且硬故從沒用過）。各國公使由外交總長介紹、呈遞國書之後，並介見參贊書記官。由領銜公使致頌詞，大總統致答詞，禮畢，由大禮官引至春耦齋設宴招待。領銜公使舉杯祝賀中華民國及大總統萬歲，大總統亦舉杯祝賀各國元首萬歲，宴畢同攝一影而散。從此中華民國始列於國際之林矣。各國元首均來電祝賀。³⁶

曹汝霖的回憶錄中，對於各國公使覲見、合影的描述可謂鉅細靡遺，由於是當事人所形成之一手史料，則照片 A 為 1913 年 10 月 10 日外交團覲見之後所拍攝一事理當無可懷疑，L'Illustration 雜誌所謂 10 月 11 日拍攝說法顯然錯誤。然而細究之下，曹汝霖回憶之種種情節未必符合當時情況。

呈遞國書一段，因美國、巴西、秘魯以外各國於 1913 年 10 月 8 日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故各駐使必須重新遞送到任國書。外交團於 191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舉行會議，決定於次日開始呈遞國書，以國書送到北京使館之次序決定，³⁷瑞典、德國為 11 月 13 日，俄國、丹

³⁶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頁 86-87。

³⁷ 「北京電」，1913 年 11 月 13 日，《申報》第 2 版。

麥為 11 月 14 日，法國、美國為 11 月 15 日，比利時、日本為 11 月 17 日，英國、和蘭為 12 月 4 日，義大利為 12 月 20 日，西班牙為 1914 年 1 月 13 日，葡萄牙為 1 月 19 日，奧國為 4 月 6 日，³⁸墨西哥則至 1918 年始正式設館駐使。³⁹各使呈遞國書時，均由各該使親誦祝詞，領銜公使並未到場。因此，袁世凱就職典禮中，並無各國公使由外交總長介紹、呈遞國書之安排。

領銜公使親誦祝詞一段，當日應邀出席的美國頭等參贊代辦衛理提到，就職典禮在太和殿舉行，接待外交團的安排與前清皇帝接見使臣時幾乎一模一樣。當天上午 9 點由使館區出發，至太和門時受到典禮大禮官、外交總長陸徵祥接待。就職演說結束後，外交團按照資格輩份再度進入會場，由領銜公使代表致頌詞、大總統親頌答詞，接著各使團團長依序拜謁大總統，並向大總統介紹隨行成員。接見完畢後，大總統退至保和殿，外交團及其隨員則退至接待室。隨後清皇室代表溥倫向大總統致頌詞，結束後大總統前往天安門進行閱

³⁸ 各國公使呈遞國書，參見「瑞典公使倭倫白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3 日）、「德國公使哈豪森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3 日）、「俄國公使庫朋斯齊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4 日）、「丹國公使阿列斐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4 日）、「法國公使康德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5 日）、「美國公使芮恩施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5 日）、「比國公使賈爾牒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7 日）、「日本國公使山座圓次郎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1 月 17 日）、「英國公使朱遜典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2 月 4 日）、「和蘭公使貝拉斯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2 月 4 日）、「義國公使斯第爾紮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2 年 12 月 20 日）、「日斯巴尼亞國公使白斯德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3 年 1 月 13 日）、「葡國公使符禮德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3 年 1 月 19 日）、「奧國公使訥色恩呈遞國書頌詞」（民國 3 年 4 月 6 日），《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檔號：03-09-015-01-001。

³⁹ 墨西哥在華使事，係由駐東京公使代辦，直至 1918 年，使設置駐中國使館，派遣羅梅路擔任專駐北京之全權公使。參見「頌詞」（民國 8 年 3 月 13 日），《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檔號：03-09-016-02-001。

兵儀式，外交團被引導至天安門觀看閱兵，政府高階官員也向大總統祝賀。⁴⁰因此，就職典禮中，確實有外交團領銜公使親誦祝詞一節。

接見完畢後，引至春藕齋設宴招待，宴後合影一段。春藕齋位於頤年堂邊，兩者為三海中的南海豐澤園所屬建築。證諸報載，總統就職大典當日，時程雖稍有延誤，但儀式確實按照規劃，於 10 月 10 日上午起在紫禁城太和殿依序進行，領銜公使致頌詞、大總統致答詞的地點均在太和殿，且袁世凱在外交團觀見完畢之後即接見清皇室代表溥倫，接著在天安門閱兵，隨後即回總統府，⁴¹則袁世凱與外交團及文武要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於 10 月 10 日當天在中南海的春藕齋合影紀念。

由此可知，曹汝霖所述之各國呈遞到任國書、各國公使觀見、領銜公使親誦賀詞、介紹各國使館隨員、袁世凱設宴款待、宴會後合影紀念等情節，全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但不可能同時發生於袁世凱就職當天，曹汝霖係將幾個發生於不同日期、卻極為相似的事件合而為一。據曹汝霖回憶錄中由香港天文台報創辦人陳孝威撰寫之序文，可知曹汝霖於 1960 年開始撰寫回憶錄，於該年 9 月 6 日開始在天文台報連載，至 1963 年 5 月 16 日連載完畢，此後又續有增補，曹汝霖夫人曹郭靜真女士於該書序文中表示，曹汝霖開始撰寫回憶錄時年逾八旬，記憶力已減退。則將 40 餘年前相似事件混為一談，並非其有心造假，而是撰寫回憶錄時常見問題。

顧維鈞回憶錄中，提到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曾為外交團舉行一次招待會，會後攝影師為個人排定座位、準備照相時，顧維鈞發

⁴⁰ FRUS, pp135-137.

⁴¹ 「大總統就職記盛」，1913 年 10 月 16 日，《時報》第三版。

現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穿著常禮服、條紋褲，但未配戴硬領，不合西式規範，因此建議其用手帕圍住頸項，以免有失體統。⁴²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時間為 1913 年 5 月 2 日，已經超出前段所論述之照片 A 拍攝時間斷限，但照片 A 中的梁士詒確實配戴領巾，與顧維鈞所述相符，則有必要對照片進行進一步驗證。若照片 A 為 5 月時袁世凱與北京外交團合影，當時領銜公使朱邇典理當出席，無官職的梁啟超則不應出現在照片中，由此可知，該照片並非 1913 年 5 月間所拍攝。

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 1913 年 6 月 1 日出版之《東方雜誌》第 9 卷第 12 號中，刊登一張題為「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紀念」照片，說明為「美國承認民國之日袁總統與美國公使等在總統府攝影」，⁴³筆者認為，顧維鈞回憶錄中所提及之照片，應即為此照片（以下簡稱照片 C）。據衛理所述，1915 年 5 月 2 日上午 10 點，大總統府派車前往美國使館，將署理公使衛理與使館隨員接至中南海總統官邸處，由禮官孫寶琦、蔡廷幹、程璧光、蔭昌等以軍禮接待。外交總長陸徵祥代表因病請假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大廳等候，衛理等人由東華門進總統府。上午 11 點，衛理向袁世凱宣讀美國總統威爾遜承認

⁴²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頁 131。

⁴³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紀念」，1913 年 6 月 1 日，《東方雜誌》9 卷第 12 號。此為雜誌正文前之照片，未編頁碼。

中華民國政府國書，⁴⁴以及衛理所撰寫頌詞之中文譯本，⁴⁵袁世凱則令大總統府英文秘書顧維鈞宣讀大總統覆函之英文譯本，⁴⁶衛理隨後

⁴⁴ 美國承認國書內容為：大美國大總統致書於大中華民國大總統。當中華民國人民新負自治性質及主權之時，美政府與美國人民甚為表示同情，暨茲代表全國國會業經召集，以盡其最高最重責任，發表民國輿情所希望者之，得有圓滿效果，是以美國政府及人民，皆以余當代表美國政府及我美人民，歡迎新中國加入萬國一家內。余現因中華民國完全政體將欲成立，果能從此發展盛興達於極點，且將來國會造成之新政府，對於臨時政府之所續擔責任亦能賡續擔負，是誠余所冀望而深信者也。〈美國大總統承認民國國電〉，民國2年5月3日，北洋政府公報013冊，頁63。

⁴⁵ 衛理之頌詞為：美國署理公使奉本國外交總長訓令，將大總統諭言代達中華民國大總統，本署公使膺此職任，不惟得獲最優寵眷，亦深為極大之幸福也。美國大總統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諭言，本署公使既已代達，並需將管見暨駐華我美人民意旨同時表明。蓋以美國政府此項情事，本署公使等深為悅服，我美人民與中國既為兄弟民國之人，則對於中國民主政體之得有效果問題，無論合項情事，皆不能不加意注重。本署公使旁觀民國前途，實視為同情之事，且深望起義時代諸烈士思想，從此得有圓滿效果，以成立自由機關。緣我美人民於建設施行及為民造成之此項政體，皆視為最優政事，況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上古大禹實遺此語，茲復發生於今日。本署公使等與貴大總統及中華人民無不欣悅，深信合民意之新造政府，其治安公理皆能維持永久，不惟使中華人民得有無窮幸福，即上蒼亦能垂以護佑也已。〈民國二年五月二日美國衛署公使謁見大總統呈遞承認國書送詞〉，民國2年5月3日，北洋政府公報013冊，頁65。然按FRUS所載，衛理之頌詞分為兩部分，中譯本前五句為開場頌詞，其後則為呈遞國書完畢之結語。參見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No.841, May 6, 1913, F.R.U.S., File No. 893.00/1681, Inclosure 1, Introductory remarks by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Concluding remarks by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⁴⁶ 袁世凱答詞中文本為：美利堅合眾國大總統閣下，承認國書已由駐京貴國代表遞傳，其中親愛之盛意、歡迎之至誠，流露言表，足見貴國相互扶助之美德長存不衰，從此中美兩國七十年來之邦交益生光彩，本大總統以中華民國之名義敬此致謝。共和政體於敝國雖屬創舉，然其精神之美備，而為貴國所代表者，敝國之民已熟知之。以此敝國政府之目的惟維持共和政體、完備行政機關，庶幾合國國民得永享其澤，對內則調和法律自由，以增進國家之利益、人民之幸福，對外則履行所有之義務，以保國際之和平、列邦之睦誼耳。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大總統覆美國大總統國電〉，民國2年5月3日，北洋政府公報013冊，頁63。原件部分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參照順天時報報導予以校訂，

向袁世凱一一介紹隨行的美國使館官員。進謁完畢後，袁世凱短暫離席，在衛理等人觀賞中南海風景結束後設午宴款待，宴後攝影師為眾人合影留念，直至下午始送衛理等人回美國使館。⁴⁷包含衛理在內，當天美國使館共 15 名官員覲見大總統，⁴⁸照片 C 中外籍人士共 15 名，衛理與袁世凱並肩立於頭排，顯見其為當日最高階外籍人士；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共 11 名，筆者可辨識者為袁世凱、孫寶琦、陸徵祥、蔭昌、梁士詒、蔡廷幹、程璧光、顧維鈞，與衛理所記相符。因此，照片 C 才是顧維鈞所稱，美國承認中華民國，袁世凱邀宴後所拍攝，但邀請對象並非北京外交團成員，而是美國代表團。⁴⁹

參見〈大總統覆美國大總統國電〉，《順天時報》民國 2 年 5 月 3 日第二版。當場由顧維鈞宣讀的英文譯本，與中文本在意義上相同，文字上則甚有出入，參見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6, 1913, F.R.U.S., File No. 893.00/1681, Inclosure 2, The reponse of the President.

⁴⁷ 衛理等人覲見情形，參見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6, 1913, F.R.U.S., File No. 893.00/1681.

⁴⁸ 謁見名單為：美國署理公使衛理、二等參贊孫墨麟、署理漢務參贊裴克、頭等書記闕那、二等書記官莫爾幹、繙譯生秘克福、繙譯生馬濟南、繙譯生達為士、繙譯生米赫德、武參贊博理、衛隊統帶羅瑟樂、即授衛隊統帶魏禮謨、衛隊醫官李安瑞、武隨員侯勒克、武隨員畢格樂。參見〈美館各員進謁大總統名單〉，民國 2 年 5 月 3 日，北洋政府公報第 013 冊，頁 65-66。

⁴⁹ 筆者未見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本，因此無法確定是翻譯錯誤，或顧維鈞回憶與事實有所出入。

美 國 承 認 中 華 民 國 之 紀 念



美 國 承 認 中 華 民 國 之 紀 念 禮 儀 中 之 袁 世 凱 總 統 與 美 國 公 使 在 總 府 攝 影

照片 C：「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紀念」，1913 年 6 月 1 日，《東方雜誌》9 卷第 12 號。

當事人之記載為第一手資料，應最為可信，然曹汝霖、顧維鈞回憶錄皆於晚年所撰寫，因此，儘管兩人均親歷其境，卻無法在回憶錄中準確描述其內容，與其他史料所載有相當之出入。

曾參加袁世凱就職典禮，且在當下即留下記錄者，有衛理，以及上海《新聞報》記者黃遠生。

據衛理於 1913 年 10 月 13 日所撰寫的報告，就職典禮當天上午九點，內務部派馬車前往使館區，迎接外交團所有與會人員前往就職典禮會場，抵達天安門後，眾人步行入太和門，受到典禮大禮官、前外交總長陸徵祥的歡迎、並引導至接待室，11 點被引導至太和殿，

觀禮區在大總統左邊。袁世凱宣讀誓詞、發表就職演說，隨後與在場官員互相鞠躬敬禮、三呼萬歲之後退場，隨即接見外交團，由領銜公使致頌詞、袁世凱親致中文答詞、依序接見各國使團團長及隨員，接見結束後外交團返回接待室，袁世凱則接見清皇室代表溥倫，隨後前往天安門閱兵，外交團亦隨後被引導至天安門參觀閱兵儀式。⁵⁰

值得注意的是，衛理在報告呈遞國書情形時提到結束後宴會與合影等事，但在報告參與就職典禮時則並未提到。衛理所描述的就職儀式流程，與國務院所安排、公布者符合，僅在時間上有所延遲，⁵¹且閱兵典禮完成後，袁世凱即返回總統府，外交團及各國務員則自行散去。⁵²袁世凱的就任儀式盛大隆重、行程緊湊，並無預留與觀禮人員合影紀念之空檔，此或即為衛理未提及合影一事之原因。

據當時獲邀參與就職大典的新聞報記者黃遠生所述，10月9日夜間大雨傾盆，國慶日上午仍有微雨。上午十時十餘分，袁世凱乘八人肩輿，由大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秘書夏壽田，侍從武官軍事處處長蔭昌、次長唐在禮引導進入太和殿，就職典禮在宣讀就職宣言書後結束，慶祝員齊赴武英殿進行茶會，殿中高帽禮服者重重重疊而立，但聞人聲、不見食品。⁵³晚間，黃遠生赴外交部迎賓館參加晚宴，主持晚宴的外交部長孫寶琦向黃遠生表示，「是日天安門閱兵成績極佳，外使甚欣賞，閱後約余同往蹴一相為紀念」。⁵⁴黃遠生於光緒30年考取進士之後，隨即赴日留學，返國後入郵傳部任職，受當時尚書

⁵⁰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3, 1913, FRUS1912, pp.135-137.

⁵¹ 〈大總統受任禮節〉，民國2年10月9日，收入北洋政府公報018冊，頁251-253。

⁵² 「天安門之閱兵」，1913年10月16日，《時報》第三版第二張

⁵³ 「禧日日記」，1913年10月17日，《時報》第2版至第3版。

⁵⁴ 「禧日日記其二」，1913年10月19日，《時報》第二版。

徐世昌、左侍郎汪大燮器重，民國初年，與張謇、梁啟超、湯化龍等人均有往來，更於進步黨成立後擔任交際處主任，在北京政界、學界擁有廣泛的人脈網路，⁵⁵由袁世凱兩次就職典禮均獲邀參加、以及孫寶琦與之進行略帶炫耀意味之寒暄，可以想見黃遠生其人在新聞界頗有份量，其記載之可信度極高，則代表 10 月 10 日袁世凱就職當天確實曾有外交團合影紀念一事，似可推定 L, Illustration 雜誌記載之日期顯然有誤，但細究之下則不然。

在照片 C 中，大總統、美國政府代表、外交總長同列第一排，可知觀見呈遞國書係由外交部安排，因此外交總長得以與美國政府代表並肩拍照。然而照片 A 中，外交次長曹汝霖、外交部參事顧維鈞、唐在復均站立於最後一排，外交總長孫寶琦甚至並未出現，若照片 A 確實為袁世凱就職典禮當天所拍攝，外交總長孫寶琦不可能被排除，因此照片 A 並非孫寶琦所述之閱兵後合照照片。

筆者在英國的 University of Bristol（布里斯托大學）與蔣經國基金會合作之「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計畫中，發現一張名為「Sun Baoqi (孙宝琦) with diplomatic envoys, at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的照片（以下簡稱照片 D），該計畫僅能辨識出照片中四位人員，認為前排左二為孫寶琦、前排右一為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中排右二為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後排左一則為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因而將該照片的拍攝時間推定為 1890-1901 年間、地點則在北京。

克林德於庚子事變期間被害之前。照片中前排兩位華籍官員，左二確實為孫寶琦、右二則為陸徵祥，但兩人皆未留辮，何況當時孫

⁵⁵馬建標，〈黃遠生的身份選擇與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態〉，《社會科學戰線》2017 年第 7 期，頁 107-108。

寶琦隨駕西行，於行在辦理電報，⁵⁶陸徵祥則在駐俄使館擔任二等繙譯，⁵⁷兩人當時均不在北京，因此該照片不可能是在庚子事變期間拍攝。再與照片 A 相互比對，則可發現照片 D 中除陸徵祥、孫寶琦之外，其餘 15 位人員與照片 A 完全相同。照片 D 中前排由左至右，分別是瑞典公使倭倫白、孫寶琦、日斯巴尼亞公使白斯德、陸徵祥、比利時公使賈爾牒；中排由左至右，分別是丹麥公使阿列斐、法國公使康德、日本公使山座圓次郎、葡萄牙公使符禮德、德國署使司艮德、俄國公使庫朋斯齊、義大利代辦華雷；後排由左至右，則分別是和蘭署使思迪愣、墨西哥代辦胡爾達、美國署使衛理、奧國代辦德福爾、英國代辦艾斯敦。該計畫所指的克林德、畢盛、寶納樂三人，實際上為照片 A 中的比使賈爾牒、俄使庫朋斯齊、以及和使思迪愣。再仔細比對之下，可發現照片 A 與照片 D 除拍攝地點明顯不同之外，照片 A 中的賈爾牒、符禮德、思迪愣勳章綬帶均配於左肩、照片 D 中則均配於右肩，亦即照片 A 與照片 D 並非同日拍攝。

孫寶琦於辛亥革命時為山東巡撫，與袁世凱、慶親王奕劻為兒女親家，民國成立之後、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前，於 1912 年 12 月 18 日出任稅務處會辦，⁵⁸1913 年 5 月 11 日出任署稅務處督辦，⁵⁹同年 9 月 11 日接任外交總長。以其外交總長地位，與北京外交團合照

⁵⁶ 孫寶琦隨駕西行，獲得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保薦，於光緒 27 年 5 月 5 日陞見後，交軍機處存記候旨錄用，隨即奉派辦理行在電報事宜，因功授四品候補京堂，旋於次年 6 月以三品卿銜出使法國。參見「奏為遵旨保薦賢才僅就所知據實臚舉以供使任恭折仰祈聖鑒事」，光緒 27 年 4 月初 10 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袁世凱奏摺專輯》（台北：廣文書局，1970），第二冊，頁 260 上；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 58 冊，德宗實錄（七），頁 378 上、頁 511 下、頁 613 下。

⁵⁷ 羅光，《陸徵祥傳》（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37。

⁵⁸ 1912 年 12 月 18 日

⁵⁹

為順理成章之事，但陸徵祥當時並無官職，則有可能在上述時間與外交總長與北京外交團合照時間，僅為具有擔任袁世凱就職典禮大禮官身份之時。

因此，筆者認為孫寶琦所述的合照確實存在，但並非照片 A，而是布里斯托大學所收藏之照片 D，兩者並不相同、甚至不在同一天拍攝。



照片 D：Sun Baoqi (孙宝琦) with diplomatic envoys, at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下載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中國歷史照片網站，網址為 <https://www.hpcbristol.net/visual/wc-s01>

綜合上述史料，已可確定，1913 年 10 月 10 日當天，因就職典禮行程緊湊、袁世凱無法與北京外交團、高階政府官員合照。然而，照片 A 中的外籍人物是北京外交團成員、中國籍人物則是包含參、眾兩院院長在內的政府高階文官。在前述 1913 年 9 月 11 日至 1913 年 10 月 12 日之間，是否有其他場合，可以讓這些平時難得齊聚一堂的政府要員以及外交團成員們合照？

伍、新聞報導中的10月11日大總統府宴會

查閱當時報紙，有幾家主要報紙報導頗值得注意。《順天時報》於 10 月 12 日刊登「袁總統招讌中外賓客」，內容為：

袁總統日昨午後二時，於儀鸞殿懷仁堂招請各國公使及公使館員、中外文武大員、兩院議長、外國新聞記者、及其夫人等數百人。開讌初，總統夫人及其公子、女公子等，均在堂內應接賓客，頗極殷勤。四時半，總統入會場，對客周旋，且與中外夫人一一握手施禮畢，就食案與來賓同舉杯祝賀，少時辭去。席間菊花競妍、佳樂盈耳、和氣藹然，至暮一同退散。⁶⁰

《申報》於 10 月 12 日報導中，先以 11 日一則專電報導總統府開園遊會，繼而引述路透社電 11 日兩則電文，報導內容為：

北京電。今日總統府招待各使及國務員、議長開園遊會，午二時至五時止。⁶¹

北京電。今日下午袁總統夫人在府開歡迎會，秩序極佳。各賓客

⁶⁰ 「袁總統招讌中外賓客」，1913 年 10 月 12 日，《順天時報》第九版。

⁶¹ 「專電·北京電」，申報 1913 年 10 月 12 日，第一張第三版。

由南門入宮，乘艇渡過清德宗帝園居之小島，在總統府前附近登岸，袁總統夫人在一大亭之內接見來賓，袁總統旋亦詣亭，與各女賓行握手禮，精神健旺，昨日喘咳業已痊癒，府內各處樂聲洋洋，賓客食精緻之茶點後，即至府內各處遊覽一周，景色之佳實所罕見。各賓以招待殷勤，且蒙遇以優禮，故均歡然而返。⁶²

北京電。袁總統夫人今日下午接見所邀之賓客二百餘人。⁶³10月16日則進一步報導：

袁總統於十一日午後二時，在儀鸞殿懷仁堂招請各國公使及公使館員、中外文武大官、兩院議長、外國新聞記者、及其夫人等數百人。開讌初，總統夫人及其公子、女公子等，均在堂內應接賓客，頗極殷勤。四時半總統入會場，對客周旋，且與中外夫人一一握手施禮畢，就食案與來賓同舉杯祝賀，少時辭去。席間菊花競妍、佳樂盈耳、和氣藹然、至暮退散。又聞是日外交團全體到者約三百人，外交總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及總統府之外交顧問均列席。茶點後，由外交部人員導往游覽三海名勝，外交部並訂於十三日下午，邀請外交團瞻仰太和殿及社稷壇各處云。⁶⁴

《新聞報》於10月12日之報導，與申報引述同一則路透社電文，內容一字不差。⁶⁵10月18日則追加一則「大總統歡讌外交團之盛會」報導，內容為：

⁶² 「特約路透電·北京電」，申報1913年10月12日，第一張第三版。

⁶³ 「特約路透電·北京電」，申報1913年10月12日，第一張第三版。

⁶⁴ 「袁總統之招讌」，1913年10月16日，《申報》第二版。

⁶⁵ 「11日北京電」，1913年10月12日，《新聞報》第一張第三版。

十一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大總統在府設茶會，邀請駐京各國公使、參贊到府與會，申謝此次各友邦一致承認中華民國之美意，並以聯絡感情。屆時外交團全體到者約三百人，大總統先於十二時邀各公使午膳，至茶會時，總統夫人及女公子先在儀鸞殿接待來賓，四時半大總統親臨，與各外賓握手，總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以及總統府之外交顧問均列席，茶點後由外交部人員導往遊覽三海名勝，主賓盡歡而散，可謂盛極一時。又聞外交部於十三日下午，邀請外交團瞻仰太和殿及社稷壇各處云。⁶⁶

10月13日之《大公報》則報導：

日昨下午，總統府宴會甚屬熱鬧，賓客自南門入，乘船經過一湖，中有一亭，即光緒帝被拘所也。登岸後即總統府，當時賓客進府，有袁總統夫人及中國女士數人接待。少間袁總統到，與各女士行握手禮，其府之周圍各處樂聲齊作，而預備之飲食品極佳，賓客食畢後，即緩步遊觀勝地，經過舊廳房涼亭等。是時煊耀之日光射於金屋頂之上，光爛奪目、景緻殊佳。賓客等均被款待、備極殷懃，令人心感。當時京城尚有他項宴會云。⁶⁷

以上四家報社之中，《新聞報》為申報主要競爭對象，特色為新聞快速、消息靈通、多報導少評論，聘請大量特約記者擴大新聞來源；⁶⁸《申報》駐北京記者即為黃遠生，讀者主要為學界人士，對於

⁶⁶ 「大總統歡譙外交團之盛會」，1913年10月18日，《新聞報》第-二版第一張。

⁶⁷ 「北京電」，1913年10月13日，《大公報》第4015號，第2版。

⁶⁸ 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頁32。

有價值的新聞報導與時事通訊極為重視；⁶⁹《大公報》訴求讀者為一般民眾，報導訴求為開民智，令知識水準普遍不高的民眾能藉由白話文獲取知識；⁷⁰《順天時報》則為日本外務省在華宣傳之機關報，⁷¹四份報紙各有立場、互不隸屬，雖會互相引用，但會在報導中註明引用來源，且各有其消息來源管道。

報導內容交叉比對之後可以發現，《順天時報》、《路透社》、《申報》同於10月11日收到、或編輯完成新聞稿，且其來源各不相同。

《順天時報》與《路透社》報導內容最為詳盡，但存在相當差異，前者詳列時間、地點、參加人員、接待人員、袁世凱到場時間、到場後宴會互動、宴會氣氛、結束時間等。後者則描述邀宴大略時間、入府路線、袁總統夫人接待、袁世凱到場與賓客互動、茶會後至府內各處遊覽等較為表面之內容。《申報》黃遠生專電則僅記載時間與參加者，別無其他。

儀鑾殿原座落於西海中段，南臨豐澤園、北臨紫光閣，為中式宮殿建築，八國聯軍時曾為聯軍統帥瓦德西駐地，燒毀之後在其廢墟上重建海晏堂，改為西式建築，另在海晏堂西北方新建儀鑾殿。民國初年，儀鑾殿改為懷仁堂，海晏堂則改名為居仁堂。⁷²據袁世凱三女袁靜雪之回憶，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原在南京的臨時大總統

⁶⁹ 馬建標，〈黃遠生的身份選擇與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態〉，《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頁107-108。

⁷⁰ 侯杰、肖冰，〈英斂之與近代開民智〉，《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總第159號，頁48。

⁷¹ 〈20世紀在華日本報人與中日關係——以《順天時報》為中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總第96期，頁37。

⁷² 林克光，〈從儀鑾殿到居仁堂〉，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編，《近代京華史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34-46。

府移設於北京石大人胡同的前清迎賓館，⁷³國務院則設於鐵獅子胡同的前清陸軍部，⁷⁴但因迎賓館不敷使用，因此遷移傳聞始終不斷。袁世凱於 6 月 29 日提名陸徵祥為國務總理、次日獲得參議院通過，因陸徵祥借住迎賓館，總統府乃先於 1912 年 7 月 1 日開始暫時遷移至陸軍部，與國務院合併使用，⁷⁵隨後確定移設於中南海，並在 1913 年 4 月 6 日遷移完成。⁷⁶遷入中南海之後，總統府設於居仁堂，一樓為辦公處所，二樓為家眷居處，每逢陽曆新年則在懷仁堂招待外賓，⁷⁷其他時間接待外賓也多在懷仁堂。而袁世凱大夫人于氏為傳統女性，不諳接見外賓儀節，曾有一次新年宴會上因拒絕外賓之握手禮而惹怒袁世凱，此後凡是接待外賓場合，袁世凱均派遣較年長之子女陪同協助于氏，以免于氏再做出失禮行為。⁷⁸

袁靜雪的回憶內容未必全然屬實，例如提到袁世凱因害怕再遭遇暗殺，自搬進中南海之後沒有再出過新華門一步，「活著進的新華門，直到死後才被抬著出了這個門」，⁷⁹即明顯與事實不符。但在陪同于氏接見賓客部分則並無問題。在就職典禮之前，袁世凱唯一一次邀請各國公使參加新年宴會為 1913 年 1 月 5 日，則于氏惹怒袁世凱之不合宜行為必然發生在該次茶會上，此後則均由年長子女陪同接見，順天時報報導中的宴會地點在懷仁堂、總統大夫人于氏由袁

⁷³ 「總統府防範之嚴密」，1912 年 5 月 27 日，《大公報》第 3523 號，第 3 版。

⁷⁴ 「組織臨時政府最近聞」，1912 年 3 月 20 日，《申報》1912 年 3 月 20 日，第二版。

⁷⁵ 「大總統實行遷府之關係」，1912 年 7 月 4 日，《大公報》第 3561 號，第 2 版。

⁷⁶ 「總統府遷移後之國務會議」，1913 年 4 月 8 日，《大公報》第 3827 號，第 2 版。

⁷⁷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收入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 20-21。袁靜雪生於 1899 年，本文於 1963 年撰寫完成。

⁷⁸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收入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頁 34-35。

⁷⁹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收入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頁 20。

世凱較年長子女陪同接待賓客等細節，與袁靜雪回憶內容相符。路透社記者顯然不知宴會地點為懷仁堂，僅知為一大亭，不知何人獲邀參加、亦不知陪同總統大夫人于氏接待外賓者為其子女，甚至稱賓客入場後袁世凱「旋亦」到場，可知路透社之新聞來源為接獲通知到場採訪的記者，到場時間甚晚，因此不知詳情，順天時報之報導內容應直接來自於日本公使館人員，數日後申報乃不得不以順天時報內容為本進行追蹤報導。至於黃遠生發回《申報》的新聞稿內容極為簡短，並未提及宴會細節，原因在於僅邀請外國新聞記者，黃遠生並未獲邀參加，但至少黃遠生已知參加者有大總統、國務員、議長、各國公使。《大公報》報導內容與申報、順天時報頗為雷同，因記者亦未獲邀參加，應為參考兩報之後所編寫之新聞。

《新聞報》於 18 日之追蹤報導頗值得注意。該報導未註明引述來源，當為報社記者自行採訪所得，與路透社及順天時報新聞相異之處，在於報導 10 月 11 日中午袁世凱先宴請各國公使，下午再召開茶話會，以及外交部總、次長及總統府外交顧問均與會等。然而，順天時報已經報導中外文武大員均應邀參加，新聞報所提人員出席宴會也在情理之中。至於中午先宴請各國公使一節，無論順天時報、路透社、黃遠生所得消息，總統府園遊會開始時間均為下午兩點，且均未提及袁世凱曾在園遊會之前邀各國公使午宴，可暫存而不論。

10 月 11 日在大總統府舉辦之園遊會，由袁世凱大夫人于氏出面邀請，性質上仍屬國宴，除仍在病假中的國務總理熊希齡、以及尚未抵達北京的工商總長張謇兩人之外，⁸⁰國務員理應全數出席，但未

⁸⁰ 張謇於 10 月 17 日始抵達北京，參見「張謇君到京矣」，1913 年 10 月 18 日，《順天時報》第 3560 號，第九版。

出現在合照中的，除外交總長孫寶琦，尚有以及交通總長周自齊。據報載，周自齊於 10 月 1 日抵達北京，⁸¹此後直到 10 月底，都沒有離開北京的紀錄，兩人沒有出現在合照中，原因尚待研究。至於已辭職的前外交總長陸徵祥入鏡原因，筆者認為除前一日擔任總統就職典禮大禮官，以及久歷外交、與各國公使關係良好之外，袁世凱刻意拉攏，希望陸徵祥繼續留在身邊，蓋當時陸徵祥被歸類為袁黨，不論 1912 年任國務總理、1913 年任外交總長時，在議院均受國民黨議員抵制，因而在 1913 年 9 月兼辭一切官職，甚至傳出欲舉家搬遷國外消息，袁世凱或欲藉此彰顯其地位與表示器重之意。此外，陸徵祥、孫寶琦兩人在 10 月 10 日閱兵典禮結束後合照，但陸徵祥未赴當晚外交部舉辦之大型宴會，孫寶琦則未在 10 月 11 日總統府宴會中參加合照，兩事是否有所關連，頗耐人尋味。至於外交部參事唐在復，入鏡原因當為外交總長法語秘書身份，但實情仍待發掘進一步史料加以驗證。

陸、攝影師

至於攝影師部分，L'Illustration 雜誌註明照片 B 之攝影者為「FU SHENG」。清末北京已經出現專業攝影工作室，FU SHENG 即為其中之一，該工作室所屬攝影師曾因企圖違法拍攝慈禧太后葬禮過程而被逮捕。⁸²按慈禧太后梓宮於宣統元年 9 月 27 日由紫禁城起行，十月初一日上午即將抵達普陀峪定東陵時，發生官差在文武百官眾目睽睽之下，於隆恩門內拍攝陵寢事件；初 3 日焚化冠服時，直隸

⁸¹ 據順天時報記載，周自齊於 9 月 30 日抵達北京，「行程日表」，1913 年 10 月 1 日，《順天時報》第 3544 號，第 9 版

⁸² Claire Roberts, *Photography and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pp. 57.

總督端方乘坐綠呢大轎，在衛隊前後擁護下衝撞神路；當日上午梓宮自隆恩殿奉移至寶城前時，在寶城山上東北角處拍照之四人當場被捕，供稱為端方所派遣。⁸³ 10月初4日舉行奉安典禮後，⁸⁴農工商部左丞李國杰於初8日即具本參奏直隸總督端方，除違法拍照、衝撞神路兩罪之外，另指端方在陵寢風水牆內借用行樹為電線桿，⁸⁵朝廷交部議處，端方因此被革職。⁸⁶而據大公報查證結果，該照相館乃位於天津東馬路之福陞照相館，攝影師亦非端方所派，乃該館買通總督衙門中負責管理德律風之劉壽山隨同前往。⁸⁷事後，劉壽山以及攝影師尹紹耕、尹滄田兄弟均先發交三河縣枷號兩個月，期滿後尹姓兄弟再各罰充苦力十年，劉壽山則永遠監禁。⁸⁸因此，負責拍攝袁世凱就職典禮之攝影師，應為福陞照相館所屬，至於是否為尹紹耕兄弟所拍攝、或另有其人，則尚待進一步查證。

柒、結論

自19世紀照相技術發明以後，照片成為除文字之外，記錄歷史的重要工具之一，一張照片往往能發揮比成篇累牘文字史料更重要的作用，令枯燥無味的歷史能以更生動、更鮮明的印象呈現於世人眼前。然而大多數歷史照片均無文字加以說明，也沒有經過分門別

⁸³ 「孝欽顯皇后梓宮奉移日記」，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二期，頁393。

⁸⁴ 「京師近事」，宣統元年十月初八日，《申報》第一張第五版。

⁸⁵ 「宣統元年十月大事記」，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第6年第12期，頁437。

⁸⁶ 「內閣奉上諭」，宣統元年十月十一日，收入《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三十五冊（宣統元年），頁429下至430上。

⁸⁷ 「照相者誰」，宣統元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第2641號，第6版。

⁸⁸ 「禁地照相案定罪」，宣統元年10月21日，《順天時報》第2337號，第7版。

類妥善保管，即便研究者或典藏機構能順利取得，也往往難以清楚確認其內容。

本文以南京二檔館所收藏之「袁世凱與外國使節」照片為例進行研究，比對官方檔案、報刊雜誌、相關人士回憶錄、其他歷史照片等史料之後，可以確定攝影者為天津福陞照相館所屬攝影師，拍攝時間並非 1913 年 10 月 10 日舉行就職典禮之後，而是次日下午 4 點半，袁世凱自居仁堂抵達懷仁堂抵達之後，但確實時間仍無法得知；拍攝地點可確定在中南海，但因文字史料缺乏，且中南海除 1928-1945 年間曾短期做為公園對外開放之外，自清代迄今長期為政府佔用，流傳在外照片不多，需進一步比對其他歷史照片之後，才有可能確定。

歷史照片除本身可能因收藏者有意或無意產生之編輯錯誤之外，該照片相關人士遺留之一手史料也未必能盡信，甚至當時之新聞報導也未必完全正確。以本文為例，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及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總統府安排外交團覲見合影，但並無此事，合影者僅為美國代表團；曹汝霖在回憶錄中提及承認民國之後安排外交團覲見、呈遞國書、隨後攝影，描述生動，卻是將發生在不同時間的記個相似事件結合為一，因此進行考證相當曠日廢時，或許因此導致引用者多、考證者少。萬一解讀者一時不慎而發生錯誤，旁人不察、輾轉引用，導致錯誤的資訊隨著歷史照片流傳，不僅無助於歷史研究，甚且導致對歷史的認知錯誤。本文為歷史照片考證之初步嘗試，疏漏在所難免，期望能藉此拋磚引玉，令歷史照片的考證工作能更為人所重視，讓更多歷史照片能發揮其應有價值。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未刊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外交部檔案》。

已刊檔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廣西省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三十五冊（宣統元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理編輯，《政府公報》（上海，上海書店，1988）。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袁世凱奏摺專輯》（台北：廣文書局，1970）。

史籍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58冊，德宗實錄（七）。

史料彙編

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台北：國史館，1990）。

報紙

《順天時報》

《申報》

《時報》

《新聞報》

《大公報》

《京華新報》

雜誌

《東方雜誌》

傳記、回憶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第一分冊，頁 132-133。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羅光，《陸徵祥傳》（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專書

（英）帕特南·威爾（Putnam Weale）著、秦傳安譯，《亂世袁世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編，《近代京華史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萬仁元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期刊論文

侯杰、肖冰，〈英斂之與近代開民智〉，《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總第159號，頁48。

馬建標，〈黃遠生的身份選擇與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態〉，《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頁107-108。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頁183。

劉愛君，〈20世紀在華日本報人與中日關係——以《順天時報》為中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總第96期，頁37。

外文資料：

已刊檔案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o Congress December 2, 1913(191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

雜誌

L'Illustration, No. 3690, 15 Novembre 1913.

專書

Claire Roberts, *Photography and China*, London : Reaktion Books, 2013.



1937年美國《時代》雜誌對中國的報導

吳昆財*

摘 要

安危他日終須一仗。1937年7月，在世人的驚訝之下，所中日之間發生的大戰，代表著中國人一場生死存亡的奮鬥史。為求其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不至於亡國滅種，於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團結所有的力量，爭取所有的支持，全民決定奮勇一搏。單單是上海淞滬之役，中國人就與兇猛的日軍奮戰超過百天以上，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誇辭大話。

究竟1937年中日戰爭之始，戰場的諸多變化為何，頗值得吾人探討。本文的研究主軸乃欲從著名的美國雜誌《時代》(The Time Magazine)，所留下的第一手戰地報導的文獻與史料，從而分析與探討這場影響中國人命運的戰爭，究竟如何推演。最後能得出一些真相，以供後人參酌與省思。

關鍵字：中日戰爭、《時代》雜誌 (The Time Magazine)、國聯、蔣介石、宋美齡

* 吳昆財，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

The report of The *Time* Magazine on China in 1937

Kun-tsai Wu^{*}

Abstract

There will be a battle in the end. In July 1937, under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world,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presented a history of strugg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not to perish the country, s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ang Kai-shek, unite all forces and strive for all support, the whole people decided to fight hard. I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and Shanghai alone, the Chinese fought against the ferocious Japanese army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days, smashing the rhetoric that the Japanese army died in March.

After a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what are the many changes on the battlefield? It is worth discussing. The main axis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first-hand field reports left by the famous American magazine *The Time* Magazine, so a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how this war affecting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people can be derived. Finally, some truths can be draw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consider and reflect on.

Keywords : Sino-Japanese War, The Time Magazine, League of Nations, Chiang Kai-shek, Song Meil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1937年「七七事變」一發生，立即震驚中外，引起世人的矚目，國際社會無論是外交、軍事乃至輿論與媒體，紛紛投注高度的關注。在當時的中外輿論界，對於中日雙方的戰爭與中國戰場的報導，投入最多心力，並且可謂達到巨細靡遺者，吾人可舉《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最具代表性。

究竟當1937年，蘆溝橋事變一起，《時代》如何報導與評論這場影響人類現代史的戰爭，乃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課題。本文試圖從《時代》在1937年全年裡，每期中有關中日戰事的報導，從而歸納與分析出包括：中日戰場的對峙、中日兩國內部政治發展、國際外交、羅斯福政府的態度，甚至是從量與質之中，論述《時代》本身對中日戰爭的立場等層次，探討《時代》究竟如何參與投身於這場中日的世紀大戰。

貳、《時代》對中國的報導——1937年1月至7月

分析《時代》在1937年對中國的報導，可以分為二個階段，即以七七事變為分野。這一年共有35篇有關中國的文章，其中上半年即1月4日至4月19日為止，共有10篇。這篇文章裡，主要的集中在西安事變、中國禁烟問題，以及中蘇關係等幾個重點上。

一、西安事變

由於西安事變發生於1936年12月，所以延續這項影響國共關係的議題，在中日大戰之前，仍為《時代》所極度關注。

1937年1月4日，《時代》首篇文章即報導震驚中外，發生在中

國的西安事變。文章一開頭的標題，即形容這次對中國獨裁者是一次不成功的綁架事件（unkidnapped）。而且《時代》以荒謬（preposterous），來形容這西安事變。之所以以荒謬一詞論述西安事件，主要有三，其一，是事件的主要綁架者（kidnapper），乃是由一位「吸毒者」（onetime dope fiend）——張學良，挾持了蔣介石委員長，將近 13 天，殺害了 46 位蔣的衛士，以及掉失了蔣的一副假牙。其二，荒謬的另一個原因是，當張學良閱讀了 1936 年蔣介石的 50,000 字私人日記後，深受感動，決定放棄綁架行動，親自護送蔣回南京。至此，《時代》認為種荒謬的背後，代表中國人的「面子」問題（face saving）。

其三，緊跟著面子問題而來的第三個荒謬是，則是還蔣如何回到南京？當他一抵達到國府首都，立即由主席林森和 20 萬民眾挾道歡迎蔣委員長的歸來。稍後二個小時，再接著跟隨張學良而來。回到南京後，蔣和張分別發表談話，張自責犯下大罪，不配與蔣一道回南京。與之同時，蔣介石也深切自我反省表示，由於個人領導無方，才導致西安事件的發生。但他絕無任何私心，阻礙國家的幸福，或者忽視革命的理想。若有，中國人民可以共擊之。為了釋疑，蔣介石特別強調，這次事件，他絕對沒有任何的承諾，以及簽下任何的文件，因為這等於是毀滅中華民族。

但《時代》對於這場在西安所發生的荒謬劇，仍直指乃是透過贖金方式解決的。數百萬贖金的來源，由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以政府之外的方式籌措解決。有了這筆贖金之後，張學良與楊虎城將綁架蔣介石，要求他立即進行抗日的初心，完全拋諸腦後。事件報導的結束，《時代》認為張學良將暫時帶著數百萬金錢，遠渡海外。之後，再回中國，成為蔣麾下之一軍。事件快樂的結局，《時代》引用了滴

酒不沾「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話語，他要乾杯祝賀委員長的歸來。¹

至於，審判張學良也是一場政治大戲。此時的西安事件究竟真相為何，傳言四起。不少直指是蔣介石與張學良兩人的私人恩怨。受審時，張學良大聲要求嚴懲他自己。最後的結果是判處張 10 年徒刑，褫奪公權 5 年。審判結束後，張學良被帶往孔祥熙的住所，等待晉見蔣介石。四天後，國府通知張學良被免除其刑，恢復公民權，並取得自由。

《時代》分析，西安事件當時，對於如何解決危機，國府的確存在不同的意見。主流派主張立即派遣軍機轟炸西安事變附近 70 多公里的渭南，以懲罰叛軍。可是當時國府的顧問端納（William H. Donald），卻極力反對轟炸，他認為如此一來，只會傷害到蔣介石。同時，也有消息指出，西安已有 400 名涉及事變者遭到處決，國府和中共周恩來進行談判。這項談判源自於當時社會，已經普遍認知到與日本之戰，勢不可避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沒有中共和蘇聯的支持，抗日是不可能獲勝的。為此，有人預測國府將會進行改組，納入共產黨的意見和激進派人士。

不過，此時日本方面雖然對中國情勢極度不安，但他們研判，蔣介石不會突然翻轉反共的態度，和中共與蘇聯合作。日本也不相信莫斯科對於多年來強烈反共的蔣介石，會給予援助。²

《時代》對西安事變的主角蔣介石和張學良依舊關注。蔣仍在隱居休養之中。張雖然獲得自由，不過卻是受到嚴密的保護當中。傳言西安已由中共軍隊佔領。而日本也非常擔心，由於奇妙的西安事

¹ *Time*, January 4, 1937, V. 29 (part I), pp. 18-19.

² *Time*, January 11, 1937, V. 29 (part I), pp. 23-24.

變，會造成蔣介石的中國和史達林的蘇聯，合作對日作戰。³

至於，國內政治問題，《時代》報導，休養中的蔣介石，終於選擇和張學良在浙江奉化見面，此舉從而提振了中國領導權力的道德和政治士氣。甚至也讓整個南京政府能夠覺醒，從而和「有力的中國共軍（*potent Chinese Communist armies*）」合作，共同抗日。對於西安的觀察，《時代》這時也發現，西安仍處於危險不安之地。一方面，國府仍持續以金錢賄賂楊虎城，試圖對西安事變進行善後工作，解救在西安的政府人員，返回南京。另外，為了營救在中共手上的美國 21 名人質，美國派出了大使館外交官派克（*Wilys R. Peck*），前往西安與中共、楊虎城談判。最後，得到楊虎城保證，由陸路與空中釋放這些人質。⁴

西安事變後，西安依然不安。《時代》發現不少東北軍等主戰的少壯派，殺害了主和派的王以哲、蔣斌、徐方和宋學禮等人。面對這一危機，國府採取兩個策略，一方面，國府準備以金錢，賄賂收買楊虎城。另一方面，國府又派出顧祝同率領，擁有最新德式裝備的部隊，前往西安。當顧祝同進入西安後，隨即嚴格要求所有部隊必須保持和平，因為這不是以武力佔領的，並且必須忘掉西安事變之事。

根據地理位置所顯示，位於中共的紅色地區和蘇聯之間，有三個重要區域：1.日本佔領的東北；2.日本影響的華北地區，以及 3.德王統治下蒙古地區。尤其德王又同時接受日本與中國的賄賂，左右逢源，但德王卻顯然又具反共思想的。如此一來，中國勢將陷入道德危機之中，因此，在歷史上，東亞的命運可能將轉向到紅色地區上。

³ *Time*, January 18, 1937, V. 29 (part I), p. 22.

⁴ *Time*, January 25, 1937, V. 29 (part I), p. 21.

3月1日,《時代》為文報導中國「最寬廣的民主人士」(Widest Democrats)。該文介紹對於中國國內的民主與政治發展,它從三個角度分析,首先是報導西安事變的後續發展,張學良的妻子于鳳至從海外歸來,同時,也指出蔣介石為了釋疑國府官員對西安事變的質疑,於是出版《西安事變記》,證明自己沒有把中國出賣給日本。自己的行為,配得起是一位勇敢與真實的中國人。⁶

3月22日,《時代》發現,在西安事變後,宋美齡竟然顧用了曾經替張學良飛機駕的巴爾(Julius Barr),做為她的飛機駕駛員。⁷《時代》形容宋美齡的這種舉動,猶如著名飛行家林白之妻(Mrs. Charles Lindberg)因為聘用了霍普特曼(Bruno Richard Hauptmann),最後造成了1932年在美國轟動一時林白之子事件。而這時,有消息傳出宋美齡正準備飛往美國,向基督教女子團體,解釋她那位屬於衛理教派丈夫,也是中國獨裁者所面對的困境。⁸

二、中國禁烟問題

這個時期,《時代》除了報導西安事變外,也非常關心中國的禁烟問題。這或許是與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吸食鴉片有關。在1月11日,《時代》對於中國政治和鴉片的互動關係,進行了分析報導。這篇文章主要是把西安事變和鴉片相互連結,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⁵ *Time*, February 15, 1937, V. 29 (part I), pp. 26-27.

⁶ *Time*, March 1, 1937, V. 29 (part I), p. 21.

⁷ 巴爾曾是陳納德將軍在華飛虎隊的一員。見, Jack Samson, *Flying Tiger: The True Story of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U.S. 14th Air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p. 30.

⁸ *Time*, March 22, 1937, V. 29 (part I), p. 24.

論點。內文指出，目前，列強主要有英國、日本和挪威進行對中國的鴉片走私。同時，國府軍事委員會每個月可以取得 3500000 元的鴉片特許權利金。但是活鋒一轉此時的中國社會卻強烈的認為，造成西安事件的主因，乃是邪惡的烟毒所致。所以，如何面對這場亞洲歷史上最為令人恐慌的戰役，國府決定雷厲風行進行肅烟工作。從年初以來，單單北平一地就處決了 100000 名烟毒犯，並且有 5000 名是公開行刑。雖然地方政府這種集體處決的方式引起國際社會的側目，但是南京國府就是要藉此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⁹

1 月 18 日，《時代》報導了「基督將軍」馮玉祥，對於國府處理烟毒問題的不滿情緒。他要求南京政府應該徹底執行禁絕烟毒的政策，而不應只是敷衍而已。為了強調禁毒的可行性。馮玉祥特別指出，他有一位毒癮長達 40 年之久的表親，在 62 歲時最後治癒了。所以他認為其他人如何有決心，也可以成功的。

原本對於禁烟採取敷衍態度的國府官員，經由馮玉祥憤怒地，公開地的譴責後，迫使官方必須有所回應。為此，在北平，政府逮捕了一位名為陸居新的販毒者。接著由北平市長宋哲元，親自下令公開處決。在萬名群眾目睹和重重警衛的捍衛下，陸居新遭到當場以子彈貫穿頭部，一槍斃命。

1 月 25 日，《時代》報導了中國內部紛亂的情勢。在粵漢鐵路上，發生了火車大火，超過百名乘客死亡。在北平和上海，中國政府依然強力想清除烟毒對國家的傷害。為此，北平在 5 萬群眾面前，公開處決 5 名販毒者。這種執法行動甚至驚動了美方，由華府親自證實。為此，國府官員辯稱，中國花費太多時間和罰金，來治療烟毒

⁹ *Time*, January 11, 1937, V. 29 (part I), pp. 23-24.

之害，中國只有一個希望，就是要拯救國家免於毒害而已。

4 月 19 日，《時代》又對於禁烟議題上進行分析。《時代》記載了 40 位歐美的訪客，在北平天壇親眼目睹了國民政府處決 6 名販毒者。直接用槍，每次間隔 15 秒，朝罪犯頭部行刑。原本，這些歐美訪客還對公開處決中國烟毒犯的景像，大開玩笑時。不過，當行刑之際，他們卻臉色慘白，急忙爬進車子離開現場。¹⁰

三、中國外交與內政問題

除了西安事變與禁烟問題，在這一階段裡，《時代》對於國府的內政與外交議題，同樣也展現了高度的關注。

2 月 15 日，《時代》為文報導中國政局與中、日、蘇關係。該文一開始即預言 1937 年中日即將發生「大戰」(The Big War)。因為日本新任首相林敬三，乃是 1931 年入侵東北的日軍將領，並廣為中國人所熟知與憎恨。林敬三的任命儼然已為稍後的中日大戰埋下了伏筆。除了日本外，文章也探討了中共過去五年來的發展。它認為經由 1931 年從蘇區建立，再到 1934 年的「竄逃」(driven)或者「前進」(advanced)後，迄今它已發展出約有八萬平方哩的「紅色地區」(Red State)，這個紅色地區約等於成吉思汗的發源地。其政權乃是由中共的將領、宣傳家和政治人物所組成。由於延安地區距離南京非常遙遠，所以給了他們喘息的機會，得使吸納更多的農民。加上因為西安事變後，不少東北軍投入中共陣營。

其次，有趣的是，《時代》分析，1925 年孫中山的去世，對國民黨可謂是有益的 (advantaged the Kuomintang)，因為孫是一位不切實

¹⁰ *Time*, April 19, 1937, V. 29 (part II), p. 24.

際的空想家 (unpractical visionary)。孫的去世正好給了務實的蔣介石崛起的機會，可以把孫的政治理想高懸掛起來。

最後，蔣再務實考量如何面對局勢的發展，於是他決定在 1927 年開始清黨，接著在 1937 年時，他又思考如何與蘇聯結束對峙的態勢，共同對付日本。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於是在西安事變，國府也積極展開與進行中共談判。一方面，也是此時，蘇聯把共產主義和民主，視為一體。而將法西斯主義打成對立面。中共更宣傳成，現在是：「民主對抗法西斯」，而不是「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為此，《時代》判斷，蔣介石會在十年之後，首次走向蘇聯，以便向「寬廣的民主」靠攏。質言之，《時代》判斷，蔣介石已準備變對蘇聯的外交策略，以及包容中共等民主派人士，以便團結所有力量，共同對付日本的侵略。¹¹

3 月 29 日，《時代》出刊了一篇有關蒙古的文章，內容是介紹蒙古內部的政治發展。《時代》發現蒙古似乎已經成為另一個類似滿洲國，亦即是蒙古國。在這塊綏遠與東北之間的土地，乃是由德王所治理的蒙古，它已經擁有自己的坦克和飛機，飛機上不少是塗有日本的太陽旗，另外也有自己的國旗：藍底加上左上方紅藍白的橫條。此時，德王已經擁有萬名由蒙古人和滿洲人組成的軍隊，也如同滿洲國類似，均由日本人作為顧問。更人訝異的是，《時代》發現，這個建立於察哈爾省，並由日本人在背後所操弄的自治國家，幾個月來，國際社會竟然無人知道它已是一個新的，而且是事實上存在的國家。唯一著急的是，唯有駐紮在察哈爾鄰省的傅作義將軍，他可是驚慌

¹¹ *Time*, March 1, 1937, V. 29 (part I), p. 21. 此外，本期也介紹了日本的傀儡國——滿洲國，他們如何處理遭暗殺的猶太裔音樂家，因為這位指揮家是支持蘇聯的。以及滿洲國究竟如何對待東北境內的「白軍」(White Guards)。

失措，準備動員反抗蒙古國。但在幕後操控的日本外務省，為了杜悠悠眾口，卻解釋說，蒙古人的軍隊只是想對付共產黨而已。不過，這一辯詞當然不能夠為人接受，因為察哈爾距離中共根據地，有八百公里之遙，中間又隔著反共分子傳作義的綏遠省。¹²

4月19日，《時代》對於中國的共產黨議題上進行分析。《時代》發現，中國對於學術的尊敬，舉世無出其右。但是幾乎當時的中國，無人相信共產黨是尊敬學術。所以，當南京政府邀請毛澤東出席清明節的祭黃帝大典時，也不期待他會派員參加。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最後竟然派出紅軍財政部長林伯渠與祭。¹³林伯渠也趁此出席的機會，譴責國府封鎖毛澤東在國內民眾受推崇的地位，同時也宣傳共產黨尊敬中國學術的事實。¹⁴

參、《時代》對中國的報導——1937年7月至12月

《時代》在第二階段有關中國的文章，可視為是對於中日戰爭全方位的報導與分析，從此至1945年戰爭結束，《時代》幾乎是每週一篇不間斷地把中日戰爭的故事，傳送至國際社會。簡言之，《時代》對於中國著墨之深，遍數當代同類型的媒體雜誌，無一能出其右。單單以1937年半下年為例，《時代》是每周一篇文本，從不斷稿，共計25篇文章。再觀其內容之廣，用力之深，更是驚人，包括中日戰場的分析、國際外交的折衝、中日兩國內政與財政的比較、國共關係的互動、甚至是日本在中國傀儡政權的建立、中國軍民士奮

¹² *Time*, March 29, 1937, V. 29 (part I), p. 22.

¹³ 《時代》形容林伯渠與祭的行動，就如同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Earl Browder）在美國國父華盛頓生日之時，派員致敬資本主義。見 *Time*, April 19, 1937, V. 29 (part I), p. 24.

¹⁴ *Time*, April 19, 1937, V. 29 (part II), p. 24.

力的抗戰、美國政府的態度，外國戰地記者對中國的同情與對日軍的質疑、甚至是《時代》對中日戰爭所持的自身立場等，都有詳細的報導與分析。所以，透過，《時代》旁觀者的角度所留下的文本，更能彰顯這場攸關現代東亞命運的戰爭，是如何開展的。

一、七七事變至上海淞滬會戰的報導

《時代》在第二階段的中國報導裡，雖然以中日戰爭為中心，但根據戰事的發展又可區分為二個時期，其中又以八月中旬，在上海所發生的淞滬戰役為分界線。

當 7 月 7 日七七事變爆發之際，中外媒體均無法研判究竟這是中日之間的短暫衝突，或將是持久的總體戰？當然這種疑惑，《時代》也是包括在內。所以，從中日雙方一對峙開始，《時代》乃將焦點放在這兩個國家的內部因應狀態，而不是戰場的描述，亦即雙方如何對這個意外事件所採取的對應方式。

（一）就中國備戰的分析

首先《時代》報導國府如何對外籌措財政支援。在 7 月 12 日，《時代》報導了國府財政部長孔祥熙訪問歐美之事。在這篇報導中，一方面，它分析孔祥熙與蔣介石、宋子文等中國政要的裙帶關係。同時也詮釋了孔祥熙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由於孔祥熙的地位穩固，所以國府派遣他，穿梭於歐美之間進行外貿工作，以圖建設中國。由於此時，中國的還債能力大大改善，所以孔祥熙在歐美各國頗受歡迎，尤其是德國的希特勒政府更視孔為座上賓。頒贈孔榮譽學位，更同意給予中國學生 10 萬馬克獎學金，以示拉攏之意。不過，孔祥熙卻表示中國要的不是外國貸款，而是商業貸款。

孔祥熙為了商業貸款之事，再從歐洲轉赴美國商談。在美國，孔

祥熙終於取得了他想要的貸款事項。經過一番協調後，中方的孔祥熙，和美方「美國進出口銀行」(U.S. Export-Import Bank) 董事長皮爾森 (Warren Lee Pierson)、銀行顧問委員會主席瓊斯 (Jesse Jones)，議定了一項商業貸款方式，亦即中美同意交易 20 部火車頭，和其相關設備，總價是 1500000 美元。並由美國的「包溫火車公司」(Baldwin Locomotive Works)，以及「美國火車販售公司」(American Locomotive Sales Corp)，負責販售給中國。並由這兩個公司負責給中國總價之一半的商業貸款。另一半的貸款則由進出口銀行負責。貸款則由中國政府和鐵道部見證，並由中國銀行作為保證人。¹⁵

接著，《時代》分析中國軍民士氣轉向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

雖然，7 月 19 日，距離七七事變已經 12 天，但究竟這場中日衝突，是否會轉變成中日大戰，《時代》似乎仍無法判斷。不過，它發現中方對日本的態度，和往昔大不相同。因為中國在盧溝橋事變後，乃由官方正式發佈新聞，指出事件仍是由日本首先開槍，最後造成 200 中國士兵的死亡。所以，中方要求日方正式道歉，懲罰負責的日本官員，並且要賠償中國的損失。與此同時，蔣介石並派出接受德式訓練的精銳的「蔣家軍」(Chiang's Own)，開赴北方。再加上，之前，國府已經改善了對蘇聯和中共之間的歧見，同時，社會上愛國人士紛紛大聲呼籲，並高舉「對日作戰」的大旗。所以《時代》研判，國府已做好和日本作戰的準備。

與此同時，《時代》發現東京對中方的反應，卻感到驚訝。因為多年來，日本已經習慣使用嚴酷的手段，最後總能逼使中國人屈從。可是這次七七事變，他們卻發現中國的態度已經強硬起來了，這迫

¹⁵ *Time*, July 12, 1937, V. 30(part I), pp. 66-68.

使日本也必須派遣滿洲國的正規軍支援北平。所以，《時代》認為華北似乎已經成為遠東問題的新風暴樞紐了。¹⁶也就是從這篇「颱風來臨」(“Fresh Typhoon”)後，《時代》每期均將中日對抗和中國的抗日戰爭，作為報導與分析的重點，從此蔣介石經常成為該雜誌的封面故事，在美國聲名大噪。¹⁷而連帶影響所及，在蔣身旁的人物亦紛紛躍上《時代》的故事，例如蔣的夫人宋美齡與蔣介石成為 1937 年的年度風雲人物。¹⁸陳誠將軍在 1941 年 6 月被做為封面故事，¹⁹宋子文在 1944 年也成為封面主角。²⁰

雖說中國軍民個個是義憤填膺，準備和日本一較高下。可是《時代》卻發現此時的中國似乎尚未準備好與日本作戰，內部指揮與軍事訓練是一團糟，德國與法國的槍托，無法與捷克、英國的槍枝配合。義大利訓練的飛行員，不會使用美國的飛機。日本與蘇聯訓練的軍官並不瞭解戰術與戰略的運用。也只有少數幾位將領能夠領導一個師以上的協同作戰。基於目前與日本作戰的不切實際，所以這位既不賣國也不愛國，但卻是務實的宋哲元選擇卑怯的，口頭向日方道歉。因此，《時代》判斷，這時在中國有長期經驗的外國人，若認為中國取得外幣，最後就會和日本在華北進行戰爭，這恐怕是錯誤的印象。

(二) 就日本備戰的分析

雖然日本駐華日軍突然挑起這場中日衝突，可是《時代》卻也發

¹⁶ *Time*, July 19, 1937, V. 30(part I), p. 20.

¹⁷ 李輝，《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 189。

¹⁸ *Time*, January 3, 1938, V. 31(part I), pp. 12-16.

¹⁹ *Time*, June 16, 1941, V. 37(part I), pp. 22-25.

²⁰ *Time*, December 18, 1944, V. 44(part I), pp. 36-40.

現此時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做好全面應戰的準備，導致其內部也充滿不少的矛盾。作為政府操盤手的首相近衛文麿，必須處理接連三次日本首相濱口雄幸、犬養毅等，遭到狂熱分子暗殺事件。同時，也要擔心國府蔣介石對於這次七七事變的態度，實在無法捉摸。而南京政府發言人指出，若有需要，蔣委員長會毫不猶豫指揮軍隊對抗日軍。且情報顯示，蔣軍已經朝北平方向移動。《時代》分析，除非中國人下定決心，以及蔣介石表現猶如凱撒般的態度，否則近衛政府最好的策略，仍將是在「榻榻米上辦公」(bedseat driving)。

此外，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中日衝突，日本裕仁天皇中止休假，返回東京。同時，近衛也召集了包括駐朝鮮和台灣總督在內的內閣會議。在會議上，日本第一次擔心中國有可能進行空軍的攻擊。同時，也由於無法預知在中國的局勢是否會加劇惡化，以及來自中國正在「非法的、殘暴的以及挑釁的行動」，所以日本決定在近五年來，首次派遣國內部隊，前往中國。面對這一緊張局勢，內閣也勸告台灣與朝鮮的總督，既然，中國空軍已經開始調動，你們這些地方首長就必須做好完全的準備，讓百姓們防禦空中的攻擊。

不過，面對這一緊張與暴戾之氣，近衛文麿卻仍然豪氣的指出，日本不只是一要維護華北的和平，也是為了東亞的和平。但究竟此時，中日兩國的軍力為何？《時代》分析，日本約有 1200 架一級戰機，中國有 400 架。此外，日本在自動化的戰力遠優於中國。7 千萬的日本人平常即義務性軍事訓練，但在中國並不存在這種兵役制度。而中國 2 百萬士兵，半數是不倫不類的。28 萬的日軍卻都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若要論中國所憑恃的是，唯有無限的人力與自然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時代》分析了近衛文麿的政治人格，和其對中國的態度。文章形容，近衛可謂是日本的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雖然天皇貴胄，乃是日本皇室五個家族出身，不過他

是一位具有「現代化觀念的貴族」(A Modern-Minded Noble)，更是一位自由派人士。²¹因幼時家貧，看盡人間冷暖，並養成了閱讀西歐極端主義文學的習慣。同時，近衛也在同屬貴族的西園寺公望的提拔下，崛起於日本政壇。

但做為一位自由派人士，不屬於日本的狂熱主義者，近衛雖然不想在華北大動干戈，可是他想要把日皇統治的祝福擴及到華北。為此，他思考如何面對華北局勢，於是東北的滿洲國，或許可以複製到華北，成為另一個「華北國」，這或許是可行之策。²²質言之，雖然近衛不認為日本能夠吞下整個中國，但卻可以咬下一口中國的櫻桃。近衛的如意算盤關鍵是蔣介石的態度，為此，蔣公開宣稱，中日目前的衝突，日本必須決定是否會演變成兩國的戰爭。而若是他允許失去一寸中國的土地，將如同一種對祖先不可原諒的攻擊，會讓自己感到罪惡感。²³

雖然東京政府的態度，非常驚訝和中國在華北所發生的戰鬥。不過，日本主流媒體卻過早地告訴民眾，華北情勢一片大好，日本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更甚於過往。日本政府發言人則斷然指出，華北的中國人會自動地採取與滿洲國相同的組織方法，日本當不能也不會「干涉中國內部事務」。日本近衛首相也對國會發表了一個直言不諱的演說，他指出，包括蔣介石在內許多國民政府要員都了解，日本的基本政策是想要國府和中國民族重回東方民族行列。因為，共產主義不屬於東方，中共只是暫時加入國府的戰鬥力量而已。國府與共

²¹ 文章中還提及近衛的長子近衛通隆，此時正就讀於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Time*, July 26, 1937, V. 30(part I), pp. 19-20.

²² 不過，本的少壯狂熱軍事分子卻主張，應該先打敗蘇俄的史達林，這個支持蔣介石的背後靠山，再來收拾中國。

²³ *Time*, July 26, 1937, V. 30(part I), pp. 19-20.

產主義共舞，只會為東方民族帶來麻煩，並且弱化了東方民族的力量。最後，近衛強烈訴求，國府能夠儘快覺醒，與同一種族的日本合作。日本不要領土只要合作。²⁴

總之，雖然中日在華北相互對峙，不過《時代》觀察到，一方面，中國人已經精神武裝起來，就算使用大刀也要擊退野蠻的敵人。可是另一方面，中日雙方仍如往昔，似乎彼此有所期待。中方的宋哲元將軍持續與日本的代表香月清司中將，進行談判。他們兩人都在等待來自南京政府的指令，究竟蔣介石會選擇派遣嫡系蔣軍，開往華北與日軍作戰。還是會讓河北與察哈爾成立另一個「華北國」，一個日本的傀儡國，《時代》認為都還是未定之數。

（三）美方政府與人民反應的報導

關於這個時期中日衝突，《時代》也有所注意。它報導了一美日外交事件，即當時有一位美國婦女雷諾普(Carol Lathrop)住在北平，因為太靠近日本防衛陣地，竟然遭日方哨兵踏到肚子。為此，美國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向日方強烈抗議，不過結果是徒勞無功。因為日方表示這不是暴力行為。話鋒一轉，《時代》認為此時，駐紮在華北的宋哲元部隊所遭受的等待，和雷諾普小姐是相同的。²⁵

《時代》也報導了有關在天津的美國居民，非常擔心中日戰鬥的加劇會影響到他們的安危，所以他們紛紛帶上美國國旗，以確保身家安全。尤其最好是能貼上「日本製」的國旗更為妥當。(為此，每面小小的星條旗，上揚1至3美元，這是天津苦力的一周薪水)

此外，這時羅斯福總統在中國海域上苦無對策，所以美國政府

²⁴ *Time*, August 9, 1937, V. 30(part I), p. 20.

²⁵ *Time*, August 2, 1937, V. 30(part I), p. 20.

訓令海軍艦艇立刻從中日衝突的天津地區，撤退至蘇聯的海參崴，以及煙台。這時日本政府也非常擔心美國政府是否會啟動《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對付交戰的中日雙方。²⁶

(四) 對於傀儡政府的報導

有關於日本試圖在侵略中國時，除了軍事佔領外，另也採取以華制華，建立傀儡政府始終也是《時代》所關注的議題。所以在中日戰爭剛發生之際，它也對此時有著墨。首先是華北的中日衝突，涉及到日本在背後支持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委員長」殷汝耕。《時代》分析這位日本的傀儡，在日方提供的武器下，所組成的一支數千名「保安隊」，突然使用日方的軍方，發起通州事件，對抗日軍。²⁷殷汝耕自己的「保安隊」，竟然發動了通州事件，這意味一則它趁日軍後防空虛時，攻擊日軍堡壘，殺死了不少的日人，因而觸怒了日方。再則，在這場突襲中，中方謠傳殷汝耕遭到謀殺，或者是失蹤。不過，日方卻指出殷汝耕是安全躲藏了。²⁸

不過，此時，華北的政局也令蔣感到棘手之處，即宋哲元將軍把華北政務交給在日本政府眼中屬於「忠誠」的張自忠將軍。為此，特地奉派前來華北的日軍今井武夫上校表示，華北非常愉悅！沒有一位中國軍人留在北平。日本通訊社甚至強調，進入日軍特別任務的中國政治人物，在日本人的協助下，將成立另一「國」。

²⁶ 不過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分析，此時美國不會執行中立法案。見 *Time*, August 9, 1937, V. 30(part I), p. 19.

²⁷ 有趣的是《時代》以一張殷汝耕牙齒外露的照片，搭配內文指出，牙齒外露的殷汝耕大部分時間，都像隻吃驚的兔子。殷這位中國人，也是日本的女婿，更是在一夜之間，在日本的刺刀之下，把自己塑造成將軍。見 *Time*, August 9, 1937, V. 30(part I), p. 20.

²⁸ 即便殷汝耕在通州事件中垮台了，日方在華司令香月清司仍然又試圖找了池宗墨來替代殷汝耕。見 *Time*, August 9, 1937, V. 30(part I), p. 20.

二、八一三淞滬會戰至 1937 年底的報導

在 8 月 16 日，中日在上海發生「八一三」淞滬會戰，同時間，日方在華北駐紮了 45000 名士兵，對抗 115000 名國軍。至此，《時代》認為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戰爭，已經是毫無任何懸念了，兩國都將毫不猶豫的進行戰鬥。吾人發現《時代》對於中國戰場的重視，可從兩個方面觀察，其一，淞滬戰役之後的 8 月 16 日至該年底的周刊新聞裡，把中國戰場列為該期國際新聞的頭題，共 20 期中即出現 14 期，另有 4 期則列為二題。其二，《時代》更以大篇幅的圖文，巨細靡遺地介紹戰況。

關於中日大戰的前半年，《時代》對於戰事的報導與分析，大約可從雙方軍事對戰、兩國各自內政問題、國際關係與國聯會議、美方態度，以及《時代》的媒體立場等，幾個面向切入。

（一）就雙方的戰場對峙而言

就戰爭的前半年而論，主要戰場集中在華北、上海兩個地點，尤其是上海，由於是戰爭之初的主戰場，加上上海又是當時所有國際媒體的聚集處。兩重優勢下，亦成為《時代》進行戰地報導的首選，為文甚深。

1. 淞滬戰役

20 世紀初，上海除了是中國的金融重鎮外，同時也是中國對外的媒體中心，尤其是 1937 年中日戰爭更是中國對外傳達資訊的櫥窗，這一點《時代》知之甚深。在名為「4:27」的文章裡，它指出，百分之九十的中國新聞由上海傳播到全世界，而百分之九十的新聞記者，又必須集中在外灘國際租借地的三家飯店裡，收發相關的中國新聞。

同時也由於無法戰事未明，各國記者均不能親赴戰地採訪，所以《時代》發現，記者圈只能取得無法證實的謠言。²⁹

在這些傳言裡，倒是有一件事即為記者們親眼目睹，即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出雲號》，它的防空電池突然之間墜毀了。而時間正好停在下午 4 點 27 分(註：1937 年 8 月 14 日)。接著立即是一陣炸彈聲和尖叫聲，粉碎了記者所在飯店的窗戶和杯子。《時代》記載了當時美聯社記者莫里斯 (John R. Morris) 的描述，在皇宮國泰飯店裡，他看到旅客在地上匍匐前進，尋找安全的空間。從飯店裡的窗口，望見至少 50 人的人行道上扭動著，另有三個外國人從中國人的死屍上爬行。尤有甚者，莫里斯瞧見一位白種婦女蹲在路旁，協助她的女兒生產。而這時，死亡的冰雹卻從天而降。救護人員在街上，從淌血的軀體中，尋找可能有救的存活者。

另外，《時代》還觀察到在法國租借區「大世界」(Great World) 的難民營裡，一顆炸彈竟然炸死了 450 人，並導致 800 人受傷。此外，包括美國傳教士羅林森博士(Dr. Frank J. Rawlinson)等三位外國人，也在街上遇害。來華進行暑期旅遊的普林斯頓大學講師 (Dr. Robert K. Reiscauer)，也在皇宮飯店被炸斷腿，並於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

就在不少外國人在租借區遇害，引發了此時正在上海的美國前總統老羅斯福長媳小羅斯福太太 (Mrs. Theodore Roosevelt Jr.)，立即向宋美齡提出抗議。為此，宋美齡回答，駕駛兩架諾斯諾普(Northrop)

²⁹ 這三家飯店包括：皇宮與國泰 (Palace and Cathay)、花園大橋飯店(Garden Bridge)以及浦江(Astor House)。Time, August 23, 1937, V. 30(part I), p. 19.這些傳言包括：9000 日本正規部隊已經進駐距離上海 30 公里處的吳淞。國軍已有 30000 精銳部隊進入上海。曾在 1932 年防衛上海的十九軍蔡廷鍇部隊，也已經到達上海。這些傳言不一而足。

飛機的兩位中國飛行機員已經受傷，且此刻正躺在上海醫院。飛機上的炸彈乃因遭到地面防空射擊，導致炸彈架損壞，炸彈落到租借區，才造成地面人員的傷亡，中國絕不會故意轟炸租借區。

目睹中日大戰一發不可收拾，基於安全的考慮，美、英、法政府與白俄流亡者，紛紛派遣部隊進駐上海，以便防禦租借地。話雖如此，中日雙方在上海的熱戰持續著發生，據統計短短幾天有 3500 人遇害，10500 人受傷。為此，美國已經準備把 2000 名美國人。³⁰

至此，《時代》發現，經過上海淞滬對戰之後，不但國府沒有對日宣戰，日方除了從南京撤出日僑外，東京政府為了不引起國際社會的側目，也沒有任何一位官員正式宣戰。質言之，這個階段的中日關係，是戰而不宣。

《時代》觀察到，總的來說，對於軍方之中的極端主義者，數年來因控制朝中大政，並可能造成國家走向破產邊緣，日本海軍是抱持著保守的態度。此外，憂心忡忡的日本商人，也寄希望於海軍，能調和日軍對中國的好戰策略。在促成日本政府處分激進少壯分子謀殺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海軍私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其實早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中，海軍雖也執行任務，但表現卻是不冷不熱。不過在八一三淞滬之役之後，日本海軍則是自從一次大戰以來，投入了最大的兵力，這可謂是單獨對戰中國。而日本陸軍則選擇把軍力向北調動，集中到北平，以對抗國軍傅作義部隊。

以日本海軍為主的戰鬥部隊，在長江口與黃浦江佈署了超過 50 艘的戰艦，這包括：4 艘主力艦、6 艘巡洋艦、38 艘驅逐艦、以及 4 艘航空母艦。同時，有 20 艘戰艦在黃浦江岸裝卸飛機設備，各項軍

³⁰ *Time*, August 23, 1937, V. 30(part I), p. 20.

需武器與海軍士兵等，以備戰鬥。

《時代》在一方面報導中日戰爭，另一方面也不忘介紹上海。包括它對中國的重要性，猶如紐約之於美國。因 1842 年的《南京條約》開港，英、法、美等列強在這裡均有租借地，這個最初充斥著沼澤地的小漁村，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在 1930 年它已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人口達 400 萬。

由於此時，中日雙方在上海已經展開激戰，所以美、英等國開始了撤僑行動。在美方，由海軍上將亞內爾（Harry E. Yarnell）指揮《奧古斯塔》號巡洋艦（*U.S.S. Augusta*）負責保護美國僑民的安全。另外，國軍約有 10 萬兵力，日軍則有 6 萬軍力投入，而且日艦則從 50 艘不斷地增加到 82 艘。

日本為了解決中日在上海的戰事，日本昭和天皇乃要求甬上任為海軍大臣，也是具有武士和貴族血統的米內光政上將負責上海問題。

而在這時候，蔣介石尚未出現在上海前線，負責上海政務的中國官員，是剛剛取代前任市長吳鐵城的俞鴻鈞市長。³¹（筆者註，《時代》以為當時國軍乃由張自忠將軍負責，這是錯誤的，因為張自忠此時人在尚北平，未能脫身。）雖然，俞鴻鈞所治理的上海市，有超過一半土地正處於煙硝之中，有成千上萬市民犧牲了性命，不過，他卻有機會成為比吳市長更大的英雄。

8 月底中日在上海戰役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時代》報導有一顆炮彈落到《奧古斯塔》巡洋艦上，導致 18 名士兵受傷，其中包括

³¹ 《時代》指出，蔣介石在 1937 年以俞鴻鈞取代原市長吳鐵城，乃基於吳鐵城的英雄名氣過大，乃決定名升暗降把吳調為廣東省省主席，這個艱困的位置。*Time*, August 30, 1937, V. 30(part I), p. 20.

一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佛格特（Freddie J. Falgout）死亡。值得注意的是，《時代》發現，在上海的外國記者，可謂是現代戰爭中，首次能夠直接觀察與報導，且無需經過任何的檢查工作。話雖如此，可是《時代》也了解到軍事觀察家與報導者，對於中日海軍戰事仍有所未知之處。例如中國海軍至少擁有 12 艘來自德國與英國時速 70 公里的汽艇，每艘艇又配備二枚魚雷，擊沉了許多的日本軍艦。³²

上海之役，日方以 55000 名軍隊進行上海。首先 13000 士兵進入黃浦江與長江的交匯地吳淞。並由 70 名白樺隊（自殺隊）所率領 700 日軍登陸，與國軍對戰。他們先突破國軍第一道防線，進至第二道時，遭到國軍雷的伏擊，以及機槍的掃射。日軍從長江西北岸進入上海，向南方挺進，準備以鉗形方式對付國軍。白崇禧則向西，沿著往南京鐵路線，撤退軍隊。國軍這一暫時的撤退，一方面拯救日本原先在上海的海軍。另一方面，也讓 350 萬居民喘了一口氣。

此後，日本雖然沒有正式對日宣戰，但卻宣布封鎖從上海至香港中國船隻，同時也威脅美英等國，在中國的戰鬥將不限於上海和北平，而是擴及到中國聚集最多人口的地區。日本這一封鎖政策不但造成中國取得供給的停止，也對中國的關稅收入大大的減少。

在南京，國府正在慶祝美國駐中國大使詹森的 30 年外交生涯之際，他們共同目睹了日本在月光中，大肆轉炸中國的事實。在上海，8 月 28 日，日方竟然下令轉炸摧毀上海南站的平民住區，造成至少包括 15 名 2 歲以下的孩童，共計至少 400 平民的死亡。

此時，誤炸事件也時有所聞，美方船隻《胡佛總統號》（President

³² 《時代》還記述了《紐約時代》駐遠東特派員阿班(Hallett Abend)和柏林翰(Anthony J. Billingham)，以及《美聯社》記者哈里斯(Morris J. Harris)在上海戰役時，所親身目睹的身首異處、血肉模糊的戰爭慘事。

Hoover) 在距中國沿岸 32 公里處，遭到攻擊，造成 1 人死亡，6 人受傷後，上海市長俞鴻鈞立刻承認是中方的錯誤。

淞滬戰役發展到 9 月底，上海市況可謂慘不忍睹。根據《時代》的發現，由於 150 萬中國難民湧入上海租借地，所帶來的傳染病如霍亂、天花等，以及食物短缺和暴動，可能造成與戰爭相同的危害程度。此外，上海通訊也遭受損失慘壞。上海市政府一棟價值 800 萬美元的大樓，在日本 13 顆砲彈轟炸之下，已毀於一旦。這時，在上海，日本仍舊抗議，美、英兩國的公司，紛紛把所屬的中國工廠、財產等作抵押，以便掛上星條旗和英國國旗，尋求保護。

《時代》完全觀察到上海幾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美國陸戰隊和英國警察共同出擊，對付 1000 名中國工人在租借地，因為中日交戰區附近危險工作，要求月薪，所舉行的罷工，最後導致有 25 名罷工者因催淚彈而受傷送醫。此外，在美國公民尋求美軍庇護者當中，有一個插曲，二位出現音樂家，要求把樂器安全護送到菲律賓。其中一位女性希望美國水手拯救她價值不菲的皮大衣，甚至另一位音樂家得寸進尺，要求把鋼琴也要後送至馬尼拉，不過最後為美軍拒絕。

33

上海地區慘烈的景象即使到了 10 月底和 11 月初時所傳出來的消息，依舊令人怵目驚心。在上海閘北貧民窟的日軍佔領區，兩軍進行激烈的短兵相接，造成中國人民傷亡慘重。《時代》報導了這時一個上海戰爭的場景，有一位司機發現眼前一顆即將落下的砲彈近在咫尺，他立即警告 14 位乘客，並鳴按鈴示警。數秒後砲彈爆開，司

³³ 此外，《時代》依舊持續關注英日兩國之間，有關英駐華大使許閣森，在上海遭到日軍炸傷，所引發的外交緊張關係，*Time*, Sept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p. 14-15.

機、乘客和部份在街上的人當場被炸死，其他幸運逃過一死的路人，全身衣服則沾染死者的血跡。當時有位美國官員冒著危險外出觀察後，形容似大雨落下的砲彈碎片，所造成中國人民傷亡的戰爭景象，猶如在地獄中戰鬥（They are fighting like Hell）。³⁴

此外，根據《時代》的報導，有一位中國婦女因日本所發射的燃燒彈，衣服著火。此時，美國陸戰隊士官名為柯爾曼（John R. Coleman），及時脫去該婦女身上的衣服，挽救了她的性命。柯爾曼乃成為媒體英雄。不過，中日雙方在上海的交戰卻令人膽顫心驚，僅僅 70 小時的短兵相接，中日士兵共戰亡 5000 人。日軍一直希望在國聯召開會議前，儘速在上海戰場有所突破，為此日方最高階將領和海軍司令們，秘密前來上海探訪，了解國軍究竟如何能力抗日軍長達兩個月之久。³⁵

時至 11 月初，中日在上海的交戰也將告一段，不過不少令人訝異的戰爭故事，依然吸引《時代》的關注。也就在日軍經過一番軍政的整合與密探上海之後，原本只願效忠天皇的海軍與陸軍，此刻決定團結起來共同作戰，以「大推進」（Big Push）戰術，進擊閘北地區。首先日軍沿著蘇州河開向閘北，僅僅在大場鎮進行了接近 1 個月之久的轟炸。最後決定以坦克等機械化作戰方式攻擊大場，以徹底摧毀國軍士氣。當大場為日本占領後，日軍在清理戰場時，竟然發現有戰死的中國士兵，用手銬把自己和機槍一起銬住，直至陣亡，仍然堅守崗位。³⁶

為掩護國軍第 88 師，這支蔣介石的嫡系迅速撤退，師長孫元良

³⁴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p. 18-19.

³⁵ *Time*, November 1, 1937, V. 30(part I), p. 21.

³⁶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 18.

乃下令留一部隊固守，以抵抗日軍的追擊。留守死戰者即為以謝晉元為團附，共率 500 人(一說 800 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當時有軍事專家形容，在東方式的戰爭中，這場閘北撤退方式乃是最有秩序與效率，乃是不少國軍用生命換取來的。這一發生在鄰近上海租借地的血戰，中外人士幾乎全程目睹，震驚全球，媒體甚至以「中國的阿拉莫」(The Chinese Alamo)形容四行倉庫之役。³⁷

孫元良鼓勵八百壯士為中華民族、中華民國與中國革命軍人的光榮，犧牲奮戰。當被記者問及四行倉庫壯士對外要求糧食補給時，大上海市長俞鴻鈞神秘地回答，不別擔心，我會找到方法。³⁸同樣的問題，當時日本海軍少將本田忠雄，則在電話的另一端冷冷一笑表示，在四行倉庫內的 500 名士兵限期投降，否則將被殲滅。不過，謝晉元則向孫元良表示，死亡已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士兵的犧牲絕對不會白費的。

從近在咫尺的租界地，冷漠的英國人目睹了這場四行倉庫戰役，它對外表示，只要中國士兵能穿越 20 碼日軍的火線，跑到租界地，英國必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不但如此，英國人甚至還備妥了大卡車，以便運送跑出四行倉庫的中國戰士。日軍原先也想藉由英租借完全把四行倉庫圍住，不過卻因英國拒絕而作罷。經過 4 天激戰後，500 位壯士中，123 位壯烈犧牲，377 位壯士（其中 26 名重傷）裝備齊全，加上 24 挺輕機槍、6 挺重機槍，跑了 20 碼進入英租借

³⁷ 阿拉莫乃是美國德州聖安東尼(San Antonio)的一個傳教站。在 1936 年時，180 位美國人在 4000 名墨西哥人圍困時，全部陣亡。見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 18. 蔣介石亦曾指出，國軍在四行倉庫的浴血抵抗，反擊日軍，在蘇州河對岸公共租界內之中國人與外國人，目睹此一壯烈場面，無不為國軍吶喊助威。見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 130。

³⁸ 戰役結束後，日軍宣稱在清點四行倉庫時，發現裡面的補給物資，都是從英租借地偷運來的。

地，最後一位出來的就是謝晉元。儘管英國人視中國壯士們是為英雄，但謝晉元此時卻是滿臉淚水。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准將斯馬萊特（Alexander P. D. Telfer-Smollett），大喊，「我從未曾見過如此偉大的！」³⁹

一方面，《時代》關注中日兩軍在上海的激戰，另一方面，它也非常在意蔣介石與宋美齡如何看待這批中國壯士？對此，《時代》指出，宋美齡目睹中國戰士的英勇奮戰，對於這位《時代》眼中，自慈禧以來，中國政府中最有名望的宋美齡，曾經她的內心也是非常掙扎，究竟是否應該力勸蔣介石應該下令讓四行倉庫的戰士撤退，或者就任令戰士為中國而效忠而亡？但她回頭想想，或許蔣介石會認為戰士們拒絕投降，會選擇為中國犧牲。而如此的犧牲也會激起國人的士氣。⁴⁰

不過從四行倉庫之役，《時代》也觀察出了美、英兩國的態度。就算在這場日軍的「大推進」戰術裡，英國有4人意外死亡，受傷6位。斯馬萊特也曾經為了躲避日軍的砲彈而躺平。但包括美國在上海的司令亞內爾（Harry E. Yarnell）也下令，就算遭受攻擊，也不能回擊。

《時代》最後甚至在提出一個假設，如果有朝一日，美、英兩國在上海的船艦被炸沈，又或者斯馬萊特或亞內爾遭到殺害，這種震撼可能對中國更甚於九國公約會議。有趣的是，《時代》也報導，日本海軍中將長谷川清非常憤怒，因為有一位英國士兵，在他的艦隊

³⁹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 19.

⁴⁰ 另外，《時代》也藉用當時中國的一張宣傳海報和戰場照片，用以介紹蔣介石所領導具有德式裝備的精銳軍隊，乃是紀律嚴明，即使在羅店一役倒下的士兵，也不驚慌失措。見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p. 18-19.

於上海登陸時，摸了日軍的機槍，而這舉動也被視為對日本海軍的羞辱。⁴¹

《時代》對於上海戰役的報導，就在所謂的「中國興登堡防線」的淪陷而告一段落。它表示在上海與南京之間，有一道「中國興登堡防線」，即「福山—蘇州—嘉興」防線，同樣也面臨著遭受日軍「顛倒」的危機。對於這條興登堡防線，國軍原本希望能在日軍的強攻下，能夠守得住 6 個月。為此，國軍特別在蘇州的沼澤地帶，建構了上千個堅固的水泥碉堡。同時，國民政府也對外宣傳，請求各國政府，要求日本高度重視具有文化意涵的蘇州，不要隨意地轟炸。但是日方根本是聽者藐藐，僅僅是在 11 月下旬的某一天，《時代》就發現有 700 顆炮彈落在蘇州城。而就在攻佔蘇州後，日軍駐上海發言人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偉大蘇州市的佔領，可謂是現代戰爭史上最不尋常，也最是悲喜交加的功業。⁴²

2. 華北戰場

《時代》發現這個時期日本對華北戰場所採取的策略較為複雜，除了軍事的攻防外，它還涉及到政治議題。質言之，日本應用軟硬兼施的二手策略，一則以戰爭方式對付中國，二則又試圖使用在華北建立傀儡政府，進行以華制華。

（1）軍事攻防

《時代》報導到了 8 月底時，由於日軍也是節節進逼，已經占領 15000 平公方里。從察哈爾的南口走道至河北的塘沽，日軍佈署了 12 萬名士兵，是中國士兵的二倍之多。尤其是南口之戰，日軍取

⁴¹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 20.

⁴² *Time*, November 29, 1937, V. 30(part I), p. 16.

得重要勝利，乃入關向西挺進張家口等地。⁴³

中日戰爭到了 9 月底時，根據《時代》的分析，日軍已經消耗 737000000 美元的軍費，同時幾乎把日本全部的 20 萬常備部隊，投入這場戰爭中。並且引發了數千名日本士兵的傷亡。原來日軍只是想要切割北平、山東、山東與綏遠等省，最後卻導致擴及到中國 4000 公里海岸沿線。戰爭初期，華北是最重要的戰場，日本華北司令寺內壽已經決派遣 60000 機械部隊，從北平西南方進擊，準備切斷平漢鐵路最重要的地點滄州。國軍在幾個月的對抗，犧牲了不少士兵，以及缺乏武器與軍機後，已經準備將戰場集中至距離北平西南方 160 公里的保定，進行防衛。⁴⁴

10 月中旬，《時代》的另一個華北焦點放在山東。它發現日本對於山東，這個隔著黃海與日本領土遙遙相望，富庶的中國省份，其攻擊方式大大不同於其他作戰地區。這主要原因是日本在山東進行大量的投資，總數達 10 億美元之多。所以在山東投資的日商苦苦哀求下，日軍決定以蜻蜓點水方式，對山東省會濟南進行轟炸。同時，也在日商的建議可以對山東，採取更為廉價的方式：收買。

幾經考量，日本政府接受建議，乃將目標對準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此，日本特別派出賄賂專家土肥原賢二出馬，準備收買韓復榘，而韓也大聲疾言，他不會背信忘義。但此時的日軍已經濱臨城下，對這一位在美國好萊塢電影中，具有理想中國軍閥的典型，即身材結實、有一張油膩但聰明的臉，並留著小鬍子。韓復榘此時是受到戰爭困境的折磨：究竟戰與不戰。⁴⁵

⁴³ *Time*, September 6, 1937, V. 30(part I), pp. 17-20.

⁴⁴ *Time*, Sept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p. 14-15.

⁴⁵ 有鑑於土肥原賢二的舉動，國府發言人甚至揚言，一旦他來到中國，必將其送

10 月時，日本戰略首要目標，是準備佔領黃河以北的中國土地。但《時代》認為蔣介石也同時做了作戰策略的變換，作為因應。首先，是山西原來由模範省主席閻錫山辭去指揮官，改由中央直派黃紹竑負責抗日。⁴⁶另外，即便韓復榘信誓旦旦表示，已下令他所屬的士兵誓死抵抗，但為了防範韓復榘作戰不力，蔣介石仍然特派桂系將領，也是宿敵的勇將李宗仁與白崇禧，指揮 50000 士兵開赴山東前線與日軍對戰。面對這一嚴峻的外患，中國顯現前所未有的團結氛圍，確實讓南京政府士氣大振，《時代》發現，甚至有中國媒體誇言指出，在陝西雁門關與平型關之役，共軍圍困了 50000 名日本部隊。但雖是言過其實，但確也證實了國軍較能在華北日軍佔領區，進行有效的游擊戰，以增強日軍超過 1600 公里補給線的困難度。

至於 11 月上旬，繼平漢鐵路沿線最大城市石家莊淪陷後，德彰也失守了，所以日軍板垣征四郎中將乃決定率軍向西進擊太原，也就是面對中共紅軍和嚴錫山部隊。⁴⁷而板垣宣稱他的自動化部隊，將迅速追逐已經無組織的國軍，讓國軍無法重新改變防線。此時，《時代》也發現一個怪異現象，依照華北氣候與地形，冬季在零度以下，應該頗為適合蘇聯與滿洲邊境之間的戰鬥，因為乾冷的天氣會把沼澤地冰凍，以便坦克的操作。可是此時《時代》卻只發現有 20 萬名日本精兵留在東北。原因是一則日本害怕東北人民叛變。再則，日本也要防範在遠東，可能再將發生另一個戰爭，這時候並不適合人員

入大牢。見 *Time*, October 11, 1937, V. 30(part I), p. 22.

⁴⁶ 傳言閻錫山正積極努力挪動自身上億美元的家產，以防範日軍的逼近。*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 18.

⁴⁷ 《時代》指出，日軍文件以「紅色路線」(RED ROUT)形容共軍。*Time*, November 15, 1937, V. 30(part I), p. 20.

的運行，啟動機械化戰爭。⁴⁸另外，《時代》也報導了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也準備透過外蒙古，以最巧妙的方式援助蔣介石，由蘇聯軍事專家攜帶價值數百萬的戰爭用品，送抵中國給反日的陣營。⁴⁹

中日戰事時至 11 月底時，華北的資訊非常難以對外傳達，所以有美聯社記者貝爾登（Jack Belden）從太原班機發出的戰爭新聞。貝爾登指出，包括共軍在內的國軍，因遭受日軍的硫磺炸彈攻擊，導致臉與雙手皮膚等處著火，撤退時簡直就像發了瘋似的（maniacs）。面對國軍這時撤退的情境，《時代》引用了當時駐守華北第 26 軍軍長孫連仲將軍的說法「許多事情是顛倒的」。⁵⁰

（2）政治操作

就在孫連仲將軍所說的「許多事情是顛倒的」之下，日本試圖在華北製造和平的政治氛圍，以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

首先是利用蒙古德王。就在中日雙方緊張對峙之際，日軍又取得蒙古德王的支持。在德王，這位國府頭疼人物的協助下，日軍準備由滿洲國進入察哈爾省省會張家口，接著占領平綏鐵路線，以便在已經共產化的內蒙與中國之間，插入一把刀。也就在這時，《時代》報導，國府已和蘇俄簽定一項條約，不會協助敵人攻擊另一個簽署國。儘管這個條約並不代表蘇聯會幫助中國對抗日本，但日方仍卻然懷疑，這是中蘇彼此之間的「秘密條約」，終將把蘇聯帶入戰爭之

⁴⁸ 《時代》也指出，留在駐守上海的日軍主要年紀都在 30 歲以上。Time, November 15, 1937, V. 30(part I), p. 20.

⁴⁹ Time, November 15, 1937, V. 30(part I), p. 22.

⁵⁰ Time, November 29, 1937, V. 30(part I), p. 16.

中。⁵¹

《時代》也發現，日本此時在北方的佔領區正著手進行以華制華的策略。首先在察南的內蒙古，日本政府在時年 36 歲的蒙古德王協助下，佔領張家口。並利用德王結合百位有力的蒙古人，進行所謂「蒙古人的蒙古」運動，建立傀儡國家，作為回饋。此外，在北平佔領區，日本則利用江朝宗市長等，大肆推行儒教儀式，以便籠絡中國保守分子，和對蔣介石夫婦放棄儒家傳統的不滿者。為此，江朝宗特別在孔廟，以 80 位孤兒唱著古樂，並向孔聖人行九磕頭的大禮。

即使在年底，《時代》仍然持續報導日本還在運用政治手段。在日軍佔領的華北地區，儘管征服地區不太大，可是日本仍然劃分了北平西南方，半徑 1200 公里，作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範圍，並以民國建立之初的五色旗為國旗，以湯爾和等人為傀儡領導。曾經留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湯爾和，在其就職典禮上宣示，他們都是老人了，無野心佔據官位，但有責任看到中國恢復正常生活。待其後，即將辭職。⁵²

3. 對首都南京的攻擊

從中日大戰之始，日本對於國府首都南京步步進逼的戰略，絕對不會鬆懈，《時代》也是充分掌握的。除了上海戰役之外，此時國府首都南京也遭到小規模的損害，至少根據美國觀察家的分析，中國空軍擁有明確的空軍優勢。空軍指揮官毛邦初將軍首次向國際社會透露，在美國受訓的二位空軍英雄，分別是 23 歲的呂中中尉和 24

⁵¹ *Time*, September 6, 1937, V. 30(part I), pp. 17-20. 《時代》也分析戰爭爆發至此，日本已花掉了 6500 萬美元等值的黃金，黃金儲存量驟降至 3 億 2 千 5 百萬左右。

⁵²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p. 13-14.

歲的王孫穗中尉。他們所駕駛美製飛機，分別在南京附近射下 4 架日軍輕型轟炸機，以及兩架雙引擎轟炸機。毛邦初甚至宣告，中國已經重創了位於東京附近空軍單位的半數飛機。⁵³

1937 年中日戰爭進行到 10 月，《時代》立即把戰場報導放在國府首都南京。在《時代》眼中，南京曾是七朝的國都，同時在蔣介石的建設下，城市點綴著林蔭大道，令人印象深刻。但自中日爆發戰爭以來以迄 10 月，日軍已經連續 16 次轟炸南京，而且日本在華海軍司令長谷川清誇下海口，準備將中國首都從地圖上抹掉。

在某天上午 10 點 35 分，南京警報器響起，日本軍飛從上海而來，中國飛行員駕駛 13 架美製霍克戰鬥機(Curtiss-Hawk)昇空迎戰。雙方發生激戰，日機向南京俯衝直下，此時，國軍地面高射砲回擊，接著國軍在地面的預備戰鬥機昇空，猶如禿鷹的銳爪，撲向日軍轟炸機群的側翼。於日方指揮戰機機身冒煙，最後敵機撤退，但留下 4 架猶如流星般的墜毀日本軍機。

11 點 15 分，日軍二度來襲，目標是南京鼓樓區，一波接一波的轟炸長達 4 小時。日軍投擲的炸藥，從大到 500 磅，小至手榴彈大小，幾乎這個地區所能接觸到炸藥的，都被摧毀殆盡。

隔天下午 3 點 30 分，中國空軍在朝向上海 160 公里處，與日本 50 架準備攻擊南京的軍機，再度狹路相逢，最後擊退日本軍機，這證明了日本對南京的濫炸，不但無法打擊國軍士氣，也無法牢制南京的空域。根據《時代》的報導，這場雙方對戰中，中國出現一種「神秘的飛機」和「神秘的高射砲」。雖然事後，日本媒體指稱是蘇聯製，但均被否認。

⁵³ *Time*, August 30, 1937, V. 30(part I), pp. 18-21.

《時代》發覺雖然南京首次遭受日軍偷襲時，蔣介石人在上海前線視察，不過稍後立即返回首都，只是不能透露真實的行踪。但為了安撫人心，蔣決定透過接受中外媒體採訪，向全球展現他人此刻仍在南京。同時，蔣也表示，中美傳統的情誼，中國人曾經視美國為侵略者，所以目前美國對中日危機，根據九國公約，不應該再所採取所謂的中立態度。⁵⁴

就在上海淪陷、中國興登堡防線相繼失守，日軍由東向西挺進太湖地區之際，雖然蔣介石仍然試圖防守長江沿岸據點，例如事先沈船於江底，以阻止日本軍艦的航行。以及太湖與江陰港的防衛工作。不過，也在蘇州—嘉興防線仍未徹底失敗時，蔣突然決定南京政府必須撤退，分散到全中國各地。於是在這一撤退計劃中，這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撤退到長江上游，距離南京 1600 公里的重慶。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財政部長遷至武漢。《時代》認為，國府此舉就是想對國際社會宣示，無論日軍佔領任何城市，中國政府仍然有其他城市可以選擇。在播遷的過程裡，大約有 5 分之 1 的國民政府人員是從長江撤離，另有 5 分之 4 則遣散返回原籍。撤離情境可謂淒楚異常，有位高級官員一面拭淚，一面整理重要文件。其餘文件

為避免落入日軍手中，全部燒毀。這位官員哭著表示，有何用？我們以平等態度對待其他國家，也要求相互尊重。但現在顯然一切都是空的。⁵⁵

不過雖然一方面蔣介石下令撤遷首府之際，可是另一方面，仍然他調動精銳隊部到南京駐守。但白崇禧將軍則以軍事觀點，建議

⁵⁴ *Time*, October 4, 1937, V. 30(part I), pp.17-19.

⁵⁵ 甚至有國民政府官員苦中作樂相互表示，3600 公里外的新疆再見。見 *Time*, November 29, 1937, V. 30(part I), p. 16.

不應該力守南京。可是在過去 7 年裡，蔣介石曾經數以百萬元，美化這座象徵新中國的城市，他毫不猶豫決定力守南京，而不惜任何代價，且誓言有朝一日將把廢墟重建。

占領上海後的松井石根，被記者問及，是否會強攻國府首都南京時，他淡淡地表示，未來的問題最好去問問蔣介石。據說，蔣介石已經準備 5 年抗戰。日方是否會達到南京，端視於蔣介石的態度。就在松井這種詭異的態度下，日軍還是決定攻取南京。對於擁有一對長耳朵的松井，在日本人的眼裡被視為是智慧的象徵。他是孫中山的親密朋友，也是孫長期的支持者。在上海的日軍司令部，60 歲的松井對著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倫敦時報 *London Times*》記者闡述，他曾經如何幫助孫中山，以及蔣介石也曾在日本接受軍事教育。他感性的指出，30 年來，他獻身於中日的合作。甚至在此時，他仍然抱持著「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內心想要解救 4 億中國人，而不是要懲罰他們。⁵⁶

自稱知中派的松井於率軍奪取南京後，卻選舉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當日軍佔領南京後，展開屠殺百名中國人的競賽，結果有二位少尉野田毅與向井敏雄，各自分別殺害了 78 與 89 位中國人。⁵⁷

尤有甚者，《時代》更報導了日軍一項更令人髮指的作戰行為。當國府緊急從南京撤退時，信誓旦旦捍衛首都的竟然是一群連步槍都不會使用的年輕人，讓他們來對付日本正規軍，而應該戍衛京師

⁵⁶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 18.

⁵⁷ 最後結果是向井與野田分別殺害了 106 與 105 名中國人。見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1938*(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p. 118.

88 師卻無情地選擇保留實力，而讓這群年輕人遭受日軍的屠殺。在距離南京 18 公里的一處山丘，日軍圍攻 300 名中國人，先用火攻，將全部國軍逼上山丘頂，以機槍掃射火焰與濃煙，最後再屠殺中國人，幾無倖存者。⁵⁸

《時代》對於日軍以勝利者攻取南京後的殘忍作為，有如此報導。當松井石根面對城外的孫中山陵寢，這位中國革命之父的長眠之地，其特別的意義遠甚於日本其他民眾。因為孫中山曾經在日本居住多年，並且是松井的好友。孫中山亦是大亞洲主義的強烈倡議者。但是居於勝利的一方，松井在老友의 永眠之地，竟然要進行執行屠殺中國士兵的工作。這些士兵都是不顧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受到誤導而堅守南京，最後慘遭屠殺。數以百計的中國俘虜排成一排，再由日軍射殺。有消息指出，某些記者親眼目睹，日本軍方邀請水手們作客，充分享受行刑之樂。⁵⁹

4. 中日內部情況

作為一分屬於第三國家的媒體，《時代》儘力從中日兩個交戰國之外，進行平衡的報導，這可以從它全方位分析當時中國與日本國內各界，對於戰爭的反應，略知一二。

(1) 日本國內狀況

對於這場戰爭，《時代》除了報導日皇與軍方紛紛崩緊精神，以求應付戰局發展，並對中國政府發表一些追求東亞和平的談話外，

⁵⁸ 日軍原本想在天皇昭和（光與和平之意）登基第 12 年 12 個月 12 日時，佔領南京，為其慶賀。不過由明代所建構 12 公尺寬，10 公尺高的南京城牆的，日軍攻陷的時間仍然晚於其預期的時程。見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 (part I), p. 15. *Time*, December 20, 1937, V. 30(part I), p. 15.

⁵⁹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 13.

《時代》亦對日本國內民眾的反應。就在日軍窮於應付中日戰爭之際，日本國內卻也出現支持中日作戰的熾熱聲浪。例如藝妓表演額外加收一日圓，捐獻給日軍。尤有甚者，東京一位名為清水真帆的商人，為了將 3000 日圓的保險金捐給日軍，竟然跳入冰冷的大西洋自盡。⁶⁰

時代發現 1937 年的中日對峙乃是一場全面性戰爭，不僅要動員人力，更需要大量軍費，這對兩國都是折磨與痛楚。為此，中國政府乃對外發行總值 1 億 5 千萬美元的「自由債」(Liberty Loan)，僅在短短時間內，《時代》發現國府已經募集了 7125 萬元。而日本也不遑多讓，東京也發動了「國民精神動員」，要求全日本民眾認購「中國事件債卷」的 3.5%，即 57660000 美元，政府分 11 年償還。

其實，從八一三開戰以來，日本的經濟衰退可謂非常嚴重，債券市場由 90 跌至 76，同時日圓也是大幅滑落。日本國內的悲觀人士測預財政只能支撐 3 個月的戰爭，而後必將崩潰。相反地，現實主義者也強調，財政破敗並不會讓戰爭停止，不過昔日有財政危機的中國，當日本財政出現問題，則已經大大改善了。因為，國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已在瑞士、荷蘭和英國等，取得數目不詳的貸款。而為了取得戰爭軍需，日本除了必須消耗自身儲存的黃金，另外必須發行 2 億日圓債券。質言之，就《時代》的判斷，日本的戰爭之刀雖說要割斷中國的喉嚨，不過也準備是切斷日本的錢包。⁶¹

不過，日本媒體卻在奚落中國購買「自由債卷」的富有階級，已經出現鬆動的現象。為此，時任中國借債主席的宋子文乃出面反擊

⁶⁰ *Time*, August 16, 1937, V. 30(part I), pp. 17-18.

⁶¹ *Time*, August 30, 1937, V. 30(part I), pp. 18-21.

指出，日本的「中國事件債卷」已經造成了日本銀行家經營的危機。而大量的金錢的流出恐怕會加速日本經濟與貨幣的崩潰。但在中國，僅上海一地的富有人士就已認購了 3000000 美元。令人感動的是，《時代》發現宋子文乃是以個人的力量，已經為中國建造 2 家醫院，同時準備再成立第 3 家。也因他認為要從士兵們身上募集金錢乃是不妥的。所以，他一直隱忍不願公布較大的贊助者，才引發了日方的嘲弄。⁶²

總體戰爭不只是財力與物力的耗損，更涉及到人員的大量傷亡。《時代》分析了戰爭初期，日本的戰略明顯犯了錯誤。此時的日軍應該是要積極鞏固已經佔領了的中國領土，但它為了東方式的面子問題，卻選擇在惡劣的天候下，兵分三路進擊中國。為了補充兵源，甚至徵召日本高中生，只為了面子問題，要攻佔馬廠，並在北平上空懸掛彩色氣球，做為宣傳。此外，日軍在天津指揮部也擔心，少數將軍由於受到面子問題所牽制，不願反映真實的損失戰況，而無法得到適當的支持，就逕行攻擊國軍，導致日軍參謀必須依賴於猜測，以進行補給工作。這一缺失也給了國軍進行反擊的機會，誘使 4000 日軍在北平西部山區中，陷入國軍機槍與火砲的圍剿之中。⁶³

戰敗的日軍又是如何情境，《時代》也有所描繪。戰爭場景回到日本東京，火車月台上的傷兵令人驚駭莫名，嚴重的被綁帶包紮成如同一根木柱。其他受傷而能行動的士兵，則穿著和服返家。回鄉的傷兵走一個月台，另一個月台則在書寫著「為我們準備出發前線的戰士恭喜」的勝利拱門下，新士兵正整裝待發。⁶⁴

⁶²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 18.

⁶³ *Time*, Septmeber 20, 1937, V. 30(part I), p. 15.

⁶⁴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 18.

(2) 中國國內狀況

戰爭對於加害者的日本是苦難的，當然受害者的中國更是首當其衝，痛苦更甚。當 10 月日軍選擇狂轟濫炸南京時，《時代》報導了一則戰爭的景象。坐在軍艦上的美國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目睹了南京火車站和長江下關的貧民窟，無法及時出逃的老弱殘病者，都在這場日軍的轟炸中死亡。可憐的中國窮人，在劫後餘生，若不是選擇退縮，就是衝出街上，握緊拳頭，指天咒罵日本軍機。之後，中國工人立即修復道路，建築更多的防空洞。但政府的主要建物並沒有遭到太大的破壞。⁶⁵

日軍的野蠻行為雖然傷害了中國，但卻摧毀不了人民的士氣。這一點，《時代》所有發現。所以它透過宋美齡勇敢面對日敵，不屈不撓的精神，傳達中國人民奮勇求生的故事。相對於美國第一夫人小羅斯福夫人艾蓮娜(Anna Eleanor Roosevelt)在美國的優居生活，在中國的宋美齡可謂是九死一生。她在上海前線，目睹了數以千計因奮勇抗戰，傷重等待救援士兵的景象，正在她內心裡糾結著。

在南京，宋美齡更見證了雖然樓頂漆上紅色十字架的洛克菲勒醫院(Central Rockefeller Hospital)，但是日本依然在 95 架軍機的轟炸下，摧毀了這間擁有 500 張病床的醫院。這場悲劇造成了 150 位病人、200 位醫護人員和相關人員，總計超過 500 名以上的死亡中數。根據宋美齡表示，日軍準備殺害他們夫妻，以便另立傀儡。最後，宋美齡指出，雖然她的心是絞痛的，中國到處受到日軍的佔領與封

⁶⁵ 當時的軍事專家認為這次日軍的空襲，中國防空洞的傷亡，乃是源自於工事建設出了差錯，並非是日本轟炸所直接造成的。Time, October 4, 1937, V. 30(part I), p.18.

鎖，但必然奮戰到底。⁶⁶

如同觀察家們發現，日本方面也已經多消耗了原先所規劃佔領上海的3倍時間。尤有甚者，4個月的中日戰爭耗費，更等於在1904-1905年時，18個月日俄戰爭的軍費。⁶⁷其實，中國的更難以估算，根據精算師保守的估計，僅是上海一地在這場中日戰爭裡，至今損失已高達7億5千萬美元，乃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3倍之多。此時，《時代》發現中國婦女，在宋美齡的號召下，也是慷慨的踴躍捐輸，把結婚首飾和黃金飾品獻給國家，以應付軍費所需。⁶⁸

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就在中國人民為戰爭慷慨捐輸之際。《時代》也發現遠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駐美大使王正廷宣布，美國紐約曼哈頓的中國人，在慶祝雙十國慶時，已收到華僑共200萬美元的捐獻。在舊金山，有一位從上海租借地，遭受日軍在8月23日首次對華轟炸，但卻毫髮無傷，歷劫歸來的美國女舞者魯道夫（Therese Rudolph），將其個人的戰爭情緒，轉化成一種屬於熱情恰恰（hot-cha-cha）舞式的「彈片搖擺」（Shrapnel Swing）。⁶⁹

5. 有關中共的報導

中日戰爭的第一年裡，雖然《時代》也對中共的角色有所著墨，不過份量不多，且褒貶不一，甚至還略有些質疑。中共共同國難的消息，《時代》一直到了1937年9月底才首次給予報導，毛澤東與朱德等人才決定與蔣介石化敵為友。它分析，國民政府終於宣布與中

⁶⁶ 值得注意的是，宋美齡就算在國難當時，仍然對解釋為何她要協助蔣介石推動「新生活運動」。主要原因之一乃是九一八事變後，了解到自助而後人助，這一慘痛的真理。見 *Time*, October 11, 1937, V. 30(part I), pp. 23-24.

⁶⁷ *Time*, November 22, 1937, V. 30(part I), pp. 21-22.

⁶⁸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 18.

⁶⁹ *Time*, October 18, 1937, V. 30(part I), p. 22.

共結束彼此十年的戰爭。同時間，中共在技術上也放棄了紅軍與蘇維埃政府，成為國民政府的第八路軍。國民政府保證，戰後將儘速在中國實行民主，也絕不會放棄任何一寸領土，誓與日軍戰到最後一刻。為此，《時代》讚賞由於國共雙方的和解，得以讓毛澤東與朱德，這兩位政治與軍事的幹才，率領中共十萬精銳共軍，加入對日作戰之中。在《時代》眼中，朱德這位共產黨員，看起來宛如農夫，唯一弱點是太沈迷於籃球運動。雖然熱中籃球，但朱德技術不佳。儘管如此，當國共宣布共同抗日時，朱德表示共軍願意和國軍攜手奮勇殺敵，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同時也將收復東北。⁷⁰

中共第二次出現在《時代》報導裡，乃是共軍向國府匯報戰績。就在山東戰事詭譎不定之時，中共透過代表秦邦憲告知南京政府，國府的第八路軍 10 月初，在山西打了二場勝仗，殺死了 1000 名日軍，同時解除了 10000 蒙古和日本士兵的武裝，並擄獲了一整個營的士兵，包括指揮官，外有 60 卡車的武器軍需。秦邦憲誇口表示，中共這一成果乃源自於他們曾經對付過國民黨的「飛行戰術」(flying tactics)。

可是《時代》認為中共打勝仗的報告，不但沒有獲得國民政府的證實，甚至南京方面還直接刊登了日本官方的公報指出，秦邦憲乃是在吹噓中共的戰績，在板垣征四郎所部關東軍來山西之前，共軍已經先行躲到五台山。此外，也沒有任何日方的記錄顯示，中國曾經擄獲一個日軍師的部隊與指揮官。⁷¹

⁷⁰ *Time*, September 20, 1937, V. 30(part I), p. 15.

⁷¹ 關於秦邦憲的報告，蔣介石在其日記裡明確指出，中共吹噓的「平型關大捷」，其實參戰的部隊主要都是國軍，如楊愛源、高桂滋等部。共軍則以林彪一部分虛張聲勢而已。見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 123。

共軍第三次見諸於《時代》，則是大篇幅文章，並輔以照片，報導朱德所率領的共軍，在平型關戰役的成就。《時代》分析，一方面，國軍在華北地區與日軍展開陣地戰，另一方面，則進行游擊戰，亦即「打帶跑」(hit-and-run)的戰術，用以擾亂日軍的補給線。這一戰術確實也發揮非常大的作用，導致日軍在 10 月之後的華北戰區陷於停滯。究竟游擊戰術產生多大的制敵效果，《時代》特別介紹了國軍中二位游擊戰的翹楚：朱德與衛立煌將軍。在《時代》的眼裡，朱德是被喻為「紅色拿破崙」，從 10 月底，即向南京蔣介石匯報不少擊潰日軍的軍情，例如共軍重新佔領在長城雁門關附近 50 公里的寧武，並且擄獲 2000 餘名日軍。⁷²雖然《時代》也肯定國軍與共軍同心協力，但它也質疑共軍可能也誇大了戰果。

6. 列強與國聯的報導

《時代》非常了解現代東亞秩序必然涉及到列強的權益，尤其是中日兩國的軍事衝突，一定會影響到歐美各國在華公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各項權利。所以當中日發生戰事起，列強無不採取相對的因應策略，以求自保。以下就《時代》的文本切入，分析它如何報導英、美、蘇以及國聯，關於中日大戰所使用的對策。

(1) 英國方面

《時代》報導當時英國為了自身利益，乃試圖出面調處中日戰事，故派遣駐中國大使許閣森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on) 赴上海準備會見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但卻在途中遭到日方襲擊而受重傷。事後，可怪的是，日本以英方並沒有在車上，掛上識別標誌，拒絕正式道歉。而英方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給予

⁷² *Time*, November 1, 1937, V. 30(part I), p. 21.

的外交照會，也只是提及這個事件與外交無關，日方真實的犯罪，只是針對車子中非戰鬥的人員，而不是英國駐中國的大使。

雖然英國努力協調中日衝突，可是此時英國也極力避免與日本發生軍事衝突。不過從四行倉庫之役，《時代》也觀察出了美、英兩國的態度。就算在這場日軍的「大推進」戰術裡，英國有 4 人意外死亡，受傷 6 位。斯馬萊特也曾經為了躲避日軍的砲彈而躺平。但包括美國在上海的司令亞內爾（Harry E. Yarnell）也下令，就算遭受攻擊，也不能回擊。

尤有甚者，《時代》甚至報導了，當各國大使館隨著國府由南京，撤退至武漢之際，英國卻突然決定把大使館從武漢撤退至廣州和上海。《時代》研判，就務實的英國人而言，這似乎代表它準備想要承認其他的中國政府。同時，英國的外交官所堅持的外交藝術，就是要遠離所有緊張的角落。舒適的藏身在上海，伴隨著英國的船艦。英國使館將猶如一隻貓，能夠柔軟地躍向任何的方向，以便謀求人類和英國的幸福。⁷³

不過雖說英國外交向來以現實主義為考量，可是《時代》也報導了英國對中國友善，並伸出援手的一面。《時代》發現，就在中日雙方戰的不可開交之際，英國似乎也被捲進這個漩渦裡。一則日本向英國提出抗議有二架英國標誌的飛機，飛過日軍的區域，但英方卻表示沒有任何飛機靠近香港。再則，日本非常痛恨四行倉庫中的 377 名中國土官兵逃到英國租借地。就在這時，英國甚至同意中國代表，但卻拒絕讓日本派員出席，4 位因受中日戰爭波及而陣亡士兵的追悼會。為表達支持英國，中國學生群聚上海街上，高舉著旗幟：「我

⁷³ *Time*, December 13, 1937, V. 30(part I), pp. 18-19.

們的英國朋友萬歲！」⁷⁴

(2)美國方面

美國是另一個在華的列強，基於美國國家實力，在此時已領先全球，並能影響中日雙方，所以它對於兩國交戰的態度至關重要，《時代》必然為文記載。

首先是撤離大使館。

《時代》發現，相對於英、蘇兩國堅持留在南京，反倒是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這位在中國的美外交老兵，此刻卻選擇在外省尋樂，伺機準備接受來自美方的外交指令，國務院傳來的訓令，要求外館高階人員，儘量避免不必要的危險。於是詹森下令使館人員撤退到長江上的「呂宋」(*Luzon*)與「關島」(*Quam*)號艦艇上避難時，此時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帕克斯頓(*J. Hall Paxton*)，這位傳教士之子，也曾在1927年「南京事件」歷劫的外交官，卻以傳教的精神，要求讓他單獨留在大使館運作。因為，帕克斯頓了解，一旦美國大使館撤出，必會引發中國反美的情緒，認為中國已遭到美國的拋棄。⁷⁵

其次，小羅斯福總統發表著名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

這時，《時代》研判另一項影響攸關中國安危的，即是小羅斯福總統在10月5日於芝加哥，所發表的「隔離演說」。這個演說雖然沒有使用「侵略者」、「戰爭」等名詞，直指出日本等國家，但卻試圖引發美國社會的義憤，進而全力支持中國的抗日。在《時代》的判斷中，雖然認為羅斯福總統對「隔離」的論點非常模糊，不過他卻清楚顯示，一旦經濟壓力無法阻止國際惡霸(*bully*)，則美國準備以外交手

⁷⁴ *Time*, November 15, 1937, V. 30(part I), pp. 15.

⁷⁵ *Time*, October 4, 1937, V. 30(part I), p.17.

段對付它們。簡言之，美國不再採用睦鄰政策，而必須限制惡鄰居了。⁷⁶

接著，美國對日本提出抗議

究竟如何維護美在華利益，不受戰爭波及，美方乃決定透過外交管道，向日本交涉。《時代》報導美與英兩國曾經由駐東京大使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交涉。例如，美國駐東京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即向日方要求，任何改變中國關稅問題，都必須諮詢美方，因為中國的關稅收入，乃是美國向中方貸款的保證。而且日軍控制中國港口，也意味蔣削弱中美之間的貿易。⁷⁷

最後，撤出美國僑民

其實，早在中日大戰初始，美國即已準備撤僑。但最有名因撤僑而衍生的美日外交事件，非以美艦《帕奈號》(*Panay*)莫屬。關於這點，《時代》有非常詳細的報導。

當日軍駐上海的海軍少將本田忠雄曾經熱情地對美國記者表示，就算日軍無法在這場未宣戰的戰爭裡，獲得任何重大的利益，但如果能釐清美日關係，並且能永遠地消除雙方間彼此不信任與猜疑的危機，這對日方的付出也就值得了。但本田的話言猶在耳，美日之間

⁷⁶ 當然，羅斯福的「隔離演說」一出，引起了正反兩面的反應，贊同者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立即登刊了前任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支持總統新外交政策的文章。甚至還有美商要求抵制日貨等支持中國抗的論調。至於反對羅斯福者，亦所在多有，例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就在頭版裡要求羅斯福政府，「停止外交介入，美國人要和平」。也有專欄作家詹森(Hugh Johnson)，也為文表示，羅斯福的隔離政策，將導致美國再度與戰爭站在同一方。見 *Time*, October 18, 1937, V. 30(part I), p. 19.

⁷⁷ *Time*, December 6, 1937, V. 30(part I), pp. 19-20.

就發生了美艦《帕奈號》(Panay)遭到擊沈，所衍生的外交事件。導致雙方危境更甚於往昔。450 噸《帕奈號》由中國人在 1927 年所建，目的是保護在長江航行的美國船隻，免於盜賊的攻擊。12 月中旨，《帕奈號》前來南京撤退美國使館人員、記者、標準石油公司人員 (Standard Oilmen)，以及其他美國公民。當任務完成後，《帕奈號》立即駛離交戰區之外的 40 公里處停泊，以示和平目的。

但是日軍司令部下令擊沈長江水面上的所有船隻，當然包括停在江面上的《帕奈號》，以及 3 艘標準石油公司的船隻，都無法幸免於難。除了美國船艦外，英國的船隻雖然標誌著明顯的英國旗幟，也航行在屬於國際航線上，但仍然遭到日軍的毒手。《蟋蟀號》(Cricket)、《聖甲蟲》(Scarab)、《瓢蟲號》(Lady-bird)、《蜜蜂號》(Bee)等，均遭到日軍的攻擊。事後，日軍激進派橋本欣五郎上校甚至公開表示，是他下令對江上每艘船隻開火的。遭日軍擊沈的《帕奈號》，以及 3 艘標準石油公司船隻。其中前者原載有 72 名官兵，最後獲救 63 名之中，包括一位美籍海軍人員和一位義大利記者喪生。另外，包括《帕奈號》和標準石油公司船隻在內，共有 96 名以上的人員失蹤。面對這一個嚴重的外交事件，為了彌補雙方關係，日軍駐上海官員與日本駐美國大使齋藤弘，立即懇切地向所有的美國人士表達遺憾和道歉之意。

《時代》發現《帕奈號》事件餘波未平，在東京街頭聚集了數以百計憂心忡忡的日本民眾，公開向《帕奈號》的美籍犧牲者致哀。這個事件給了日本民眾一項突然而起的畫面，駐守在中國那些不負責的日軍，正在著手從事一種連聰明的日本政治家們都恐懼的事，即他們準備要促使美國採取軍事行動。為了處理《帕奈號》事件，海軍部長米內光政特別向天皇報告，同時命令這一事件負責人，48 歲的

三并貞三海軍少將立即解職，返回東京。⁷⁸此外，上海日軍還建議由士兵們捐款給《帕奈號》的受難者，並且由官方正式向受害者致歉。

《東京日日新聞》一天之內就募集了 1008 美元。同時，它還建議日本應複製一艘《帕奈號》還給美國。尤有甚者，一位年約 30，穿著正式和服的日本女子，掏出一把長剪刀，剪掉自己的頭髮，再繫以金銀線，加上白色康乃馨，雙手送給一臉驚愕的美國駐大使格魯(Joseph C. Drew)。

雖說日本官方與民間不斷的道歉，但劫後餘生由《歐胡號》(*Oahu*)戰艦護送至上海的倖存者，卻道出了更多有關《帕奈號》事件的真相。在某個致命的一天，《帕奈號》停靠在距離南京上游 40 公里處的長江岸邊，這時，有日方官員和幾名士兵登艦，若說日軍在尚未登艦時，並不清楚情況，尚猶有道理。但在這之後，日方斷然無可誤解之處。不過，在下午一點三十分，一隊機翼上塗著紅色圓球的軍機，突然出現並投下第一顆炸彈，擊中了船橋，船上高射砲失去了效用，炸彈炸傷了中尉指揮官休斯(Lieutenant Commander Hughes)的腿部。若說首波攻擊，日軍看不到《帕奈號》上的 7 面旗幟和艦上識別圖案，情有可原。但是第二波的攻擊，艦上的官兵再也無人相信。於是美艦士兵以艦上的機槍進行反擊。由於美軍的反擊，導致日軍無法近身轟炸已受損的《帕奈號》，只能在該艦的周圍區域轟炸，以加速《帕奈號》的沈沒。

⁷⁸ 三并貞三乃是日本極端愛國主義者，他是最年輕的海軍少將。三并始終視《帕奈號》事件為意外的。在 1934 至 1936 年之間，他曾是日本 26900 噸級加賀航空母艦的司令。他的作戰信念是有效的進行空中轟炸。在他被派往中國之前，三并從未在日本海域以外的服役經驗。見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 13.

最後艦上主管安德斯（Executive Officer Arthur F. Anders）忍痛嘶吼艦上官兵棄艦，登上小船逃生。可是日方依舊以軍機掃射在小船上許多受傷的官兵和難民，之後再轟炸標準石油公司的三艘船隻。此時，船上難民們深恐更多的攻擊，只好藏身在冰冷的河水裡，目睹日軍船艦再以機槍掃射《帕奈號》，並且登船查看，最終任令該艦在遭受攻擊的 2 小時 20 分鐘後沈入水中。而受傷的難民則在天黑之後脫險至安徽和縣鎮上，再由《歐胡號》和英國戰艦《蜜蜂號》接替救援。⁷⁹

尤有甚者，《時代》報導那位勤奮的《紐約時報》記者阿班相信，他自己發現了就是日軍上校橋本欣五郎，下令射殺《帕奈號》的倖存者。而橋本在日本乃是一位惡名昭彰的軍事派系。他曾在 1935 年發動一場未成功的政變，謀殺了日本財政大高橋是清，並佔領警察大樓。事變後，雖然有 15 位年輕官員被處死，不過由於高橋擁有政治影響力，最後僅遭革職。其後，中日戰爭發生，橋本再度復職。橋本及其派閥認為對日本最好的事情，是讓日本對戰美國和其他「外國狗」（Foreign Dogs）。⁸⁰

總之，即使美國採取撤館、撤僑、外交抗議，甚至是發表「隔離演說」，但《時代》就是決定避免與日本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為最高原則。

（3）蘇聯方面

《時代》承認這個階段的列強，真正給予中國軍事支援的只有史達林所領導的蘇聯。蘇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自中日戰爭以來

⁷⁹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 13.

⁸⁰ *Time*, December 27, 1937, V. 30(part I), p. 13.

即給予國府必要的各項援助。

《時代》分析，國軍只有透過幾條路線進行補給：其一是從北方的內蒙，取得來自蘇聯的援助。《時代》的分析，對這時的中國人而言，蘇聯大使的到來，相較於羅斯福的「隔離演說」，更具安定人心，因為中國人民始終擔心美國政策只是口惠而實不至。⁸¹有趣的是，面對中蘇友好的態勢，日本一直擔心蘇聯的攻擊，所以宣布已經派遣了 20 萬「最佳」部隊，駐紮在滿洲國與蘇俄邊境。同時，也不斷吹噓派到中國的士兵，不是天皇的精英，藉以鼓勵日本民眾。⁸²蘇聯所供給中國的 40 架轟炸機，除了讓中國在上海和華北作戰外，更將寫下國軍敢於轟炸日本本土城鎮的一頁新史。⁸³

不過，蘇聯的援助也另有政治目的，即它要求國府若要取得軍事支援，必須加入共產國際，同時任命朱德將軍為國軍高階指揮官。

84

⁸¹ *Time*, October 18, 1937, V. 30(part I), p. 22.

⁸² 在《時代》的眼裡，這時的中國在美國民眾的意見，乃象徵著儒家、明代瓷器、英雄般的傳教士、乾淨襯衫和陳查理（Charlie Chan）。相反的，日本意味是切腹、帝國主義、富士山牌（cards of Fujiyama）和黃禍。見 *Time*, October 18, 1937, V. 30(part I), p. 19.

⁸³ 這一期的《時代》雜誌，還特別為文報導有關在中國的戰地記者，所拍攝有關日軍在南京進行轟炸，以及國軍擊落日本軍機的圖像。另一項專文報導乃是有關因戰爭，而衍生出來的疫情問題。如上海一地所發生的霍亂，已經造成每日 100 名的死亡人數。可能大規模產生的傳染性疾病，不但為害中國人民，甚而可能透過海空交通擴散到國際上，因而引發國聯衛生單位的關切。為此，國聯特別撥款 50 萬美元協助中國消滅傳染病。不過，美國衛生單位的判斷，由於傳染病毒有固定的潛伏期，但中美之間有一定距離，所以不認為諸如霍亂等傳染病會影響美國。但美方仍需要謹慎以對。見 *Time*, October 25, 1937, V. 30(part I), pp. 18-19, 25, 46.

⁸⁴ 蘇聯已經向中國供給 300 架 800 匹雙引擎馬力，時速 250 公里的轟炸機。見 *Time*, December 13, 1937, V. 30(part I), p. 18.

(4) 國聯方面

戰爭伊始，國際社會也希望透過國聯，調處中日雙方衝突。《時代》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的報導與分析。

國府為了引起世人關切，乃在戰爭之初，派遣當時駐法國大使顧維鈞，以及駐英大使郭泰祺在日內瓦的國聯會議上，控訴日本的侵略，以便為中國力爭權益。當然在《時代》眼中，最文雅也最偉大的外交家顧維鈞，於幾經考慮後，為了不讓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引用美國《中立法案》，從而造成中國更大的不利狀況，所以中方在會議上，雖然以憲章第 10、11 以及 17 條，控訴日本的軍事行動，但卻避免使用「戰爭」一詞來形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儘管中國在國聯指控日本的侵略暴行，但日方當然不會出席國聯，讓中國有機可趁。⁸⁵

國聯為了調處中日雙方，曾經二度邀請日本出席國聯會議，但均為日本公開拒絕。《時代》還戲稱，當西方列強準備鏖而不捨，進行第三次邀約時，日本駐比利時大時來棲三郎還甚至還給西方列強上了一課免費的東方心理學。⁸⁶這表示國際若有第三次邀請，日本根本不會有任何的反應。《時代》發現面對日本強硬的態度，所謂的「大三國」（美、英、法）特使，戴維斯、艾登與托奈克（Yvon Delbos），至此已無任何對策，也只能發表一篇決議案，指出日本對於利益衝突，所採取的觀念，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應對態度完全不同。而這在《時代》的判斷裡，乃是一種無關痛癢的口頭上的排斥（ostracism）。

87

⁸⁵ *Time*, September 20, 1937, V. 30(part I), p. 14.

⁸⁶ 來棲三郎表示，一個印度故事說，當第一次有人大喊：老虎！老虎！沒有一個村民會反應。第二次再喊，或許有些村民會拿起刀劍。但第三次喊時，只會激起村民而已。見 *Time*, November 22, 1937, V. 30(part I), p. 21.

⁸⁷ *Time*, November 22, 1937, V. 30(part I), p. 21.

尤有甚者，對於即將破局的國際調處，中方代表顧維鈞明確表示，既然現在的協調大門已經被日本公然賞一巴掌，所以他要求列強是否準備扣壓對日本戰爭物資的供應與信用貸款，並且加強對中國的援助？不過，儘管列強如戴維斯只是口頭上強調維護國際法尊嚴，而完全無視於顧維鈞的提議，但在義大利的反對下，仍有包括挪威、丹麥、瑞典拒絕戴維斯的意見。甚至，當國聯正在會商中日戰爭之際，英國內閣跨過艾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派遣伍德爵士（Lord Halifax, Edward F. L. Wood）直接與希特勒接觸。這令艾登憤怒到無已復加的地步。目睹英國這種羞辱艾登的外交措施，《紐約時報》還諷刺地指出，艾登應該考慮要辭職了。這時候，美國有婦女團體還熱心地電訊戴維斯，再三請求要和平，但法國觀察家卻告誡婦女們，不妨省下電報費用。並建議美國婦女，把絲綢改為棉布，讓日本破產，拯救中國。⁸⁸

事實上，《時代》分析這場國際會議根本是處處牽就日本，唯恐得罪日方，終將導致一事無成。與會成員要求戴維斯單獨成立委員會，完成目標。但戴維斯卻提出應由 3 國組成委員會而拒絕。此外，德日兩國對蘇聯出席九國會議，其身分的正當性提出質疑，從而拒絕接受調停。尤有甚者，若要組成委員會，究竟列強中有那些「小成員」可以入選，都要尋求日本的意見，以便日本願意與其溝通。最後，連給日本的一句文句表示，「用武力從就不曾圓滿地解決爭端」，都遭到日本同盟義大利的反對。不過就算國聯如此謹小慎微的協調態度，最終仍為日本拒絕。⁸⁹

⁸⁸ *Time*, November 22, 1937, V. 30(part I), p. 21.

⁸⁹ 不過，《時代》意有所指，當希特勒在此時完全默然不語，也不參與國聯會議，在歐洲觀察家的判斷，也正好證明，中日最終還是要返回由「一個人」(One M

7. 《時代》自身的立場

作為一份國際知名的雜誌,《時代》除了努力呈現客觀的新聞外,當然在中日戰爭也有自己的看法與態度。這點可由以下一探究竟。對於時任日本侵華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為侵略中國尋找藉口,而日本媒體還紛紛讚賞長谷川清,這種事先警告敵人的方式,乃具古代武士的精神,否則以現代日本軍事作戰,不可能有警告之事。《時代》評述這種警告西方國家,應該立即從南京撤退,則被視為是對國際法,最為厚顏無恥的行為。⁹⁰

《時代》發現,為了遂行日本摧毀南京的戰略,日本完全無視於國際法的規範,所以先後引起英、美等四個西方國家的抗議,不能對南京進行轟炸行為。為了敷衍列強抗議,日方竟然回覆在「人道目標」(humane objective)下,將儘快結束戰爭,而從凌晨零時起,至隔天清晨,都日軍不會攻擊南京。其實,《時代》發現日本這種所謂的人道考量,根本不是基於列強的抗議,而是此時的夜間,並不適合空軍轟炸。⁹¹

對於日本的戰爭暴行,《時代》更是毫不遮掩地忠實反應給世人。《時代》指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日本戰爭暴行的照片,逐漸被披露於美國媒體的頭版上。有一張照片顯示,有位日本兵正使用刺刀,戳刺懸吊在柱子的中國人屍體,這是攝於9月5日,日本佔領天津後之事,並且經由《美聯社》特派記者米爾斯(James A. Mills)、哈理斯(Morris Harris)證實。可是日本的參謀本部卻信誓旦旦指出,這應是穿著日本軍服的中國人所做的行為,而且日軍的刺刀技術也與

an) 代取國聯會議,協調雙方的戰爭。

⁹⁰ *Time*, October 4, 1937, V. 30(part I), p. 4.

⁹¹ *Time*, October 4, 1937, V. 30(part I), p. 4.

此不同。《時代》指出，當任何一位女性記者見到這一張照片，都會感到噁心時，但日方卻選擇以狡辯的方式，創造一位想像的敵人。⁹²

相反地，在貶抑日軍時，《時代》則盡可能的傳達中國軍人奮勇抗敵的感人故事。當中日交戰至 11 月初，上淞滬之後也終將告一段，不過不少令人訝異的戰爭故事，依然吸引《時代》的關注。也就在日軍經過一番軍政的整合與密探上海之後，原本只願效忠天皇的海軍與陸軍，此刻決定團結起來共同作戰，以「大推進」(Big Push) 戰術，進擊閘北地區。首先日軍沿著蘇州河開向閘北，僅僅在大場鎮進行了接近 1 個月之久的轟炸。最後決定以坦克等機械化作戰方式攻擊大場，以徹底摧毀國軍士氣。當大場為日本占領後，日軍在清理戰場時，竟然發現有戰死的中國士兵，用手銬把自己和機槍一起銬住，直至陣亡，仍然堅守崗位。⁹³

尤有甚者，在 12 月 13 日，《時代》更發出了一個項消息，英國外交部指出，日本在上海的佔領區進行了一場「勝利遊行」。而英國政府認為日本這種舉動，必然將導致不可預知的後果。為了防止意外，就在美、英駐上海司令比蒙特 (John C. Beaumont)，斯莫雷特 (Alexander Telfer-Smollett) 曾經二次抗議日本的遊行決定無效之後，有位美方高層驚呼，萬一有位中國人突然獨自開槍，則只有上帝會發生何事實！而這將會招來災難！果不其然，就在日軍勝利遊行的當天現場，許多日本公民竟還公然飲酒慶賀，並威脅要把中國人推入水溝之中，日本這種耀武揚威的行徑，必然招致中國愛國人士的反擊。於是有人向日軍的遊行隊伍投擲了一顆手榴彈，包括美國《紐

⁹² *Time*, October 11, 1937, V. 30(part I), pp. 22-23.

⁹³ *Time*, November 8, 1937, V. 30(part I), p. 18.

約時報》記者阿班(Hallett Abend)、在上海的英籍警察麥克菲(John McPhee)、《上海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發行人布魯斯(George Bruce)等外國人士，都目擊了這一事件。另外有位目睹事件的中國人，竟然就在一聲呼叫：「國民黨萬歲」後，從高樓一跳而亡。⁹⁴

除了中國軍民可歌可泣的奮戰故事外，《時代》記述了一則在苦難的戰爭歲月裡，一位外國教士拯救中國人的故事。在上海，法籍耶穌會教士饒家駒(Father Jacquinet de Bange)為了挽救中國難民，由他提議再經由中、日兩國的同意，劃南通地區為中立區，由此有 25 萬中國難民因而獲救，從而難民們視饒神父猶如再造父母。在中立區裡，饒神父還提議在戒嚴法下，日軍不要射殺諸如搶犯、竊賊等罪犯，而是採取公開遊行的懲罰方式，同時輔以 3 至 20 天的勞動服務，以代替槍擊。甚至，饒神父還向日軍司令松井石根與長谷川清交涉，以每人 3000 美元，保釋中國人犯。⁹⁵

肆、結語

由於《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 Luce)出生於中國，其父又是在清末民初於中國傳教，故他總是對中國懷抱著一分特殊的情感。所以當日後魯斯創立《時代》後，在國際新聞上一直對中國事務多所關注。當然在 1937 年中日大戰，《時代》必然投入全副精神，進行戰地報導。環顧同性質的國外雜誌，雖然對中國戰場也有報導，但能如《時代》從大戰後即從不間斷地，鉅細靡遺地幾乎是在每一周將中國戰役，如實的傳播到全世界，則是絕無僅有。

⁹⁴ *Time*, December 13, 1937, V. 30(part I), p. 18.

⁹⁵ *Time*, December 6, 1937, V. 30(part I), p. 19.

檢視《時代》對於1937年中日戰爭的報導，約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鉅細靡遺，圖文並茂，全方位的報導中日戰爭。舉凡相關的中日戰事，例如上海淞滬之役、華北戰役、國際社會的調處、列強對戰爭的反應、美英蘇政府的各自考量、戰爭對中國乃至日本社會與經濟的傷害，甚至日軍每周增兵至中國的員額，《時代》都力求客觀地給予詳盡的報導與分析。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還幾乎在每期周刊，加入各式的照片，以輔助說明中日戰事。⁹⁶

二，力求客觀公正，詳實傳達中國與日本內部對於戰爭的態度與因應策略。做為一分外國媒體，《時代》儘力公允且客觀的呈現史實。所以因戰爭造成的兩國內部衝擊，它也力求公平報導。所以，文本當中除了分析中國內部問題外，有不少的文章也涉及到日本社會因戰事，而產生的政府內部上的矛盾、經濟困頓與人員傷亡的慘境，甚至是海軍與陸軍在華，軍事作戰各自為政的窘迫。

三，詳實對全球傳達了日軍的偽善與在戰爭中所犯下的惡行。

⁹⁶ 由於中日戰爭激烈的對戰，不僅是士兵與人民的受難，戰地記者是身陷險境。為此，《時代》特別在分析了外國記者是如何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透過文字與影像，將中國慘不忍睹的真實戰況，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以第一時間向全球報導。在這些戰地戰者中，《時代》特別點名了三位著名的記者：中國記者王小亭、《時代》攝影師福爾曼（Harrison Forman），以及克拉魯科夫（George K. Rainukov）。見 *Time*, September 13, 1937, V. 30(part I), p. 33.此外，《時代》也發現，即便遠在萬里之外，由於中日戰爭仍然導致了美國社會上，物價的快速波動，例如大黃根在短短幾個星期內，上漲了200%。也從中國進口的鎢，則從1936年的每噸2.5美元，上漲至1937年的25美元。此外也謠傳由於從中國廣州有價值一億美元的白銀，從廣州流入到香港，導致了國際銀價的下跌，所以美國財政部此刻正在大量低價收購白銀。各國通往上海的商船也受到嚴重的影響，例如船務公司不再承作在中國港口卸貨的戰爭保險，這就影響到銀行不再貸款給缺乏保險的船隻等。

戰爭原就屬於非理性行為，一旦戰事對峙過久，或者戰場陷於膠著，就會引發交戰人員的不理性行為，尤其是主政者若強力約束所屬戰士，可能產生更多為人髮指的罪行。拜當代科技之賜，以及當時不少戰地記者的奮勇報導，《時代》揭露了許多日軍在當時侵略中國時，所說諸多經不起考驗的謊言，和所做諸多人神共憤的犯行。

四，戰事的報導中，存在著對中國軍民抗戰的高度同情心。做為一份知華、友華的媒體，當它面對中日戰爭時，除了秉持客觀與中立報導的媒體天職之外，在感情上，《時代》必然會給予中國人民許多的主觀支持。在不少的文章上，《時代》皆能及時指出中國人民為抗戰所做的共同努力、偉大的貢獻，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犧牲，以求民族的生存。

徵引書目

Time, January 04, 1937—December 27, 1937.

李輝，《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未公開發行，1978。

附表

1937 年《時代》中國報導文本的分析

	新聞 報導	專文 評論	照片	主題	篇 序	備註
01.04	V	X	V	西 安 事 變 (“Dictator Unkidnapped”)	1	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
01.11	V	X	X	鴉 片 與 政 治 (“Opium & Politics”)	2	
01.18	V	X	V	國 內 政 治 (“Old Testament”)	3	馮玉祥全家照片
01.25	V	x	x	國 內 政 治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4	另外，此期有一篇讀者來函解釋，宋美齡所曾經就讀過的喬治亞衛斯理安學院 (Wesleyan College, Ga.)，和麻州衛理女子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的差別。

02.15	V	X	V	國內政局與中日蘇關係分析 (“Soothsayer’s Year”)	5	中國地圖 另外，接續先前對宋美齡在美求學的介紹。本期又刊出一篇宋美齡在喬治亞衛斯里安學院的來函說明。文中表示，1908年時，宋美齡只有10歲，必須由校方監護她。方能與姊姊慶齡一起就讀該校。 ⁹⁷
03.01	V	X	V	國內民主發展的介紹 (“Widest Democrats”)	6	宋慶齡與其侍衛照片 在文中，《時代》指出宋慶齡是主張積極抗日，並暗指國府內有人是懼日分子。宋慶齡也強調日本的實力並不可怕，日本人民也厭戰。中日戰爭的關鍵因素，在於中國人目前已經準備的作戰決心。
03.22	V	X	X	宋美齡的飛機駕駛	7	

⁹⁷ *Time*, February 15, 1937, V. 29 (part I), p. 4.

				(“Kidnapper’ s Pilot”)		
03.29	V	X	V	蒙 古 國 (“Mongokuo”)	8	蒙古德王照片 有趣的是，在德王照片下的圖說，《時代》意有所指的，以「第一邪魔到第一中國人」(No. Bogieman to the No. Chinese) 形容德王。
04.19	V	X	X	國 內 政 治 (“Homage By Reds & Shore Excursion”)	9	

05.10	V	X	X	人物介紹	10	《時代》記載了美國首次跨越太平洋到香港的「中國帆船」(<i>China Clipper</i>) 航空，飛行任務。並記述了《大地》電影女主角雷納 (Luise Rainer)，贈送6棵梨樹給蔣夫人。 ⁹⁸
07.12	V	X	V	中國外交 (“ Kung’ s Credits”)	11	孔祥熙照片
07.19	V	X	V	中日衝突 (“ Fresh Typhoon”)	12	日本裕仁天皇照片 這篇文章也分析，日蘇雙方在西伯利亞邊界的衝突，最後彼此克制，沒有釀成戰爭。但竟然卻是由蔣

⁹⁸ *Time*, May 10, 1937, V. 29 (part II), p. 51.

						介石，而非史達林，展現對日戰鬥的企圖心。這應該也是出乎《時代》意料之外。
07.26	V	X	V	中日政情分析 (Another “Kuo” ?) 「另 一個國」	13	楊虎城、宋哲元照片、中日地圖
08.02	V	X	V	中日衝突 (“Maintaining Prestige”)	14	美國在華婦女(Caro Lathrop)照片
08.09	V	X	V	中日衝突 (“Hilter Touch”)	15	殷汝耕照片
08.16	V	X	V	中日戰爭 (“Pointed Circumstances”)	16	日軍香月清司中將照片
08.23	V	X	V	中日戰爭 (“4:27”)	17	日軍長谷川清中將照片、俄國謝苗諾夫(Grigoriy Semenov)將軍
08.30	V	X	V	中日戰爭 (“Sailors Ashore”)	18	日軍《起雲號》、上海長江口地圖、近衛首相、海軍上將米內光

						政、陸軍元帥杉山元，上海市長俞鴻鈞夫婦。這期《時代》以封面故介紹中日戰爭。
09.06	V	X	V	中日戰爭 (“Two Front”)	19	日軍松井石根、上海和北平戰爭和上海市長俞鴻鈞照片，以及中國戰場地圖。
09.13	V	X	V	中日戰爭 (“Belated Push”)	20	昭和天皇、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照片
09.20	V	X	V	中日戰爭 (“Cheering Section”)	21	中國駐法國大使顧維鈞照片
09.27	V	X	V	中日戰爭 (Fall of Chochow)	22	松井石根照片
10.04	V	X	V	中日戰爭 (As Advertised)	23	南京地圖、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

10.11	V	X	V	中日戰爭 (Shantung & Mah-Jongg)	24	上海市長俞鴻鈞、宋美齡照片
10.18	V	X	V	中日戰爭 (Double-Ten)	25	美國女舞者魯道夫 (Therese Rudolph) 照片
10.25	V	X	V	中日戰爭 (Again Liberty Bonds)	26	松井石根照片
11.01	V	X	V	中日戰爭 (“Victor” & “Napoleo”)	27	朱德照片
11.08	V	X	V	中日戰爭 (“Never Anything Greater”)	28	蔣介石海報、宋美齡照片、日本進攻海地圖、上海羅店戰爭照片
11.15	V	X	V	中日戰爭 (Brussels Conference)	29	美國無任所大使戴維斯 (Norman H. Davis)照片
11.22	V	X	V	中日戰爭 (Tiger! Tiger!)	30	英國外相艾登、蘇聯外交官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ff) 照片

11.29	V	X	V	中日戰爭 (“Things Upside Down”)	31	中國撤退的地圖
12.06	V	X	V	中日戰爭 (“Sold” Not “Given”)	32	美國大使詹森戴防 毒面具、近衛文磨照 片
12.13	V	X	V	中日戰爭 (“Victory, Bomb, Invasion”)	33	美國駐華司令比蒙 特將軍 (John C. Beaumont) 照片
12.20	V	X	V	中日戰爭 (“A Great Mistake”)	34	王克敏照片
12.27	V	X	V	中日戰爭 (Regrets)	35	滿洲國傀儡勢力範 圍地圖



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台」、「中」對外政策的改變

陳希宜*

摘要

自國共內戰、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兩岸關係時而尖銳對抗、時而和緩發展，不僅影響雙方政局，也牽動國際社會的敏感神經。兩岸關係自馬英九前總統執政開始，曾一度發展成為最和平的一段時光；但隨著政黨輪替、蔡英文總統就任後，雙方關係又跌落谷底至今仍未升溫。

本文以2018年迄今為期，透過文獻探討與歷史回顧來探究近十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剖析雙方對外政策有何轉變，以釐清雙方的盤算為何？對內、對外將造成何種影響？尤其當大陸傾全力發展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是否受到壓縮？蔡總統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能否有效發展？

文末也將評估未來雙方創造良性互動管道、和平對話的可能性，以及未來兩岸關係的新展望。

關鍵字：兩岸關係、一帶一路、新南向政策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Change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aiwan and China

Angel, Hsi-I Chen*

Abstract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en up and down with times ever since KMT retreated to Taiwan after the civil war agains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affects not only their domestic politics in Taiwan and China, but al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society.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d once reached its peak when Ma Ying-jeou was President of Taiwan; yet, it failed down to the bottom while Tsai Ing-wen took over the pos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ean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last 10 years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y and the literatures. The purpose i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ave Taiwan and China change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last 10 years? Are their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fected? Is Taiwan under the pressure brought up by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Will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be effective?

In add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channels for positiv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ill also be evaluated in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lt and Road Policy, New Southbound Policy

壹、前言

海峽兩岸自 1949 年國共內戰之後，在政治、經濟、軍事、以至於社會民間均長期陷入緊張與對抗，然而隨著國際社會兩極體系的崩解、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區域整合組織相繼成立，台灣在經歷政黨輪替、以及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之後，兩岸關係也從以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冰封期逐步開啟各項交流、協商與合作，以迎向新一波的壓力。

相較於中國大陸夾帶人口優勢的崛起之姿，不僅提供豐沛的勞動資源成為「世界工廠」；其廣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也成為各國企業必爭之地，特別是自 2013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定調「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行程全方面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成為中國當前統籌國內、國際發展最重要的決策方向。之後，十八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擴大內需增長點和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預計將持續對中國以及世界的經濟產生積極影響。

目前全球已超過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建來，中國不僅與沿線數十個國家簽署了共建合作協議、開展了國際產能合作，同時，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區域內，於 2016 年時，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達到 6.3 萬億元人民幣，增速超過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體增速；中國對「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更高達 145 億美元¹。

中國如此積極地透過在區域內對貿易與生產要素的協調規劃、交通網路的連結、以及商品、資金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企圖將亞洲地區與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歐盟連結起來，不僅引起世界主要國家的關注，對同時期民進黨完全執政的台灣而言，如何因應相對產生之經貿壓力、以及其他因而衍生包括政治與亞太安全等相關議題，力挽近年來台灣國內經濟蕭條、國際政治舞台又頻頻受挫之劣勢，成為我國衡量兩岸關係及制定對外關係政策當務之急。

貳、兩岸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兩岸關係的更迭不僅受到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改變的影響，更多的時候，是因著台灣選舉結果政黨輪替的變化而隨之牽動。海峽兩岸自 1949 年國共內戰之後經歷漫長的政治分裂與軍事抗衡，不僅政府之間高舉對立的旗幟，人民之間也普遍存在認同上的隔閡與彼此猜忌的緊張情緒，然而隨著國際社會兩極體系的崩解、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各地、區域整合組織相繼成立等外部因素；以及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中國大陸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內部因素之後，兩岸關係一改過去「不統、不獨、不武」的冷處理態度，轉而逐步開啟各項交流、協商與合作，尤其自 2008 年馬英九前總統上任以來強調「活路外交」，雙方之間包括官方和民間的往來更顯頻繁。

台海關係的漸趨和緩，建立了擱置主權爭議、共創經濟發展的

¹ 南方日報：「一帶一路點燃世界共榮之光」，香港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5/10/CH1705100016.htm>，2017 年 5 月 10 日

共識基礎，台灣與中國大陸並積極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正式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建立兩岸交流的明確規範，以期振興台灣經濟、與世界接軌，更希望透過互惠雙贏的互動交流，共創繁榮和平的兩岸新局、以及穩定和諧的東亞新勢力。

儘管兩岸關係在此框架下無論是政治或是經貿上的互動均進入相對平穩溫和的發展期，但深入分析雙方的互動內容與頻率，可發現主要的經貿往來均集中於北台灣與大陸沿海地區：根據經濟部貿易局當年的統計，雙方貿易額一年雖超過一千億美金，但南台灣與大陸的貿易比重卻不足總額的 20%。南臺灣經濟發展滯肇因自投資不足一島內不論是政府的重心、民間的投資，均普遍集中於北部，在兩岸經濟合作的政策上，也同樣重北輕南。而南臺灣呈現邊緣化的趨勢其根本原因被認為與政民進黨長期執政南台灣、藍營實力衰落、南臺灣人民與大陸互動不足息息相關（王建民，2010），因此大陸當局也體察到若欲改變此一情景，必須從改變南部政治精英對大陸的立場、促進南部民眾對大陸的充分了解做起，並正確定位南台灣在兩岸經濟關係中的角色（胡宗風，2010）。

自此開始，中國大陸重新調整台工作的重點，對台政策轉而主張「向南移，向下沉」：一、大陸地方政府與中南部縣市的基礎交流與合作活動日益增加；二、大陸旅客至南台灣旅遊的數目顯著提升；三、大陸與南台灣交流與合作的範圍逐步擴大，從早期以經貿逐漸擴展至旅遊、文化、學術、婦女、社工、社區等多元領域（王建民，2013）。

具體呈現的積極變化包括高雄機場的兩岸直航航班從過去的每週二十七班增加到 2011 年的五十一班；南台灣民進黨執政縣市的主

政者或官員在兩岸交流的事務上，明顯「反中」的言論有所減少，且前往大陸考察、訪問、推銷農產品與旅遊的人數日益增加，甚至主動歡迎大陸企業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來台投資。

然而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民意具有左右政府政策發展的重要影響力，因此儘管在馬英九前總統的執政下兩岸關係呈現和平、合作的正向發展，但考慮到南部民眾在歷史因素和政府重北輕南的政策發展下產生強烈的反國民黨意識，甚至超越「反中」意識，當時 ECFA 因而被賦予重望，希望在「擱置爭議」、「放棄仇恨」、「淡化政治」、「經濟優先」與「互利雙贏」的五項原則下，能成為大陸與南台灣培養感情，增進相互了解、加強交流合作、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平台。

由於台灣地區是小型經濟體，內需不足，必須高度倚賴外貿以創造經濟成長，其中，FTA 是拓展外需市場的關鍵，但台灣在 FTA 的談判上蹣跚前進、成效不彰，再加上 2009 年莫拉克八八颱風的肆虐重創全台產業發展，東部與中南部農林漁業損失尤其慘重，因此 ECFA 的簽署也被視為帶動南台灣產業發展的新動能，特別是提升該地區農漁業者的生計，不分藍、綠營的支持者，均能從中獲得利益。其中，「契作」—讓農漁民不論在價格如何波動中，均可維持穩定收入，不因天災人禍而收益有所受損(黃清賢，2012)。當時選定台南市學甲區的虱目魚契作成為指標性合作項目：一來台南地區傳統以來為綠營的「票倉」，二來則是虱目魚為台灣南部的代表魚種，這種契作模式除了增進可預期之經濟上的互惠利益之外，也被期待引發溢出效應帶動南台灣與大陸之間政治氣氛的改變，讓南台灣人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善意與支持，應是有效且「有感」的方法。

但事實上虱目魚契作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是否真能引發其他效應、改變在地人政治立場及政黨支持度？在發展契作的一開始，2011年「商業週刊」便委託「世新大學民意調查中心」針對二十歲以上設籍學甲的民眾進行電話抽樣調查，有五十五%居民均表示聽說過ECFA此議題；同時，有44%的居民表示知道虱目魚契作一事，顯示說明會與媒體宣傳在訊息的流通與告知上已達一定程度的效果，其中，贊成契作的比例高達六成，反對者不到一成，當中又以漁民、專科以上學歷者的贊成度最高，但卻有高達九成三的人民表示並不會因為中國契作而改變其總統支持人選(商業週刊，2011)。

儘管民調顯示出台灣人民的政治立場並沒有因為ECFA契作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有明顯轉向，但包括王塗發(2012)等人都曾對此提出隱憂，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實力差距實為相當遙遠，加上大陸官方主導了整個計劃經濟的運作，以致ECFA看似刻意淡化政治元素、著重在經濟層面的效益，但政治議題才始終是ECFA的核心真相，尤其對於經濟相對弱勢的南台灣而言，在藉由ECFA取得經濟利益時，地方政府跟居民最終也會在其他方面更加依附於大陸、失去自主性，因而改變其政治立場。

然而尚不待ECFA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轉化成政治支持度之前，自2016年5月以後隨著民進黨完全執政試圖切割、降溫與中國大陸之緊密聯繫以保全民意與選票，兩岸關係隨之丕變，中國的對台政策也因應調整緊縮，例如陸客來台觀光旅遊之人數銳減，更是衝擊民進黨長期治理之南台灣經濟發展。以回顧上述虱目魚契作的發展為例，台南地區2011年至2015年連續5年與大陸契作，每台斤以40到45元的價格收購，比一般行情高約10元，市場曾是榮景一片，豈知隨著政黨輪替後，契作關係也隨之停擺、

價格直落。同樣為民進黨大票倉的高雄其因應之道便是鑑於市場頗富潛力的鮪魚、秋刀魚、魷魚轉進泰國等地市場後產值已大幅提升，也有意讓虱目魚依循相同模式進軍東南亞市場，秉持只要能打開銷路、有錢賺，無論「西進」抑或「南向」，總之只要能夠經濟面能立竿見影、收入增加都是好政策的立場²。此外，契作的慘澹退場也造就了台灣民意對於大陸觀感的兩極端發展、並影響台灣的對外及兩岸政策：一群是意識到大陸市場不可或缺的台灣人民，轉而尋求恢復與中國經貿上更為緊密的聯繫；另一群則是更加堅定其反中意念的南台灣綠營支持者，連當初原本消極不投票或投廢票的選民，其政治立場會更不信任中國，態度上也會顯得比 ECFA 簽定前更加不支持兩岸交流政策。

儘管台灣與中國大陸並沒有官方正式的經貿協定，但根據台灣行政院 2018 年在對外貿易與投資項目所公布的進出口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大陸早已成為台灣對外的最大貿易夥伴，台灣對外的最大貿易順差便是來自中國大陸：出口方面，2017 年我國第 1 大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含香港），占整體出口比重 41.0%，出口金額較前一年增加 16.0%；第 2 大出口市場為東南亞國協（10 國），占整體出口比重 18.5%，增加 14.2%；第 3 大出口市場為美國，占整體出口比重 11.7%，增加 10.3%；第 4 大出口市場為歐洲，占整體出口比重 9.2%，增加 11.2%。而在進口方面，2018 年我國第 1 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含香港），占整體進口比重 19.9%，進口金額較 105 年增加 13.8%；第 2 大進口來源為日本，占我整體進口比重 16.2%，增加 3.3%；第

² 王昭月，「大陸契作歸零 台灣虱目魚『轉向求生存』」，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191682>。2018 年 6 月 11 日

3 大進口來源為歐洲，占整體進口比重 12.1%，增加 8.7%；第 4 大進口來源為東南亞國協(10 國)，占整體進口比重 12.0%，增加 12.0%³，足見對大陸之出口成長率是帶動台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來源，因此台灣不得不另尋發展空間與合作對象，以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振興國內經濟與國際貿易發展，又東南亞地區具有地緣優勢、又是台灣進出口貿易的主力地區，因此做為平衡、甚至取代大陸市場的「南向」選項漸漸成形。

參、台灣對外關係與新南向政策的形成

誠如前述，台灣對外關係受到中國外交政策及兩岸關係的影響甚鉅，除了大陸對台政策在 2016 年之後明顯緊縮在經濟層面衝擊台灣之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吸引世界目光及周邊地區爭取合作，某種程度也壓縮了台灣的國際空間。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是其第二次的改革開放，解決其國內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還能帶動出口經濟，且由於沿線多為發展中的國家，基礎設施明顯不足，因此透過中國的主導帶動投資與產業的轉移，不但能加強貿易擴大所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對中國而言是有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對周邊沿線國家而言更是促進建設與發展的大好機會，更重要的是透過區域內對貿易與生產要素的協調規劃、交通網路的連結、以及商品、資金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可望將亞洲地區與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歐盟連結起來。

於此同時，為擴大台灣國際舞台，同時分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並連結在地需要以帶動台灣經濟，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8 月 16 日

³ 行政院網站對外貿易與投資 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1DA8EDDD65ECB8D4&sms=474D9346A19A4989&s=8A1DCA5A3BFAD09C

召開第二次「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上通過「新南向政策綱領」，以「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的核心精神，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和「區域鏈結」四大工作面向著手推動強化與新南向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全面啟動相關執行工作（徐遵慈、李明勳，2018）。

相對於過往李登輝前總統與陳水扁前總統時期所提出的兩波南向政策，蔡英文總統「新南向」執行上更為多元、創新，不僅僅只著眼於經貿層面的利益，也強調以人為本的價值、與雙方的互惠互利的精神。此外，「新南向」的交流互動對象也從過去東協擴大至南亞地區與澳洲、紐西蘭這些人口紅利持續增加的國家，並在經貿合作之外廣開教育、觀光、非政府組織等領域之交流，以務實融入區域整合的做法來提升我國對外關係的格局與多元性，以呼應當前印太地區的蓬勃發展，同時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及市場的地位和競爭力。

儘管新南向市場中的不同國家，從政策法規、產業環境與文化等方面來看都不盡相同、挑戰頗大，但從歷史的角度與地緣性來分析，新南向國家的社會文化結構、自然環境條件比起歐美歐美與台灣的差異性較小，此外諸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皆有不少華裔移民與後代，在文化、傳統、語言和習慣上更為相似與親切，成為台商前往新南向市場投資發展時的有利基礎與重要考量。此外，由於新南向國家大多處於經濟成長趨勢，但產業的發展與結構則還不夠完整，若能透過建立跨國合作將台灣產業的優勢及經驗，例如在創新技術的產業化，及科學園區的建立與營運等適時帶入各國協助推動，台灣的「軟實力」不僅可以解決在地的問題與需求，同時也造就台灣產業的新機會、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與發展，從經濟面與產

業面來看可謂商機無限。

對於發揮台灣軟實力以推動海外市場，蘇孟宗(2017)舉農業上工研院結合屏東科技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共同合作開發「大氣電漿雞蛋殺菌應用技術」為例，不僅能夠減少水資源浪費，同時可取代傳統流程所需之手續，可配合產業發展應用於南向之大陸型國家中；而海洋產業上導入人工珊瑚養殖的環控量產技術，針對高值化的軟珊瑚原生種進行量產繁殖、萃取、製造與應用，則可擴大應用於生技、美妝、醫材等高附加價值產業，以提升海洋產業競爭力應用於南向之海洋型國家產業中，蘇孟宗直言「這些在南台灣場域成功的產業扶植案例，正呼應政府新南向政策中『資源共享』的面向，作為我國強化與新南向國家開展夥伴關係的利基，爭取雙邊或多邊合作機會」。

就從某種程度而言，台灣的「新南向」與中國「一帶一路」有異曲同工之妙：比較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兩者無論是場域或是項目均略有重疊之處可能形成競爭的關係，但一帶一路投入的資金與規模之大卻遠遠凌駕在台灣之上，是否又再度壓縮台灣對外關係的發展？實際上除了沿線基礎建設較為弱勢的國家對於「一帶一路」較為熱衷，其他國家包括澳洲、印度和日本則正在商討建立一個聯合區域基礎設施計劃來作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顯示出周遭大國對中國的忌憚，想提出對抗中國在區域內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反制之道，進而防堵中國主導全球貿易新秩序的布局。此外，在 2018 年 11 月剛落幕的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高峰會中，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說中直接警示小國切勿受到「一帶一路」貿易基礎建設計畫所引誘，中國貧窮國家提供建設和發展項目的貸款不僅不透明，還外加很多附帶條件，最終將使窮國債臺

高築、處境更為艱難。不僅美國不支持，連歐盟的態度也依舊十分謹慎，法國總統馬克宏先前便早已表示雖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但認為這條路不應該是一條「新的霸權之路，讓所經過的國家都成為附庸」⁴；就連因為「脫歐」而急於在全球尋找新機遇的英國首相梅伊也在訪問中國時拒絕書面支持「一帶一路」，並表示「歡迎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但仍舊強調「透明度」與「符合國際標準」的立場⁵，可見目前的國際氛圍中並非全然沒有台灣可發揮的空間，只是在東南亞與南亞區域，中國大陸早已是這其中許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與外資來源國，確實可能因顧忌中國大陸的態度而使這些國家不敢或不願與台灣進一步交流與發展，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新南向政策之分析報告便指出「雖然臺灣政府不斷強調新南向政策並非要取代兩岸經貿，但中國大陸仍對新南向政策的動機存疑，中國大陸有可能脅迫這些國家選邊站，而使新南向政策土崩瓦解」（徐遵慈、李明勳，2018）。

此外，謝瑞明(2018)更提出民調結果直言新南向政策在政府多項補助的支持與推廣下，其實並不受國人青睞，其吸引力依然逐漸下降，包括比較 2018 年與 2017 年民調顯示國人前往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四個主要新南向國家的意願都下降，其中，印尼的跌幅最高，從 13.8%下降為 7.8%，降幅達 6%，而越南雖是四個國家當中台灣人前注意願最高的國家，當依然由 2017 年的 18.5%，跌至 2018 年

⁴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馬克宏訪中 稱一帶一路不能為新霸權鋪路」，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67146>。2018 年 1 月 9 日

⁵「美歐大國紛紛反制『一帶一路』四面楚歌？」，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120078>。2018 年 2 月 19 日

的 13.8%⁶，顯見政府意欲擺脫依賴中國、發展多元對外關係所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不僅有中國因素和其所倡議的一帶一路這個「外患」、還要面對國人不甚支持的「內憂」。

肆、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轉變

隨著兩岸關係發展的變化、台灣政黨輪替之後對大陸政策及對外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也因應調整，特別是在 2016 年 5 月之後，中國對台政策有明顯地「不變」與「變」：

一、持續不變的「文攻武嚇」：

延續早期對台文攻武嚇模式，包括在國際上宣傳打壓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之文字宣傳；實施南海大閱兵、台海實彈演習、空軍飛越台灣海峽中線等。2018 年 3 月 16 日台灣與美國簽屬《台灣旅行法》後，中國便是以傳統文攻武嚇方式，大力抨擊台灣不承認九二共識將招致不利後果。

二、新啟動向「下」扎根、重視「天然獨」：

中國大陸自 2016 年開始將「三中一青」列為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積極接觸台灣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階層及青年族群，並在 2017 年微調為產業與青年，且從「間接」轉為「直接」接觸。

「天然獨」在兩岸分治的歷史中是個全新的議題，過去當政府或民間重申「兩岸一家親」時，乃是從「歷史與文化」出發，主張絕大部分的台灣居民都是自大陸渡海移民中國人後代，且主要為閩粵一帶的漢人移民，所謂文化乃由生活所創造，因此基於歷史上曾有

⁶ 謝明瑞(2018)，<https://www.npf.org.tw/2/19025?County=%25E5%25AE%259C%25E8%2598%25AD%25E7%25B8%25A3&site=>

共同生活經驗所產生傳統中華文化之認同、以及延伸發展出閩台文化一體，均強烈地體現在包括語言、宗教、民情習俗等生活習慣上，例如台灣民間戲曲歌仔戲、布袋戲等，又兩岸媽祖信仰的往返交流、開台聖君鄭成功的慶典活動等，在在顯示兩岸社會人民文化同源同流、在生活上緊密聯繫切割不斷，存在「共生基礎」。然而，這種共生基礎與文化認同對新一代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年輕人而言並不存在！嚴格來說，兩岸關係中台灣認同中華傳統文化且真正與中國大陸有文化共生的，乃是 1949 年之後移居至台的外省團體，歷史因素造成此一族群與故鄉有緊密的家族和社會連結、以及深厚的傳統和文化熟悉度，再加上掌握較多且較大的政治權力，因而造就了此一外省族群不僅政黨屬性較為一致親中，且在兩岸經濟交流中也成為主要的受惠團體。但從 2014 年 3 月爆發台灣史上可謂規模最大的「太陽花學運」，學生不僅佔領國會，並帶動 50 萬台灣人民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表達反對服貿協議的訴求，反映出一個重要的事實：新一代台灣年輕人並沒有與中國大陸的實質連結，光靠「感性訴求」這樣的基礎並不足以說服台灣年輕人認同兩岸人民共生共存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因此兩岸急需「重塑共生條件」。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國大陸宣布 31 項惠台措施，不同於先前 ECFA 時期以經濟誘因為主，2018 年的惠台政策改採直接面向台灣民間，含蓋內容包括金融、就業、教育、醫療、影視等多種領域，範圍更大、操作也更為細膩，其中，12 項是有關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19 項則是有關逐步為台灣同胞提供與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尤其重視「天然獨」年輕人的需求，希望不只是讓台灣年輕人了解大陸情況、願意往中國大陸流動，更要讓台灣人有意願

留在大陸求發展。此一惠台措施是中共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對台政策的重大宣示之一，無論這是重塑共生連結的策略、還是統戰的手法，中國大陸大學對台招生採免試均標，在台灣學測達均標以上便能提出申請，且提供相關獎學金的條件相當優渥，再加上目前台灣年輕人畢業求職起薪偏低僅有只有 22K，中國大陸提供相對優惠的條件與機會，可想而知台灣年輕人前往中國大陸的意願應相對地提高。

分析惠台政策的內涵，惠台 31 條具體措施主要可分為企業與個人兩大部分：企業方面，台資企業可參與「中國製造 2025」，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此外，台商也可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建。而在個人方面，提供在大陸不管是學習、創業、就業、還是生活的台灣人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包括開放 134 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讓更多台灣專業人士取得在大陸從業的資格。儘管惠台 31 新政策給予台商、台生、台青等各種創業者與大陸人「公平競爭」的機會、「台灣人當自己人」的權利，但參與各種項目並非全無條件，其重要前提的便是認同中華文化為基礎，謝明瑞(2018)指出「為了達到大一統的目的，在兩岸同為中華民族的大前提下，惠台政策強調中華文化的重要性，亦即在不觸及政治認同等前提下，希望能與台灣人達成心靈契合，認同中華文化，並以文化為基點，做為兩岸統一的基礎」。這便是前述中國大陸積極重塑兩岸共生基礎之道。

綜觀惠台政策 31 條條文的內容，對台商、台青而言相對有利，但其磁吸效應卻可能造成台灣國內人才嚴重外流、不立於台灣長期政經發展！儘管惠台政策的實質效益仍有待觀察，但根據遠見雜誌針對「大陸 31 項惠台措施」所進行的民意調查已然發現天然獨對中

中國大陸的認同感已產生改變：過去被認為最支持民進黨的 18 至 29 歲天然獨族群，在 2018 年的調查中，是所有年齡層中認為大陸對台友善比例最高的族群(40.8%)、也是到大陸發展意願最高的族群(59.6%)，並起在惠台措施實施以後，更是有超過 61.6%受訪者表示大陸發展的意願隨之提高，顯示「天然獨」是可以靠後天政策的推動來改變其立場的。

伍、結論

台灣對外關係的發展除了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與區域整合的變化之外，也受到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影響，根據中國大陸公布惠台 31 項前後的兩項調查的「2018 台灣民心動向大調查」、以及「大陸 31 項惠台措施」的民意調查顯示出中國以軟策略拉攏台灣民心的作法已呈現效果，台灣人包括統獨立場、出國發展意向、青年赴外發展、新南向政策、藍綠板塊挪移、施政滿意度、兩岸關係，以及九二共識的認知等，均已發生重大改變，台灣政府不能再漠視，也必須積極提出因應之道。

目前台灣除了透過推動「新南向政策」找出現階段、甚至是未來的成長動能，以帶動產業與經濟的突破，並同時提高台灣在區域市場和國際社會的地位和競爭力之外，同時也必須要重新審思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與互動模式。儘管就目前結構性的情勢而言，兩岸問題雖無法在一朝一夕解決，但透過建立互信的管道與合作的機制，雙方確實有機會從特殊的歷史關係和文化連結上，創造雙贏的兩岸關係。正所謂台灣與中國某種程度而言依然血脈相連、文化相融、城市相通、經濟相依，比起區域內任何其他的國家更有合作的基礎與互

利的優勢，因此期待雙方政府與人民能以更務實的態度與作法來突破現階段的僵局，充分溝通、相互理解、締造共識，以合作代替競爭，從文化與經濟的共生發展成為未來政治共生的基石，以創造兩岸關係的新紀元！

參考文獻

- BBC 中文網，2018，〈美歐大國紛紛反制『一帶一路』四面楚歌？〉，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120078>。2018年2月
19日
- 中國大陸國台辦，2018，《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
- 王建民，2010，〈如何改變南台灣與大陸的互動關係〉，《中國評論月
刊》十月號。
- 王建民，2013，《南台灣與大陸互動新局有進展》，華夏經緯網。
<http://hk.huaxia.com/tslj/jjsp/2013/09/3525927.html>
- 王昭月，2018，〈大陸契作歸零 台灣司目魚「轉向求生存」〉，聯合新
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191682>。2018年6月11
日
- 王塗發，2012，〈評論「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台灣安
保通訊》第24期。
- 自由時報，2018，〈馬克宏訪中 稱一帶一路不能為新霸權鋪路〉，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67146>。2018年1月9日
- 行政院網站對外貿易與投資，2018，
[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1DA8EDDD6
5ECB8D4&sms=474D9346A19A4989&s=8A1DCA5A3BFAD09
C](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1DA8EDDD65ECB8D4&sms=474D9346A19A4989&s=8A1DCA5A3BFAD09C)
- 李棟明，1970，〈居台外省籍人口之組成與分布〉，《台北文獻》11-
142:62-86。
- 林祖嘉，2006，〈1987 年以來兩岸貿易與投資環境的變遷與發展〉。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s://www.yumpu.com/cs/document/view/49790576/1987->
- 香港文匯報，2017，〈南方日報：「一帶一路點燃世界共榮之光」〉，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5/10/CH1705100016.htm>，2017
年5月10日
- 徐遵慈、李明勳，2018，〈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執行成果與未來展望〉，
《經濟前瞻》雙月刊，第172期。
- 張茂桂，2014，〈兩岸紅利誰獲益？如何矛盾？〉，《自由時報》6月23
日。
- 辜樹仁、馬岳琳，2018，〈中共31項惠台政策是商機還是威脅？〉，
《天下雜誌》643期。
- 黃清賢，2012，〈從理性與感性角度分析大陸對南台灣的契作模式〉，
《中國評論月刊》十月號。
- 黃智慧，2014，〈從服貿「經濟」的盲點，看族群共生的未來〉，《全
球客家研究》11-3:279-300。
- 楊志誠，2012，〈全球化世紀的兩岸關係：城市主義、文化網絡及經
濟整合〉。《海峽評論》264。<http://www.haixiainfo.com.tw/264-8627.html>
- 經濟部，2013，《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台北市：經濟部。
- 遠見雜誌，2018，〈2018台灣民心動向調查，看蔡英文執政650天〉，
2018年2月。
- 遠見雜誌，2018，〈大陸31項惠台措施「民意調查」〉，2018年3月
- 賴寧寧，2011，〈429天追蹤中國錢進台南學甲，內幕紀實〉，《商業
週刊》1249期。
- 謝明瑞，2018，〈中國大陸31項惠台(對台)措施對台灣的影响〉，國

家政策研究基， <https://www.npf.org.tw/2/19025?County=%25E5%25AE%259C%25E8%2598%25AD%25E7%25B8%25A3&site=>
蘇孟宗，2017，〈新南向連結在地需求，帶動台灣經濟〉，工業技術研究院市場產業情報。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1&MmmID=5000&MSid=745167217260051225>



英國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歷史發展與未來展望

陳希宜*

摘要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各大區域莫不積極尋求與周遭鄰近國家合作，以振興彼此的經濟發展、並提升自身區域在世界的影响力。其中，歐洲區域整合的模式與經驗最為成功成為眾人學習與模仿的機制，區域主義的發展也因此受到蓬勃探討與研究，而歐盟也更是成為當今國際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國際組織之一。

英國傳統以來在歷史上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等面向，在歐洲以及全球發展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歐洲推動整合的過程中更是發揮著領頭羊的影響力，然而2016年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對區域發展卻投下了一顆震撼彈：是否區域主義已走到盡頭？區域整合已不受青睞？

本文試圖透過文獻探討，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檢視英國參與歐洲整合發展的歷程、與歐盟的關係，並釐清英國脫歐的緣由，以及脫歐之後對英國本身、以及歐洲區域整合發展的進程將有何影響？以理解英國與歐盟，以及區域整合機制在全球發展下一個階段可能的走向與展望。

關鍵字：區域主義、區域整合、歐盟、脫歐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

Abstract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world after WWII. Those who suffered from the war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working with countries nearby to boost mut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model is considered the most successful case so far. European Union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s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are also greatly learnt and studied.

The United Kingdom us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leading powers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urope. However, the decision of Brexit made in 2016 has shaken the whole Europe. Whether regionalism or regional integration had come to the end was loudly debated than ever.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Britain's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EU in the history and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y Britain insists to leave EU. It is anticipated the influence of Brexit to Britain as well a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could be clearly analyzed and understood. Moreover,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cheme could be predicted.

Keywords: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Brexit.

壹、前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發展呈現幾點特色，包括各地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大批新興獨立國家紛紛宣告成立，而國際體系也從多極體系走向美、蘇對抗的兩極體系。

國際社會、特別是飽受兩次世界大戰摧殘的歐洲地區，在戰後均意識到於振興國家發展的必要性，因此致力於重塑包括政治與經濟的秩序以追求穩定、繁榮與發展，然而面對冷戰開始、兩大陣營的對峙中，各國也了解到難以單靠本身力量已維持生存與發展的國際現實，因此主動與鄰近國家加強聯繫以形成集體力量與共識，藉此振興彼此的經濟發展、並提升自身區域在世界的影響力，相關理論包括區域主義、功能主義、聯邦主義等，便是在如此的背景下產生並且受到蓬勃探討與研究，而各種相對應的合作機制也因應而生，其中，規模最大、成效最鮮明的區域整合機制莫若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

歐洲區域整合的模式與經驗被視為最為成功、且最多人企圖學習與模仿的機制，而歐盟更是被認為是當今國際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國際組織之一，其中，在歷史上影響歐洲發展最深、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程度最活躍的國家之一英國，卻在 2016 年選擇退出歐盟，不僅在一直以為加入歐盟是「單程車票」的歐盟成員國中引起震撼，更在國際社會中引發質疑，是否區域整合已失去初衷的效果，參與國家再難從中受惠？

本文試圖透過理論的回顧，探討區域整合的意義與存在價值，並藉此檢視英國參與歐洲整合發展的歷程以及與歐盟的關係，以釐清其脫歐之因，以及脫歐之後對英國本身、以及歐洲區域整合發展

的進程將有何影響？以理解英國與歐盟，以及區域整合機制在全球發展下一個階段可能的走向與展望。

貳、區域整合的興起

一、區域、區域化、與區域主義

什麼是「區域」？從文獻中可發現「區域」一詞的定義非常模糊，幾乎各家學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解釋與標準，例如 Russett 便利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將區域進行系統性分析並提出下列辨別標準（陳仲沂，2011：172-174；梁銘華，2008：211-251）：

1. 社會與文化相似的地區：其區域的組成國家在內部屬性方面類似。
2. 國家的政治態度或對外行為相似的地區：判斷的標準乃是依據各國政府在聯合國的投票立場。
3. 政治上相互依賴的地區：各國彼此間透過超國家或政府間的政治制度關係而相互連結一起。
4. 經濟上相互依賴的地區：區域內部的貿易乃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份。
5. 地理位置上鄰近的區域。

而 Cantori 和 Spiegel 則是將區域視為世界各個不同的地區，由地理上接壤鄰近的國家，形成在外交事務上相互連結的集體單位，例如歐洲、東亞、東南亞等概念。這些國家不僅因為地理位置相關聯而結合在一起，並因為地理上自然的關聯性而形成區域認同，因此兩位學者將「區域」定義為：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的互動的國家，享有共同的種族、語言、文化、社會與歷史聯繫，且對體系外的國家採取較一致的行動和態度（陳仲沂，2011：172-174；梁銘華，2008：211-251）。

Hettne 和 Soderbaum 則提出廣義開放性的「區域」定義，認為區域應該超越傳統「國家中心觀」的思維，轉而探討區域性（region area）的問題，因此他們提出將區域性分為五個漸進的層次（陳仲沂，2011：172-174）：

1. 區域地區：此為區域性的第一個層次，不存在任何組織化的運作。
2. 區域複合體：進入區域性進程的萌芽階段，區域內相互依賴程度提高，並產生區域認同，但對於重大安全議題或經濟議題，仍受到國家體制的抑制。
3. 區域社會：這是區域化發展與深化的關鍵層次，除了國家之外，許多不同的行為者也紛紛加入在不同的社會層面與議題討論上，形成多層面的區域化。
4. 區域共同體：區域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體」，有明確的認同感與制度化，以及非正式的行為者能力、合法性和決策結構，並出現國家與區域認同相互矛盾的觀念。
5. 區域國家：此乃為區域化的最高層次，類似民族國家但不等同於民族國家，區域內同質化不是與特定的種族模式一致的文化標準化，而是多元文化內種種差異之間的融合力。

其他也有學者如 Hurrell 認為「區域」乃是想像的共同體，伴隨著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而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因此，世界上並沒有所謂自然天生的區域（吳鵬翼，2013:92）。

綜觀以上，儘管各派學者的認知與解釋不盡相同，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項目前較多學者普遍同意的共通點：「區域」的概念是指由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基於地緣鄰近的關係，又彼此擁有相似的歷史、經濟、文化、政治、社會背景等認同因素，可自然發生或可以政策刻意形成較為緊密的內部活動與外部交流，並產生一定程度相

依互賴的行為。根據這樣的定義，世界便可明顯劃分出不同的區域，包括歐洲，東亞、東南亞等。

在界定明白區域的概念之後，接著便需要討論在區域內可能形成的整合運動，包括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區域化與區域主義主要差別在於其運作的模式，前者指的是區域內的國家由於各自的現實需求而產生連結，在政治與經濟上自然互動與合作，是一種自發性「由下而上」的運作方式；而後者則是由國家有意識的主導，「由上而下」推動產生具有功能性的區域認同(Hanggi, 2006:4)。

就區域化而言，Mansfield 與 Milner 將其劃分為四個時期(蕭力愷 2007：93)：

- 1.1850 年至 1890 年：從歐洲工業革命開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
- 2.1920 年至 1945 年：自宗主國對其所屬殖民地實施貿易性優惠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
- 3.1945 年後：在歐洲與東亞區域的經貿量與規模大幅度地增加，超過一半以上的世界貿易均在此優惠性貿易措施下實現。

第四時期又可分為兩階段：

- (1)前階段為 1950 年至 1970 年：殖民地獨立運動與美蘇冷戰時期；
- (2)後階段為 1990 年後：冷戰結束後，在美國的支持與影響下，各地區逐漸提高相互依賴的層次，此時 GATT 以後其後 WTO 開始逐漸提升其影響力，使得區域整合成為民主改革及鞏固經濟的手段。

由上述可見，區域化的興起與拓展除了政治因素的考量之外，更大程度上是與經濟發展的需求息息相關。

其中，在 1950~60 年代間，為了因應當時戰後國家振興與國際社會發展的高度需求，許多鄰近國家選擇以簽約合作的方式建立具有不同功能性與目的性的區域組織，其中又以西歐經濟共同體的建立最為積極、發展成效也最為卓越，這也是今日歐盟建立的基礎，不僅對歐洲地區、同時也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的莫大的影響，區域主義就此蓬勃興起，而針對這些其他區域組織發展也出現了一波波的研究熱潮。

研究區域主義的學者眾多，提供了各種不同層次的理解與定義，例如美國 Nye 認為區域主義就是以區域為基礎，國家之間形成集團 (Nye, 1968:vi-vii)、中國學者馬嫻(2002:10)則提出區域主義具有國際性、地緣性、和組織性，分別顯示區域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範疇、存在範圍、以及活動空間；Kupchan(1997:209-238)定義區域主義是一群對區域有共同認同感的國家結合、而 Gilpin (1994:330)則一步指出區域主義是在特定地理範圍的國家們，透過經濟合作或聯盟的方式，提升自身在區域內的份量、改善與已開發國家地位，而主要的合作方式包括建立自由貿易區。此外，還有學者如 Bono(2002:117-118)則提出區域主義同時含有區域化與區域整合的概念，其中，相對於其他學者認為研究區域組織的必要性，他認為區域主義更重視的是區域化的形成過程。

早期區域主義的實踐被視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一種區域合作理論和實踐的總稱，最主要目的乃是希望透過簽約合作的模式，以集體合作的方式來追求減少貿易障礙、促進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以維護本國與本區域的利益。而自區域主義興起後，相關研究也絡繹不絕，首先因應而生的乃自 1950 年代區域主義興起後、針

對歐洲區域組織發展的研究，又被稱為是第一波區域主義、傳統區域主義或舊區域主義，而相關研究一直持續熱絡發展了十多年，而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區域主義也在這一間斷實踐擴展到了全球，直至 1980 年代末，冷戰終結、全球化浪潮興起，國際政治經濟互賴程度與日俱增，科技、文化、社會跨國交流日益頻繁，世界經濟導向漸趨以地區為中心聚合發展，區域化和區域主義現象越來越興盛，帶動了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的研究，又稱為第二波區域主義、或新區域主義。

若分析區域主義的發展、並比較新舊區域主義的異同，可見傳統區域主義形成於兩極冷戰體系期間、建立在歐洲整合的經驗與理論基礎上，由大國從外部創造出來的來保護自我發展，並以國際合作或整合的有限或特定議題為主，強調經濟、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同質性，進而演化出區域認同和區域整合（李一平，2003：30-1）；但新區域主義則是在多極國際體系中，來自內部自發形成的過程，以開放與自由的核心價值追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僅涵蓋了豐富的行為對象，除了國家行為者外，包括國際組織、國際建制、地方政府、國內社會、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甚至是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此外也著重於更多元的國際合作議題，從傳統的經貿議題溢散至環境、社會、文化以及政治或安全等全面性跨國議題，彼此互動關係及區域治理模式的複雜性都較傳統區域主義難度高。

新區域主義的代表學者 Hettne(2003:28-29)便評價這樣的區域整合運動有著超越傳統的外溢動態發展，因此以「社會建構」的邏輯來理解「區域的發展過程」更加適當，他提出了五種層次來表示越來越深廣的發展程度，例如：

1. 強調地理上的地域特性的「區域空間」。
2. 強調跨部門互動關係的「區域複合體」。
3. 在文化、經濟、政治與軍事上，「有如社會般互動關係」的區域社會。
4. 當現有組織架構足以促進社會溝通、凝聚價值時，將建立一個區域層次跨國公民社會的「區域社群」。
5. 強調一個更具固定特性決策結構的「區域制度性政體」。

總結學者們的意見，可見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可以說是剛好相對的概念，誠如上述，區域化由民間自然形成「自下而上」運作的政治、經濟互動；而區域主義由政府主導「由上至下」透過協商訂定合約、成立機構或建立制度性合作機制，兩者在當今全球化浪潮的催化下都在快速發展。而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可謂是同步進行(郝培芝、羅至美，2007:381)，特別是因為歐洲區域具有相似的歷史、文化、信仰等背景，相對於其他地區更具天然融合力且共享興衰，因此在二戰之後各國的領導人更具有推動整合的共識與企圖，以期振興歐洲經濟發展並發揮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區域主義因而在此地區蓬勃發展，並展開不同層次的整合行動。

二、整合理論的三大學派

整合理論起源於 1940 年代，在經歷二次大戰與冷戰對立的國際結盟政策後，各方學派更是蓬勃發展，且大多以當時的國際組織的發展為研究對象，學者高朗將之歸類分析，提出整合理論可分為三大主流學派，包括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聯邦主義(Federalism)，儘管三大學派均以和平手段為訴求，但對於達成整合的途徑卻秉持不同的論點與假設也不盡

相同(洪丁福, 1996: 128-129)。

功能主義最早由學者 Mitrany(1975)提出, 被視為整合理論的源頭, 也被認為是所有研究整合理論相關論述中最重要根基, 其研究重心在於國際關係內部的經濟與社會議題, 是第一個討論從民族國家轉向國際統合的整合理論, 功能主義中的功能是指就單純性的「功能性」整合, 所謂的「功能性」就是透過跨國界性組織來整合各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貿易等面向, 解決單一民族國家所無法解決的層次。

Mitrany 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組織的失敗加以探究後原因後, 認為主要的關鍵原因乃是因為儘管國際聯盟雖然創立許多個委員會來整合國家間的事務問題, 如裁軍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託管委員會等, 但在運作上卻大大挑戰了當時國家主權的治理, 因此他提出所謂的「整合」應當著重於技術層面如何務實地解決共同的需求與問題, 而非在於政治層面上引起國家主權被剝奪的疑慮, 換句話說, 若要達成深度整合, 就必須從著眼於如何增進各國間共同的現實利益, 因此處理如經濟、技術、醫療、勞動領域等的專門性國際組織, 譬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主掌各個領域的跨國性質團體將更具成效, 否則國家主權的概念畢竟早已根深蒂固於民族國家之中, 若要勉強就政治層面上實現整合, 恐怕也是表免上的統合、難以持久推動(Mitrany, 1966)。

因此, 傳統上功能主義的擁護者認為民間非正式的交流合作是日後達成政治上的整合的基礎, 若沒有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力量與經濟協助, 政治上的整合目標將難以達成。因此功能主義所提的「合

作」概念與區域化概念相似，皆是主張「由下而上」地蔓延開來，從民間技術性交流而漸進式進入複雜的官方正式合作的方式，最終影響政府部門及民族國家的主權概念，促成較大規模的國際整合。

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則是於 1950 年代間修正功能主義而生，企圖解釋功能主義在整合上的解釋不足的部分。新功能主義強調政府、菁英階級、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並在分析途徑中加入了「政治權力」與「經濟現實」的考量，主張國際體系下的合作關係並非僅以非正式性合作如此的單一面向就可以解釋清楚，功能主義架構下所謂的非政治性合作在現實層面上並不容易達成，例如其所強調「技術層面」的專家學者等合作交流，也常需要政府的資金與人力涉入其中，並非可以全然維持非官方的色彩與性質。此外，就算國家間可以因共同利益而進行整合，但若政治精英領導階層的主觀意願不明確、又缺乏政治性的超國家機制提供各利益團體協助以推展進程，其全面地、深度地整合的目標最終恐將淪為一場空談（胡全威，2002）。

新功能主義學者 Haas (1960)也進一步就其長期觀察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發展提出看法，認為國家間合作的開始並不是從功能主義所說的「共同需要」開始，所謂的共同需要指的是什麼？由誰來決定？都是含糊不明的概念，事實上，利益是會受到外在結構的限制，且因為個人認知而定義不同，甚至帶有競爭性，因此並沒有所謂的「共同需要」，反而是因外在環境結構制約下而形成的各種不同的個人或團體利益(Haas, 1964: 33)。Haas 認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才是整合的起源與關鍵，因此，包括歐洲煤鋼組織和歐洲共同體都是符合各國經濟利益而產生、且得以

長久推展的國際性組織(Hass, 1964: 47-50)。然而經濟層面的整合只是為達成政治層面整合的過渡期而已，藉由經濟層面的整合由簡入繁、由小到大的方式，漸漸將合作項目擴大到其他領域，最後則是才能影響到政治層面以達成整合的目的，此即為「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概念。

而不同於功能主義學派主張「由下而上」的模式，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代表學者 Jean Monnet 主張整合必須擁有明確的目標，並建立一套完整的憲政措施及中央機構，利用政治力量來執行「由上而下」的推動，才有可能有效實現整體國家間的共治目標。聯邦主義認為經濟上的整合未必然可以促成政治上的整合，反而是政治上透過「超國家(supranational state)」機構實質控制並調和各成員國間的利益，但同時又讓成員國依然享有一定限度自治權力，才能發揮最大的整合效應，當今國際社會例如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都是實行聯邦主義這種同中有異政治整合成功的典範。

王玉葉(2000:9-10)也指出聯邦主義的精神表現在「根留地方」，讓所有決策儘可能接近民意，以保全地方社會文化的多樣化、滿足個人的需要，因此下級政府之地位與責任應儘可能發展，以形成一個既合作又競爭的組織結構，如美國與德國等這些典型的聯邦國家，其聯邦權力皆採列舉主義規定於憲法之中，而未列舉出的權力則仍保留給各州或各邦。而歐盟也是採取相同模式，將權限以列舉的方式明定於條約中，因此，歐盟僅擁有非常有限的部分國家主權，一旦形成決策之後，並無法直接執行，而是需要仰賴會員國政府去積極實現決策，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可限制歐盟對會員國採取不必要之干預行為；另一方面則也能同時減輕歐盟下各機構的工作負荷量。

綜觀整合理論的三大學派，也呈現如同區域化「自下而上」與區

域主義「由上至下」相左的意見，誠如前述，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同時都發揮了作用，但在歐洲區域特殊的地域、歷史、文化等背景及國際現勢的連結下，政府間基於利益與共識「由上而下」地推動整合運動也越發顯著，為了謀求彼此長遠的共同利益，歐洲國家願意犧牲部分國家主權及短期經濟利益，在國家之上設立一個超國家組織來進行整合，並依照階段性目標，藉由集體合作的力量達成單一國家所無法達成之目標，逐步從經濟整合為目標的歐洲煤鋼鐵共同體，逐步邁向政治整合、甚至全面性整合的歐盟。

參、英國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進與退

一、英國與歐洲區域整合的關係

1951 年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國、西德，義大利六國基於共同利益提出建立歐洲煤鋼鐵共同體被認為是歐洲區域整合的先驅，緊接著在 1957 年建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則是更進一步的擴大區域整合的合作層面與項目。英國在 1963 年首次提出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卻遭到了法國的杯葛，法國反對的理由主要有下列兩點(王泰銓，2008：11-12)：

1. 從歷史軌跡來看，就歐洲內部而言，英國傳統上與歐洲大陸的國家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但對外英國卻反而與美國長期保持過緊密友好的關係，令人質疑英國若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是否真能遵循區域整合的原則，以歐陸共同利益與發展為優先考慮？

2.再者，英國與法國在歷史上長久以來即是競爭的關係，又兩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表現與實力相當，因此若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法國在體系內的地位以及話語權勢必受到威脅，法國自然不願放棄現在有的優勢因而否決英國的申請。

英國在1967年再度提出申請，卻依然遭到法國的否決，直至1973年才正式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至今參與歐洲整合也已經超過四十年了，然而誠如之前法國所憂慮的一般，這期間英國對於歐洲區域整合的事務往往為維護自身主權地位而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甚至抗拒參與，例如在對外政策方面英國一如往常採取親美更甚於親歐的立場，而對歐洲內部其首相柴契爾夫人強勢主張經濟上支持歐洲共同體進行整合，但政治上卻反對朝超國家聯邦型態發展。此外，柴契爾夫人又以歐洲共同體的運作過於僵化，充斥干涉主義與保護主義使得英國不僅形同邊緣化、難以發揮影響力，且所承擔的預算遠高於應得之利益為由，就年費問題與歐洲共同體進行談判，並成功爭取回1979-1983年間溢支會費的三分之一，且留下名言「我想要回我的錢」(王泰銓，2008：28-30)。

甚至在歐洲區域整合取得大幅度進展成立歐盟之後，英國在歐盟的表現依舊一如往常地呈現對歐洲國家的認同感不足與忠誠度不佳，例如1985年德國、法國等簽署申根公約時英國並沒有加入；1992年歐盟爆發第一次貨幣危機時英國宣布退出歐洲貨幣體系，之後也拒絕加入單一貨幣「歐元」、堅持繼續使用象徵主權的英鎊；而當2014年歐盟要求英國補繳21億歐元時，首相卡麥隆也揚言拒絕付款。針對英國拒絕融入歐盟內部整合的種種行為，吳振逢(2017：32)認為「英國在歐洲聯盟裡始終扮演一個反對、異議和剎車的角色，鮮少提出一個積極統合的政策」。

為何英國既是歐盟的一份子，在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事務上卻表現得與其他會員國如此格格不入與疏離呢？回溯區域整合運動相關理論所提到基礎與前提：「區域的概念是指由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基於地緣鄰近的關係，又彼此擁有相似的歷史、經濟、文化、政治、社會背景等認同因素，可自然發生或可以政策刻意形成較為緊密的內部活動與外部交流，並產生一定程度相依互賴的行為」，若以此標準檢視英國與歐洲大陸國家們的關係即可發現英國海島位置的特殊性與困境：英國與歐洲大陸以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相隔，缺乏與歐陸國家的天然連結，在歷史上與地理上的互動終究比不上歐陸國家彼此間的密切，也難以與歐陸國家共享陸地資源，因此，英國放棄登陸發展，轉而將自己定位為擁有全球視野的海洋經濟領導者，全力開發海外殖民與對外自由貿易。

先天自然連結不足再加上後天發展目標使然，致使英國與歐洲國家間的合作關係與條件較為薄弱，不僅英國自己意識到與歐洲國家的疏離、歐洲國家也是如此看待與英國的關係，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便曾在1930年2月15日接受採訪時表示「英國與歐洲在一起、但英國並不屬於歐洲」；而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也回以「英國人和歐洲大陸人在包括民族性格、國家結構和生活環境等方面確實不一樣」(Cowell, 2011)¹。

二、英國脫歐之因

儘管英國對於歐洲區域整合的事務一直是若即若離的態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國竟然在2016年6月23日針對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且在脫歐(Leave)與留歐(Remain)的選項上，以51.9%比

¹ 邱吉爾接受採訪的原文為「We are with Europe, but not of it,」Winston Churchill wrote in 1930. 「We are linked but not compromised. We are interested and associated but not absorbed.」

48.1%通過了脫離歐盟的決定(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016)。英國脫歐震驚全球，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在接受 BBC 的訪問中表示他曾對此向卡麥隆提出質疑為何決定提出脫歐如此危險又愚蠢的公投案？然而卡麥隆的回應是「公投只為了一個理由-就是為了他所屬的政黨」(Boffey, 2019)。

回顧英國自加入歐洲區域整合運動之後，在經貿方面與歐盟國形成高度互賴的關係，同時也是員國當中獲得海外直接投資流入的最大受益者，而本身經貿與歐盟國家也呈現高度互賴的關係(張心怡，2015:43)，但近十年來隨著歐元危機、主權債務問題、恐攻事件頻傳、大量難民移入造成社會問題等，英國國內逐漸形成疑歐派與脫歐派的聲浪，認為英國付出的代價遠比從歐盟得到的利益多，並不值得。眼見疑歐派與脫歐派的聲勢日漸看漲已威脅到執政黨的選情，首相卡麥隆不得不在 2013 年 1 月 23 日選前向選民承諾一旦保守黨贏得 2015 年的大選，英國將重新針對英國在歐盟會員國的權益事宜展開談判以維護國家利益，此招果然奏效，卡麥隆在 2015 的大選一舉拿下國會大選最多席次達成完全執政，但因此不得不兌現承諾，針對脫歐與否舉行公投。

英國脫歐或許對人民而言是釋放政治與經濟層面長久累積的壓力與怨氣的，但對卡麥隆而言卻是錯估情勢的一盤棋。蘇宏達(2016)分析卡麥隆原本的計畫乃是「用脫歐公投搶奪獨立黨的票源，壓制黨內的疑歐派，同時挾此與歐盟其它廿七國談判，要求更多的讓步和優惠。但由於公投須要國會半數以上同意，當時是保守黨與自由黨共組聯合內閣，而自由黨和工黨皆主張留歐，遂不可能通過公投提案」。因此，卡麥隆在贏得大選勝利後正式致函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針對英國在歐盟的會員條件展開一連串談判，包括在歐盟的框架下讓英國享有更大的彈

性、同時免除更多歐盟法規的義務，以爭取英國人民續留歐盟。儘管卡麥隆所提出的多項議題都違背歐盟基本條款的原則，但最終四大談判目標都獲得歐盟各國的讓步、同意給予英國特殊會員國的待遇，然而這些優惠措施卻無法得到英國人民的認同，在6月23日公投71.8%的投票率中，有51.9%的公民無視歐盟的讓步，依舊選擇脫離歐盟(李淳、杜巧霞、葉長城、吳柏寬、李宜靜，2016)。

分析英國脫歐之因，可歸咎於近十年來英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所遇到的困境，引發人民強烈不滿，包括：

1. 移民與難民議題：由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26 條第 2 項載明「歐洲內部市場為無邊界的區域，在區域內應保證貨物、人員、勞務和資金的自由流通」，因此，在歐盟於 2004 年正式接納十個中東歐國家總人口數約為 7,500 萬人的加入後，英國每年均須接受約有數十萬人次的東歐移民人口湧入英國境內。然而自從 2008 年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2010 年歐債危機重挫英國經濟之後，英國景氣持續低迷，失業率更是節節攀升，人民在承擔沉重賦稅與失業壓力之餘，眼見大量外來移民不但享有社會福利及全民醫療健保，還與本地人民競爭工作機會，不滿的情緒自然日益高漲，特別是年長者，低收入、低技能等受到經濟衝擊較大的族群，對於這些外來移民者尤其不滿。
2. 政治因素：19 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曾說「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²，而這也是英國一向的主張-國家利益至上。然而在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架構下，英國並無法獨立行使政策來捍衛國家的最佳利益，

² 原文“Britain has no permanent friends, nor permanent enemies. She ha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例如疑歐派 LeaveEU 在 2015 年便提出質疑：英國在歐盟的代表僅僅佔了 4%、在歐盟立法的投票權重也只佔了 11%，如此輕微的比例將如何在歐盟體系下中為英國爭取最佳的利益呢？³ 倒不如脫歐之後擺不受歐盟法規的限制，英國自己依照自身的國家利益制定政策以重塑英國的榮景。

3. 社會福利因素：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報告指出英國每年必須繳交給歐盟的貢獻金額高達 84 億英鎊(李淳、杜巧霞、葉長城、吳柏寬、李宜靜，2016:23)，但歐盟預算回流至英國的卻不及一半，而且也不能指定預算用途，又歐盟會費逐年漲價，面對如此沈重的負擔英國人民不滿的情緒逐年累積，因此，當疑歐派便提出脫歐之後無需再繳交昂貴會費，甚至可以把每年省下的金額挹注在 NHS 全民健保體系使國民立即受惠，果然吸引一向對歐洲事務較於冷淡及陌生的英國人民支持。
4. 世代差異問題：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選民結構指出在 65 歲以上的族群中有 60% 支持脫歐，而在 55-64 歲年齡層則有 57% 支持脫歐的比例，顯見 55 歲以上的族群超過半數均支持脫歐(李淳、杜巧霞、葉長城、吳柏寬、李宜靜，2016:24)，此一現象反映出老年人較無法理解或享受到區域整合所帶來的效益。同樣的，除了大都會區留歐票數高於脫歐外，包括南部、中部、西南及東北部地區等偏鄉地區，均是脫歐派勝出，也反映出類似的情況：都會區之外的地區較難自歐盟一體化的的便利性及經貿優勢中得益。因此舉凡年紀較長、居住於偏鄉地區者、及其他自身條件居於弱勢、競爭力不者，自然覺得留在歐盟是弊多於利。

三、英國脫歐的利與弊

脫歐派主張，英國離開歐盟之後，在貿易、財政、金融自由度、

³ LeaveEU 文宣。http://leave.eu/downloads/Independence_Facts.pdf.

立法各方面均更能自主、有更好的發展，此外，英國也可以重新拿回主導權，掌控自歐盟自由入境英國的人口、以及從非洲和中東地區湧入英國境內日益增長的難民人數。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及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作出利弊分析，認為脫歐有以下優勢(The Economist,2016; HM Treasury, 2016)，包括：

- 1.貿易自由度提高：英國可重新協商與歐盟的合作關係，不再受到歐盟法規的約束。
- 2.可自由運用經費：英國不必再向歐盟繳納高額會費，可將此筆費用挹注在國內發展與產業上。
- 3.重得法規自主權：可自主規定包括勞動法規、醫療健保、國家安全措施等。
- 4.管控移民政策：可有效管控境內移民制度，無須再配合歐盟移民政策。
- 5.國際地位提升：取得話語權與談判權，可在自由貿易與國際合作議題上進行談判、提升國際地位。
- 6.金融自由度提高：倫敦的金融業績將可擺脫歐盟繁複的法規與程序，以更具彈性的方式提高競爭力。

但除了上述利益之外，英國同時也必須承擔脫歐之後的部分風險，例如貿易成本的上升、貿易規模縮小、外資投資興趣減少等挑戰，此外，倫敦金融中的地位也有可能被法蘭克福或巴黎所取代，而政治上，英國也極為可能面臨蘇格蘭藉此機會爭取獨立。

四、英國脫歐之後的選項

然而儘管英國脫歐已成定局，但就歐盟是全球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市場之一的現實面而言，英國完全斷絕與歐盟的貿易往來並不是

明智之舉，因此，英國必須思考的是在脫歐之後該如何維繫與持續推動區域整合的歐盟彼此之間的關係。

若以當今非歐盟會員國與歐盟現行的經貿互動模式而言，大致有三種模式，包括加入自由貿易協會或經濟區的模式、簽署雙方自由貿易協定的模式、或依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因此，英國脫歐之後也極有可能從中選取較有利的模式來維持與歐盟市場的互動關係(陳希宜，2019：92-96)：

1.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模式或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模式⁴：EFTA 模式又稱為瑞士模式、而 EEA 模式又稱為挪威模式。兩者的共同點為均需要加入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差別則為是否進一步加入由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和歐盟共同成立的歐洲經濟區並進而得以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例如瑞士模式是透過與歐盟訂定各項雙邊協定來規範雙方的關係；而挪威模式則透過進一步加入歐洲經濟區來保持和歐盟的聯繫。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原為1960年由英國與其他尚未加入歐盟的國家所創立，然而隨著大部分的會員國紛紛加入歐盟後，目前僅剩挪威、冰島、列支敦士登與瑞士仍是會員國。1994年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與歐盟達成協議設立歐洲經濟區，讓其會員就算沒有加入歐盟也可以透過歐洲經濟區參加歐洲單一市場，目前歐洲經濟區成員包括歐盟會員再加上挪威、冰島與列支敦士登三國。

英國可選擇重新加入當初創立卻又捨棄離開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並透過該協會繼續成為歐洲經濟區的成員，加入單一市場來維繫英國與歐盟的經貿關係，並享有歐盟大部分的

⁴ EFTA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efta.int/about-efta/the-efta-states>; EEA Arrangement. <http://www.efta.int/eea/eea-agreement>.

優惠；或是選擇歐洲經濟區模式以取得進入歐盟單一市場的權利，原則上英國出口商品到歐盟仍可享有零關稅待遇，也能提供金融服務，並且得與其他國家締結貿易協定，算是經濟衝擊代價相對較低的選項。但在以上種模式中，英國必須遵守歐盟決議、繳交貢獻金給歐盟，卻不能參與歐盟決策，地位遠遠不及原先會員國所享有的權利，最為不利。

2.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模式或關稅同盟模式：此 FTA 模式因加拿大採取此一方式與歐盟市場連結，也因此也被普遍稱之為加拿大模式(江庭瑀, 2018)⁵。英國與歐盟針對各項議題展開談判，進而簽署各項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藉以持續擴大參與歐盟市場的空間，這種低度整合的模式可讓英國享有更多的自主權，例如限制人員移動、不需要貢獻歐盟預算等優勢。

若採取關稅同盟、又或稱作土耳其模式與歐盟建立關係，英國可在歐盟境內採取共同關稅與同一商業政策，但其享受的市場進入優惠待遇自然不能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相比，雙方經濟整合程度也將會從單一市場退回低度經貿整合關係。

3.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模式：僅僅是一般性的最惠國待遇，所有經貿問題一律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定處理。而英國本來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就算退出歐盟之後也不需要大費周章重新加入，但由於英國原本是以歐盟一份子的身份下，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其他成員國做出的承諾表(schedules)，意義等同於是歐盟對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國的承諾表一般，因此當英國退出歐盟後將導致原先的承諾表產生變動—至少英國的部分勢必要重新改寫。

⁵原文出自 Tom Dunn, "UK financial Services after Brexit," *Burges Salmon*, 2018/01/31. <https://www.burges-salmon.com/news-and-insight/legal-updates/uk-financial-services-after-brexit/>. Accessed on 2018/12/24

此外，英國新承諾表的擬訂將涉及英國、歐盟與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國之間的談判，包括農業補貼的限制、關稅配額等等敏感議題，其他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有可能不允許英國依照現有的條件與其進行貿易，例如俄羅斯等較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家，可能就不願意英國享有比自己更好的待遇，再加上包括國際政治爭端或各別國家強大的國內利益考量等等因素，均可能影響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同意英國新的會籍條件之意願，因此一般認為此一談判不僅將耗費冗長時程，且過程將會十分複雜與困難。

五、英國脫歐的進度

由於英國脫歐無先例可循，相關條約也僅有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規定，退出歐盟協定應自通知之日起 2 年完成，否則歐盟相關協定便將於 2 年期滿時對該退出成員國終止適用，但在歐盟及申請退出成員國的共識下，得以按雙方合意予以延長的簡單陳述，而無進一步詳細規定，因此自 2016 年公投案脫歐通過後始始終未能如期完成脫歐的程序。

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曾三度於國會提出脫歐協議草案，卻屢屢遭到否決無法闖關成功，其中，為爭取國會支持所提出了十點新脫歐協議，卻連同黨議員也不支持，導致脫歐日期由原本的 2019 年 3 月 29 日延至 4 月 12 日，又再度延期至 10 月 31 日，而梅伊也因此宣布在 6 月 7 日辭職，歷經三年的英國脫歐程序再度陷入不確定性、談判時程大幅延期，不僅對英國國內政治局勢造成衝擊、對於期望態勢早日底定的歐盟而言也是既困擾又煎熬。

肆、英國脫歐對歐洲整合的影響

英國脫歐之後，對於自身國家發展、以及歐洲區域整合將有何影響？根據歐盟每年一月針對會員國人口普查的統計顯示，英國 2018 年註冊的人口數 66,238,007 萬，僅次於德國與法國，佔歐盟 28 國人口總數的 12.9%⁶，是歐盟中僅次於德國人口最多人的國家⁷，英國也是歐盟會員國中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歐盟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14.6 兆歐元，英國就佔了其中的 17.6%，僅次於德國。此外，英國與歐盟貿易關係密切，佔其對外進口約 14.5%、對外出口約 11.6%，同樣僅次於德國，貿易逆差高達 90 億英鎊，足見英國在歐盟中的份量⁸，一旦脫歐等同於砍斷歐盟的四肢，對歐盟、或是對英國的經濟而言都是重大傷害。

英國脫歐之前，全歐洲的資金幾乎都聚集在倫敦，但脫歐以後，有相當一部分資金，可能重回德國法蘭克福和法國巴黎，屆時將有一大筆資金遷徙，因此，英國脫歐將不僅將重挫歐洲經濟，自己也可能付上倫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慘痛代價(陳希宜，2019)。此外，脫歐以後，英國所有銀行的法令遵循、IT 資訊系統，屆時可能都要大幅修改以適用未來法規，直接導致大批銀行的成本增加 (蔡曜蓮、楊紹華、周岐原，2016)。而在人員的跨境移動方面，未來除英國白領或專業人才可能外流外，企業在英國雇用其他歐盟國家勞工，也可能遭遇新的障礙或限制，而造成缺工問題(徐遵慈，2019)。

⁶ Eurostat 每年一月一日統計會員國國內合法註冊的居民總數。<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ps00001&tableSelection=1&footnotes=yes&labeling=labels&plugin=1>

⁷ 根據 Countries in the EU by population (2018)，截至 11 月的即時統計，英國人口已突破 6,670 萬，躍居成為歐盟人口數第二名。<http://www.worldometers.info/population/countries-in-the-eu-by-population/>

⁸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s://www.ons.gov.uk/economy/grossdomesticproductgdp>

除了經濟效應之外，英國脫歐將打破傳統政治上歐洲整合主要由英、德、法三方主導的平衡，黃文正(2016)曾形容在歐洲的整合上，「德國扮演加速器，堅信有效率功能的歐盟是邁向歐洲和平繁榮的唯一長程路徑；而英國則充當煞車器，強力抗拒全面推進歐洲政經整合」，然而由於法國近年來景氣不佳、政經發展不順又疲於應付恐攻事件，在英國退出歐盟，極有可能由德國成為一方獨大的歐盟主要領導者（吳振達，2017）。

儘管英國脫歐重擊了歐洲區域整合的，且後續恐引發骨牌效應，導致其他會員國仿效舉行脫歐公投，尤其是境內原就有分離運動訴求的會員國，包括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等國，均有可能藉機引發獨立運動，但也有樂觀主義者認為既然英國總是以若即若離的姿態遊走在歐盟會員國中謀求自己的利益，而非以歐洲國家的共同利益為優先考量，或許在英國脫歐之後，歐盟會員國的共識度及互信度反而會更高、更有利於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對此歐盟輪值主席國荷蘭總理呂特(Mark Rutte)便表示儘管他對英國脫歐的決定感到失望，但卻也認為英國脫歐應該被視為歐盟改革的契機（吳振達，2017）。

伍、結論

英國從歷史上來看，緊守著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與歐陸國家維持著若即若離的互動關係，對於歐洲區域整合的推動也不甚積極，從英國脫歐一事足見當初加入歐盟最大的理由依舊為了追求國家的最高利益，一旦察覺付出與收益不成比例，英國人民便毫不遲疑地選擇退出已經參與四十多年的整合機制。儘管最初卡麥隆祭出公投案所圖求的僅為政黨利益、並非樂意預見英國陷入脫歐的泥沼中毫無進展，但是已至此，包括英國國內、歐洲地區、以及全球社會，都

注視著英國的解套之道，畢竟這是歐洲推動區域整合運動中最大的震撼與挫折，也極有可能成為未來類似案例的參考典範。

對歐盟成員而言，在經歷對英國脫歐前談判的種種退讓，卻依舊換來英國脫歐的結局，六大創始成員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的外交部長在英國公投結果揭曉後的兩天，立即在德國首都柏林表達了強硬且一致的態度，要求英國應該「立即啟動脫歐進程」，顯然歐盟已從中得到教訓，若縱容英國來去自如、無須經歷任何痛苦歷程，未來極可能導致引發其他成員國效仿求去彷彿骨牌效應，那才真是歐洲區域整合的大災難。因此，若能藉由此番處理英國脫歐以建立程序與典範，並著手改革歐盟的相關制度，未嘗不是個契機調整歐洲整合機制朝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不僅對會員國而言是種保障，也可使歐洲區域整合機制更加穩固。

而至於英國對內、對外包括政治與經濟發展上將面臨諸多頗多挑戰的聲浪與疑慮，包括蘇格蘭極為可能在英國政府忙於完成脫歐程序之際，藉機再次爭取獨立而致使國土分裂；以及經貿上因著法規不便、貿易障礙增加，而造成貿易成本上升，外資投資興趣降低、貿易規模縮小等挑戰，皆將成為英國持續發展與壯大。然而儘管脫歐反映著英國積極參與歐洲區域整合的腳步將有所暫停，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英國從此將不再受限於歐盟法律的管轄或歐洲單一市場及相關自由貿易協議的約束，可以更為彈性地調整包括貿易、財政、金融等政策，對於近年經濟發展疲軟的英國而言或許正是良機，也正式宣告英國將從參與區域整合正式轉向發展全球市場。

參考資料

英文書目

- “A Background Guide to ‘Br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conomist*, 2016/02/24; IMF, “Country Report-United Kingdom: Selected Issues,” 2016/06/17,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6/cr16169.pdf>, accessed on 2018/10/31;
- Boffey, Daniel. “David Cameron Believed Brexit Vote Would Never Happen, Says Donald Tusk,” *The Irish Times*, 2019.01.21.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uk/david-cameron-believed-brexit-vote-would-never-happen-says-donald-tusk-1.3765926>. Accessed on 2019.01.26.
- Bono, Narihiro.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政策科學*(2002), pp.117-130, available at http://www.ps.ritsumei.ac.jp/assoc/policy_sci ence/101/101_10_bono.pdf. Accessed on 06 April 2018.
- Cantori, Louis. J., & Spiegel, Steven 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Eaglewood Cliffs: N. J. Prince-Hill, 1970), pp.1-7
- Cowell, Alan. “Insularity Cuts 2 Ways for Britain”, *The New York Times*, 2011.12.9.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1/12/10/world/europe/10iht-letter10.html>. Accessed on 2018/10/22
- Dunn, Tom. “UK financial Services after Brexit,” *Burges Salmon*, 2018/01/31. <https://www.burges-salmon.com/news-and-insight/legal-updates/uk-financial-services-after-brexit/>. Accessed on 2018/1

2/24

EEA Arrangement. <http://www.efta.int/eea/eea-agreement>

EFTA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efta.int/about-efta/the-efta-states>;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 330

Haas, B. Erns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0, Vol. 15, No. 3.

Haas, B. Ernst.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anggi, Heiner; Roloff, Ralf; and Ruland, Jurgen. “Interregionalism: 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14.

Hettne, Björn.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42

HM Treasury, “HM Treasury Analysis: The Long-Term Economic Impact of EU Membership and the Alternatives,” April 2016,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17415/treasury_analysis_economic_impact_of_eu_membership_web.pdf, accessed on 2019/04/20.

Kupchan, Charles A. “Regionalizing Europe’s Security: The case for a New Little Europ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 Direction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09-238
- Mitrany, David.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Federal or Functional."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65, Vol. 4, No. 2, pp. 119-49.
- Mitrany, David.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1975).
- Nye, Joseph.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p. vi-vii,
- Russett, Bruce M.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cago: Rand-McNally, 1967).
-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EU Referendum Results," <https://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find-information-by-subject/elections-and-referendums/past-elections-and-referendums/eu-referendum/electorate-and-count-information>. Accessed on 2019.01.26.

中文書目

- 王玉葉,〈歐洲聯盟之輔助原則〉《歐美研究》第三十卷第二期(2000), 頁1-30。
- 王泰銓,《歐洲聯盟法總論》(台北:台灣智庫,2008),頁11-12、28-30。
- 江庭瑀編譯,〈簡介英國脫歐談判中金融服務議題可能採取之模式〉,《經貿法訊第 230 期》(2018),頁6。<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30/1.pdf>。檢索日期2018/12/24。
- 吳振逢,〈英國脫歐效應及歐洲整合前景〉《國會季刊》,第45卷第1期(2017),頁32。<https://www.ly.gov.tw/Pages/ashx/File.ashx?FilePat>

- h=~/File/Attach/40965/File_14626.pdf，檢索日期2018/10/29。
- 吳鵬翼，〈東亞區域主義發展與中國的腳色〉《龍華科技大學學報》第33期（2013），頁91-113。
- 李淳、杜巧霞、葉長城、吳柏寬、李宜靜，〈英國脫歐後對全球及我國經貿影響〉，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諮詢回覆，中華經濟研究院編號 1050604，2016，頁 19-20。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Doc/5f3ca3be-ca49-42f6-8011-8fe61684b455.pdf。檢索日期 2019/04/29
- 胡全威，〈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之評析〉。國政論壇。2002年6月11日。網址：<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NS/091/NS-B-091-015.htm>
- 徐遵慈，〈英國脫歐對我國的經濟影響評估〉，中華經濟研究院。2019。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9003>。檢索日期2019/01/27
- 郝培芝、羅至美，〈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收錄於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出版社，2007），頁381-413。
- 馬嫻，《區域主義與發展中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陳希宜，〈剖析英國脫歐及其對區域整合與發展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六十五期(2019)，頁81-102。
- 張心怡，〈英國的脫歐公投及其對英國和歐洲整合之影響〉《國際與公共事務》，第二期(2015)，頁43。
- 梁銘華，〈從區域主義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從中國視角出發〉收錄於宋鎮照、陳欣之（編）《變遷中的東南亞整合—過程、挑戰與發展》（台北：五南書局，2008），頁211-251。

陳仲沂，〈從區域主義觀點論冷戰結束後歐盟與東協發展歷程之異同〉

《台灣關係研究季刊》第7卷第1期（2011），頁1171-194。

黃文正，〈歐盟分裂：遺憾、尊重 歐盟巨頭：英國要走快走〉，《中國時報》，2016年6月2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25000343-260102>。檢索日期2019/01/29

蔡曜蓮、楊紹華、周岐原，〈三位趨勢大師 解讀英國風暴後全球新局〉，《今周刊》，1019期(2016)。<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606300020/%E4%B8%89%E4%BD%8D%E8%B6%A8%E5%8B%A2%E5%A4%A7%E5%B8%AB%20%E8%A7%A3%E8%AE%80%E8%8B%B1%E5%9C%8B%E9%A2%A8%E6%9A%B4%E5%BE%8C%E5%85%A8%E7%90%83%E6%96%B0%E5%B1%80>。檢索日期2018/11/02。

蘇宏達，〈台灣歐盟專家蘇宏達，如何解讀英國脫歐？〉遠見，2016-06-24。<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33183>。檢索日期2019/04/20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第五期

出版發行／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電話：(05) 226-3411 分機2001

傳真：(05)226-6540

網址：<http://www.ncyu.edu.tw/ncyuhg>

編輯者／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池永歆

責任主編／涂函君

編輯委員／呂慎華 吳昆財 吳建昇 涂函君

莊淑瓊 陳希宜 陳凱雯 談珮華（依姓名筆畫排序）

執行編輯／O.Q.(廖昭雄)

助理編輯／林滋珉 吳佳倩

內頁排版／林滋珉 林靖儒 楊涵絜 陳昱瑋

封面設計／秦孝芬 黃若綺 盧淨玉

印刷／金三裕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創刊／2016年11月

刊期／不定期出刊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版次／初版一刷

定價／新台幣360元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GPN 2010503215

ISSN 25200216